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朝鲜战争（下）

 **eBOOK**
网络资源 非精英

朝鲜战争（下卷）

第三十三章 打过三八线

除夕之夜军号响，炮声隆隆刀闪光；
枪林弹雨无所惧，大雪纷飞渡大江。

第二次战役后，美李军一下子退到三八线以南。此刻，彭德怀认为，我们和敌人之间的距离不能拉得太大。所以志愿军部队略事休整后，又急速向南挺进。

这时，志愿军总部驻大榆洞离前线已经太远，彭德怀要求靠前指挥，于是往君子里迁移。那里离平壤较近，同朝鲜领导人联系也比较方便。

彭德怀的指挥所就设在山脚下个木板棚里，在棚后的石壁上挖了个又大又深的防空洞。这样，办公、防空都不成问题。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一到君子里，就用报纸把彭总办公室的板墙糊得严严实实，用废弹药箱垒起了一张办公桌，放在进门的左边。桌上铺着自布，放着彭总最心爱的那只象牙边的放大镜，以及紫狼毫毛笔、铜墨盒、烟灰缸，还加了个用竹筒做的很精致的笔筒。进门，板墙上挂着那幅大军用地图，还用废弹药箱做了一只不太结实的凳子，在靠山脚板墙那边放了一张旧行军床。另外，进门的右边放了一条比较像样的长板凳，那是招待客人用的，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奢侈品”。

彭德怀第一次走进这间办公室十分满意，他笑咪咪地对警卫员说：“小景啊！你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很有艺术天才嘛！布置得满不错，真像个特殊招待所。”

彭德怀搬到君子里，由于这里的环境比大榆洞好，他的心情也就更加舒畅，每晚总是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入睡。他一直为运筹第三次战役费尽脑汁。他认为，我军虽然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尚未大量歼灭敌人主力，而且部队减员严重，连续作战非常疲劳，供应十分困难，所以急需休整一段时间，等到明年春季再进行新的战役。但是，形势发展很快，不容我军等到春天再战。

“怎么办？”彭德怀经过反复考虑，认为部队还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做好作战准备，下决心打。

12月15日，他召集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解沛然等研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一定要打过三八线去！

鉴于美英军集中在汉城，拟先集中兵力打伪军，牵制美军。首先歼灭伪第一师，尔后相机打伪第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再打春川之伪第三军团；如进展不顺利，再改变作战方针。彭德怀说：“突破就是胜利，就是对敌人和谈阴谋的有力打击。”

敌人经过我军两次打击，尤其是在第二次战役中它们所受的打击更沉重，因此对我军的力量由轻视转变为畏惧。这时，美国同其仆从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军事上的失败而日益加深；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呼声一天天高涨：美国处在军事、政治两不利的境地。为了缓和国内各种矛盾，挽救其军事上的败局，于是想从“联合国”这个美国的御用工具身上找出路。12月14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所谓“在朝鲜停战的建议”，企图利用三八线在人们头脑中的旧印象，进行政治欺骗宣传，引诱我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使其残兵败将得以休整补充，之后卷土重来。

12月16日，杜鲁门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将美国军队从当时的250万人增至350万人，还要求在一年之内将其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4至5倍。

在朝鲜战场上，敌人退到三八线就不再退了。他们在横贯朝鲜半岛约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组成了两道基本防线。第一道防线称为A线，西起临津江口大洞里，经汶山、舟月里，沿三八线附近向东至长存里；第二道防线叫B线，西起高阳，经议政府、加平、春川、自隐里至冬德里。为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三十七度线，还准备了三道机动防线，称为C、D、E、防线。C线是沿汉江南，经杨平、横城至江陵；D线是从水原经利川、骊州、原州、平昌至三陟；E线是沿37度线，从平泽经忠州至三陟。

这时，敌军在朝鲜的总兵力已达34万多人，一线兵力与第二次战役时相同，仍为5个军13个师零三个旅，约20余万人。敌人部署的特点是：第一线是李伪军，第二线是美、英军，其大部分集结在汉城周围和汉江南北地区的交通要道上。这就明显地摆出了一副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随时撤退的架子。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司令员与金日成首相商定，集中九个军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为了使中朝军队有效地配合作战，经中朝两党协商，已于12月4日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统由联司指挥。联司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另由朝鲜方面推荐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关于第三战役的部署，在中朝联合司令部的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首先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第三次战役会比上两次战役打得好，因为敌人已是惊弓之鸟，士气低落，连招架之力都不足。我们是进攻部队，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从上到下都摸到了敌人的老底，信心足，士气旺，这就是我们胜利之本。”

“但是，下一次战役，我们怎么个打法呢？”彭德怀稍微停了一下，继续说，“我考虑，还是集中优势兵力，围敌人一个点或一小股，围好就干净歼灭，并引敌增援，以便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打援，将其歼灭。各军要控制足够的预备队和强大的打援部队，以保证连续的突击力量。”

经过全军干部的充分讨论，12月22日定下了最后的作战部署，全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右纵队以志愿军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军并加强炮兵六个团组成，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首先歼灭伪第六师，再歼伪第一师，尔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人民军第一军团主力向汶山方向实施佯攻，配合志愿军右纵队歼灭伪第一师，另以一部在海州地区警戒海上敌人，保障我右翼安全。

左纵队以志愿军第四十二、六十六军并加强炮兵第四十四团组成，由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指挥。首先歼灭李伪军第二师一至两个团，尔后切断汉城、春川间的交通；另以一个师抓住李伪军第五师，策应左翼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南进。

过了两天，即12月24日，毛泽东主席又就第三次战役的具体战法问题，给彭德怀发来了如下的电报。

德怀同志：

国内伪军及美军一部在三十八度至三十七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目前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

利。因此，不但我军于此次战役后收兵休整可以向后撤退一步，使伪军又能集中起来，构成防线，以利下一次歼击，而且对于原定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该两兵团在此次战役后暂时和志愿军一同休整，不要南进，待下一战役后再行南进，似较适宜，究应如何，请你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主席的这些指示，具体而详细，不但进一步坚定了我军打过三八线的决心，而且还更加完善了我军的作战部署，为了加强志愿军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决定尽快补充两千辆汽车；命令一个工兵团入朝担负修建定州至平壤的公路、桥梁及扫雷任务；命令铁道兵桥梁团和独立团入朝执行抢修大同江桥等铁路桥梁任务。

根据前两次战役的经验，我军没有制空权，敌机白天轰炸很厉害，我们只能靠晚上打仗。在有月亮的晚上，更能发挥我军夜战优势。阳历12月底1月初，正好是阴历11月中旬，是月圆期。

12月31日又是阳历新年除夕，美伪军对过新年感兴趣，过了圣诞节，就要过新年。选择这个日子，更能出其不意，保持突然性。于是，彭德怀当即决定，把战役发起时间选在除夕，即12月31日的夜晚。

在发起攻击的前两天，12月29日上午，雪絮纷飞。指挥志愿军右纵队的韩先楚副司令员向志愿军总部报告说：“突破三八线歼灭伪六师作战，决定于31日黄昏开始总攻击。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统于31日16时40分开始炮火袭击，17时步兵开始攻击；第四十军于31日20时开始攻击。步兵突破成功后，即组织一部分炮火渡过临津江，以便继续支援步兵纵深作战。”

1950年除夕到来之前，云集在与敌人对峙的正面阵地上的各个部队，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突破临津江，越过三八线，歼敌迎新年，为中朝人民再立新功，给毛主席、金首相拜新年！

12月31日黄昏，我军按照预定计划，在约20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全线发起攻击。当时针指向17点的时候，一串串耀眼的信号弹飞向阵地上空，我们的大炮怒吼了。顿时，一片闪动着的红光，带来一阵阵天崩地裂似的轰鸣。大炮轮流吐着长长的火舌，成群的炮弹风暴似的飞向敌人工事，敌人阵地陷入了烟雾火海之中。高亢嘹亮的军号声震荡着冰河与山林，在“同志们冲上去！过江就是胜利！”的口号声中，右纵队担任正面突击的部队，在炮火与密集的重机枪的掩护下，开始了抢渡临津江的战斗。

临津江位于汉城以北150里处，是汉江的支流，发源于太白山脉北端西坡，西南流经汶山西侧，注入汉江。长254公里。流域面积8118平方公里，航程121公里。河宽达百余米，两岸蜿蜒着起伏的高山，它穿过三八线缓缓折向西南，中游一段横泻在三八线上，而这段江面正是我军前进的突破点。敌人为了阻止我军过江，阵地前沿横置屋顶形铁丝网，江边、道口密布地雷，树枝上高挂串串拉雷，在陡壁绝崖的山峦上还构筑了大大小小的地堡。敌人的飞机不停地在江北岸巡逻，敌远射程炮火盲目地轰击江面。当时，三八线附近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这次进攻要跨过临津江、汉滩川、永平川和攀越海拔600—1000米的道城岬、峨洋岩、国望峰、华岳山、高秀岭等障碍。这种恶劣的天气和地形，给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进攻，更增加了困难。

然而，困难吓不倒英雄的志愿军突击队。战士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和严寒，纷纷跳进冰水里，像流星，像尖刀，像狂涛怒浪一般冲向彼岸。担任插入敌后任务的部队，英勇无畏地通过了敌前沿开阔地之后，又在峭壁陡崖间攀援前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右翼突击集团的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突破地段选定临津江新堡一段。二营五连已隐蔽在离江岸 100 米的山沟里，全部伪装起来了。气温虽然降到零下 20 多度，但大家一动不动，都在眼巴巴地盼着太阳快点下山。

战斗前，突击部队均作好了涉水破冰的准备，大家又饱餐了一顿辣椒牛肉。乘着牛肉和辣椒激发的热乎劲，副排长王殿学带着尖刀六班到了江边。一声令下，战士们不顾一切地踏破碎冰往前冲击。这时指导员在江边大声喊：“五连的同志们冲啊！立功的机会到啦！”王殿学带领尖刀班在深及胸口的江水里往前冲，棉衣、枪弹全湿透了，刺骨的寒流一阵阵涌上胸口，浑身已经麻木。我们的重炮刚向南延伸，对岸的机枪就疯狂地扫射过来。忽然一颗炮弹落在王殿学的身旁，激起的水柱有几丈高，就像瀑布那样劈头盖脸压下来。王殿学副排长有点支持不住了，幸好六班长郭文魁拉了他一把。接着，战士唐洪斌正被一块大冰排撞得东倒西歪，很危险！王殿学不顾一切地划水过去，把冰排推开，拉着唐洪斌一块浮到对岸。

当尖刀班在副排长王殿学的带领下、全部到达对岸的时候，每个人的两条腿却像几百斤重的两根铁柱一样。战士甩掉雨布套裤，又勇敢地向前冲击。这时，左面响起了激动人心的军号声和联络用的小喇叭声，我们的机枪也响了起来。七连也登岸了。王殿学副排长立即带领尖刀班向右面火光闪闪的江岸冲去。敌人的第 18 号地堡在作最后挣扎。王殿学带着战士唐洪斌迂回到 18 号地堡，把手榴弹朝着机枪射孔扔进去。随着一声巨响，机枪立刻哑巴了，里边的敌人鬼哭狼嚎地叫起来。这时，王殿学掏出小喇叭嗒嗒地吹响了，他告诉五连的战士们，我们已经胜利地占领了敌人的阵地。

1950 年的除夕之夜，是一个值得后人永远记住的除夕之夜，我军以锐不可当之势不仅突破了由李承晚伪军防守的第一道防线，而且突破了一部分由美军防守的第二道防线。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早在当晚 18 时就先后突破了南朝鲜军前沿阵地，迅速向其防御纵深发展进攻。从南朝鲜第六师左翼突击的第三十九军突过临津江后，军主力于 1951 年 1 月 1 日拂晓前占领汶山东北的大村、武建里，前进了 10 公里，并有力地策应了第五十军渡江。该军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的第一一七师，沿途击退敌人多次阻击，元旦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东豆川里以南的仙岩里，前进了 15 公里，截歼南朝鲜第六师 600 余人，隔断了南朝鲜第六师与其左翼南朝鲜第一师的联系。

从南朝鲜第六师右翼突击的第三十八军突过汉滩川后，军主力向抱川发展，进至抱川西侧的新邑里。抱川之敌已弃城南逃。该军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的第一一四师于元旦天明后坚持昼间继续前进，但这个师有的部队走错了路，直至 12 时才进至指定位置七峰山，未能与进到仙岩里的第一一七师构成合围。第一一四师到达七峰山后，发现七峰山西侧凤阳里有南朝鲜的第六师 1000 余人正在南逃，立即展开阻击，歼敌 400 人。

从正面进攻的第四十军突过临津江和汉滩川后，其第一一九师于一日拂晓进到指定位置东豆川里以西的安兴里、上牌里，并以一个连占领了东豆川里东山。但该师未能构成严密的堵击阵地，形成了缺口，致使南朝鲜第六师大部得以逃脱。

1月1日晚，志愿军右纵队继续发展进攻，人民军第一军团也渡过了临津江向坡州里前进。到1月2日晚，志愿军右纵队和人民军第一军团进到坡州里、议政府东北至抱川以南一线，已突入南朝鲜军防御纵深15—20公里。

志愿军左纵队第四十二军涉过永平川，进入进攻出发地位，然后一举突破南朝鲜军道城岬、峨洋岩阵地。该军第一二四师在突破敌阵地后，不顾山高雪深，不怕敌机威胁，兼程前进，沿途打破敌人10次阻击，于1月1日12时前出到济宁里以南的石长里，切断了南朝鲜第二师的退路，并继续向上南淙、下南淙地区突击。1月2日该师协同第六十六军主力将该地区之敌歼灭，圆满完成了断敌退路、围歼敌人的任务。该军主力在突击中于加平以北花岬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第二师一个多营，随后向加平方向发展进攻。

第六十六军主力踩着两尺多深的积雪，克服敌人设置的雷区和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突破了国望峰、华岳山、高秀岭等阵地。然后，向南朝鲜军防御纵深猛突。先后占领修德山、上红磑里、下红磑里、上南淙、下南淙等地，在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协同下，歼灭了南朝鲜第二师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和南朝鲜第五师第三十六团大部，以及南朝鲜军炮兵一个营，共毙伤俘敌32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60余门，各种枪1500余支（挺），胜利地完成了预定任务。

为此，志愿军领导机关致电祝贺第六十六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并给予通报表扬。第一九六师第五八七团第三连班长张续计，在突破国望峰以南龙沼洞阵地的战斗中，一人连续夺取五个地堡，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通路，荣立特等功。第五八六团第四连担任突破华岳山的尖刀连，经五小时激战，于1951年1月1日零时攻占华岳山主峰，获“首破三八线英雄连”锦旗一面。

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的五个师，于战役发起前越过三八线，分别向洪川、横城、原州方向渗透迂回前进，其第十二师于12月31日晨前出到洪川西南之新堡里，威胁了敌人后方，迫使南朝鲜第三师南逃。战役发起后，该两军团其余部队继续越过“三八线”，随主力向南攻进。

至1月2日，南朝鲜军固守在三八线上的部队争相南逃，整个防线便土崩瓦解了。这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进行的一次较大的对先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战役。美李军队差不多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三八线构筑了这条自称“固若金汤”的防线，却经不起中朝人民军队数小时的猛攻即崩溃了。

新到任不足一周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追述了李承晚军队从三八线溃逃时的真实情景：“敌人的攻势在大除夕黄昏后两小时到来了。那一夜，南韩第一师和第六师的败讯，不断传进我的指挥所。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南朝鲜士兵乘坐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及数人操作的武器。”

在中朝军队的勇猛攻击下，美军的狼狈情况比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也好不了多少。南朝鲜人金阳明在《韩国战争史》中写道：“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挤得简直连个小孩子都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潮蔓延开了。”

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我军已全线突破敌人防御纵深 20 多公里，将敌人整个部署打乱了。敌人第一道防线完全崩溃。右翼完全暴露。敌人怕我们从他们的右翼实施深远迂回包围，使其 10 多万军队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陷于危险境地，被迫于 1 月 2 日开始全线撤退。

当彭德怀得知敌人已无意抵抗，逃跑得很快时，估计敌人有可能放弃汉城，或退守汉江南岸，甚至有可能继续南撤，当即决定乘胜追击，向汉城进军。正是：

大军横跨三八线，
敌军拼命往南窜；
乘胜追击不停步，
汉城解放在眼前。

欲知向汉城进军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章 向汉城进军

节节推进指汉城，进军路上尽英雄；

飞雪迎春鏖战日，战地新年情更浓。

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后，敌人纷纷溃退，彭德怀司令员随即发出命令，乘胜扩大战果，追击敌人，向汉城挺进！

1951年1月3日晚，志愿军和人民军各军团转入追击作战。志愿军右纵队第五十军一部，在高阳以北碧蹄里击退美第二十五师约一个营兵力的抵抗之后，进至高阳以南佛弥地截断了英第二十九旅的退路。经一夜激战，全歼了这个旅的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一营及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缴获和击毁坦克31辆、装甲车和汽车24辆。这是一场志愿军战士用爆破筒、手榴弹同英军重型坦克搏斗的战斗。这也是在汉城进军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

自从美军三八线被我军突破之后，汉城守敌即惶恐不安。美军为了自己逃命，命令英联邦二十九旅来复枪团和“皇家重坦克营”在议政府地区担任掩护。1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某部接到了“向高阳攻击前进”的命令。高阳就在议政府到汉城的公路上，距两地各60里。志愿军占领高阳，既可威胁汉城侧背，又可断议政府英军退路。

高阳以北二里处有一个小村，名叫碧蹄里，由美军二十五师三十四团一个营据守。志愿军五十军即以两个连猛攻碧蹄里，激战20分钟，俘美军28人，残敌丢下英军抱头窜回汉城。于是，被美军司令官派在议政府担任掩护撤退任务的英国帮凶部队就完全孤立，落入志愿军的天罗地网中了。

我志愿军占领高阳后，随即向高阳东南仙游里高地进攻。仙游里高地在议政府至汉城公路以西，高200公尺，英军一营掘壕据守此地，这是英国“皇家重坦克营”的唯一后援。1月3日拂晓，志愿军以两个连猛攻这个高地，半小时完全占领。敌人跑得如此之快，以致联络飞机的信号板都未来得及搬走。就在3日这一天，从早到晚，爆炸声震撼着仙游里高地。议政府英军千余人，配合从高地逃下的英军，并用200多门大炮配合，轮番向高地反扑。敌人为了抢夺联络飞机的信号板，发动了五次进攻，都被扼守高地的志愿军某连战士击退。这个连的军事干部最后只剩下一个副排长，仍然带领剩下的战士坚持到胜利。在志愿军的前沿阵地上，堆满了英军的尸体。战士们戴上英军的钢盔，掌握着联络飞机的信号板，指挥美国飞机猛炸高地周围的英军。战士们说：“眼看着敌人打敌人，真是让人开心啊！”

在痛歼英国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中国志愿军的战士们，充分显示了高度的创造性和大无畏的精神。只第五连一个连，一个晚上就缴获、击毁敌坦克12辆、装甲车1辆；除了打死者外，还生俘英军少校队长以下32人。艾德礼送到朝鲜做美军帮凶的“大英联邦二十九旅皇家重坦克营”，就这样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歼灭了。这是一切侵略者和帮凶们的必然下场！

在向汉城进军中，我军英雄辈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第三十九军先头部队于回龙寺与美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一团遭遇，歼其一部，之后又在议政府以西釜谷里歼灭英第二十九旅两个连。在围歼英军这两个连的战斗中，第一一六师三四七团第七连担任阻援任务。当该连连长负伤、其余干部牺牲时，司号员郑起挺身而出，代理连长指挥，打退敌进攻多次，毙伤敌60余人。最后，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在6辆坦克掩护下猛烈进攻。郑起组织

全连仅剩的7名战士，把仅有的一根爆破筒和几枚手榴弹投向敌人；接着他机智地吹起冲锋号，迫使敌人仓皇溃退。郑起荣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第四十军，追击敌人至议政府东南水落山地区，击溃美第二十四师一个团。志愿军左纵队第四十二军主力和六十六军一个师由加平、春川渡过北汉江，并向洪川方向发展。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继续向洪川、横城方向进攻，截歼南逃之敌。

从突破道城岫到会歼伪二师、伪五师，仅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就俘敌2114人，全军共俘敌2797人，毙伤敌1173人，缴获山野榴弹炮22门，化白迫击炮11门，各种枪支2463支。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和六十六军受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在敌溃败之时，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四十二军，于1月2日晚在加平以南的长僧里地段渡过北汉江，抢占阳德院里，断洪川敌人退路，并向横城逼近，相机占领骊州、梨浦里，控制南汉江滩头阵地。

敌人为拦阻志愿军追击，于2日午间，美机疯狂轰炸汉江冰面。由于天冷得出奇，江面很快结了一层薄冰，被雪覆盖。这给我军渡江带来了困难。1月3日2时许，部队全部渡过了北汉江。敌人为了迟滞我军前进，除了派飞机轰炸扫射之外，沿途投下了许多定时炸弹，步兵布设雷区。仅第四十二军行进的路线上，就设有三道雷区。部队一边排雷，一边小心地前进，致使行军速度大大放慢。

1月4日，我军进至阳德院里。刚架起电台，即收到志愿军司令部给军部和一二四师发来的电报。电文大意是：命四十二军停止前进，就地待命，派一个团向横城方向侦察，弄清楚美二师是否从洪川撤下来了，横城有无敌人。随后，第四十二军又给一二四师发来电报，再次重复了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内容。第一二四师指挥部设在阳德院里。该师第三七二团驻守在龙头里，距横城约40里。师里决定派副师长肖剑飞到三七二团，于1月5日夜全团向横城侦察。

为使部队隐蔽，不暴露目标，第三七二团避开公路和较开阔的地面，专门爬山越岭前进。担任该团前卫的六连二排副排长张克文带领的尖刀班到了静冰亭村西。突然一声枪响，子弹击中张克文。尖刀班立即朝着枪响处射击，并摸了上去。见村边有两辆卡车停在路旁，车上架着重机枪。据观察认定，是敌人哨兵的警戒车。三个敌人死在车下。从被打死的都是美国兵判断，静冰亭村里驻的是美军。

副营长段培明迅速组织后面上来的部队，以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向静冰亭街里冲去。疲惫的敌人正在村民家里熟睡，做梦也没想到志愿军已经冲了进来。战士们想抓活的，但又怕惊醒敌人后负隅顽抗。因此，逐屋扔手榴弹，用步枪、机关枪扫射。打得美国佬鬼哭狼嚎，血肉横飞。

六连尖刀班冲到街东一个小山包处，向敌炮兵营猛烈射击，敌人不知志愿军来了多少人，惊慌失措，弃炮逃命。尖刀班绕过去，堵住东逃的100多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当了俘虏。在第六连刚打响的时候，敌人在公路左侧的台峰352高地向三七二团纵深队形展开射击。团长张景耀即刻命令八连连长魏修堤说：“迅速夺占台峰高地，否则后继部队受阻！”

八连连长魏修堤立即集中部队，在第三七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山头。这儿有敌一个排的警戒部队，被我炮火压得抬

不起头来。两军相遇，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我八连战士精神抖擞，龙腾虎跃，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人多势众，两三个对付一个美国佬。敌人死伤大半，只有少数人逃跑。八连夺取了台峰 352 高地，控制了制高点，保障了侧后部队的安全。

静冰亭战斗，其实是个遭遇战。被歼的这个营，是美第二师三十八团的侦察营，也是到静冰亭执行侦察任务的。敌先我五六个小时到达。我军不知敌人在此，敌也不知我突然到来。两军遭遇后，我军先发制人，将敌击溃。由于黑夜作战，未能全歼，余敌逃回横城。

就在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勇猛向汉城进军的时候，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已经意识到：撤离汉城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并且，任何试图在此时此刻阻拦这些败兵的举动，都与制止雪崩一般徒劳无益。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南逃，直至汉江以南 15 公里的预设防御线。那时候，他们溃逃的速度也许会因远离了敌军而放慢，再用宪兵来阻止他们继续后退，从而收集这些败兵残将，重新整编，再设法让他们打回来。

三天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在全线突入防御纵深 15 至 20 公里。李奇微接到报告，西线中共部队已突破临津江，逼近汶山；一支强悍的中共军队冲破层层阻击，迂回到东豆川南一带，使南朝鲜军队第一师和第六师的联系被切断，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右翼方面亦遭到中共军猛烈进攻，修德山和上下红磑里地区已被中共军队攻占。而北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军团正迅速逼近洪川、横城，威胁着第八集团军的侧翼。

要求撤退的告急电报不断从各个防御地段飞向李奇微的前进指挥所。1 月 3 日午前，李奇微乘一架小型飞机到达前线，会见一些高级指挥官。在这些指挥官众口一词的催促下，迫于中共军队全线突入纵深的巨大压力，李奇微只得下令撤到汉江以南，尽管此举非常危险。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将汉江以北众多的部队和火炮、坦克及各种车辆撤过乱冰阻塞的汉江，无疑是一种大规模的复杂军事行动。一旦撤退因中国志愿军的迫近轰击而延误在汉江以北，损失将是巨大的。

当日午后不久，李奇微就告知美国驻南韩大使莫西奥，要他通知李承晚，美国第八集团军准备立即撤出汉城，要求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必须下午 3 时以前撤离汉城；自下午 3 时起，汉江大桥和来往要道，仅供军队通过，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

很快，李奇微就接到莫西奥大使的电话，转达了南韩总统李承晚对将军的如下质问：“李奇微将军讲过，他是准备长期留在朝鲜的，可现在他刚到朝鲜一个星期，就要撤离汉城，难道他指挥的军队只会撤退吗？”

“请您告诉那位可爱的南韩总统，”李奇微在电话上对莫西奥大使说，“最好请他到前线听听中共军队进攻时吹起的刺耳的军号，看看成千上万的中共军用不堪入耳的英语喊‘缴枪不杀’和蜂拥冲锋的情景，再看看他们南韩的军队是怎样像羊群一般的溃逃吧！”

“大使先生，请你也帮我考虑考虑，这样的军队怎能实施我的突击计划？而坚守阵地就等于送死！”李奇微在电话上对莫西奥大使咆哮道，“请你转告李承晚，我李奇微现在只是撤离汉城，并没有准备离开朝鲜！”

李奇微打完电话，即吩咐人把第一骑兵师长助理帕尔默准将叫来，命令他亲自赶赴汉江大桥，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他说：“你要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证第八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从下午 3 时起，禁止非

军方以外的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以免堵塞交通。我最担心的是，汉城的数十万难民涌上大桥，那他妈的可就给中共军帮了大忙啦！”

1951年1月4日，中国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开始出没于汉城郊区。南朝鲜政府迁都釜山，“联合国军”的前进指挥所也转移到了大丘。李奇微将军看到了担任后卫的第二十七团开始撤退后，离开了位于汉城市内的指挥所。他首先把装饰在桌子上的全家照片装进箱子里。这张“全家福”还是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照的，那时，他还写了一份遗嘱。他想，既然沃克将军遭到不测，很难说同样的命运绝不会光顾他。现在李奇微把这张照片收拾好后，又把放在手提包底下的一件破烂睡衣钉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并且写了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关于这次退却，李奇微将军回忆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背靠冰封的江河进行战斗……能够给敌人以严重的损失，收到了最大的迟滞效果。……我是担心过退却的命运，即担心退却时容易出现的错误和溃败，但得知取得了以上成果，感到极大的满足。”

但是，汉城撤退时，美军采取了同平壤撤退时一样的破坏行动。军事设施不用说，凡是认为敌人可能利用的设施，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全都焚毁了。在金浦机场储存有50万加仑航空燃料和25000加仑凝固汽油弹；在富平的美国陆军后勤司令部和仁川的码头上，各种补给品堆积如山。地面军队用的补给品，随着防御计划的决定逐渐转送到天安一大田附近。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能把大量的航空燃料运送出去。因为，正如李奇微将军回忆的那样，中国军队的进攻兵力超过了预先的估计，而边境阵地只维持了两天半。这么多的航空燃料同油罐等设施一起毫不可惜地被烧掉了。冲天的黑烟好像葬送汉城第二次失陷似的飘忽在布满雪云的空中。1月4日，美国报纸曾对汉城作了如下描述：“警察已撤走，汉城的大街成了掠夺之城。……1月4日夜间的汉城，巨大的黑烟在寒风中飘动，喧闹的机枪声不时地响彻寂静的夜空。汉城已是三次改换其主人了。”

就在美军撤退汉城的当天下午，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和中国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军各一个师先后进入被美军破坏仍在一片烟火和爆炸声中的汉城。这时，为了不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汉江南岸，控制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口，以威胁汉城和妨碍下一步作战，志愿军司令部决定逼退汉江南岸之敌。因此，建议人民军第一军团留一个师守卫汉城，军团主力准备渡过汉江，相机占领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口；命令志愿军第五十军，立即以有力之一部控制汉江大桥，力争占领汉江南岸滩头阵地，军主力攻击南岸之敌，如敌继续南逃则尾追至水原待命；命令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在清平川附近渡过北汉江攻歼杨平、利川之敌，尔后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广州、水原、永登浦之敌。1月5日，志愿军第五十军、人民军第一军团主力渡过汉江。志愿军右纵队领导人决定除以第五十军继续追击外，其余各军在汉城东北和议政府东西地区待命。第五十军在追击中，于果川、军浦场歼敌一部，并占领水原、金良场里。人民军第一军团先后占领金浦和仁川港。1月8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已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赶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

这时，彭德怀鉴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似在有计划的撤退，有诱使志愿军和人民军深入后实施侧后登陆进行南北夹击的企图，为了避免上当，1月7日上午，彭德怀召集志愿军几位主要领导一起讨论了战役的进展情况。

彭德怀首先指地图上的标记说：“你们看，敌人已经退到三十七度线，前面就是洛东江了。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军突破敌人防线后，敌人每日撤退30公里左右，主力部队白天撤退，掩护部队黄昏撤退。当我军夜间攻击至拂晓停止时，刚好处在敌人预设阵地之前和敌人炮火控制之下。这就证明，敌人已接受了前两次战役的教训，摸到了我军在无制空权情况下的作战规律。所以，目前的战斗歼灭的敌人并不多，他们的主力没有受到更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敌人退得很快，退得这么远，整整一个纬度，我们乘胜追击，会不会钻到敌人的圈套中去？”

彭大将军浓眉紧锁，思绪万千，他沉思了片刻，突然在桌上猛击一拳，说：“绝不上李奇微的当！我们要当机立断，停止追击，立即结束这次进攻战役。你们的意见如何？”

“彭总分析得对。”洪学智说，“很明显，敌人还不能算是吃了败仗的溃退，我们是应当慎重。”

“我完全同意彭总和洪副司令的看法。”解方参谋长慢条斯理地说，“根据现有情报表明，洛东江一带敌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有大量兵力防守，准备以逸待劳。不仅如此，还从日本调了两个师来朝鲜；有的情报讲，从美国也调了两个师，正在途中。这些情报还需我们进一步观察。”

“这就对了，我们不能让敌人打我们的屁股！”彭德怀说，“再追下去，敌人如果再来一次仁川登陆，我们就要吃大亏了。”

“谈何容易！”解方说，“如果麦克阿瑟故伎重演，那就找错对象了！”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我们马上就此作出决定。”彭德怀说，“命令各军于1月8日停止追击，就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御。主力后撤休整，结束此一战役。”

第三次战役是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齐心协力，并肩进攻，经过连续7昼夜的奋战，前进了80—110公里，毙伤俘敌19000多人，粉碎了“联合国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敌人内部矛盾，扩大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推动了祖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持续高涨。

这次战役，志愿军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我军入朝后，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没有休整补充，部队相当疲劳；再加战线南移，运输线延长，供应更加困难。同时，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只有6个军23万余人，朝鲜人民军虽有3个军团参战，但兵力仅7万余人，总计中朝军队第一线兵力共30万人；而敌人在三八线部署了13个师，20余万人的兵力，从东线咸兴方面撤下的美伪军也向三八线增防。仅就敌我第一线兵力对比而言，我之兵力也嫌不足。

但是，依据当时的形势，从政治需要出发，为粉碎敌人诱我停战、以求喘息、卷土重来的阴谋，决定趁着敌人内部混乱、举棋未定的时机，立即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这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也是有利的。在作战指导上，彭德怀深谋远虑，采取稳进方针，适时决定战役的进止，不作深远追击，都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破三八线的行动，深受朝鲜人民，特别是饱受美李奴役统治的三八线地区人民的欢迎。当志愿军和人民军一军团渡过临津江后不

久，江南岸便流传着一首中朝人民心连心的朝鲜民谣：

临津江的水呀深又深，
中朝人民心连心，
把苦诉给志愿军，
志愿军帮助我们活了命，
志愿军给我们报仇恨！

欲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下一步行动，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章 停止追击以后

停止追击意纷纭，知己知彼定决心；
苏联大使唱反调，深谋远虑彭将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两个多月，三战三捷，特别是第三次战役，粉碎了敌人在联合国玩弄的停战阴谋及固守三八线、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企图，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与此同时，在我们内部有些人的头脑发热了，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他们对志愿军总部停止追击的命令想不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问和责难。

有人问，战役开始前你们就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怎么一打，又打大胜仗了？

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停止追击？现在敌人这样望风而逃，这样大溃败，汉城也收复了，你们为什么不追击了？为什么要结束第三次战役？

有人说：第三次战役不应该停下来，应该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国鬼子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嘛！

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实际的，在军事上是根本不可行的。“作为志愿军的司令员，”他说，“我恨不得再加把劲儿，一下子把敌人赶下海去，不是更好吗？但是，不行啊！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一下子赶下海，能赶得下去吗？不可能嘛，敌人也不会让我们赶下去呀！要是可行，我们还不愿意早日完成消灭敌人的任务吗？”

可是，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彭德怀的看法，他指名道姓的指责彭大将军：“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他坚持中国志愿军要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

远离前线的人，不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哪里知道就在捷报频传的同时，我军正在发生愈来愈多的困难。众多的部队拥挤在三八线以南狭小地区，粮食供给很成问题；气候奇寒，我军冻伤人员急剧增加。第一九六师已有数千人因冻伤而失去战斗力，这就等于敌军不费一枪一弹，我军折损近一个师。

1月5日，韩先楚副司令员打来报告：此次战役部队损失尽力骨干，第一一六师两个团伤亡1000余人，第一一九师一个团伤亡300余人，现已有不少营团失去攻击能力，甚至有的师只有半数人员在前面作战。且部队极度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行军中不少战士掉队。加之后勤供应不上，部队无鞋穿，缺弹药，炮兵因道路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作战。敌人退却前，沿途布设了地雷，我军追击时，经常发生触雷事件，仅第四十军触雷死者即达百余人。

对于这位苏联大使的批评，洪学智副司令员也很不以为然。他说，拉佐瓦耶夫只看到我们打了胜仗、士气高涨的一面，没有看到我们还有没有条件追下去的一面。

洪学智将军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具体说明了“将敌人赶下海去”，靠当时志愿军现有的力量是办不到的道理。其一，我军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减员极大，需要补充休整。其二，在第三次战役中，我军虽然获胜，但又未能消灭敌人的主力。敌人只是溃退，后备力量仍然很强，技术装备有极大的优势，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明显变化，决战条件尚不成熟。其三，三次战役后，我军战线迅速南伸，运输线急剧延长，已延长到500—700公里，再加上敌机疯狂轰炸，运输工具缺乏，补给更加困难，部队所需粮食

大部需要就地筹措，而当地群众余粮有限，难以保证需要。其四，这亦是很重要的一点，即虽然我军经连续7昼夜的进攻，前进100多公里，歼敌近两万，但是，据各部队报告，敌人抵抗并不坚决，汉城也系主动放弃，似乎严寒的气候和后勤补给方面的困难比敌人的抵抗给我军造成的阻力更大。彭德怀将军敏感地意识到，敌人有可能且战且退，诱使我军过远南进，从而疲惫甚至拖垮我军。如果在此情况下，我继续贸然大步南进，敌人一旦从我侧后登陆，对我南北夹击，很难保证不再出现仁川登陆后情形，洪学智说：“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彭总下令部队停止追击。”

1月8日，志愿军第五十军一个团南进到乌山，总部作战处据侦察情况获悉：敌军在乌山一带有伏兵，形成一个口袋。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将五十军的这个团从乌山撤回，随即下令全线停止进攻，并令人民军第一军团、第二军团各抽一部兵力于水原、全良场里、利川、龙头里、横城、下安乡里及平昌以北地区进行防御，掩护主力在三八线以南附近休整。

据洪学智将军回忆，彭德怀下令停止追击以后，苏联大使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斯大林那儿去了。彭德怀对此愤愤他说：“我是志愿军的司令员，我对人民负责，错了由我承担责任。”他给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阐明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把彭总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说彭德怀将军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另外还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以后又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去了。

在第三次战役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彭德怀即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议，总结这次新年攻势的经验，确定下一步的战斗任务，通过了《休整时期工作指示》。会议在讨论休整时间时，有的同志从我军需要出发，主张三个月；多数同志则认为，三个月太长，恐怕敌情不会允许。最后一致同意暂定休整时间为两个月，由元月15日起至3月15日止。同时指出，敌人可能迅速再来进犯，各部队应随时准备作战。1月8日，志愿军党委将《休整时期工作指示》电告各部队。

谁知就在这个“指示”发出的当天晚上，志愿军总部就接到朝鲜方面的通知，说金日成首相将于近日从平壤附近出发，前往君子里会见彭德怀司令员，商谈尔后作战问题。

1月10日晚上，金日成首相在中国驻朝鲜使馆武官柴成文陪同下来到君子里，随同来的还有朝鲜外相朴宪永。看得出来，中朝军队连续三个战役的胜利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振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一再对彭德怀司令员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胜利表示祝贺和感谢，同时也对中国志愿军下一步的打算十分关注，特别是对停止追击“不太理解”。

彭德怀在木板屋里昏黄的瓦斯灯光下，详细地向金日成首相介绍了情况，讲到前三个战役的伤亡情况；讲到当前运输的困难，部队给养状况很差；讲到敌军的布防情况和我方应避免把敌人压缩到釜山狭小的防御圈内，从而给以后歼敌造成困难等。“我所担心的是，部队如南进过远，会给后勤运输工作造成更大的压力，难以保证部队的补给。”彭德怀说，“而且，据我看，敌人并未打算死守三八线，汉城也是自动放弃的。有许多迹象表明，李奇微是在有计划地后撤，企图诱我们南进，待我们部队疲劳、给养缺乏时，再来一次登陆夹击，我们不上其当！”

“苏联驻我国大使认为，我们不应该停止南进，而应该乘现在战场上有

利的形势，继续南进。”朝鲜外相朴宪永说，“苏联同志建议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克服困难，向南挺进，对敌人施加最大的军事压力，才能迫使敌人撤出朝鲜半岛。”

待朝鲜外相讲完，彭德怀抬起头来笑了笑说：“说起来容易哟，现在敌人还有20多万，而且他们的主力并未受到多大损失。我看，不再歼灭它七八万人，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从歼敌考虑，南进过远，把敌人压到釜山，反不利于我分割歼敌。不知金首相意见如何？”

“彭司令员的意见是对的。”金日成说，“如果现在停止迫击，转入休整，不知需要多长时间？”

“说实话，第三次战役打得有些勉强，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才仓促打这一仗的。突破三八线后，气温骤然下降，有的部队衣服单薄，整营整连的人因冻伤失去战斗力。战士们咬紧牙关，徒步追击敌人，夜晚作战，白天防空，战士们太疲劳，加上后勤供应跟不上，再继续攻进，就成了强弩之末啦！”说到这里，彭德怀看了看金日成又说，“所以我们考虑，应该让部队充分休整一下，好好进行下一战役的准备，我们的重点是春季攻势。”

“彭德怀同志的想法是好的。不过，我看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即可以。时间若拖长了，河川与稻田地一化冰，部队运动就会增加困难。”金日成说，“至于提前作战的运输补给困难，我们正与交通部门研究解决办法。”

“一个月恐怕时间太短了。”彭德怀说，“我们第一批入朝部队已连续作战三个月，减员过大；第二批参战部队最快也要三至四个月才能到齐，还要进行必要的战前训练和物资准备。目前，我们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与敌人相比，数量上已不占优势。”

彭德怀说完上述意见后，双方经过反复研究、交谈，最后取得二致意见。即下一次战役放在两个月后的春季进行。这一段时间抓紧整训部队。双方商定于1月25日在君子里召开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三次战役的经验和讨论做好下次战役的准备。

彭德怀送走金日成、朴宪永后已是深夜，但毫无倦意。他戴上老花眼镜，就着一盏瓦斯灯，批阅各种文电和报告。他一边阅看电文，脑子里不时掠过刚才同金日成、朴宪永谈话的情景。他心里有些担忧，问题不只是在领导同志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经过连续三个胜仗，部队普遍产生了轻敌与松懈情绪。多年的经验告诉彭德怀：胜利的同时，也往往潜在失败的因素。

必须抓紧时间对干部战上进行正面教育，电服各种消极有害的情绪。

与此同时，彭德怀还发现，最近北京报纸的宣传调子也升温了。他看到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题为《祝汉城光复》。文中写道：“汉城的光复，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美国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坦克和大炮，在伟大的中朝人民面前，无论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已证明无能为力。中朝人民军今天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力量。他们完全有力量消灭与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恢复朝鲜的和平。”社论最后提出：“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这张报纸还报道了首都人民为汉城光复举行盛大游行的消息和照片。

看着这些报道和文章，彭德怀有些不悦他说：“大游行，庆祝汉城解放，

还喊口号，要把美国侵略者赶下大海去……解放个汉城就这样搞，要是丢了汉城，可怎么向人民交待啊！”

“有些人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困难。”彭德怀叹道，“毛主席多次告诫我们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要作艰苦斗争的准备，怎么报纸也这样宣传呢？”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没有入睡，他们正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处理与朝鲜战争有关的事务。毛泽东坐在圈椅里抽着烟，两眼望着办公桌上的一份报告。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坐在一侧的沙发上。聂总正就加强广东、福建海防的事情向主席、总理汇报。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两眼因疲劳过度充满血丝。聂荣臻说：“据各方报告，1月8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去东京密见麦克阿瑟，商谈制订反攻大陆的计划——准备用20至25万兵力进攻厦门、汕头，以配合朝鲜方面作战。据称，麦克阿瑟已告蒋介石，美国有可能在一月宣布结束对台湾进攻大陆的限制。”

“我看麦克阿瑟捉襟见肘，居然又打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的主意。”毛泽东掸了掸烟灰说，“不过，也不得不防啊！”

“我们已电告陈毅和叶剑英向志，请他们考虑加强福建和广东的防务。”

“好啊，”毛泽东点了点头说，“还要督促广东、福建两省的剿匪，务必早日完成，不得迟误。”

有关华东和中南防务问题处理完后，三位领导人的话题·又转到朝鲜战场上。周恩来说：“对于1月13日联合国通过的停战委员会拟定的五步方案，我们应尽快作出反应，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并就此给苏联方面发个备忘录。我已指定外交部拟文，很快就可报来。”

毛泽东一面听着周恩来讲，一面从圈椅上站起，思索了片刻，说：“美国要的是先停火，再谈判，为的什么？无非是停战对他有利。只要先停战，美国就可能保存实力，还可以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嘛，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

“我们绝不上美国的当。”毛泽东说，“我们要拒绝先停战的谈判，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的主张：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

“谈判内容还要包括美国第七舰队从台湾撤离和恢复我们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周恩来插话说。

“对！就是要将美国一军！”毛泽东说，“杜鲁门很可能不会同意我们的提议，否则他就太丢面子啦。如此说来，决定问题的还是战场上的军事形势。因此，必须督促中朝军队加紧整训，以强大的力量迎接春季作战。”

“德怀同志电告，他们已通令全军停止追击，转入休整，并准备于1月25日召开中朝两军干部会议，总结三次战役经验和讨论下一步行动。”周恩来说，“我军入朝两个多月，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部队太疲劳了，减员也很多，的确需要充分休整，以利再战。”

“依我看，今后敌人统帅部方面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毛泽东站起来说，“其一是，在中朝军队压迫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其二是，双方进行反复较量，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长期的艰苦的战斗准备。”

“当然，我们在精神上也作好另一种可能的准备，敌人不允许我们充分

的休整，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下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形势，那我们就以两个月至三个月时间充分地各项准备，以备明年春季再战。”

“主席，总理，”聂荣臻插话说，“最近，苏联军事顾问沙哈诺夫将军和我谈到，近日敌军侦察进攻很积极，而且美三师已增至防御线正面，有攻占我汉江南桥头堡的迹象……而我中朝部队，主力过于靠北，只伸出少量部队在前，正面连不成防线，容易被敌人乘虚而入。他认为目前应加强正面防御，防敌攻占为好，不然，汉江南桥头堡被敌攻占，我春季攻势开始须要重新夺回，会增加尔后作战困难。”

毛泽东移动着高大的身躯，走到挂图前，看了好一阵说：“加强汉江正面防御，似可确保我三七线以北已攻占的地区，不过，我军作战历来不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的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看还是怎么有利于歼敌怎么办好。日前，我最担心的是把敌人压缩到釜山、大丘狭小防御圈内，不利于我歼敌，而敌人此进则不足惧，这反而有利于我们运动歼敌。”

周恩来说：“我看，此事征求一下德怀同志的意见吧。请他考虑一下，究竟怎么办好，由战地司令官综合情况拿出意见。”

“还有，最近收到志愿军党委打来的报告，准备开一个中朝联军干部会议，以总结经验、统一思想，他们希望有中央、东北局的同志出席，并请朝中央方面主要负责人出席。”周恩来讲到这里，看了看毛泽东，说：“请主席考虑，派谁去较为合适？”

“让高岗同志去参加，他既可以代表东北局，又可以代表中央方面嘛。”毛泽东想了想说，“这是彭德怀的主意，金日成同志担心部队休整时间过长，贻误战机。苏联驻朝大使对彭下令收兵休整又很有意见，他感到不好办，曾提出要与金日成一起到北京来商量下一步作战计划。现在时间很紧，不可能来北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会上讨论解决，无非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嘛！这件事要征求金日成的意见，会议要请他参加主持。请恩来拟个给金日成的备忘录，我看后用电报发去征求金的同意。”

1月25日，中朝两军高干会议如期在君子里一个矿洞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金日成首相和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志愿军的其他领导人，有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有志愿军直属各部、各军的主要负责人，朝鲜人民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到会正式代表60人，列席者62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来朝参观的领导干部和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均参加了这次会议。

陈赓将军是从越南回来即来朝鲜的。

1950年夏，他率部解放云南后，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和胡志明主席之邀，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越，协助越南共产党和越人民军总部指挥越北边界战役，打破法军对中越边界的封锁，使越南抗法战争获得稳定而强大的后方。他刚从越北战场凯旋归来，征尘未拂，便奔赴朝鲜参加会议，并实地考察对美军作战的经验。

为了便于总结经验，互相学习，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混合编为六个组。25日上午，大会首先由金抖奉致开幕词，彭德怀司令员作《三个战役的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25日下午至26日，朴宪永、邓华、杜平、解方、洪学智、韩先楚先后作了专题发言。27日分组讨论。28日金日成、高岗讲了话。29日上午彭德怀司令员作了大会总结。

彭德怀在大会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前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他说：“在三个战役中，我们歼灭了敌军七万余人（敌军非战斗减员如冻伤、病、逃等未计在内），收复和解放了朝鲜三分之二的领土。这个胜利奠定了取得更大胜利的基础，巩固了中国的国防，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弱点，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计划，扩大了美帝国主义内部和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裂，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因此这是一个伟大胜利。但是，美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退出朝鲜，美国因为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因为要保护他们在朝鲜所掠夺的财富，并且也因为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彭德怀指出：“在朝鲜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的优势在我们的正义性和部队的人数较多，敌人的优势在于其装备优良。我们在三次战役中完全没有飞机、坦克，极少大炮，几乎没有反坦克武器，运输工具很少和兵站机构极不健全；而敌人则有强大的空军、坦克部队、炮兵和运输力量。但是我们仍然得到了胜利。”

谈到胜利，彭德怀主要列举了如下的原因：

——我们的作战是正义的，它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尤其东北人民的全力支持，友邦人民的援助和全世界人民的援助。没有这些支持和援助，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作战既然是正义的，是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后勤工作人员、参谋机要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就能够在作战中完全团结一致，上下友邻之间万众一心，就能够无比的英勇，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进行近战、迂回、挺进，敢于以各种轻型武器来对付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没有这种团结和英勇，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优良的政治基础上，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军事指导原则，即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敌人，予以各个歼灭。三次战役的胜利，证明实行这个军事指导原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胜利是不可能的。

彭德怀在报告中高瞻远瞩，除了指出前三次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总结了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基本经验外，还分析了第一次战役我们不进行追击而采取诱敌深入，第二次战役进行相机追击，第三次战役虽然大胜但不进行猛烈追击反而停止进攻的原因。

他说：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敌人的装备虽然占优势，我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但在渗透敌人纵深或迂回敌后，或疏散的追击溃敌的条件下，白日作战仍是可能和必要的），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分割，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混乱敌之部署，乘胜全面猛攻，使敌自顾不暇。

彭德怀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政治地位和扩张野心，而且迷信其装备优势，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准备，给敌人以更大打击，才能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他要求各部队要做好下一次战役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特别要搞好后勤保障。在朝鲜的作战中后勤工作特别繁重、复杂而艰巨，必须加强后勤工作的机构和干部，进一步克服困难，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战争胜利。

最后，彭德怀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强调了要进一步加强中朝两党两军的团结。原来的讲话稿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有成绩，这是光荣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过去朝鲜有很多同志参加中国革命战争，为中国人民而流血，我们应当学习。”

毛泽东最初看到这段文字后，稍感不足，特电告彭德怀，并亲笔增加了如下文字：

“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想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当彭德怀将军在会上诚挚而有力他讲完这段话时，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轰然而起，中朝指挥官相互握手致意，掌声撞击着每个人的心扉。

继彭德怀报告之后，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发言中，着重讲了如何把各种与战争相抵触的思想，引导到积极作战，争取光荣的胜利上来。为此必须抓好两个环节。他说：一是不断宣传胜利，鼓舞士气，增强胜利信心，部队出国前由于对美军不摸底，有信心不足的问题。出国后，打了胜仗就高兴，打得不好，部队伤亡大，环境特别艰苦的就容易出现埋怨和失望情绪。政治工作必须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反反复复地从战争全局、从政治意义上来宣传胜利，宣传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及其战斗经验，以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二是要注意克服速胜思想，树立持久作战、把战争打到底的思想。三战三捷后，部队普遍出现了快打、快胜、快回国的急躁思想。为此，志愿军政治部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及各项政治工作指示，从敌情、我情和三次战役的经验，反复说明为什么战争是长期的，要求逐级进行传达讨论，克服各种缺乏长期作战准备的思想，把全军上下的思想都集中到持久作战上来，有决心打到底，有信心打到最后胜利。

大会第二天，志愿军洪学智副司令员就后勤工作作了专题发言。他首先回顾了三个月来的后勤工作情况。指出：志愿军后勤工作有很大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物资供应不上，伤员抢救不及时，部队是在挨饿受冻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部队普遍反映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主要是我军没有制空权，敌机轰炸使后勤工作遭到严重损失。

“前三次战役共损失 1200 多辆汽车，平均每天损失 30 辆。”洪学智说，“另外，后勤力量不足，机构不健全，也是不能保证战时供应的重要原因。美军 13 个后勤人员供应 1 个兵。志愿军则是 1 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 6 至 10 个兵。没有充分的物资，没有足够的道路和交通工具，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就谈不上后勤保证。”

洪学智副司令员强调搞好后勤工作，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后勤机构，必须

组织多线运输，必须做好物资储备，还必须加强对敌机的斗争。洪学智说，在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不能光靠后勤供应，还要依靠就地借粮，取之于敌。他初步计算，下次战役需要 3400 辆汽车运输，现在仅有 1000 多辆，怎么办？一是抢修铁路，加速火车运输；二是优先运输主要物资、必不可少的物资；三是除增加几个汽车团，加强汽车运输外，还要组织人力、畜力、大车参加运输。

大会第四天，金日成首相报告朝鲜劳动党今后工作方针，高岗报告国内外形势，宋时轮报告第九兵团作战经验。大会第五天，上午作典型报告。人民军第五军团长方虎山报告人民军第六师作战经验。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副师长刘海清报告第二次战役中截断敌人的作战经验，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副师长张峰报告突破临清江战役经验。

高岗在讲话中除介绍了国内抗美援朝情况外，着重谈了后勤问题，他说：我是一个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人员，因为住在后方，对前方的情况不甚了解。关于战争准备问题，中心是把前方需要的物资运上来。历史上有好多部队由于供应不上而遭受挫败，为此，中共东北局已拿出六个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已拿出四个部长专门做后勤工作，以保证供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紧抢修铁路；必须赶修机场；必须从各方面以各种办法与敌人的空军作斗争；必须增加汽车部队，改善管理，提高运输能力，按实际需要配备大车、手推车，弥补火车、汽车不足；必须加强后勤部门。

特别值得大家兴奋的是，在前方开中朝两军高干会议的同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在东北召开后勤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后勤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高级将领，决心把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推上新的阶段。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后勤必须以新的指导思想，新的供应方法，新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适应这一新的重大变化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

1月29日大会进行总结。就在会议结束之前，敌人已开始向我发起新的进攻。因此，彭德怀首先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1月28日给他的电报，电报说：“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地区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干会上进行说明，将正在进行的中朝两军高干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彭德怀号召全军指战员尽快投入新的战役的准备，并要求大家：

——在技术上，要具有攻坚爆炸准备，炮火打坦克，扫地雷，架桥修路，粉碎敌人连续设防或掩护撤退时的任何阻碍。

——在战斗动作上，要熟练夜间作战，翻山涉水，敏捷动作。

——在战术上，要熟练组织步炮协同，集中兵力、火力连续突破敌阵，夜间纵深发展，善于掌握指挥部队，机动打击敌人，敢于向敌后纵深穿插，打乱敌人，消灭敌人。

一在战役上，要有突破敌阵、战役迂回、断敌退路、抢占重要港口、封闭敌人与最后消灭敌人于半岛上的足够力量，及忍受一切痛苦，克服一切困难，连续突破，连续追击，连续消灭敌人的政治思想与战役思想的深刻教育。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教育意义很大，使大家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今后的

作战方针，消除了某些干部的急躁情绪和速胜思想，交流了经验，增强了团结，对争取下一次战役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且说在敌人方面，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连续进行了三大战役歼敌七万余人，麦克阿瑟更加急不可待，再次叫嚷对中国境内采取行动。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章 麦帅狂谋

气急败坏更发疯，敌营矛盾直上升；

麦帅力主炸中国，重整溃部又进攻。

中朝军队在新年攻势中突破三八线之后，麦克阿瑟更加恼羞成怒，急电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考虑”他被否决了的针对中国的行动，不然就要付出被迫撤退的代价。

他在电报中重申，战争应该扩大，办法是袭击中国在东北的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国民党军队增援朝鲜战场和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骚扰。他说，他这一行动方案，所以在1950年12月29日遭到拒绝，是因为华盛顿当局害怕这会挑起和中国的全面战争。但是，麦克阿瑟认为，这种害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以为怎么也不会力日剧与中国面对面的局势。至于俄国人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倒是谁也说不上来的。然而，如果俄国人打算袭击日本，只要麦克阿瑟得到他替日本要求的四个额外的师，他就可以拖延俄国人的行动。”

麦克阿瑟还认为，如果美国无意扩大战争，唯一的其他抉择就是逐渐缩小其在朝鲜的阵地，一直到只剩下釜山滩头堡，然后再从那里撤退，不管这样做对亚洲的士气会有多坏的影响。

1951年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批准通知麦克阿瑟将军说，他所建议的报复性措施华盛顿正在考虑中。参谋长联席会议进一步向他明确说，总统完全了解中国共产党进入朝鲜和目前进入南朝鲜引起局面改观的情况。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他说：“不大有可能发生政策转变或其他外来不测事件以致有理由要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封锁中国也必须等到美国在朝鲜的地位稳定或者是撤出之后；即使到了那时，对中国进行封锁之事，还需要同英国人进行谈判，因为要考虑“英国经过香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以及联合国的同意”。至于对中国进行海空袭击，“恐怕只有待中共在朝鲜之外攻击美国部队之时，才能授权进行”。

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拒绝在朝鲜使用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部队。接着他们重申了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在保障你部安全和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这一首要考虑之下，逐步坚守阵地，尽可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如果根据你的明确的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而必须撤退的话，彼时可以将你的部队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愤怒地接读此电，他认为这是一个“陷阱”，电令要求作出互为矛盾的抉择：如有可能就在朝鲜坚守；否则就撤出。他的反应是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澄清”，弦外之音就是说他打算重新争论此事。

麦克阿瑟在收到这一指令的第二天，就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强烈不满。他说，要他守住朝鲜阵地而同时又要保卫日本，使它不受外部的袭击，他所统率的军队并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进一步强调说，如果他必须继续受限制，以他现有的军力作战，那末，他所统率的部队在朝鲜的军事地位最后将支撑不下去。

他指出：“联合国军在长期艰苦的征战中已经精疲力竭，并因那些无端指责他们在被曲解的后退行动中的勇气和战斗素质的可耻宣传而感到苦恼。士气正在急剧下降，作战效率受到严重威胁，除非要求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的这一政治基础，得到了明确的说明、充分的理解以及紧迫到了作战的危险

可以欣然接受的程度。”

是否继续留在朝鲜，麦克阿瑟要求华盛顿当局必须马上作出决定。他在电报中说：“这一决定具有最高的国家和国际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在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些偶发事件所左右的战地司令官的权限，这些事件只对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区域中发展的战术局势发生影响。这也不是一个应该让敌军的优势来作出决定的事，根据对你电的合理解释，敌军的优势实际上倒是一个决定性的尺度。因此，我的疑问就在于：目前美国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在不明确的有限时间内保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还是在能够实施撤退时就立即撤退以尽量减少损失？”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进一步强调说，“在受到非同寻常的限制和被迫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本军在朝鲜的军事地位是难以保证的，但是它能坚守一定的时间，直至全军覆没，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这样要求的话。”

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把麦克阿瑟的电报带到白宫时，杜鲁门总统深感忧虑。实际上麦克阿瑟是在指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的并经总统批准的行动方针是行不通的”。国务卿艾奇逊说得更加尖刻：“这是一份留给后人的文件，如果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件的话。其目的不仅是在一旦事情弄糟时可以使麦克阿瑟免于指责，而且还向华盛顿尽量施加压力，以使用之后退，转而接受他扩大战争的建议。”

在艾奇逊看来：“无需任何证明，我完全相信这位将军正是桀骜不驯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而且对其总司令的意图基本上不忠顺。”

国防部长马歇尔在看了关于部队士气那一段之后对艾奇逊说：“一个将军埋怨他部队士气之日，便是应当检查他自己士气之时。”

麦克阿瑟对军事形势的这一阴暗估价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惑不解，因为他们认为李奇微在一月第一周的表现已表明“第八集团军能够支持住”。谢尔曼海军上将说，他和同事们对于要求他们“澄清”本来就好像十分明确的指令一事感到“有些不快”。几个月之后，马歇尔将军对参院的一个委员会说，那封电报来到的时候，“我们正处在最低点，麦克阿瑟有意在给我们出难题”。

但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却对麦克阿瑟进退两难的境地颇表同情，并对国务院表示某种不满。柯林斯说：“在中国进行干涉之后的一系列定期的会议上，参谋长们一直想要把什么是我们在朝鲜的今后的政治目标这一点定死，但是外交官们则总是对这一质问进行反诘，说‘什么是你们的军事能力？’国务院希望达到最大的军事成就，而一旦事情弄糟，军方则不得不承担全部责任。”

尽管杜鲁门对此十分恼火，但还是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麦克阿瑟的电报和研究对这一问题该怎么办。1月10日，星期日，迪安·艾奇逊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要员们请到家中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个月，他和其他官员曾用了几天时间来达成一项协议，即军方要给外交方面一些时间来做工作。现在麦克阿瑟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艾奇逊已是忍无可忍。他想听听别人的意见：怎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让麦克阿瑟明白，美国正进行一番特殊的事业，他那没完没了的节外生枝是不受欢迎的。

在白宫和其他各处对各种草案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和考虑之后，杜鲁门总统决定采用三条各自独立的渠道来使麦克阿瑟“遵命就范”。第一，他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一电报，重申（已是第三次了）对麦克阿瑟行动的指令。

电报说：根据我们所知的所有因素，其中尤其包括你这次来电中所提供的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在朝鲜坚守更长时期是不可取的，但是力进行外交努力，更进一步争取时间将符合美国和联合国的利益。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给中国人以“尽可能重大的、可以实现的惩罚的重要性，并强调不从朝鲜撤出的重要性，除非确实迫于军事上的考虑”。

第二，杜鲁门批准派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前往朝鲜，去获得关于当前战况的第一手材料，并就华盛顿作出决定的缘由同麦克阿瑟面商。杜鲁门希望在没有电报往来这一套繁文褥节的情况下，直接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这样可以更好他说明自己的理由。

正当两位将军访问东京时，杜鲁门起草了一封致麦克阿瑟的私人信函。总统一直认为，只要这位将军理解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委，他就会停止对他的批评。杜鲁门听说了一些传闻，说麦克阿瑟的左右侍从挡驾了他的一些电报，很多重要文件根本到不了他的办公桌上。于是，杜鲁门在1月13日向麦克阿瑟发了一封冗长的“私人电报”，来使他“跟上美国的对外政策”。

这份电报中概括了过去几个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以及其他一些会议上已经阐明过的论点：“在朝鲜的成功抵抗”，将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联合国都不会接受“侵略”；它将“打击被危险地夸大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威望”；它将为组织全世界抵御共产主义扩张赢得时间。杜鲁门要求麦克阿瑟就他的部队“能合理地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作出判断”。电文如下：

麦克阿瑟将军：

我希望你知道此间对朝鲜的局势正予以极大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了解我们的努力正集中在这个对美国的前途和其他各国自由的人民的生存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以寻求正确的决定。

我希望在这封电报中就我们继续在朝鲜抵抗侵略这一问题上，让你了解我对我国和国际上的基本目的的看法。我们希望你统率下的联合国军队能支持我们力图在世界基础上迅速组织起来的抵抗侵略的行动，我们需要你就联合国军队能合理地提供的最大力量作出判断。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要把这封电报当作一纸训令。这封电报的目的是告诉你，我们对政治因素的某些看法。

第一，在朝鲜能胜利地抵抗侵略就可以达到下列重要的目的：一、具体表明，对侵略行动，我们和联合国是不能接受的，并提供一个团结的目标，使自由世界的力量能够围绕着它动员起来，以应付苏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所发出的威胁。

二、打击共产党中国已被夸大到危险地步的政治和军事威望，这种威望现在大有破坏非共产党亚洲的抵抗，并且巩固共产主义对中国本身的控制的危险。

三、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直接援助在中国国内外组织亚洲非共产党的抵抗。

四、履行我们对南朝鲜所承诺的光荣义务，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的友谊在患难中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

五、使日本可能取得更为满意的和平处理方案，并对日本与大陆间在和约签定后的安全地位作出巨大贡献。

六、促使许多目前生活在共产党势力阴影下的国家坚定意志（这不仅指亚洲的国家，而且也包括欧洲和中东国家），让它们知道它们不必急于在所

能取得的实质上等于完全屈服的条件下，与共产主义妥协。

七、鼓舞那些可能在遭受苏联或共产党中国突然攻击下，响应号召，以寡敌众的国家。

八、使人们看到迅速建立西方世界防务的理由和它的迫切性。

九、使联合国贯彻对集体安全所作的第一次巨大努力，并形成自由世界的联合阵线，这个联合阵线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十、提醒铁幕后面的人民，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子向往侵略战争，这种罪行将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击。

第二，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团结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国。这大多数的国家不仅仅是联合国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在苏联向我们发动攻击时，它们也是我们迫切需要依赖的盟国。此外，在我国的力量尚未建立以前，只要是涉及扩大战区的问题，我们的行动一定得十分谨慎。某些步骤就其本身而论，也许是具有充分的理由的，这也可能有助于朝鲜战役，但是，如果这些步骤反而把日本和西欧国家卷入到大规模冲突中去，那就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第三，当然，我们承认以你目前被迫用来应付大量中国军队的有限兵力，要继续进行抵抗，在军事上也许是不可能的。再者，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中，你的兵力应该保存起来，作为保卫日本及其他地方的有效的工具。然而，如果在朝鲜本上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已不可能，同时你又认为某些上述的重要目的是适当而又切实可行的，那末你就可以在朝鲜沿海诸岛，特别是济州岛，继续抵抗以支持上述这些目的。在最坏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必须撤离朝鲜，我们得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出于军事的必要而被迫采取这样行动的。除非侵略行为得到纠正，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我们将不承认撤离的后果。

第四，在对朝鲜问题作出最后决定时，我不得不经常考虑来自苏联的主要威胁和迅速扩大我们武装部队以应付这一危险的必要。

第五，有人敦促我去相信，自由世界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已有一个现实而又清楚得多的认识；必需的勇气和力量即将涌现出来。联合国最近的会议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脱离实际的想法，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会员国是受下达愿望所驱使的：彻底搞清楚所有谋求和平解决的可能途径都已经完全尝试过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会员国正迅速地团结起来，结果将出现一个鼓舞人心的、不可抗拒的联合力量来保卫自由。

第六，全国人民都感谢你在朝鲜艰苦斗争中的卓越的指挥和你的军队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下的出色的表现。

哈里·杜鲁门

1951年1月13日杜鲁门的这一函电，正是在柯林斯和范登堡两将军抵达东京之前不久，麦克阿瑟方才收到的。他们谈话一开始，麦克阿瑟就埋怨从来没有人向他明确表示第八集团军应在何种条件下，在多长时间固守朝鲜，以及由谁来负责日本的安全？然后他念了总统的电报，并使他消除了一部分疑问，“先生们，”他说，“这就最后解决了我们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不会主动撤出的。”他对杜鲁门答复得很简单：“我们将尽力而为。”

但是，麦克阿瑟对于同时承担朝鲜和日本的责任这一点仍畏首畏尾。第八集团军在朝鲜打得不可开交。柯林斯叫他按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的指令去办，该指令强调了留守朝鲜的重要性，同时又让麦克阿瑟决定联合国军能否在不受摧毁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柯林斯指出，总统已经指出了在朝鲜

延长抵抗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样是为了在联合国的政治行动争取时间。至于日本的问题，即使立即批准增援，增援部队六个星期也到不了日本，也就是说，麦克阿瑟仍要负责保卫日本。对此，麦克阿瑟甚为不满，他说，当第八集团军在朝鲜继续坚守时，防卫日本不应由他负责。他重申了立即把国民警卫队的四个师派到日本的要求，又遭到柯林斯和范登堡的拒绝。

接着，柯林斯和范登堡两位将军向麦克阿瑟介绍了一份。‘可供选择’的文件。这个文件是1950年11月以来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们逐步修改形成的。其最后一稿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经国防部长马歇尔阅过，不过未经他或任何别人批准。

这是一份列有“联合国军”被迫撤出朝鲜时用来对付中国的各种“建议性行动”的计划，用马歇尔将军的话来说，这些建议“‘是作为一旦这些可能接近现实时而提出的权宜之计’”。文件所列出的16项建议中，有11项是直接和朝鲜有关的。所列要点如下：

——继续并加强对中国的封锁。

——“现在即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并一俟我们在朝鲜地位稳固之时即加以实施，或待我们已撤出朝鲜时，视当时所处环境而实施之。”

——取消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

——取消对中国国民党人行动的限制，对他们反对中共的行斗21动给予后勤支援，包括为在中国的国民党游击力量提供“一切可行的秘密援助”。

——“当中国人在朝鲜以外的地方攻击联合国部队时，即向共产党中国的目标发起破坏性的海上和空中袭击。”

柯林斯和范登堡两位将军，在向麦克阿瑟介绍这个未出笼的“选择方案”时的具体情况并未记录在案，因为他们会晤时的笔记没有保存下来。后来在1951年的一些参院听证会上，两位将军坚持说，他们告知麦克阿瑟，这个“单子”并没有作为已计划好的行动得到采纳，而只是在一旦中国人将他的部队逐出朝鲜时可供考虑的选择方案。但在麦克阿瑟看来，这个“单子”等于就是政策范围，他可以在此范围中行动。这样在几个月内，这个“单子”就成了激烈的政治纷争的主题。麦克阿瑟疯狂地鼓吹对中国“全面战争”，并在公开讨论中援引其中各条作为依据，证明他并未违犯政策；而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用这些来提出反对意见。

就在麦克阿瑟疯狂地鼓吹对中国进行“全面开弓”的时候，朝鲜战场最高指挥官——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重整溃部，对中朝军队发动了新的进攻。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七章 图协败局

顽敌组织新进攻，飞机坦克齐出动；
彭总运筹歼敌计，美帝阴谋又落空。

正当被誉为军事天才的麦克阿瑟遭到军事惨败的时候，正当美国各界对朝鲜的战败骂不绝声的时候，正当世界各国对朝鲜战局十分关注的时候，李奇微却认为这正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他认为第三次战役后，中共军队已“力竭气衰”，正在补充休整，这正是他进行反击的绝好机会，如果经此一举，能遏止住中共军队的攻势，同时相应地向北推进，使军事形势有所改观，那无疑将是自己军事生涯中的“伟大建树”！

李奇微作这番设想的时候，正是“联合国军”丢失了汉城，败退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地区，内部愈加混乱，失败情绪愈加严重的时候。美国统治集团以共和党首脑塔夫脱为代表，认为这是“美国从未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失败”，尖锐地抨击杜鲁门政府奉行了“使美国在世人眼中威信扫地的政策”。英国则为在朝鲜的失败担心其以后的自身利益，于1月上旬举行英联邦总理会议，公开提出“不应使美国的政策把联邦牵累太深”，主张同我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又对朝鲜战争的战略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早在第三次战役前，麦克阿瑟就疯狂主张扩大对中国的战争，如今，又特邀国民党战略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到东京密谈，策划利用蒋介石军队的问题。美国政府基于保持其“在亚洲的地位，促进欧洲的防务和团结”的基本政策，则既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意撤离朝鲜，在协调其内部矛盾的同时，还从多方面采取了强化战争的步骤。

在联合国，美国大肆活动，玩弄阴谋。1月13日，它操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所谓“立即安排停火”的“五步方案”（即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揭露了美国利用停火争取喘息的阴谋后，美国又挟持联合国大会，于2月1日非法通过了颠倒是非的诬蔑我国为侵略者的美国提案，妄图破坏新中国的光辉形象。

在国内，美国政府则继续加紧扩军备战。1月6日，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本年度军事预算一下子上升到450亿美元，较上个年度增加了80%。3月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军事人力法案”，将征兵年龄从19岁降到18岁，并延长了服役期限；将国民警卫师编入现役，并加紧后备部队的训练。与此同时，还大力增加军工生产，要求每年生产5万架新式飞机和35000辆坦克。

在国外，为了加强其全球战略部署，1月7日派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的军队。1月25日派杜勒斯到日本活动，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和约和加速武装日本的问题，并加紧筹划地区军事条约组织，以便镇压亚非拉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

李奇微的进攻计划就是在以上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他认为事在人为，机会全在于你是否能及时地把握它。聪明的指挥员与愚蠢的指挥员的区别就在于此，前者能及时发现与抓住机会，后者却视而不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进攻，一定要进攻！

为此，他首先利用美军的良好运输条件，迅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了一批老兵补充其在朝鲜的部队，并加强了坦克和野战炮兵，改善了后方供应。同时，还将美第十军调至三十六度线附近地区，

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序列。这样，敌人很快就恢复了实力，整顿了部队，且兵力已集中。这时地面部队已达 25 万余人。

1 月 15 日，李奇微为了消耗疲惫我军，查明我军情况，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进攻。每日以汽车搭载步兵，配合少量坦克，采取多路小股的方式，在宽大正面进行威力搜索，不断地对我进行小的攻击。开始以连排兵力，后来又以团的兵力实行火力侦察，大批的侦察机频繁出动，情报部门亦在千方百计努力工作。然而，庞大的敌方部队似乎神秘地失踪了，无法查出它的踪迹。

据情报部门估计，在第八集团军正面，至少有 17 万多名中国志愿军及北朝鲜军队。这些部队究竟布防在什么地方？下一步的意图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些疑团，1 月下旬的某一天，李奇微亲自出马了。这位司令官一向雷厉风行，办事认真，他不愿重蹈麦克阿瑟“圣诞节攻势”的覆辙，冒冒失失地把他的部队投入到中国军队埋伏的巨大陷阱里。李奇微要亲自飞到中国军队阵地上方，亲眼看看那里是什么情景。他命令第五航空队司令帕特里奇准备一架飞机。他在电话里对这位空军司令官说：“帕特，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和我一起坐一架侦察机，在中共军队上空兜兜风，看看他们在于什么？”

“很乐意奉陪，将军。”帕特里奇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亲自驾驶飞机了，我想这正好可以在你眼前显示一下我的飞行技术。”于是，帕特里奇亲自驾驶一架 AH—6 型老式高级教练机，载着李奇微，开始在敌方占领区纵深几十里的范围内进行搜寻。帕特里奇熟练地驾驶着飞机，越过一座座山峦和一道道河流，在任何可能驻有大部队的村庄附近及山谷地带盘旋侦察着。

这架老式教练机飞行速度虽然很慢，但它像一匹驯服的老马一样，非常听使唤。在三个多小时的飞行搜索中，只在一处看到大部队移动的迹象：白皑皑的雪野上，有一片密如蛛网般的车辙轮迹和脚印，从一个村庄通往一处密布松林的山谷。帕特里奇驾驶着飞机在这山谷四周掠来掠去，只看见墨绿色的松林随着山势起伏延伸，到处是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却看不到有什么车辆或人马移动的迹象。除此之外，在这天上午的整个飞行搜索过程中，他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可用了，”李奇微在返航途中说，“我要让第八集团军向北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查清敌人到底在哪里集结。”

晚上，李奇微在第八集团军指挥所里，在一盏瓦斯灯的帮助下，反复查看作战地图和历次作战的记录。从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中国人共与联合国军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在前两次为进攻一方，后一次为防御一方。李奇微翻开参谋处交给他的作战笔记簿，找到了如下几个数字的记载：

“第八集团军第一次向鸭绿江的进攻，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遭到中共参战部队的埋伏攻击，大规模战斗从 26 日开始，至 11 月 2 日第八集团军主力撤至清川江以南为止，历时 8 天；第八集团军第二次向鸭绿江的进攻，从 11 月 25 日夜开始遭到中共军的攻击，战至 12 月 2 日，中共军就停止了对溃败的联合国军的攻击，历时 8 天；第三次是中共与北朝鲜军队于 12 月 31 日黄昏全线向联合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战至 1 月 8 日，中共军队即停止了进攻，历时 8 天。”

“多么巧合呀！三个 8 天，三个相同的数字，三种相同的做法！”经过沉思，李奇微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共军队不具备长时间攻进的能力。显

而易见的是，由于联合国军的空军优势，使得中共军队的运输时断时续，甚至不得不靠人力、畜力，沿着崎岖的山道，肩扛背驮。而在紧张的攻进战斗中，中共军队的弹药、粮食几乎完全靠作战士兵自身携带，一旦粮、弹消耗完毕，而补给又不及时，那么攻进遂即停止。这就是中共军队的攻击战锐势只能保持一个星期左右的原因。”

据此，李奇微可以放心地认为：中共军队来势汹汹的进攻，无非是“礼拜攻势”而已。还有，由于中共军队担心白日作战会遭到联合国军空军的轰炸，一般只在夜间作战，天亮后便隐蔽起来，这同样减少了他们攻击作战的时间，而且大大增加了他们作战的难度。这种限制一旦被联合国军所利用，那么中共军队将在军事上难以有所作为。想到这里，更加鼓起了他发动进攻的勇气和信心，李奇微为了不给中共军队以穿插分割的机会，他要各部队连接一线，互相策应，齐头并进，推进速度不应过快，要稳扎稳打，稳步向前推进。

这次进攻，李奇微集中了5个军16个师又3个旅、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地面部队共23万余人。美英军主力及李承晚军一部于西线（南汉江以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美军一部及南朝鲜军主力在东线（南汉江以东）实施辅助突击。敌人这次进攻的特点是：美伪军混合编队，由美军担任主攻，美军主要在西线，李承晚军主要在东线，并加大了战役的纵深配备；为防我实施反击，被我分割包鼠，也一反过去分兵冒进的做法，而改取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做法，力求东西呼应，互相支援；并针对我装备劣势和供应困难的情况，实行了所谓“磁性战术”和“火海战术”，对我实行消耗战。

所谓“磁性战术”，是敌人在摸到了我军供应困难的弱点之后，企图依恃其现代化装备机动快、人力强的优势，像磁铁一样，始终保持同我接触。在大规模交战之前，先以少量坦克和汽车搭载步兵与我保持接触，或进行武装侦察，或抢占我某一地区，或迟滞我之行动，掩护其主力转移和进攻，以此来消耗、疲惫我军。所谓“火海战术”，是敌军依恃其优势的炮兵、航空兵火力，以及坦克的人力对我军进行的一种密集的猛烈的人力突击，以杀伤我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手段。

当时，“联合国军”的兵力配备和具体部署是：

在西线，美第一军（辖三个师、两个旅），以上耳其旅、美第二十五师、第三师、英第二十九旅为第一梯队，在野牧里至金良场里约30公里正面上展开，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朝鲜第一师于乌山里地区为其预备队，美第九军（辖三个师、一个旅）以美骑兵第一师、美第二十四师、英第二十七旅为第一梯队，在金良场里至伽川约38公里的正面上展开，向礼峰山方向实施突击；以南朝鲜第六师位于院湖里地区为其预备队。

在东线，美第十军（辖四个师、一个团），以美第二师、美空降第一八七团、南朝鲜第八师、第五师为第一梯队，在伽川至平昌共67公里正面上展开，向横城、阳德院里、清平川方向实施突击；美第七师位于堤川地区为预备队。南朝鲜第三军（辖二个师），以伪第七师为第一梯队，在乌洞里至北洞里约30公里正面上展开，向下珍富里、县里方向突击；伪第三师位于宁越及其以东地区为预备队，南朝鲜第一军（辖二个师），以其第九师和首都师成一个梯队，在北洞里至玉溪30公里地段上展开，沿东海岸向北配合进攻。

除了东西两线兵力配置外，美陆战第一师、南朝鲜第十一师分别位于义

城、大丘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南朝鲜第二师在忠州、丹阳、永春等地区担任警备和掩护后方交通运输任务。

当时，志愿军总部虽然也曾估计到形势的发展有可能迫使我军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但是，没有料到敌人会很快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主要是把精力放在春季攻势的准备上。当我判明敌人企图之后，遂于1月27日停止休整，准备作战，并将正在进行中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改为准备进行第四次战役的动员会议。

中国人民志愿军洪学智副司令员，在其长篇回忆录中写道：“第四次战役我们是被迫打的，彭总对此次战役的后果是很担心的。他在1月31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曾明确指出：第三次战役即带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可能。”

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已决定入朝的第十九兵团还没有到达。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尚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一时难以立即投入作战。在前线能投入作战的部队，仅有刚刚参加过三次战役的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三个军团。这样不仅在技术装备上敌优我劣，而且在兵力数量上我也失去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方针是：“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根据这个方针，中朝第四次战役的作战顶案是：由志愿军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第三十八、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在西线组织防御，抗击敌人向汉城方向的进攻，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东线则让敌人深入，尔后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实施战役反击，争取歼灭敌人（主要是南朝鲜李承晚军）一至两个师，进而向敌纵深发展突击，从侧翼威胁西线敌人主要进攻集团。如反击得手，可制止敌人的进攻；如反击不顺利，敌人将继续前进，我则准备退至三八线以北地区，给敌人以坚决回击。

战斗打响后，志愿军政治部根据这次战役的特点，于2月1日向部队发出了《第四次战役的政工指示》。指出：此役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诸如部队普遍希望休整，作战思想准备不够，兵员未能得到补充，粮食、弹药困难等未完全解决，因此政治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让全军指战员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不怕疲劳，勇于克服困难，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

西线美军在大量航空兵、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从1月25日起，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我坚守汉江南岸的部队在天寒地冻、粮弹供应困难、工程器材异常缺乏的情况下，依托一般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打得很英勇，也很艰苦。每一要点都要同敌人进行反复争夺，使敌付出重大代价。志愿军总部于1月31日分别通令表扬了第五十军的全体指战员。该军军长曾泽生一直跟着部队在前线指挥，他们在敌人飞机、坦克和炮兵猛烈轰击下，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并给了进攻之敌以大量杀伤。

西线我军展开坚守防御作战不久，志愿军总部即根据第五十军一四八师实施防御作战的情况和经验，及时向部队发出了战术指示，强调进行野战阵地防御，必须做好工事，采取疏散的纵深的兵力配备（每一阵地只以少数兵力加强轻火器进行防守），才能减少伤亡，保持防御的稳定性；必须以短促、突然、猛烈的人力配合阵前反击，才能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进攻；必须作好对敌实施反击的充分准备，较大的反击必须于夜间进行，才能收到大的效果；同时还特别强调，不能死守一地，在争取到一定时间或无力防守时，应主动

地转移阵地，并尽力坚持夜间转移，以减少伤亡。

2月3日，西线进攻之敌占领了我修理寺南山一线阵地，我军转至第二线阵地继续防御。2月4日，我第三十八军对渗入该军侧后的洗月里、山中地区之敌进行反击，歼敌400余人。此时，西线我军已连续作战10昼夜，在敌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火力猛烈突击下，伤亡较大。为了保持汉江南岸阵地，继续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保障我军主力在东部战线实施反击，志愿军总部决心缩小第五十军防御正面，加强纵深防御力量。至2月7日，敌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之后，占领了虎岫、安养里、内飞山、鹰峰、国主峰一线阵地。此时，汉江局部地段已开始解冻。为避免背水作战，志愿军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奉命除留一部分兵力控制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外，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经过2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我军歼敌万余，完成了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掩护东线我军主力向横城地区集结和反击的艰巨任务。

东线之敌至2月9日，已被我阻止在砥平里地区的横城以北一线，造成了我反击的有利态势。志愿军司令部于同日发出了反击作战指示：此次反击，我们集中九个师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层层切断横城及以北地区美军一个团及南朝鲜第八师，根据客观情况，我们完全有把握取得全胜。其中关键在于：第六十六军主力迅速进至横城以南断敌退路；第四十二军主力截击南朝鲜第八师向横城逃窜的退路；第四十军及一九八师应勇敢动作，从正面和侧面同时分割歼灭敌人，力求速战速决，继续扩大战果。彭德怀司令员对横城地区反击战非常重视，认为只有胜利才能挫败敌人进攻的气焰，才能争取休整补充的机会和争取歼灭更多敌人的准备时间。他号召志愿军与人民军进行打胜仗的比赛，去争取新的光荣和新的胜利！

2月11日晚5时，夜幕降临。邓华将军指挥的四个军按照预定计划，向横城地区之敌发动了进攻。经一天激战，我将南朝鲜第八师三个团全部歼灭。战斗至13日清晨，又歼灭美第二师一个营、美军和南朝鲜军四个炮兵营，以及李承晚第三、第五师各一部，此次反击作战，共歼敌12000余人，其中俘虏7800人，内含美军500多人。

李奇微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朝鲜战争》中，是这样描述志愿军在横城的胜利的：“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二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八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二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天兵天将。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横城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后，西面砥平里之敌仍在原地未动。为了扩大成果，我军于13日晚以六个团的兵力，向砥平里之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将敌压缩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由于敌人此时已形成据点式防御，四周以坦克防守，兵力、人力很集中，我军火炮少，弹药又不足，因而仍未解决战斗。

砥平里战斗失利，据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介绍，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敌情不明，攻击不力。当时认为，敌人只有野战工事，兵力不到4个

营，而实际上已形成据点，有 5 个营共 6000 余人，我攻击部队在兵力尤其是人力上不占优势，又以野战方法去打形成据点的敌人，必然不会成功。再加上参战部队建制多，通信联络不畅，协同动作差，以致当夜仅歼敌一部，未能解决战斗。

15 日美骑兵第一师一部在坦克 30 余辆，飞机 100 余架的掩护下，进至砥平里西南的曲水里，与志愿军阻援部队第一一六师、第一二六师各一部展开激战，其步兵被击溃，但大部坦克已突入砥平里与守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如果继续攻击砥平里，即便攻下来，也难于造成各个击破敌人的态势。为避免陷于被动，志愿军司令部决定于当日 17 时 30 分停止对砥平里的进攻，命令部队于 16 日拂晓前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从 1 月 25 日至 2 月 16 日，我军第一阶段作战虽然取得了歼敌 22000 余人的胜利，但因砥平里战斗失利，战役反击不顺手，战略预备队未能赶来，不能扩大战果，也就难以制止敌人的进攻。

志愿军总部对第一阶段的敌我情况和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连夜进行了分析，作出了新的决定。分析认为，从敌人此次战役进攻可以看出，不消灭美军主力，敌人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这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在防御方面，表现了我军高度顽强的战斗作风，暴露了敌军只凭优势装备，进攻精神不强的弱点，每天只平均前进 100 米。我们的弱点是，部队过度疲劳，减员大多，兵力不足。第十九兵团 2 月 17 日由安东出动，其他各军最快也要 4 月初才能先后到达三八线附近。其次是运输困难，军需不能保证，尤其是粮、弹不足。敌人的便利条件是装备优良，有空军配合，运输快，因而敌人可能继续进攻，乘我第二番兵团及补充兵员未到前，企图进逼三八线。

根据上述分析，中朝联司决定：全线转入防御，节节阻击，迟滞和杀伤敌人，争取两个月的时间，等待第二番兵团的到达；同时积极改善交通运输，囤积作战物资，为下个战役创造条件。彭德怀将军在完成上述部署后，于 2 月 19 日专程回国，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朝鲜战况和请示作战方针。前线中朝部队，且战且向三八线以北缓缓转移。

3 月 7 日，李奇微又集中 5 个军共 14 个师 3 个旅又两个团的兵力，在西线发动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攻势。美第二十五师分两路强渡汉江，企图夺取汉城，进而向三八线推进。我守备部队，英勇奋战，组织了运动防御。这时，志愿军前线部队的困难局面超过入朝以来任何时期。因弹药不足和炮损严重，炮兵部队大多先撤往三八线以北休整。有些前沿阵地因守备部队饥饿，被迫放弃，前线部队指战员的各种装具也破烂不堪，赤脚露体已成普遍现象，因生活困苦病倒者也大量增加。在战斗人员减少过半的情况下，各部队凭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高昂的斗志，仍顽强奋战。3 月 7 日一天内，第三十八军和第五十军在汉江北岸就有几个连队战至最后一人，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革命誓言。

志愿军司令部及时总结了经验，并根据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意图，于 3 月 8 日发出了关于当前作战指导方针的指示，又强调了兵力配备“前重后轻”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志愿军部队在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空、步、炮、坦克的协同进攻面前，利用山区和丘陵的地形，只以少数人坚守前沿各个支撑点，多数兵力分散隐蔽在阵地后方，各种火炮适当前推，并有层次地分散隐蔽，当敌人步兵接近阵地时，各种火器集中开火；敌突入阵地后，则适当投入后方兵力反击，与敌近战，使敌空、炮支援难以发挥作用。这样可以用

较少的代价换取敌人较大的损失。

然而，敌人气势汹汹，战斗异常激烈，就在此关键时刻，彭德怀从北京回到了志愿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他分析了战场形势后，于3月11日致电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我于9日拂晓前安抵司令部。敌于7日又开始全线进攻。力继续疲劳敌人，缩短我之防线，争取时间，决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吸引敌人主力进至三八线，进至南川店、兔山、铁原、杨口线，于我歼敌有利。”

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决定，为争取主动，待机歼敌，我军于3月14日主动撤离汉城。彭总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我军作战的目的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军解放汉城时，有新闻报道说，北京城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彭德怀当时就不高兴他说：“假如以后因战争需要而撤离汉城，又怎么办呢？”他经常教育指战员千万不要有速胜的思想，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我第一梯队各军从3月10日起，按照预定计划逐步向北转移。第二梯队于3月12日开始同敌人接触，不仅打得英勇顽强，而且接受了前一阶段打防御战的经验教训，实行了“兵力前轻后重，人力前重后轻”等原则，战术更加灵活，杀伤了更多的敌人，减轻了自己的伤亡。由张仁初军长、李耀文政委指挥的第二十六军，在扼守七峰山、海龙山的战斗中，与敌反复争夺11次，以较小的代价，杀敌1000多名，并创造了一个班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坦克9辆的模范战例。3月间的朝鲜，正值冰雪融化，美军将泥泞的公路形容为“巧克力汤”，这种气候也影响了敌机械化部队的前进。4月初中朝部队已基本撤至三八线以北，李奇微因发现我方大量新增部队到达，也停止进攻。4月21日战役结束。

第四次战役从1月25日至4月21日，历时87天，敌军一直向北发起猛烈进攻，然而只前进了100余公里。从战略上看，敌人部分达到了它保住南朝鲜的目的。但是李奇微也承认，这次作战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从战役进程上看，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机动防御是成功的，达到了以小的代价换取敌较大的损失，并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这为重新获得主动，并进行下一次反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为在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我军依靠一般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此役我军共歼敌78000余名，使敌人每天平均要付出900人的代价才前进1.3公里。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战斗减员53000多人，敌我伤亡比率为1：0.67。

正当第四次战役在汉江南岸激烈进行着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决议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为响应中央号召，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当即向志愿军总部发出邀请，派战斗英雄回国，报告志愿军在朝鲜打击美国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同时组织中国人民首届赴朝慰问团，慰问英雄的中朝人民军队。

4月上旬，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随团文艺工作者一行575人，在团长廖承志率领下，分为8个分团到达朝鲜前线进行慰问。4月21日夜晩，月色朦胧，慰问团从万景台出发，途经崎岖不平的山路，在平壤西郊会见了朝鲜

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廖承志团长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向金日成献旗献礼。他在致词中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灿烂的红色国旗，是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上面的。今天我们献给您一面鲜红的锦旗，是表示中国人民以自己的鲜血洒在朝鲜抗美战场上为光荣，并准备以最大的决心，实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完全胜利。”

金日成首相接着设宴招待慰问团的代表，并发表了诚挚、热情的讲话。他说：“当我们朝鲜人民处在祖国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国人民派遣了自己的优秀的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帮助我们，现在又派遣了慰问团来慰问我们。朝鲜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对我们的这种国际友谊。朝鲜人民坚信我们能够获得胜利，因为在我们背后有着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作我们的后盾。”

彭德怀司令员在自己简陋的指挥所里热情欢迎祖国派来的慰问团。他向代表们介绍战场情况说：“敌人想诱我们前去洛东江，实行所谓沃克计划。我们不上它的当，使之落了空。第四次战役敌人的损失和消耗更大。长此下去，敌人就受不了。”彭德怀很形象他说：“美帝国主义的装备是现代化的，眼睛却长在后脑勺上，只会向后看，前途是一片黑暗。”当廖承志把他母亲何香凝画的一幅《猛虎图》交给彭总时，彭德怀激动他说：“晤！大夫人画得好极了！此乃无价之宝！”

紧接着，有全国工人代表、著名的劳动英雄赵国有，上海工商界及民主建国会代表、60岁的陈已生先生，新疆13个民族的代表扎克洛夫及祖国各民主党派、教育工作者与妇女的代表燕京大学雷洁琼教授，相继致词，并分别报告了全国工人阶级、全国工商界、全国各族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积极行动和坚定决心。

从4月初到5月中旬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广泛的慰问活动。广大志愿军战士以这样一首歌来表达他们看到慰问团亲人时的欢快心情：

春风吹过鸭绿江，
祖国亲人来前方。
带着嘱托和希望，
来和子弟叙短长。
今天见了亲人面，
我们心里暖洋洋。
好像见了毛主席，
好像见了亲爹娘。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到来，有力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斗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战士们在欢迎慰问团的大会上振臂高呼：“为世界人民立功！为朝鲜人民报仇！为祖国人民争光荣！”

且说，李奇微的这一攻势，虽说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却使战线从朝鲜的三十七度线又逐渐地向北推了回去。美军战场形势的好转使麦克阿瑟陷入一种难堪的境地。欲知其结局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八章 麦克阿瑟丢官

形势好转便发狂，要求白宫再松绑；
架鸢抗命惹人恨，解职丢官其下场。

让麦克阿瑟感到意外的是，第八集团军经过李奇微的整顿，采取了一种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术，将战线从朝鲜半岛的三十六度线附近逐渐又向北推了回去。美军战场形势的好转，使麦克阿瑟落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不久前，麦克阿瑟还一再渲染朝鲜战场的严重局势，给华盛顿当局施加压力，声言如果不立即采纳他的扩大朝鲜战争的计划，第八集团军将面临覆灭的危险。然而，自李奇微指挥第八集团军从1月中旬开始发动进攻以来，他曾经预言的那种全军覆灭的危险似乎并不存在，这一点使这位好大喜功的将军多少感到难堪！

不过，麦克阿瑟对李奇微的这种消耗战的方针并不放在眼里，轻蔑地称之为“一场拉手风琴式的战争”，嘲笑这种作战的公式是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尽管麦克阿瑟这样说，但战局的好转却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麦克阿瑟又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名下。难道不是自己首先提名由李奇微接替阵亡的沃克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吗？难道李奇微的进攻计划不是经他麦克阿瑟批准的吗？所有这些谁又能站出来加以否认呢？

朝鲜战局的好转，更加刺激了这位将军“彻底取胜”的勃勃野心。2月1日，麦克阿瑟又给华盛顿当局发去了一个新的取胜的计划。他断言，实现这个计划，就将有效地肃清朝鲜半岛上的敌人。根据他的设想，这个计划将分三个步骤执行。第一步，首先对北朝鲜内敌人后方的全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以造成敌人混乱和动荡不安，切断公路和铁路。第二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敌增援部队跨过鸭绿江。如果仍然禁止轰炸鸭绿江和对岸地区，应在敌人的主要运输线上布设放射性废料，以切断北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联系。第三步在北朝鲜东西海岸上端实施两栖和空降部队登陆，对敌人实行大包抄。那时他们要么饿死，要么投降。麦克阿瑟叫嚷：“应当趁热打铁，乘胜前进！”

从：月底第八集团军开始发动反攻以来，麦克阿瑟已兴师动众地两次飞到朝鲜前线视察了，每次视察回来都向记者大吹大擂一番，一再表明他的英明决断。然而，就在2月20日下午，他举行记者招待会不久，一群由母亲和妻子组成的美国军人家属请愿团来到他的办公室。麦克阿瑟上见到这些人就恼火了，但他极力克制着说：“本司令官非常欢迎从美国本土飞到东京来的客人，尤其是卡诸位这样漂亮的女士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观赏一次东京的樱花？……”

麦克阿瑟的话还没有说完，请愿团的妇女们就像连珠炮似的向这位远东总司令提出了质问。首先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年长老太太说：“尊贵的将军，我们前来东京不是为观赏樱花，而是向你儿子的。去年11月初，你曾答应要让孩子们回家过圣诞节，现在不仅圣诞节过了，而且元旦也过了，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怎么议论你吗？都说你是一个爱开空头支票的骗子！”

“麦克阿瑟将军，”一位年轻的妇女说，“我的丈夫正在朝鲜流血，那些黄皮肤的中国人正像围猎一样在捕杀他！我可没有兴致去看什么樱花！”

“我的儿子也在朝鲜。”另一位中年妇女说，“我那可怜的约瑟啊，他最怕寒冷，见不得流血，我要求你放我的儿子回家！”

“我知道，诸位女士们的儿子或者是丈夫正在第八集团军服役。”麦克

阿瑟一面抽着烟，一面淡淡他说，“第八集团军的任务是统一全朝鲜，现在战争还在继续。如果要想与前线的亲属相聚，那要耐心等到他们服役期满。”

“听说你要扩大战争，还要在朝鲜使用原子弹，那样，我们的孩子们也会受害的！”一位年长的母亲善于点中要害他说，“我们养育后代，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到朝鲜那个遥远的鬼地方去送死，我们要求你下令休战，把孩子们送回美国，兑现你的诺言！”

“谁都知道，在朝鲜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另一位母亲说，“你身居要职，对于这些无辜死去的青年，你应该负责！”

“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为保卫美国而战斗，甚至牺牲，那也算死得其所！”一位戴眼镜的母亲愤慨他说，“可是在朝鲜他们干什么？是你们驱使着这些年轻人在侵犯另一个国家啊，这简直是犯罪！我要求你把他们放回去！”

“尊贵的太太们，你们太过分了！”麦克阿瑟站起来，声色俱厉他说：“明天，我要亲自去前线视察。到时候，我不会忘记关照诸位的儿子或是丈夫，我会命令他们的长官，要他们——也就是你们的儿子或是丈夫，统统派往第一线！让他们去冲锋！去踩地雷！明白吗？”说完，把门一关，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为了打回三八线，3月7日，李奇微将军又发动了一场“撕裂者行动”，第八集团军虽然进展缓慢，但确不断向北推进。这样一来，麦克阿瑟用武力统一朝鲜的野心又死灰复燃了，他接二连三地给华盛顿拍发电报，重弹老调：他的手脚被捆住了，不应该再对第八集团军施加更多的限制；应当允许他动用蒋介石的军队；在最要害的地段——沿鸭绿江的两端东西海岸登陆，给中朝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应该让李奇微率领第八集团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统一整个朝鲜。

3月15日，麦克阿瑟又召见美联社社长休·贝利，由贝利对他作了一次专门采访。他在录音谈话中，再次批评了不准第八集团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而且口气非常强硬：“今天，第八集团军再次收复了汉城，正向三八线攻进，军事形势鼓舞人心……但是，那些惯于蹲办公室对战场发号施令的人却不让第八集团军越过三八线，就是说，要把北朝鲜让给共产党。这与联合国授予第八集团军的统一朝鲜的军事使命是相违背的。事实上，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已放弃了这一使命。”

在杜鲁门的传记中，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描述成一位桀骜抗命的将军，说他在1951年3月和4月的一系列公开言论都超出了不可僭越的限度，是在向政府当局的政策挑战。但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却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威洛比在其“颇为辛酸”的回忆录中曾指责说：“看来政府的所有所谓理由都必定掩盖着更深一层的东西。”

威洛比所影射的是指麦克阿瑟成了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里的“邪恶势力”的牺牲品。不过他无意之中触及了杜鲁门政府隐藏根深的一个秘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解职，并非因为他的公开言论，而是因为杜鲁门总统所不能容忍的一些外来的阴谋诡计。

据威洛比这位情报官员透露，1951年在东京被监听的外国使馆有两个，它们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都由右翼独裁者执政，麦克阿瑟对这两国颇有好感。

1951年3月中旬，杜鲁门总统收到一份从西班牙、葡萄牙驻东京外交官那里截听来的电文，其中他们向上司汇报了他们同麦克阿瑟的谈话。谈话的

要点是，这位将军满怀信心，他能够把朝鲜战争转化为一场大规模冲突，并彻底解决“中共问题”。麦克阿瑟希望，假如此事发生，葡萄牙或西班牙不要感到惊慌。

杜鲁门及其三四位亲信顾问看到了截听的电文。电文的尖刻言辞转给了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当杜鲁门总统读到这些电文时，下颚绷得紧紧的，张开的手掌猛拍着桌面。他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杜鲁门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罢免麦克阿瑟。由于消息来源不能公开，美国又不打算承认它对友好国家进行窃听，所以麦克阿瑟撤职的问题，还得靠别的途径，靠他很多的公开言论。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对政府的批评也逐步升级。他继3月15日向美联社社长休·贝利发表谈话九天之后，又进行了新的表演，艾奇逊称之为。“对政府行动的一个重大破坏”。第八集团军成功地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使杜鲁门政府相信，要进行一次新的和平努力，此乃“吉日良辰”。战前态势实际上已经恢复，第八集团军在实力上同中朝军队几乎旗鼓相当。杜鲁门认为：“现在为了他们的利益（其程度至少同我们一样）也该停止战斗了。”

但是，应当向中国人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于是讨论了两个级别的问题：一是一项可供总统发表的公开声明；二是一项关于美国在谈判中将接受什么或可以讨论什么的秘密意见。在政治上，美国政府希望其和平行动得到盟国与中立国的支持。在军事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从1月份以来第八集团军处境改善，可使美国进行更强硬的讨价还价。3月19日，艾奇逊、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审查所提出的公开声明草稿。他们决定通知麦克阿瑟关于这份即将发表的总统宣言，并请他提出意见。当时杜鲁门正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小白宫度假，他批准了这一声明。

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去了这样的电报：“国务院正草拟一个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国军已肃清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认为：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作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谈判的发展。鉴于三八线并没有军事意义，国务院已间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你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在以后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表示意见。”

麦克阿瑟3月21日的回电，实际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表示意见的要求不予理睬。他再次抱怨对他指挥权的限制，“使他根本无法去扫清北朝鲜的敌人，或者不能做出任何明显的努力来达到这——目的”。

在接到麦克阿瑟的回电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又与国防部、国务院开会，进一步确定了拟议中的总统声明的细节。此外，国务院官员还与出兵朝鲜的其他国家驻华盛顿代表举行会谈，为的是征得他们对拟议中总统声明的同意。杜鲁门声明草稿如下：

我作为政府的行政首长，应联合国的请求，在朝鲜行使统一的指挥权，并在与提供战斗部队支持联合国在朝鲜行动的联合国各国政府充分协商之后，发表如下声明：

联合国在朝鲜的军队正从事击退向大韩民国和联合国而发动的侵略行为。

侵略者蒙受重大的损失之后，已被逐回去年6月最初发动非法进攻的地

区附近去了。

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按照 1950 年 6 月 27 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提出的条件来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要求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战争的蔓延，并避免苦难的延长与生命的损失。

这里有一个在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它应该是一切衷心希望和平的国家所能接受的。

联合国统一指挥部准备履行能终止战争并保证不再发生战争的部署。这种部署能为解决朝鲜问题开辟更宽阔的道路，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联合国已宣布这个世界组织的政策是：允许朝鲜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

朝鲜人民有权享有和平。他们有权力按自己的选择，适应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政治以及其他制度。

朝鲜人民有权获得世界组织的援助以医治战争的创伤。

联合国已准备给予这种援助，并为此设立了必要的机构。联合国会员国已提出要给予慷慨的援助。目前需要的是和平，在和平的情况下，联合国才能把它的资源用在创造性的重建事业上去。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在朝鲜反对联合国的人对原来可以而且仍然可以为朝鲜带来和平解决的许多机会很少加以理会。

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就能大大地减轻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并能开辟道路，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

在未达成个人满意的结束战斗的部署以前，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必须继续下去。三天之后，正当国务院同其他国家政府商谈声明文稿时，麦克阿瑟为破坏达成停火的任何企图，于东京时间 3 月 24 日（华盛顿时间 3 月 23 日），发表了如下不寻常的声明：

战事仍按照预定的日程与计划进行着。现在我们已大体上肃清了共产党在南朝鲜有组织的军队。愈来愈明显，我们昼夜不停的大规模海空袭击已使敌人补给线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就使敌人前线部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出色地利用这一弱点。敌人的人海战术已无疑地失败了，因为我们的部队已适应敌人的作战方式。敌人的渗透战术只是使其小股小股的被消灭。在恶劣的天气、地形和作战条件下，敌人的持久作战能力要低于我军。

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具有更大意义的是，事实清楚地表明，赤色中国这个新的敌人，缺乏工业能力，无法提供进行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足够多的重要物资，敌人缺乏生产基地，缺乏建立、维持以至使之投入作战的哪怕是中等规模空、海军所需要的原材料。敌人也无法提供成功进行地面作战行动所必需的武器，如坦克、重型大炮以及科学技术为进行军事战役所创造的其他精巧的武器装备。起初，敌人数量上潜在的巨大力量大大弥补了这一差距，但随着现代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发展，单靠数量已无法抵消这些缺陷本身所固有的危险性了，控制海洋和空中，进而也意味着控制补给、交通和运输，其重要和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在并不亚于过去。我们现在拥有这种控制权，加上敌人在地面上火力的劣势，其作用更加倍增。

这些军事上的弱点，在赤色中国进入朝鲜战争时，就已清楚无疑地表现了出来。联合国部队目前是在联合国当局的监督下进行作战的，因而相应地

使赤色中国得到了军事优势。即使这样，事实还是表明：赤色中国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现在必然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末，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确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如果朝鲜问题能够按它本身的是非加以解决，而不受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台湾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影响，则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绝不能牺牲已受到极其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的结局得在战斗中解决，但除此之外，基本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方面寻求答案。不用说，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以内，我准备随时和敌军司令员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军事途径，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这一声明，使华盛顿当局大为震惊。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 12 月 6 日颁布的、未经五角大楼事先批准不得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声明的训令，因此是公然的抗上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是对文职官员领导军人的传统观念的挑战。更有甚者，声明的好战语调暗示了政策上的变化，即战争将要扩大。这对于停战谈判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和轻率的姿态。

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的声明十分恼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幸得很，我们的周密准备竟枉费心机。3 月 24 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一项声明，它与我所准备发表的声明完全背道而驰，结果是如果我发表那项经过缜密计划的声明，就只能引起世界的混乱。因此，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花去的许多时间以及许多外交家和国防领袖们的详尽讨论全都付之流水了。”

“联合国的一位军事司令官自作主张地发出这样一个声明是极不平常的事。”杜鲁门愤怒地指出，“这是完全漠视不许发表有关对外政策的任何声明的所有指令的行为。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这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

“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当然，他说这得有待政府当局去决定，但考虑到他是高级负责人，全世界人民会认为他事先获得消息，知道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杜鲁门说，“在我们的盟友中果然马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影响。世界各地的首都所发出的询问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什么意思？美国的政策难道要改变了吗？”

“事情所牵连到的不单单是美国总统所要发表的已准备好的声明的命运而已，甚至也不只是这一‘檄文’所引起的外交界的怒潮而已；挪威大使向国务院询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称它为‘檄文’。更重要得多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又一次公然反抗他的统帅——美国总统的政策。”杜鲁门进一步指出，“麦克阿瑟将军在同一个月份早些时候的一项声明中，也曾对总统的政策进行挑战，我是了解这个事实的。3 月 7 日，他曾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声明，大意说除非我接受他的政策，否则就会发生‘残酷的屠杀’。不过，他当时至少还承认，这不是由他作决定的事。可是，现在，由于他的声明，他已确实影响了政策的方向，而且再作这样的声明就只会带来巨大的损害。”

“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无可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

翌日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腊斯克、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等人到白宫专门研究此事。艾奇逊写道：“前一天收到麦克阿瑟的声明后，我从未见过洛维特那样愤怒过，他说麦克阿瑟一定要撤职，而且要立即撤职。”其实艾奇逊对此也非常愤怒，他说：“这一声明可以说完全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藐视，是对他已被告知的一项行动的破坏，是对他的总司令的公然违抗。”但到此刻，杜鲁门却表现得“十分冷静”，似乎是处于一种难以置信，同时又压抑着怒火的思想状态之中。杜鲁门说：“我现在唯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我从未低估过我同麦克阿瑟之间的困难，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能尊重总统的职权……我认识到我本人除了解除这位国家的最高战场指挥官外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还不能马上把他解职。因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必定会使在美国人民中早已不得人心的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杜鲁门以异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一天他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他只是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出如下的电令：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专电：

总统指示你注意他 1950 年 12 月 6 日发出的命令。鉴于 1951 年 3 月 20 日给你的情报，你以后的任何声明都必须符合 12 月 6 日命令的规定。

总统还指示，一旦共产党军事领袖要求停战，你应立即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这一事件请示报告。

布雷德利

1951 年 3 月 24 日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麦克阿瑟后来否认了任何失当之举。他被免职之后在参院听证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发布的公告，只不过是每个战地司令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布的那种公告。通过这一公告，可以同对方总司令协商，寻求结束双方敌对行动的途径。”

麦克阿瑟是彻头彻尾地撒谎。这一年早些时候，麦克阿瑟在对美国退伍军人的一次友好集会谈话时自夸说，他揭露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阴谋”之一。他把国务卿艾奇逊的和平行动“看成是一次出卖，是一项能结束战争而没有胜利的政治行动，会给美国 and 南朝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另有高论，他力图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军事行动”。因为他是“以一名司令官的权威”发表这一声明的，而且表示的是“一位战区司令官的局部观点”。

不论麦克阿瑟如何辩解，他的动机及其效果是一清二楚的。正如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所说的：“麦克阿瑟的声明给我们的盟国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使他们对我们的如何行事完全摸不着头脑：

总统拿出一样东西来提请他们注意，并调整他们的行动以取得一致的行动；但这一过程还未做完，战地司令官又提出来一个建议，使总统用以处理事态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尤其认为，它造成了政府领导的信任危机。”

后来几天中，尽管有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提醒，但麦克阿瑟继续干扰政府的政策。在同伦敦《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谈话时，麦克阿瑟断言他的部队“被束缚在一张人为的罗网之中”。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第一次发现是在打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在“三八线”问题上，是政客们侵犯了军人的职权范围。“如果不涉及到士兵们的生命，这局势将荒谬得可笑。”麦

克阿瑟暗示他所辖部队，每月 6000—7000 人的损失是在白白地送死。“如果这些损失，甚至更大的损失是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付出的，那我们将随时准备接受它。”

共和党参议员们捡起了麦克阿瑟这个题目。密执安州的霍默·弗格森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去问麦克阿瑟这场战争应当如何进行。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达夫说：“某一掌权人物应当决定政策，而其余的人应当遵循这一政策。”在杜鲁门看来，麦克阿瑟的表现“带有哗众取宠的特征”。他把他和麦克阿瑟的关系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乔治·麦克莱伦将军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麦克莱伦对战争应当怎么打，有自己的一定之见，如果林肯给他下一道他所不中意的命令，他就不予理睬。同林肯一样，杜鲁门因为麦克阿瑟违抗他的指令，最终把他解了职。

公开的导火线是众院共和党领袖、众议贝约瑟夫·马丁，4月5日，在一次众院发言中宣读了麦克阿瑟3月20日给他的回信。信函如下：

我十分感谢你8日的来信和信中寄来的一份你于2月12日讲话的副本。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你的讲话，我发现尽管岁月流逝，但你昔日的魄力无疑没有消失。

赤色中国在朝鲜与我们交战，我关于因此产生的局势的观点和建议，已极为详尽地向华盛顿作了报告。总的讲，这些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并得到了普遍的理解。这些观点主张走传统的路子，那就是像我们过去所成功做到的那样，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去对付武力。你关于使用台湾中国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传统。

有些人似乎不可思议地难以认识到：共产党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而我们对由此引起的战场问题却展开了争论；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了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杜鲁门是在通讯社报道马丁演讲时听到麦克阿瑟的信函的。他满腔怒火地看完了这份文稿。关于利用中国国民党人的第二段“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这一段文字就确定了麦克阿瑟的解职。他实际上是在说美国现政府的政策是不合乎逻辑和违背传统的。杜鲁门把信的最后一段叫做“真正的绝妙高论”。这一段表明，麦克阿瑟要么是不理解，否则就是不想接受美国的决心，即要在亚洲也要在欧洲存在下去。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讽刺地写道：“我不了解这位将军通过什么情报途径而知道共产党决定把力量集中在亚洲，更明确他说是集中在他的管辖区。”杜鲁门不喜欢麦克阿瑟“对我们的外交努力所作的轻蔑性评论和所谓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一浮夸和自信的宣称”。

杜鲁门在当晚的日记中，发泄着对这位将军的憎恶：“麦克阿瑟已经使他自己成为争议的中心，无论是公众生活中还是私人关系中。”他接着又概述了这位将军的私生活：“他总是有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有过两个老婆——一个是他在42岁上娶的社会名流；另一个是他50多岁时离婚后娶的田纳西姑娘。”

第二天，即4月6日，星期五上午，杜鲁门把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等召到他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他们应当如何处置麦克阿瑟。

大家一致主张解除他的职务，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布雷德利将军是“愤怒已极”。他和哈里曼都说，早在两年前就应当把他解职。当对是1949年春天，麦克阿瑟作为日本占领军司令，不听召唤，自行其事，为此杜鲁门不得不派陆军部长肯尼恩·罗亚尔前往东京去阻止这位将军支持日本国会的一项经济法案。这一法案同占领军的政策是“直接相悖”的。

当晚，杜鲁门在日记中再次评论这位将军说：“麦克阿瑟通过约瑟夫·马丁又扔了一颗政治炸弹，这看来像是最后的致命一击。卑鄙下流的抗命不从。”杜鲁门把麦克阿瑟去年夏天对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讲话引起的轩然大波和他为“见麦克阿瑟并达成面对面的谅解”所作的威克岛之行一笔略过。他接着写道：“我已经得出结论：我们在远东的大将军必须召回。”

4月9日，杜鲁门总统继续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召开内阁要员会议，大家一致主张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并决定他的一切职务由马修·李奇微接替，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由范佛里特将军充任。为了使麦克阿瑟不致太难堪，会议还决定由正在远东视察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把这一命令当面交给麦克阿瑟将军。

然而，出入意料的，由于通讯线路发生故障，在弗兰克·佩斯收到这一命令之前，《芝加哥论坛报》将在4月11日上午抢先发表这一消息。在此情况下，杜鲁门认为，他“再也无法做到由佩斯部长亲自传达命令，以表示礼貌了”，他指示他的新闻秘书约瑟夫·肖特于4月11日凌晨1点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向白宫记者团宣布了总统这一“令人震惊”的决定：

我深表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涉及他所担任职责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的指挥。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B·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者。

对于有关国家政策进行的全面而激烈的辩论是我们自由民主宪法制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军事指挥官们必须按照我们的法律和宪法规定的方式服从颁发给他们的政策和命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危机时刻，这一因素尤其不能忽视。

麦克阿瑟将军已完全确定了在历史上的地位。对于他在重大负责岗位上对国家做出的卓越和非凡的贡献，全国人民深怀谢意。由于这一原因，我对不得不对他采取行动再次表示遗憾。

接着，白宫新闻秘书肖特又宣读了杜鲁门总统致麦克阿瑟将军的解职令。

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完成计划前往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

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之于众。

当肖特将杜鲁门的声明和解职令宣读完后，当天美国各大报就用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两条消息。随之的一场轩然大波掀起，愤怒的责骂和声讨的浪涛滚滚而来。乔·麦卡锡说：“杜鲁门撤换麦克阿瑟是醉酒时决定的。”理查德·尼克松要求杜鲁门立即恢复麦克阿瑟原职。众议员约瑟夫·马丁打长途电话

给麦克阿瑟将军，邀请他立即回国向两院发表演说。一时间，掀起了一场歇斯底里的反对杜鲁门政府的浪潮。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当天晚上，李奇微飞到东京走马上任。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李奇微坚决不住进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麦克阿瑟最后离开东京。当李奇微前往麦克阿瑟官邸进行礼节性的拜见时，麦克阿瑟已由当日最初得知这一消息的打击下恢复了常态，十分镇静而有礼貌地接待了李奇微。他除了对继任者谈了一些军事上的问题，以及许多表示友好的鼓励的话外，也谈到杜鲁门总统。他说：“有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从总统私人医生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思想上的糊涂是他严重病情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据那位医生讲，杜鲁门活不过六个月了。”

李奇微对这样的话题不愿插嘴，等麦克阿瑟说完，他才转换话题问道：“回国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离开美国 15 年了，”麦克阿瑟说，“我想回纽约定居。”

“祝您回国后一切顺利！”李奇微告别时说，“您作为我的老上级和伟大的军事统帅，将永远赢得我本人的尊敬。”

欲知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易人后，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九章 争夺战场主动权

交战双方百万兵，争夺主动相互攻；
五次战役规模大，经验教训甚是丰。

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麦克阿瑟被罢官事件的时候，朝鲜战场硝烟弥漫，战火仍在熊熊燃烧。战争间歇过后，双方又在剑拔弩张，临战前的准备都在加紧进行。

且说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司令员就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开始筹划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共投入了100多万军队，为了争夺战场的主动权，相互进行了激烈的攻防作战。这次战役的主要特点是，我方为防止敌军登陆而陷入两面作战，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前发起了进攻。在两个阶段的进攻中，我方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未能很好地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并在战役后期也受到一些挫折。通过这次战役，我方取得了入朝参战以来最为重要的经验教训，最终对于朝鲜战争的前景和现代战争的特点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麦克阿瑟被罢官后，李奇微前往东京接任远东军总司令，继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是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范佛里特被誉为美国“第一流的战斗部队司令官”。他是在野战部队成长起来的，是从士兵连续晋升上来的所谓“士兵出身”的将军。经常有人说，如果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最多升到中校；但在欧洲战场上的作战中，他的天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诺曼底进攻战役时，他是登上了奥马哈海岸的美第二十九师的步兵团团长，尽管他进行了英勇战斗，但该师的成绩很不好。当时，登陆已经过去五天了，该师还停留在登陆当天的战线上，由于德军的猛烈反击而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登陆战役一度陷入局部失败。实地视察战线的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将军查明原因，立即撤换了师长等人，让范佛里特上校代理师长。于是，该师“就像苏醒了似的”，突然前进了。不久，他正式担任师长，接着又连续晋升为军长，享有战斗指挥官的盛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作为国内军队的司令官负责部队的教育训练，将十几万补充兵员送往朝鲜。现在他亲自在这里担任作战指挥了。他决心在李奇微开创的局面继续前进。

尽管美军预料到中朝军队可能发动新攻势，但第九军的右翼和第十军等中线和东线各军仍在继续向“堪萨斯线”北进；已经到达的美第一军和第九军的左翼师，则正在以“犹他线”为目标继续进行攻击。

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将要采取的轮番作战方针，毛泽东主席于1951年3月1日，向斯大林作了如下的通报：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对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60—70%能达前线，有30—40%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击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的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个月中调用。上述10个军的4个军，因打了5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10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12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一二两个月的作战经验，我国有3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国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于4月上旬到达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4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就在3月底4月初，朝鲜北部进入阳春季节。中国志愿军逐步转移到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继续阻击迟滞敌人的进攻。这时，敌人进攻的势头明显减弱，但有个大问题却在志愿军几位领导人的脑际索回。敌人会乘我疲劳，再次越过三八线北进吗？还是在三八线暂停，待阵地巩固后再北进？我军的反击以何时最有利？彭德怀要志愿军其他几位领导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志愿军总部参谋长解方将军提供了两个重要情报。一是麦克阿瑟和李奇微近日在东线视察，敌海军也加强了对我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封锁和对沿海岛屿的侦察、袭扰活动；二是敌人正在调集援兵，似有大动作。美方宣布在本周后从本上调两个国民警卫师赴日本，准备增援朝鲜战场，南朝鲜至少有两个师约三万人在日本加速训练，装备美械。还有消息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已有三万人于1月运抵济州岛。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似在加紧进行登陆准备，而且可能先在东海岸通川、元山登陆，配合陆上进攻，企图打到三八线以北，避免志愿军由东西山区向其出击。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和三兵团已开进朝鲜，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此刻，敌人开始全线向三八线进攻。我军则以机动防御，

掩护后续部队开进和展开。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设想和敌人可能登陆的情报，彭德怀开始考虑对敌人进行大规模反击，即进行第五次战役。一天下午，他把邓华、洪学智、解方、社平几个人找去，商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方案。会议一开始，彭德怀就说：“今天讨论第五次战役怎么个打法，你们发表意见吧！”

洪学智首先发言说：“我主张把敌人让到铁原、金化地区再打，如果在铁原、金化南面打，我们一出击，敌人一缩，不容易达到毛主席说的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把敌人放进一些来，我们可以拦腰一截，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也可以逸待劳，多一些准备时间。”

洪学智刚说完，彭德怀就说：“我们不能再退了。把敌人放到这一线来坏处很多，铁原是平原，是很大的开阔地，敌人坦克进来，对付起来很困难。另外，让敌人打进来，物开里那儿还储存了很多物资、粮食，怎么办？不行，不能把敌人放进来，还是得在金化、铁原以南打。”

“我倒是同意洪学智的意见，他的意见有道理。”彭总讲完后邓华接着说，“应该把敌人放进来打。眼下，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将进来，第九兵团也刚刚往前开进，地形都不熟悉，行动也很仓促。把敌人放进来，一是我们可以准备得更充分些，可以以逸待劳，另外也可以进一步把地形摸熟。”

“至于物资和粮食，好办，”洪学智又说，“我保证两夜之内将它们全部向北搬完。”

彭德怀听了以后，沉思良久，叹了一口气说：“你们的意见也有道理，我就是考虑朝鲜战场狭窄，把敌人的坦克放进来不好办呀！”

“敌人坦克开进来固然不好办，可是我们打出去更不好办。”洪学智坚持说，“我们往前进，敌人就要往后退，我们是靠两条腿，敌人是坐着汽车跑，我们的人又疲劳，地形又不熟，追不上敌人的汽车！另外，打远了怎么供应呀，供应线也接不上啊！”

彭德怀所以没有采纳洪学智他们的意见，主要是担心时间拖长了，敌人有从我侧后登陆的危险。彭德怀考虑，当时我们开进去的部队都是按照正面发动进攻部署的，敌人想从我侧后登陆破坏我正面的进攻，一旦发生敌人侧后登陆的情况，我们又得调整部署。部队都配备在正面，几十万大军，调头很困难。所以彭德怀想赶在敌人未登陆以前发动进攻，粉碎敌人的企图。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看了看大家说：“我觉得敌人会再次越过三八线北进，而且正准备从海上登陆配合，逼我两面作战，那对我军是很不利的。”谈到目前作战方针，彭德怀又说：“我军必须在敌人很疲劳，伤亡还未补充，部队不甚充实，且后备部队尚未来到之前，举行反击。我军反击时机以现在为最好。但现时我第二番人朝部队尚未集结完毕，可考虑5月上旬开始反击，若再推迟，待敌人登陆和增援到来后再打，可能增加我军的困难。”最后总部几位领导都同意司令员的意见，决定召开志愿军党委第五次扩大会议，部署和讨论这一重大问题，统一全军的认识和行动。

4月6日，志愿军党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金化郡上甘岭举行。第二番人朝部队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和第九兵团的司令、政委，除陈赓将军因病未参加外，都参加了会议。志愿军14个军的军长、政委，只有第三十八军和六十军的未到。会议还邀请了朝鲜人民军部分指挥员参加。这次会议是继1月份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是部署第五次战役，准备出击。会议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还对如何加强运输，克服

三八线以南无粮区的困难以及如何如何在敌后配合这次战役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彭德怀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他首先高度概括了前四个战役的经验和教训。他说，主要的经验教训有两条。这就是，在军事上，证明我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坚持固守防御是困难的，积极的运动防御是必须的；在政治方面，说明抗美援朝战争是长期的，以为突破三八线，取得汉城后，即可一帆风顺地结束朝鲜战争，是一种幻想。彭德怀接着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总方针。他说：在这个总方针下，我国军队今年准备补充60万，并确定全国以国防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亦围绕着国防建设，这是准备长期。我军实行轮番作战，改善志愿军装备，加强后勤机构，努力准备空军、装甲兵部队参战，这就是为了尽可能争取短期。

彭德怀在讲话中对敌人的兵力、企图作了分析，提出了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部署。他说：“现在敌人在朝鲜前线的兵力为14个师、3个旅，共24万人左右。另有伪军第二、八、十一师共3万多人，分布在春阳、大丘、大田、马山等地，敌人在4、5月份可能获得后备兵力不下12万。从各方面情报及种种迹象判断，敌军进占三八线以后还要继续北进，而且很可能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对我造成极大威胁。”

“我们必须在4月20日左右，至迟5月上旬，举行战役反击，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彭德怀说，“在打法上，由于敌人这次兵力比较靠拢，战役纵深不大，我军必须实行战役分割和战术分割相结合，从金化至加乎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各个包围歼灭之。”

为了确保战役胜利，彭德怀还要求参战部队做好如下工作：第一，即刻抓紧时间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术教育；第二，组织第一批参战部队的干部向新参战的部队介绍作战经验，并派出顾问协助新参战部队指挥；第三，按照作战区域划分，严密组织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第四，加强囤集粮、弹物资，规定这次战役发起时各参战部队自带五天干粮，另由各分部再准备五天干粮，随部队跟进，同时须尽一切努力，克服南进时300里无粮区的困难，使部队能不断获得粮食、弹药供应；第五，要求卫生部门作好收容四五万伤员的准备；第六，工兵部队立即着手抢修熙川经德帆里、宁边、孟山至阳德的公路，准备在敌一旦从侧后登陆，我西线交通被切断时，作为主要运输线。彭德怀最后强调说：后勤工作要特别认真对待东线五个军的粮食供应。如一两天没有饭吃，再好的作战计划都完了，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4月10日彭德怀把他的设想和部署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4月13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

就在召开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那天，北犯敌人已进至距离志愿军司令部驻地甘岭只有几十公里了。敌机昼夜盘旋轰炸，不时有隆隆的炮声从南面的交战前沿传来。为总部安全计，会议一开完，彭德怀一行便向位于甘岭西北百余公里的空寺洞转移了。空寺洞位于西线中部地区。而西线是敌军的主攻方向，也是我军即将大举出击的主要反击方向。

谁知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洪学智忽

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防空哨枪响，紧接着又听见了飞机的轰鸣声。他立即意识到这是敌机袭击来了，猛地从床上跳下来，这时邓华还在“呼呼”地打着呼噜，睡得正香呢。邓华太累了，昨天他睡时连衣服和鞋也没脱。洪学智一时叫不醒他，就急忙把他的行军床掀翻，拉着邓华往外跑。刚跑到屋对面一条小山沟里，他们的房子就被炸毁了。接着，他们又看到敌机的机枪和火箭弹把彭司令员的房子打中了。他们非常焦急，赶快让警卫员去看。警卫员跑回来，彭总已进洞了，他们才放心。

待敌机飞走后，洪学智他们上去一看，不仅彭总住的房子打坏了，就连他躲进去的防空洞门堆的草袋子也打了足足有70多个子弹眼。幸亏彭总进了洞子，而且堵了沙袋子，要不然，还真危险呀！当大家上前对他慰问时，彭德怀挥动着右手笑着说：“苍天有眼呀！差一点去见马克思！”

原来昨夜彭德怀睡得很晚，天放亮时还没醒。飞机来时，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杨凤安急忙嘱咐警卫员把彭总叫醒。说来也巧，彭德怀刚披上大衣，出屋没多远，一架敌机嗥叫着俯冲下来，一梭子子弹把他睡觉的行军床打了几个洞，房子也被敌机炸塌了。真危险！彭德怀在朝鲜前线，已经多次遇险。当大家劝他注意防空时，他风趣他说：“美国飞行员不认识我彭德怀，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李奇微担任新职后，为贯彻杜鲁门的既定政策，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他认为这条线正面狭窄，只有170公里，地形对他有利，进可攻，退可守，又是朝鲜的腹地；占领这条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利的。

这时候，敌人空军对我后方交通、物资囤集地和部队集结地进行了空前猛烈的轰炸。敌海军也加强了对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封锁、侦察和袭扰活动。不过，这时敌人由于连续两个月的进攻，兵员疲惫，损失严重，对我军大批新部队开进朝鲜，准备向他们发动新的攻击也十分畏惧。

4月19日，美军先头部队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进至铁原附近。这两个师在敌军整个战线上形成了突出态势，有利于我军对其实施攻歼。当晚，彭德怀做出决定：第五次战役于4月22日黄昏发起。就在4月19日这天，志愿军总部向全军发出了如下的政治动员令：

第五次战役就要开始了！大量歼灭敌人几个师的光荣任务，已经落在同志们的肩上！

这次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

我们要力争战争时间缩短，因为它符合中朝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力争这个仗打胜，因为它有胜利的条件。

我们向敌人出击了，为中朝人民立功的时机已到！

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全体动员起来，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争取每战必胜！保持革命光荣传统！

4月22日傍晚，中朝军队14个军（内含人民军3个军），沿着200多公里宽的战线同时开始进攻。根据预先确定的正面突击和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部队采取多钳合击的方式，向前穿插。第九兵团和第三十九军首先在战线中央击溃南朝鲜军第六师和美第二十四师之一部，将敌军的战线分割成两部分。东西两线的中朝军队乘胜向后撤之敌猛攻，在为时7天的第一阶段的攻势中，全线推进了70至80公里，在战役进攻的总体上取得了

胜利。

在第一阶段的攻势中，第十九兵团（内含配属该兵团的人民军第一军团）在向汉城方向的攻击中打得最为艰苦。其第六十三军，在突破临津江的作战中，敢于打破常规，利用敌人认为我军白天不敢以大部队活动的心理，将第一八七师分成多路纵队，在白天隐蔽分散地接近江边，天黑后就突然发起攻击，一举突破宽 100 米，已设置了大量障碍物并有严密火力封锁的临津江。

为了发展胜利，第十九兵团遵照志愿军总部关于迅速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的命令，经过激烈战斗，于 25 日 18 时突破了南朝鲜第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的主要防御地带，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一部和英第二十九旅格罗斯特团第一营及坦克团大部，共歼敌 4000 多人。这是英第二十九旅在我新年攻势中为掩护美军逃生，受到我军突袭以后的又一次遭受我沉重打击，其中以格罗斯特团的损失最为惨重。

格罗斯特团是英国军队中唯一缀有两个帽徽的著名的团。该团在 1801 年远征埃及的殖民战争中被围，后转败为胜，获得了缀两个帽徽的殊荣。今天，在英勇的志愿军面前，该团当年的威风一点也看不到了，志愿军战士用步枪、机枪、冲锋枪横扫。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该团士兵惊叫着四处逃窜，扔得枪支、食品、衣物遍地皆是，许多人乖乖地当了俘虏。格罗斯特团团长兼直属营营长卡思，先是躺在尸体堆里装死，当被志愿军战士发现后，只好爬起来，自动摘掉缀有“荣誉”帽徽的军帽，垂着脑袋，走入俘虏行列。

我们的战士是英勇无比的，第六十四军的一个营和兵团侦察支队，以 20 个小时的时间，冲破敌人 7 次阻击，在敌纵深穿插公里，一举夺取了议政府旁的制高点道峰山，切断了汉城以北之敌的退路，随后又在敌围攻下坚持了三天四夜。这一行动打乱了汉城以北敌军的部署，战后该营和该支队分别被志司授予“道峰山营”和“道峰山支队”的光荣称号。

但是，由于新入朝的部队缺乏对美军作战的经验，有的指挥员不敢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敌人，结果第六十四军主力被敌火力阻住未能穿插前进。而第六十五军的两个师又已尾随跟上，致使 5 个师约 5 万余人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约 20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达两天之久，连遭敌密集的炮火攻击，伤亡严重。后来，部队虽经艰苦奋战，得以继续前进，可是汉城以北的敌军主力却已全部撤走。4 月 29 日，第十九兵团进抵汉城北郊，第三、第九兵团和人民军东线部队也全线进抵三八线以南。可是美军却坚守汉城，在城市的东北西三面组成密集的火网。这时，志愿军自身携带的粮弹基本已用尽，攻击汉城显然不利，彭德怀司令员毅然决定停止进攻，部队转入休整。

第一阶段的进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可是据我方统计只歼敌 23000 人，其中未能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一个团，远远没有达到预定的歼敌计划。从客观原因上看，主要是敌人已根据志愿军夜间穿插的战术采取了节节撤退的战法。敌主力在白天撤退，担任掩护的摩托部队和坦克黄昏撤退，每天最多只退 20 公里，恰是志愿军一夜前进的路程。结果志愿军攻击部队夜间抓不住敌人，天亮后又正好进至敌预设阵地前，反遭敌炮火的袭击。

从战役部署上看，主要是志愿军领导仍沿用国内战争中打大歼灭战的方法，口张得太大，预定的突击距离太远。同时敌人根据我军的攻击特点，不断地改变战术，建立了兵力和地空火力密切配合的纵深防御；我军却还采用过去的尖刀战术，以密集兵力突破一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遭敌地空火力的密集封锁，尽管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整个战线上也只能形成一线平推，不能

重歼敌人的主力。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敌军从4月30日起，即以部分兵力实施反攻，企图破坏我军进攻准备。李奇微当时判断我军可能从中线突击，因而将美第七师调至揪谷里、龙头里地区，伪军第二师调至禾也山、鼎排里地区，以加强美第九军的防御。鉴于美军大都集中到西线，东线由南朝鲜军的六个师防守，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将主力移到东线，争取先消灭东线的南朝鲜军，以求达到当时确定的先消灭伪军，以孤立美军，使其在朝鲜不能长久的战略意图。

5月16日晚，中朝军队共13个军（其中志愿军9个军、人民军4个军团）发起第二阶段进攻，西线的第十九兵团佯攻汉城，以吸引美军主力。中线的第三兵团实行中央突破，切断了敌东西线联络。担任主攻的第九兵团和人民军三个军团在东线开始分割包围南朝鲜军。由于采用了傍晚突破，夜间向纵深穿插，天明实现合围的方式，加上攻击部队十分勇敢，东线的南朝鲜军迅速崩溃。

志愿军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发起进攻后，第一夜就推进了25至28公里，和东部的人民军一起，至5月18日就切断了南朝鲜四个师的后路。这时，南朝鲜军又采取遭受沉重打击即化整为零的老办法，丢弃全部车辆和重装备，分散逃入深山。中朝军队虽缴获了四个师的装备，却由于东线山高林密，一时搜剿不易，只歼敌17000人。

志愿军第十二军在这次作战中，奉命在加里山至鹰峰地段上突破，向自隐里、丰岩里方向突击；主力协同歼灭南朝鲜第五师，另以一个师向束沙里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与人民军第二军团构成合围的态势。据战前了解，防守自隐里的是南朝鲜的军队，实际上却是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三团两个营和法国营。第十二军军长曾绍山、副军长肖永银认为敌情虽有变化，但歼敌战机极好。在手头只有两个团，难以全歼敌人的困难条件下，仍毅然决定向敌发起攻击，经6个半小时的激战，毙敌千余，另有250余个美军官兵当了俘虏。美军第二师两个营及法国营大部被歼。与此同时，该美二师第三十八团团部和第一、第二营大部，也在大水洞地区被我十五军歼灭，计歼敌1807人，俘美军少校营长成鲁盖夫以下244人。在这次战斗中，第四十四师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

从5月16日至5月21日，中朝军队经五天连续进攻，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中朝军队在东线普遍推进了50至60公里，在敌方战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然而在进攻中，我方由于供应困难，不得不停下三天等待补充。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个师以摩托化行军，仅十几个小时就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这时，彭德怀将军鉴于部队疲劳和供应困难，已无法发展战役胜利，决定春季攻势到此结束，将主力转移至三八线以北休整。综合两个阶段的作战，共歼敌46000余人，内俘敌9800余人，击毁和缴获汽车1000多辆、坦克207辆，击落击伤敌机236架。

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就在于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战线推进到北纬三十九度线的所谓“蜂腰部防线”计划，为以后更多地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然而，就在中朝主力开始北撤时，由于是胜利后的班师，全军上下普遍出现麻痹思想，当时志愿军还有8000伤员未转移，也影响了部队的行动。这时，李奇微却根据对我军“肩上后勤”能力的计算，认为我军已进攻五天，粮弹基本耗尽，又没有得到新的补充，锐气已失，所以使用以逸待劳的美军七个师为主力（每师约1.8万人），连同南朝鲜军等部共

13个师，于5月22日开始全线反扑。

这次敌人反扑，改变了上次战役中稳扎稳进的战术，大胆地以坦克群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向我方纵深迅速穿插，抢占桥梁和渡口，配合后续部队包围志愿军后撤部队。当时，由于部队未安排好交替掩护，第三兵团电台又被敌机炸毁，所属部队失去指挥达三天之久，在中部战线一时出现混乱。加上一些指挥员缺乏现代兵种的知识，在前沿布置掩护部队时不注意破坏桥梁，也未很好地以人力封锁道路，而是把兵力集中在山头上，结果敌军一旦突破前沿，就能于三天之内在我方纵深推进50至80公里。

形势危机。至5月24日，志愿军第十二军军部和下属的两个师、第二十六军主力和第六十军所属的第一八师被敌人截断在三八线以南。面对突然出现的严重局面，被截断的志愿军部队大都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由于敌军“特遣队”兵力不多，敌步兵又普遍缺少近距离攻击搏斗的勇气，主要依赖火力进行封锁拦截，突围坚决的部队都获得了成功。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七军，当发现敌坦克和空降兵已插入自己的后方，全军已基本断粮时，军领导果断、沉着地组织部队交替掩护，寻敌空隙，灵活地绕路转移，全军终于建制完整地平安撤回。第十二军主力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该军第九十一团，在敌纵深90公里处被围，可是该团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一路寻野菜充饥，夺取敌人的武器补充自己，并利用夜间和敌人混在一起夺路突围，五天后终于和大部队会合。只有第一八师由于指挥失当而自身出现混乱，遭受了严重损失。在这次严重失利中，第一八师全师11000人中共损失7000多人，其中有5000余人被俘，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人员被俘最多的一次。

为了扭转因敌人反扑出现的混乱局面，志愿军前敌领导在组织节节阻击的同时，又在后方建立了三道防线，并调集兵力，待敌深入三八线以北时，再进行大规模反击。为此，正在修筑机场的第四十七军紧急调赴前线，第二十兵团也由国内入朝。对此，李奇微认为：“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其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他和新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都估计中朝军队即将举行大规模的反攻，因此于6月10日下令全线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至此结束。

敌人在进行反扑时损失也十分严重。据我方统计，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共歼敌82000人，我方损失85000人。特别在战役后一阶段，部队在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其中第三兵团因一时出现过混乱，加上内部一些潜伏的坏分子乘机叛逃，因而失踪人员最多，达16000人。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对此，彭德怀非常生气。第五次战役结束后，6月中旬，志愿军司令部在空寺洞召开了一次由军长、政委参加的会议，会上，彭德怀总结了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当讲到一八师的情况时，他当面质问第六十军军长：

“韦杰，你们那个一八师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你们被包围了？你们并没有被包围，敌人就是从前面过去了。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后面也没有敌人，中间也没敌人，就是过去了嘛，晚上完全可以过来嘛，为什么要说被包围了？哪有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

“你这个韦杰，军长是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

彭德怀自己对此也深感内疚。在总结到第五次战役最后吃了亏的情况时，他说：“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打法，洪学智曾向我提过意见，我没有采纳。现在看来，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

的确，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地总结经验和改变打法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内战争中，我军习惯于一次数万、数十万地歼敌。入朝后在运动战期间，志愿军仍多次想以战役性的迂回包围，一次歼灭美军几个师。可是，实际情况是只有第二十七军利用东线的特殊条件一次成建制地歼灭过美军一个团。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志愿军虽然在夜间进攻中包围了美军营、团规模的多股兵力，结果却不能全歼。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军的火力远远超过内战中的国民党军，他们掌握着制空权，有机动性强的长处。结果在运动战后期就出现了想近战——难以接近敌人，打夜战——当夜不能消化，力求速决——一时又僵持不下的局面。严酷的现实，强迫我军必须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

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主席曾通过认真询问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四位军长，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我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美军一个团的问题。为了改变战略战术，1951年5月26日特给彭德怀司令员发了如下的电报：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到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耳其）军1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就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1个整师，或两三个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及时。他根据新的战争实践，及时总结经验，并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常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军事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战争中，克服经验主义，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然而，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敌人感到再战下去，困难越来越多，于是放出了“停战谈判”的试探气球。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章 步履艰难的和谈

美帝侵朝无底词，世界人民要和平；

白宫深感步履艰，形势所迫放和风。

进入6月，朝鲜气温升高，夏雨绵绵，战场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特别是经过第五次战役，敌我双方都在精心地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来，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经过五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损兵折将23万人之多，被迫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了三八线附近地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丧命，迪安将军被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统治集团开始觉察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战争双方的军事力量趋于均衡，战线相对稳定。1951年6月，“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投入战场上的兵力，已由志愿军入朝时的42万人增加到69万余人。其中美军40万人，南朝鲜军23万余人，英、法、加拿大等国的军队6万余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兵力由志愿军入朝初期的41万人增加到112万余人，人民军34万余人。

志愿军和人民军虽然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劣势。“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拥有飞机1670架，舰艇270艘，坦克1130辆，轻迫击炮以上火炮3560门。而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战场上仅有少量飞机和坦克参战，火炮在数量上、质量上也处于劣势。美军除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外，其地面部队火力、机动能力也是志愿军和人民军无法相比的。

侵朝美军虽然在技术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士气低落，尤其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已成其在侵朝战争中的致命弱点。这一点是根本不能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相比的。总之，这时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双方综合力量旗鼓相当，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战争双方都在考虑实行战略转变，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

美国的侵朝战争，使杜鲁门政府内外交困。战争的第一年，美军就损失10万多人，耗资达100多亿美元。这两项损耗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的损耗多一倍。1951年度美国军费增加到600亿美元，平均使每一个美国人负担307美元，加重了美国人民的经济负担。美国侵略朝鲜，不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和平和停止侵朝战争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矛盾加剧，英法等国表示不愿继续追随美国把力量消耗在朝鲜战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杜鲁门集团作出了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月2日至16日再次坐下来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进行研究，向杜鲁门提出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杜鲁门后来回忆说，在朝鲜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幕后操纵，我们就决不能浪费自己的力量”。

杜鲁门所以在态度上来了这样一个转变，主要是在朝鲜战场连连碰壁的结果。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一直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多次发表声明支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

1950年11月18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团

长郭沫若，又向大会提出五项建议，主张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美军仁川登陆以后，中国领导人希望对方能在到达三八线的时候停下来，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问题。可是，杜鲁门的“胃口”太大了，一味地想吞并全朝鲜，扼杀年轻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

1951年2月1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又以44票对7票，9票弃权，通过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非法决议案。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这一决议案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斯大林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的一方，而保卫它的边境并力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认为通过这一决议是“不明智的”。

联合国大会决议指控中国是“侵略者”，这就把谈判的大门堵死了。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又通过美国提案，实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禁运的非法决议案；美国第七舰队在太平洋上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等等。面对着这些事实，中国政府不得不作长期打的准备。看来不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杜鲁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为了对敌人进行有力的反击，中朝军队继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之后，1951年4月22日又发动了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规模很大，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100万，战至5月21日，在整个战线上我军前进50—70公里，歼敌4.6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时，美国及其盟国又掀起了一场争论，除了一部分短见的人仍然幻想打到“彻底胜利”外，英、法等盟国和美国有战略眼光的人士都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好的“心理时机”。然而这时，对于杜鲁门来说，寻求谈判的门路却更为困难了。正如艾奇逊后来在他回忆录里所说的：“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艾奇逊首先是要当时在巴黎的查尔斯·波伦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之后，又通过美国一瑞典一莫斯科的渠道秘密试探了一下，同样没有回声；让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香港寻找接触的机会，辛苦了一阵，仍然没有获得成功。这时，艾奇逊又想起了国务院的顾问乔治·凯南。他是苏联问题专家，过去在苏联呆的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洽有便利条件。

凯南受命之后，在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与马立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经过拐弯抹角，最后终于挑开了问题。“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至此，凯南总算把他受命要说的主要意思捅出来了。

马立克同凯南的谈话传到北京，中朝领导人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谈判时机，综观战场实力，我占绝对优势，如能再歼灭它更多些部队再谈，会更有利。关于谈判条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朝两国政府历来的主张，如能以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我方不宜拒绝。于是，一切按预定的安排运转起来。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

了举世瞩目的讲话。他说：“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六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又受到了威胁。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样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倡议。”

“目前最尖锐的朝鲜武装冲突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马立克指出，“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1951年6月25日，北京《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演说的新闻和题为《朝鲜战争的一年》的社论。社论说：“本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是给予美国的又一次考验，看它是否接受已往的教训，是否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社论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它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又合理的。”

凯南的试探得到了苏、中的响应。马立克的广播讲话也得到了美国的响应。6月25日，正在田纳西州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的杜鲁门乘机发表了演说，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除表示“愿意参加问题的和平解决”外，还对主张扩大战争的人提出了某些“批评”。根据《杜鲁门回忆录》，他在当天下午讲了下面一些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我们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保持我国安宁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维持世界和平……”

“从来没有一个侵略者遇到过这样一系列的保障和平的积极措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屏障。”

“当然，我们不能担保将来不会有世界大战。只要克里姆林宫愿意，它就完全能够掀起一场世界大战。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机器，它的统治者是一批专制的暴君。”

“苏联统治者未来究竟怎样做，我们无法肯定。但是，我们能够使自己有资格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进攻，你们就会遭到自由国家的联合力量的反击，如果你们进攻，你们就会面临一场你们不可能得胜的战争。”

“克里姆林宫仍然在设法离间自由国家。克里姆林宫最怕的是自由世界的团结。苏联统治者一直在设法分裂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他们一直企图在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之间散布猜忌的种子。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拆散我们的盟友，并迫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进而实行他们的计划，各个击破，以征服全世界。”

“不幸的是，一直在设法离间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而

已。在我们国家里也有些人正在企图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

“抱有党派成见的人，力图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姑息主义’，还给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语。他们只指向一个目标，要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结在维持和平的伟大、统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吗？在朝鲜打击武装侵略，并把它击退，这难道是姑息政策吗？

“当然不是，每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是。

“请看看这些批评家提出的另外的办法吧。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说不定苏联不愿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他们不致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 475 国玩轮盘赌。

“在朝鲜和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必须准备采取一切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步骤。我们必须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冒险行动，或其他足以使侵略行为得逞的软弱行动。……”

在同一篇讲话中，杜鲁门还重复了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和平解决的谈判，但是这必须是一个能使朝鲜人民重新得到和平与安全的真正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他指令美国驻苏大使寇克求见苏联外交部，要求证实并阐释马立克演说中关于朝鲜问题的部分。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向李奇微将军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如下：

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贵方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签字）

这份电报发出之后，据《杜鲁门回忆录》中说，白宫还给李奇微发了一补充训令，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这次停战中，我们的主要军事用意在于停止在朝鲜的冲突，保证制止战斗的再起和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不论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对决定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停战部署的态度是否认真，或者他们是否准备同意订立解决朝鲜问题的可以接受的永久性办法，我们都缺乏确切的保证。所以，在考虑停战时，纵使就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达成协议毫无进展，获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为我们所能接受的停战部署，也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谈判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或考虑与朝鲜问题无关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处理……”

此外，训令还要求李奇微“在谈判立场上要极其谨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们最低的条件，否则不得让谈判破裂”。

对李奇微的声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7月1日作了如下答复：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李奇微建议在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不能同意，因为这只船是属于敌方的。中、朝提出在开城谈判，美方也认为对它不利，但是终于接受了这个地点。7月8日，双方各自派出三名校级参谋军官在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会晤，为停战谈判进行筹备工作。我方参加人员为张春山（朝鲜）、柴成文（即柴军武）、金一波（朝鲜）；对方出席会议的是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和南朝鲜中校李寿荣。首次会议开得较为顺利，双方就7月10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达成协议，并提出了双方正式谈判代表的名单。

我方谈判代表是：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对方的谈判代表也是五人，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其他四位代表是：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巡洋舰分队司令勃克海军少将以及南朝鲜的白善焯少将。

按照中朝两党中央的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不出面，为了安全的原因，李克农称为“工作队”的“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

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谈判能手，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从1928年起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参加过保卫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工作，成功地挫败了敌人妄图破坏中共领导机关的大阴谋。

1936年初任中共中央联络局长，作为周恩来、叶剑英的助手，是他首先同张学良将军的代表谈判，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职，表现了他的革命才干。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国共谈判时，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美国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全国解放后，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

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经常为报刊撰写国际评论。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作为伍修权的助手出席过联合国会议，具有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就停战谈判问题，曾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要李、乔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在这个班子里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他曾作为伍修权特别助理出席过安理会的会议，还有新华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他们一抵达开城，就

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开城是朝鲜文化名城，位于三八线南侧。公元 935—1392 年，曾是王氏高丽国的首都。这里城墙用石头构筑，有四门，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古迹。7 月 10 日这天，是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城里的男女老少在疑虑中显出一点喜悦，人们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对方的来使。

上午 10 时，双方代表在来凤庄的过庭会晤，然后步入会场坐定，互阅证书。按照惯例，会议在我方召开，本应由我方首先发言，但没等我方开口，乔埃就抢先发言。他在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以后说：“停战协定没有生效之前，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乔埃在发言将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幸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

南日将军对此没有置理。他在发言中说：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 6 月 23 日提出的建议，即“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随后，南日将军提出了三条原则建议：

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他着重加了一句，“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

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 10 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

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南日发言之后，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接着致词，支持南日的发言。他说，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建议。

接着双方就谈判的议程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对方首先提出了九项议程草案，遗憾的是对方却没有提撤退外国军队，也没有提自三八线撤退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需要谈判解决的要害问题。不难看出，对方立场有了变化。李克农说：“看来对方已没有凯南约会马立克时那样急迫了。”

既然是双方对等的谈判，我方也提出了一个五项议程的对案。世界各大通讯社对我方提出的“以北纬 38 度线为双方停战军事分界线、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交换战俘问题”，都作了突出报道，给世界人民以鼓舞和希望，由此也引起了记者们向对方施加的压力。

美国总希望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所没有得到的东西，李承晚对现在进行的谈判大为不满，并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6 月 27 日发表声明说：“决不接受导致恐怖战争序曲的任何停战方案。”6 月 30 日，他又阐述了南朝鲜政府关于停战问题的立场：第一，中共军应全部撤走；第二，人民军应解除武装；第三，联合国应制止第三国援助北韩；第四，关于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应邀请韩国代表出席；第五，反对对韩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引起纠纷的任何决定或计划。

随后，停战谈判就进入了步履艰难的阶段，总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事件的处理和战场上的再次较量。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一章 边打边谈

美方代表放狂言，大炮最有发言权；
军事讹诈无济事，针锋相对挫其奸。

第五次战役以后，敌我双方的军事控制线大体上是沿着三八线的，但又不完全是。美军和李承晚军在东面攻过了三八线，在东海岸这边占了一块山区。在西海岸，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占了三八线以南包括开城和板门店在内的一块平原和延安半岛及瓮津半岛。东面美军占领的三八线以北山区，从地形上讲，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美国人不是老早就说以三八线划界吗？所以在和谈开始时，我方代表就提出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要求美国把东面的那块山区划给我们，我们把西面那块平原让他们，完全恢复原来的三八线军事态势。在谈判中，美方不但不同意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反而凭着他们的所谓海空军优势，以在军事上得到补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三八线以北我方阵地内，企图不战而攫取我方 1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这时，“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行动方针是，在谈判期间“不实施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以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施加压力，破坏志愿军和人民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同时，视停战谈判的进展情况，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作战，并预先制定了向朝鲜半岛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推进的所谓“势不可当行动计划”。

为此，“联合国军”一面加强防御阵地，一面积极地进行发动局部进攻的准备。至 8 月中旬，先后建成了三道防线。各道防线均构筑了坚固工事，埋设大量地雷和架设数道铁丝网。同时还积极扩建了金浦、水原、大丘等原有机场；靠近前沿阵地又修建了 18 个机场，增辟了 14 处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另外，美军有六个师，南朝鲜有四个师先后从一线撤至二线，进行了一两个月的休整。7 至 9 月，美军从美国本土运往朝鲜进行轮换、补充的兵员达 12 万人。美军还将空降第一八八团和两个轰炸机联队由美国调至日本，并扩编了三个南朝鲜师和一个英联邦师，以增加其机动力量。

对于停战谈判开始后可能出现的形势和“联合国军”的行动企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早在准备进行谈判时就作了充分的估计，深知美国虽因在战争中遇到严重困难而求和，但在谈判期间，它可能玩弄种种阴谋伎俩，也可能乘机在战场上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毛泽东主席多次指示，要求志愿军必须提高警惕，积极注意作战。

特别是停战谈判开始后，“联合国军”的行动以及美方在谈判桌上的种种蛮横表现，使朝中方面更清楚地认识到，同美方进行谈判将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长期斗争。只有将政治上的揭露与军事上的打击紧密结合，尤其是军事上予敌人以沉重打击，才能迫使美国知难而退，使停战谈判按照有利于朝中人民的方向发展。

转入战略防线防御后，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积极构筑防御阵地，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进攻。至 8 月中旬，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阵地西起礼成江口，东至东海岸高城，东西绵延 250 公里之防御工事已经完成，并构筑了二线防御阵地。同时，军队部署也作了适当调整，加强了东线防御力量。为贯彻轮番作战方针，志愿军第二十兵

团在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下，于6月开始入朝，集结于东线元山队西地区，准备随时支援人民军作战或歼灭登陆之敌。

不料，进入7月下旬后，朝鲜北部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横溢，泛滥成灾。一般河流水位上涨三四米，最高达11米，水流速度达到每秒4至6米，最高达7米。洪水所到之处，交通中断，堤防溃决，房屋倒塌，物资冲走，装备毁坏，人畜伤亡，其水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危害范围之广，为朝鲜近40年来所未有。在洪水冲击下，志愿军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附近变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和高炮阵地全遭水淹，安州、鱼波车站及平壤附近全被洪水吞没，后方几乎所有的路面被冲坏，路基被冲塌，205座公路桥梁全被冲垮，无一幸免。栗里至逍遥里的沿河公路交通中断了20余天。部队作战和供应面临着权大的困难。

当时分管后勤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说，“一个是激烈的战争，一个是特大洪水，雪上加霜，困难上加困难。我作为兼后方勤务司令员，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心急如焚！为战胜洪水灾害，保证运输畅通，保证前方物资供应和兵员，我和志后其他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把不通的桥梁和能通的公路连接起来。为此，发动全军动手，另外，朝鲜群众和人民军也要参加，道路不通，大家都困难啊！

就在这个时候，美方又在谈判桌上节外生枝，制造障碍，仅在讨论议程问题上就拖了半个多月，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美方又企图不战而攫取我方1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政治讹诈理所当然地被我中朝方面严词拒绝。美方首席代表乔埃竟公然进行军事讹诈，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李奇微也狂妄地声称：“用我们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位置。”

8月18日，敌人趁我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和面临“绞杀战”的极端困难之时，在东线先后动用了美军2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的兵力，向朝鲜人民军北汉江东岸艾幕洞至东海岸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企图夺取人民军阵地，迫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让步。“联合国军”在作战行动上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方式，在选定的战线上先实行全面进攻，后集中兵力、火力实施重点进攻。人民军在该线防守的是第二、第三、第五军团，他们在粮、弹供应不足的困难情况下，利用野战工事，进行了英勇的夏季防御作战。

面对敌人的立体进攻和洪水灾害，人民军各部队进行了顽强抗击与积极反击，激战三天，“联合国军”仅攻占部分前沿支撑点。8月21日，敌人被迫转为重点进攻，对一些要点集中兵力、火力，多、梯队轮番攻击。战斗更加激烈，有的阵地反复易手10余次。8月25日和26日，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为了打击进攻之敌，夺回部分已失阵地，乘敌疲惫之际，先后进行了两次局部反击。第五军团以第六师和第十二师各两个团，反击进占杜密里杨口以北地区之敌。第二军团以第二十七师，在第五军团第六师一部的配合下，反击大愚山之敌。战至27日夜，第五军团收复了杜密里以北地区阵地。第二军团对大愚山的攻击，因敌工事坚固，防守兵力较大，当夜未能解决战斗，在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于8月31日主动撤出战斗。夏季防御作战的第一阶段，

1951年秋，美国航空兵平均每天出动飞机900架次，对我狂轰滥炸。这种“空中战略”的目的，是企图使中朝前线部队陷入无粮无弹，不战自退的境地。

朝鲜人民军共毙伤俘敌 24000 余人。

从 9 月 1 日起，“联合国军”不断以营团兵力向东线人民军进行所谓“对有限目标发起一连串进攻”。战至 9 月 8 日，仅攻占部分前沿阵地。9 月 9 日，转入重点进攻，首先由芦田坪以东 4 公里地段开始。南朝鲜第八师每日均以 1 个多团的兵力，有时集中 4 个团的兵力，在大量飞机和大炮之支援下，实施猛烈进攻。人民军在每一阵地上均击退敌人 6 至 8 次攻击，有的阵地击退 18 次攻击。在杜密里以北的 851 高地，战斗尤为激烈，敌人死伤惨重，美军士兵称为“伤心岭”。战至 9 月 18 日，“联合国军”除了在 1211 高地等地段继续保持进攻外，其他地段的进攻已被迫停止。在这一段，人民军共毙伤俘敌 22000 余人。

在此期间，志愿军第一线各军，为了配合朝鲜人民军作战，积极进行战术反击。位于北汉江以西的第二十七军，于 9 月 1 日至 3 日，以 3 个团的兵力，在 5 个炮兵营火力支援下，向金城以南注波里东西一线地区之敌实施反击，共毙伤俘敌 1900 多人。第六十四、第四十七、第四十二、第二十六军各一部，于 9 月 5、6 两日，分别向涟川以西德寺里、铁原西南 338·1 高地、铁原西北中马山、平康东南西方山和斗流峰等敌军阵地实施反击。除第四十二军攻击中马山未能成功外，其余均达到预定歼敌目的，占领了西方山、斗流峰等要点，改善了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奋战一个多月，胜利地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联合国军”以死伤 78000 余人（内含美军 22000 余人）的代价，突入东线阵地之至 8 公里。

夏季反击作战的胜利，是在我军刚转入阵地防御，工事不坚，经验不多，粮弹供应不足和部队疲劳的困难条件下取得的。这一胜利，为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进一步提供了依据。9 月 4 日至 10 日，志愿军党委在空寺洞再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夏季攻势进行了总结。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陈赓将军，对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零敲牛皮糖”的战法大加赞赏。他对彭德怀司令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供给困难，进行大的战役，倒不如这样小打，虽然是小的歼灭战，但可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削弱敌人，打击其士气，造成进行大战役的基础。”

会议分析了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的战场形势，确立了在持久战思想指导下，今后战争的样式主要是阵地攻坚和阵地防御。社平将军说，从这时起，朝鲜战场上精彩的运动战已经谢幕，代之而起的是长达两年之久的阵地战。如果说，以前五个战役解决了能不能打的问题，那么此后要解决的则是能不能守的问题了。

对战争形式的这种决定性变化，彭德怀司令员在 9 月 8 日的“作战方针”报告中，曾作了这样的阐述：

“第一，我们虽然胜利地打到了三八线附近，但我军的技术兵种还差，特别是整个供应运输，由于敌空军的破坏，相当困难，直接影响到战役的连续进行。

“第二，由于我军的胜利前进，使战场变得狭小，敌人兵力相对集中，我要大踏步前进，一下打到釜山是有困难的。

“第三，敌人由于遭受了多次的惨败，也不敢大胆地冒进，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可能性也是较小的。”第四，朝鲜海岸线长，便于敌登陆作战，我如长驱直入，确有后顾之忧。

“总之，朝鲜战场上阵地战的战争形式一天一天的明显，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的机会已日益减小。我们必须学习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坚持持久作战。”

对于阵地战的打法，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确定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在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抵抗，对每一阵地必须进行反复争夺，不得轻易放弃阵地。要采取不断的阵地反击及小出击，歼灭出犯或突出部之敌，以求得以较小的代价更多地杀伤敌人。

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面对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的进攻，要能保证防御的稳定性，关键是要有坚固的阵地工事。彭德怀要求全军必须把进一步加强防御阵地作为战略任务来抓。他说：“自8月18日开始，敌人向东线人民军进攻，20天中前进5公里，伤亡至少有5000人。这仅仅是我整个前线1/3的地段。从目前前沿至黄川有120公里，我们又有三道纵深阵地，即需要480天时间及30多万人的伤亡。范佛里特吹嘘其东线攻势，要让我们在开城会议上去想一想，那末，这也要范佛里特去想一想，看他有没有本钱来干！”

且说敌人的夏季攻势被志愿军和人民军粉碎后，仍不甘心，又在西线发动“秋季攻势”。9月29日，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并投入大量的坦克。其直接目的，是企图迫使志愿军放弃临津江左岸至铁原以西一线阵地，解除对其涟川至铁原交通干线的威胁，并从侧翼威胁开城，为尔后夺取开城要地创造条件。位于铁原地区的美第三师两个团，首先在100门火炮和60辆坦克配合下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防守的地段进攻。激战终日，志愿军防守夜月山的第四二三团第六连，连续击退敌人14次攻击，杀伤敌人800余人。我工事全部被摧毁，坚守主峰的一个排全部壮烈牺牲。但是，在天德山方向，志愿军阵地屹立未动。

从10月3日开始，“联合国军”集中美骑兵第一师、美第三师两个团、英联邦第一师在200余辆坦克、300余门10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和大量飞机支援下，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第四十七军阵地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马良山阵地曾五次易手。志愿军防守216.8高地的一个连，依托坑道式的工事，在一天内连续击退敌人20余次攻击，以伤亡26人的代价，毙敌700余人，初步显示了坑道工事的优越性，经过五昼夜激战，英联邦第一师伤亡2600余人。在敌人疯狂的进攻面前，我军凭借工事，英勇抗击。战至10月18日，志愿军粉碎了敌人在西线的进攻，“联合国军”以伤亡22000余人的代价，仅前进了3至4公里。

从10月8日至10月25日，敌军又以六个师（其中美军三个师）在东线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和人民军第五军团一部的阵地发起进攻。进攻中敌军大规模地使用了坦克。第二十兵团的两个军经顽强防御，粉碎了敌人的“坦克劈入战”，为在阵地防御作战中如何进行反坦克战斗，提供了重要经验。

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入朝后，于9、10月间接替了久战疲劳的第二十七军和人民军第五军团。这支部队刚刚接防，还未及适应环境和加固工事，就投入抗击敌人集群坦克进攻的紧张战斗中。在朝鲜战场上，开始美军使用坦克比较谨慎，作战时坦克很少先于步兵冲击，而大多充当前沿的活动火力点。不过在第四次战役后，美军知我反坦克火力弱，虽对其单个或小群坦克威胁较大，但却难以对付其集群坦克，因而敢于以连（24辆）、营（72辆）规模的坦克集团进行割裂志愿军阵地作战。

秋季攻势开始后，美军集中其坦克兵在东线展开了所谓“坦克劈入战”。

其作战方式是，每次以 20 至 40 辆坦克组成一个集群，在大量飞机掩护和步兵、工兵伴随下，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实行密集轰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各个高地的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进行“逐山占领”，9 月 21 日，美军就在第六十七军阵地前使用了 70 余辆坦克，分三路向纵深穿插。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5 日，在第六十七军防御的 27 公里宽的阵地前，美军又出动了 280 余辆坦克发起攻击。同时每天发射炮弹 5 至 10 万发，出动飞机 100—130 架次。这是朝鲜战争中美军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坦克作战。

第二十兵团第六十七军在金城以南接防新阵地后，阵地上只有少量土木构筑的掩体和战壕，防地内道路又比较多，美军坦克利用这一便利条件连续展开反击，大部分工事被敌摧毁。第六十七军采取边打边补充，边抢修工事，白天失去的阵地夜间反击夺回的办法，与敌人反复争夺。各部队通过总结经验，连队大都组织了反坦克小组，敌人进攻时埋伏在路边，待敌坦克接近时突然跃出发起攻击。各师、各团又组织了反坦克队，在道路上设置了大量障碍，有效地降低了敌坦克的前进速度。有限的反坦克火器也分散隐蔽配置，待时机有利时才突然开火。这样，经 10 昼夜激战，敌人推进了 6 至 9 公里后，即被阻止。这一期间，据我方统计，共杀伤敌人约 23000 人，击毁敌坦克 39 辆；其中 1 万人是在 3 天内被杀伤的，创造了志愿军日平均杀伤敌军数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第六十八军，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经过 13 昼夜激战，不仅守住了文登里主阵地，还杀伤敌人 7600 人，击毁敌坦克 28 辆。

第二十兵团粉碎敌“坦克劈入战”的经验证明，要有效地抗击敌人集群坦克的进攻，需要多兵种的有机配合。第二十兵团在没有空军掩护和坦克配合的情况下，主要采取步、炮、工兵的密切协同，将大炮射击、反坦克手出击和工程障碍结合起来，利用敌集群坦克在山区不易展开队形，一般只能一线运动的特点，在重点地区以火力的集中对付敌坦克的集中。这样，就使得敌人坦克特有的机动性和突击力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又容易遭到沉重打击。美军因其“坦克劈入战”损失较大，而战果又有限，在此后的整个战争期间就再也未敢使用坦克向志愿军阵地实行穿插，也再未使用大的坦克群直接配合步兵作战。

美方发动的“秋季攻势”和与此同时进行的空中“绞杀战”，并未能达到夺取军事优势以改变战场态势的目的。敌军在一个月的进攻中，东西两线共死伤 79000 多人，敌我伤亡之比为 3：1。在这长达 250 公里的战线上，敌军平均推进了不足 2 公里，而距鸭绿江的直线距离还有 400 公里。因此，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讥笑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 20 年的米景才能达到鸭绿江。”李奇微后来也承认：“对当时军事上的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儿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1 年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是在刚刚转入阵地防御，工事尚不坚固，敌机狂轰滥炸，洪水为患，部队粮弹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的。在异常激烈艰苦的作战中，广大指战员充分表现了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强决心，连续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取得了歼敌 157000 余人的战果。志愿军伤亡 33000 余人，“联合国军”占去土地 646 平方公里。此后，敌人在长期的对峙作战中，再也不敢冒险发动全线大规模的进攻了。

敌人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均遭失败，美方“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

论”的叫嚣宣告破产，只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继续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在谈判中，美方放弃了攫取1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无理主张，但其提出的新的军事分界线方案，仍要求朝中军队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撤出开城地区。美方在谈判中为攫取开城地区，提出了荒谬的理由，说什么开城对汉城构成“威胁”，开城如不是中立区早为“联合国军”所占领，并表示要以“联合国军”所占领的朝鲜北部西海岸外若干岛屿与开城交换。

美方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朝中方面的拒绝和有力驳斥。为使谈判达成协议，10月26日朝中方面提出了根据实际接触线加全面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双方互有进退，而各自撤退的区域大体相当。但美方仍坚持无理主张，企图占有开城地区。

为了配合谈判中就岛屿问题进行的斗争，根据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决定，志愿军第五十军于11月5日至11月30日利用渔船渡海作战，攻占了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和岛等十余个岛屿，消灭了岛上南朝鲜方面的特务武装570人。人民军也攻占了部分岛屿。在渡海作战中，志愿军的战斗机曾掩护船只航行，轰炸机两次轰炸了大、小和岛。这是我军历史上轰炸航空兵的第一次战斗出动，也是我军航空兵第一次直接配合陆军作战。

我方以攻岛作战打掉敌方在军事分界线谈判中的一块筹码。与此同时，为了增加对敌方的压力，显示我方力量，以利谈判，志愿军司令部于10月底指示前线的六个军发动局部反击。10月30日至11月下旬，前线部队进行了34次进攻战，每次以歼灭敌一个连、一个营为目标。经反复争夺，最后夺回并巩固占领了九处阵地。

为了确保开城的安全，粉碎“联合国军”攻占开城的企图，志愿军司令部10月29日命令第六十五军加强开城地区及临津江以西防御兵力，如敌进攻，坚决防守，不得轻易放弃一寸土地，并尽可能向前推进，消灭敌人的小部队；还命令第六十二军于11月中旬进至开城东北地区，准备协同第六十五军打击向开城进犯之敌；并命令第四十军第九师准备随时参加保卫开城的作战。

第六十五军遵照第十九兵团关于“扫清汉江以北敌之海防部队”的指示，于11月间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驱逐了盘踞在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汉江以北地区，经常对谈判中立区进行破坏骚扰的南朝鲜军队。志愿军控制了汉江北岸和砂川河西岸的有利地形，将阵地向前推进了280平方公里，进一步稳定了开城地区的防御。

在局部反击战中，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大显威力。11月4日，第六十四军对马良山的进攻战，是志愿军第一次组织的步兵、炮兵、高射炮兵、坦克兵和工兵的协同作战。进攻出敌意外地在白天发起，先由60门火炮摧毁敌工事和压制敌炮火，又以坦克进至前沿直接射击敌火力点，同时以较密集的高射火器打击敌机。三个步兵营以四个小时的强攻，全歼英军第二十八旅的一个整营，夺回马良山阵地。随后，又打退敌军多次反击，这次战斗，志愿军共毙伤俘英军约1740余人。

11月4日，第四十七军以2个步兵团11个连的兵力，在114门火炮，11辆坦克支援下，向美骑兵第一师3个连防守的正洞西山发动进攻。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攻占阵地。次日，美骑兵第一师以两个营的兵力反扑。第四十七军在打击敌反扑中，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离阵地。在敌

重新占领该阵地后，第四十七军又乘敌立足未稳，以三个营兵力再次反击，全歼美骑兵第一师一个营又一个连大部，创造了在阵地攻坚战中打小歼灭战的范例。

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作战，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以及志愿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战场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能不能打的问题通过第一、第二次战役解决后，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火力面前，志愿军能否守得住阵地。秋季阵地防御战的成功，使这一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在志愿军和人民军局部反击作战和攻岛作战胜利的形势下，11月27日，美方同朝中方面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

协议中规定：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

10月25日，秋风瑟瑟，草木枯黄，一转眼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已经一周年了。

10月29日，彭德怀将军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总结夏、秋季防御作战经验，并研究下一段的作战部署。彭德怀说：“抗美援朝已经一年了。一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迫使他们同我们举行谈判。朝鲜人民感谢我们，给我们受勋。我彭德怀去接受这个勋章，是作为志愿军的代表去接受的。”讲到这里，彭总拿出勋章让大家看，“多漂亮的勋章啊！”接着他深沉而又严肃地说：“为了抗美援朝，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志愿军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这枚勋章是一个星期前，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建立的伟大功勋，特地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前夕授予彭总的。为了接受勋章，前几天彭德怀还亲自到平壤去了一趟。他的勋章是朝鲜最高的一级国旗勋章，是朝鲜最高人民委员会授予的。

谈到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彭德怀指出：秋季作战的成功，也使志愿军确定了新的作战方式。根据当时我方的统计数字，运动战期间，敌我双方人员损失数基本相等；而在夏、秋季的阵地战期间，敌我人员损失的比例是2.7：1，我方物资消耗更比运动战期间少得多。这样看来，打阵地战可以用更小的代价实现我方的战略目标。

彭德怀最后强调指出：全军必须提高警惕，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他说，现在停战谈判虽然在进展，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企图在谈判桌上捞取战场上不能赢得的东西。为此，他们节外生枝，无理取闹，并随时向我进击。我全军指战员必须发挥“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威力，寻找战机，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重创敌人，只有大量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促进和谈的胜利实现。

彭德怀还特意号召航空兵、高炮兵、铁道兵，努力奋斗，克服一切困难，保证铁路、公路运输的畅通，在夏、秋攻势胜利的基础上，坚决粉碎敌人“绞杀战”的阴谋。正是：

夏秋攻势开新面，

歼敌一十又六万：
小股出击歼顽敌，
积小为大甚可观！
欲知反绞杀战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二章 反绞杀战

军民齐反绞杀战，天兵怒气冲霄汉；
军需供应当务急，确保钢铁运输线。

1951年7月，朝鲜北部出现了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战时抢修的桥梁因其基础多不坚固，大部被冲毁，美军又乘机发起空中“绞杀战”。这年秋季美国航空兵平均每天出动约900架次，其中只有90架次直接用于支援前线地面部队作战，其余都用以攻击中朝军队的后方。这种“空中战略”的目的，是企图使中朝前线部队陷入无粮无弹，不战自退的境地。

“绞杀战”是美军仿照1944年3月盟国空军在意大利境内，以德军使用的铁路线为主要攻击目标而发动的一次空中战役而炮制的。那次战役，最初被称为空军协同攻势。后来被称为“绞杀战”。朝鲜半岛的地形、交通线的构成以及美军空中封锁的计划，都同在意大利进行过的“绞杀战”极为相似。所以，美军把他们的这次行动亦得意地称为“绞杀战”，想把朝鲜半岛变为昔日的亚平宁半岛。

美军“绞杀战”的具体做法是，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区，以绝大部分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进行长时间毁灭性的轰炸。切断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破坏我军前后方联系，窒息我军作战力量。所以“绞杀战”又称“阻隔战”、“窒息战”。

在当今的战争中，后勤保障的程度，对决定战争的胜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志愿军人朝参战后，在供应方商与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所需要的装备基本不能取之于敌，所需给养也几乎不能取之于当地之民。运动战初期缴获物资虽多，却因美军采取破坏战场的做法，缴获到的装备很快被敌机大部炸毁，所余的与我军装备的型号也大多不一致，难以使用。北朝鲜的人民虽然热情支援志愿军，可是因战争的摧残、破坏，战区人民生活尚无保障，难有多余的衣食支援志愿军。我军虽可暂时借粮借物，也必须尽快归还。所以几十万出国大军的作战和生活需求，基本上都要由国内供应。

可是敌机在我军后方日夜不停地实行严密的空中封锁，敌海军舰炮也不断轰击东西海岸的交通线，使得志愿军的运输供应极其困难，这一困难在运动战期间成为影响志愿军作战的最重要的因素。

1950年10月，志愿军刚发起第一次战役时，战线距离中朝国境线一般只有几十公里，可是战役进行到第10天，部队前进到距国境170公里的时候，就因粮弹供应不上而被迫停止了进攻，第二次战役虽然是志愿军战绩最辉煌的一次战役，可是战役期间也暴露出后勤工作的严重弱点。当时入朝部队和后勤民工已达50多万人。然而由于部队迅速穿插前进了数百公里，人力、畜力运输难以跟上，而志愿军人朝的1300辆汽车因空袭和翻车损失严重，只剩下260辆，结果粮弹和棉装都供应不上。东线第九兵团在饥寒交迫中因冻伤减员达三万人，以致于美海军陆战一师从包围中逃生，未能很好地完成歼灭敌主力的任务。

在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中，随着战线的延伸，供应更加困难。这时运输线最短也有500公里以上，火车还基本不通，前线主要依靠汽车运输。志愿军的汽车虽然已增至2000辆，数量仍远远不够。而且由于敌机在夜间也不断轰炸，汽车行车时不敢开灯，一夜只能行驶30至40公里，运输量仅达

到前线最低需求量的 30—40%。这样，志愿军不但已不可能向南朝鲜纵深地区继续推进，连保持现有地区也比较困难，因而未能完成预定的歼敌计划。

正因如此，侵朝美军依赖空中优势，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战略要地、军事设施及交通运输线进行轰炸破坏。这一直是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一再加强。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美国空军投入战场的各种类型飞机，已由战争开始的 500 架增加到 1100 架。其中用于轰炸破坏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的占 50% 以上，主要攻击军队集结地域、补给基地、公路铁路桥梁、交通枢纽和运输车辆等。至 1951 年 7 月，美国空军投入战场的兵力增加到 24 个大队又 10 个中队，拥有各种类型的飞机约 1700 架，其中包括美军当时最先进的 F—86 型喷气式战斗机以及可载千磅炸弹的 B—26、B—29 型战略轰炸机。

1951 年 7 月 10 日，停战谈判开始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就命令远东空军司令：“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中力量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来惩罚在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

同年 8 月，侵朝美军制定了“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的绞杀计划，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尽可能使“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企图切断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运输补给线，割裂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与后方的联系，窒息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作战力量，以对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配合停战谈判。为此，美国空军把封锁交通线作为首要任务，动用了大部战斗轰炸机和全部战略轰炸机来执行这一任务。美国远东空军第五航空队司令埃佛勒斯特中将在绞杀战开始时就大言不惭地说：“对铁路实施全面的阻滞突击，将能削弱敌人到如此程度，以致第八集团军发动一次地面攻势即可将其击溃，或者将能使敌人主动把部队撤至满洲境内附近，以缩短其补给线。”

当时情况是十分严峻的。7 月下旬，朝鲜北部发生了 40 年未见的特大洪水，并一直持续到 8 月底。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冲毁了大量桥梁和道路，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运输线受到严重破坏。铁路桥梁被冲毁 94 座次，线路被冲毁达 116 处次，中断运输最长者达 45 天，最短者为 13 天。50% 的公路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志愿军后勤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地区成了一片汪洋。到了 8 月中旬，美国空军趁洪水给我造成巨大破坏时，开始实施“绞杀战”，重点轰炸铁路桥梁，并对尚能通车的线路进行逐段轰炸，致使我后方处境更加困难。至 8 月底，铁路桥梁遭受破坏达 165 座次，线路达 459 处次，当时尚能维持通车的铁路总长仅约 290 公里，平德线（平壤至德川）由于大同江桥与沸流江桥被破坏，全线停开。整个铁路交通经常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到了 9 月份，美国空军在普遍轰炸道路、桥梁，封锁破坏我交通运输的同时，又重点集中轰炸新安州、西浦、价川铁路的“三角地区”。这个三角地区，是整个朝鲜北方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枢纽和咽喉。南北走向的京义线、满浦线，东西走向的平元线、价新线都在此连结、交叉。如果这一地区遭到破坏，不仅南北东西铁路运输同时中断，而且公路运输也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一地区铁路运输畅通与否，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作战物资的供应关系重大。

美国空军将轰炸重点转至“三角地区”后，平均每天出动飞机 5 批 100 余架次，集中对京义线渔波至新安州段和满浦线顺川至价川段进行轰炸，并逐步压缩轰炸范围，最后在肃川至万城间的一公里地段和龙源里至泉洞间的

一个连结点上连续反复轰炸，企图在一两点上造成深度破坏，使志愿军和人民军无法修复，从而达到切断运输供应的目的。

“三角地区”的凡段铁路仅长 77.5 公里，为朝鲜北部铁路总长的 5.4%。据统计，这期间遭受破坏达 2600 多处次，是朝鲜北部全部铁路被破坏处次的 45% 以上。4 个月中，敌机在这一地区投弹 38000 多枚，平均每两米即中弹一枚。此外，敌人还在价川至顺川投下了许多 500 公斤以上的定时炸弹，人土深达四五米。由于定时炸弹威胁大，严重影响了抢修速度。

面对洪水和敌人的“绞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不分前方和后方、战斗部队和后勤机关、战士和铁路员工，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战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彭德怀将军说：“这是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他号召志愿军铁道部队、工程部队、运输部队、公安部队、高射炮兵、航空兵和兵站仓库、医院诸兵种联合作战，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打一场大规模的反“空中封锁”战役。

我方部队同洪水斗争的同时，又想尽一切措施反对敌人对我后方的绞杀。为此，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要求各部队对各种物资紧急隐蔽、疏散、伪装，设置各种假目标，以假隐真，迷惑敌人。当时各部队创造了许多隐蔽的好方法。有的利用地形，在狭窄的山沟、山崖、山脚等处建立仓库，囤集物资，停放车辆，舟设治疗所；有的利用地物，在茂密的树林隐蔽人员和车辆；有的利用矿洞、自然洞、隧道和各种掩体。这些地方一般不易发现，即使发现了敌机袭击也比较困难。运输部门还在公路沿线两旁修了许多汽车隐蔽部，或干脆就利用路旁山拗的天然洞，一看飞机来了，汽车就钻进隐蔽部。有了汽车隐蔽部，汽车队就不光是只能在夜间运输了，白天也可行车，飞机来了就躲进隐蔽部。

后来，志愿军还有意识地设置假目标，使敌机真假难分，诱敌机上当。在仓库区附近苫上苇席、草袋子，上面用绿树叶子盖着，敌人来了就狂轰滥炸一阵子，结果什么也没有炸到，增加了他们的消耗。有时，晚上还故意燃几堆篝火引诱敌机轰炸、扫射。有时，干脆就把坏的汽车装上高粱米间隔距离很远地放在那儿，故意让敌机炸。“我们给敌人算了一笔帐，”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将军说，“他们撂 200 磅、500 磅的一枚炸弹，打中了，炸我一车高粱米，不值多少钱。如果他撂空了，没炸掉，最多把口袋打几个窟窿，粮食还是照样吃。我们漫山遍野到处都有假目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同敌机斗智。”

“过去敌机是发现了目标就炸。”洪学智继续说，“后来，敌人怀疑了，派了很多特务来察看轰炸的效果怎么样；特务报告说，效果不好，有许多是共军设置的假目标。所以敌机再炸时就犹豫了，先琢磨一下是不是假的，我们就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有时干脆就把汽车停在公路中间；敌机以为一定是打坏的，好的绝不敢停在公路上，就不轰炸，我们就这洋真真假假与敌机作斗争。”

入朝作战之初，预报敌机空袭问题没有解决。宿来在实战中总结了经验，战士们在沿途一些制高点设立防空哨，日夜监视敌机的活动。一旦听到敌机的声音，马上鸣枪报警。这样，正在开灯行驶的汽车司机听到报警的枪声，立即熄灭车灯，摸黑行驶或躲避。敌机飞过后，防空哨又敲钟解除警报，汽车继续开灯行驶。

在加强防护的同时，后勤部队也积极开展了对空射击。志愿军入朝初期，

只有一个高射炮兵团，对空防御力量很弱。这个团属志愿军炮兵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指挥。不久，炮兵司令部改为炮兵指挥所，由匡裕民任主任。高射炮兵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师相继入朝。此时，高射炮兵已有4个师又3个团和50个独立营。为掩护抢修抢运，志愿军总部下决心抽调了在朝高射炮部队的70%，并成立铁道兵高炮指挥所，统一指挥。同时，开展群众性的对空射击运动，用轻武器打敌人低空飞机，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志愿军入朝初期，为了隐匿战略意图，也由于缺乏对空作战经验，很少用轻武器打敌机，在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期间，仅击落敌机17架，击伤1架。第三次战役以后开展群众性的打敌机运动，部队开展了学技术与打飞机竞赛，并普遍制定打飞机计划，从而创造了一连串的光辉纪录。重机枪手杨德贵曾用10发子弹击落一架双引擎中型轰炸机，而高射机枪手屈秀善只用3发子弹就击落了一架敌机。

从第四次战役起，击落、击伤敌机的数目就日益增加，相当可观。从1月25日至4月21日，击落敌机457架，击伤28架，共485架，平均每日击落击伤敌机5.6架。自第五次战役开始，4月22日至6月25日，击落敌机323架，击伤154架，共477架，平均每日击落击伤敌机7.3架。从6月26日至8月25日的两个月内，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役，但由于敌人开始实施“绞杀战”，我后方部队对空射击活动增强，又击落敌机273架，击伤229架，共502架，平均每日击落击伤敌机增至8.2架。

物开里是志愿军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绞杀战”开始后，天天遭到轰炸。掌握敌机的活动规律后，后勤司令部秘密地把一个高炮营调过去，有12门高射炮，4挺高射机枪。一天，4架敌机果然又来轰炸了，低低地俯冲下来。这时高射炮突然开火，将4架敌机全部击落。不一会儿又飞来4架，第一架又被我高炮击落，剩下的3架见势不妙，拼命升高往上窜逃跑了。高炮打飞机旗开得胜，高炮营得到了后勤司令部的嘉奖。

为保障后方铁路运输，1951年春中央军委派遣三个高射炮师入朝，以铁路为防卫重点。高炮部队入朝护路后，各部队也展开了群众性的对空射击。敌机不敢低飞了，高空投弹对铁路目标的命中率只有原先的1/10。而后，美军航空兵将普遍轰炸改为重点封锁。他们一面重点封锁几座重要的江桥，一面集中轰炸清川江附近的新安州、西浦、价川这一作为运输咽喉的“三角地区”。在4个月里，美机不分日夜死死啃注“三角地区”这个仅有77.5公里的铁路地段不放，使这里平均每两米即中弹一枚。针对这一情况，志愿军司令部决定采取以集中对集中的办法，以重点保卫和机动作战相结合的方式打击敌机。

根据这一决定，志愿军于9月下旬抽调高射炮兵1个团、11个独立营和6个高射机枪连，加上原部署在铁路运输线上的高射炮兵部队，在铁路线上组成了4个防空区。到12月，担任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部队已达在朝高射炮兵部队总数的70%，其中2/3的兵力配置在“三角地区”。为了统一指挥作战，12月份成立了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随着志愿军防主力量的增加，仅12月份即击落击伤敌机106架，其中仅高炮英雄阎舒魁的一门炮，就击落敌机6架，击伤12架。

高射炮兵根据敌机活动的变化，为了克服防卫区域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贯彻“重点保卫、机动作战”的方针，除集中部分兵力掩护桥梁、车站

和仓库外，以 2/3 的兵力广泛实施机动作战。

1952 年 4 月至 6 月，担任掩护交通的高射炮兵部队转移调整兵力达 20 余次，行程 3659 公里，1 月至 6 月，志愿军担任掩护交通运输线的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 198 架，击伤 779 架。5 月 8 日，高射炮兵第二十国营在捕亭里仓库区对空作战中创造了一天击落敌机 25 架的纪录，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在防空部队和空军的掩护下，铁道兵部队和地方铁路员工每夜都进行紧张的抢修抢运。为了加强铁路系统的领导，1951 年 8 月，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下成立了以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的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为便于朝鲜境内的指挥，还专门成立了前线铁道运输司令部，以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委，李寿轩和一名朝鲜同志任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副政委，负责指挥入朝的四个铁道兵师，连同配属的运输、高炮部队共五万多人。

敌人对我交通大动脉铁路的破坏是极其疯狂的。两年多来，曾出动飞机 15 万多架次，投弹 19 万多枚，其中定时炸弹约占 1/3，平均在我通车线路上每 7 米投弹 1 枚。志愿军铁道部队、广大铁路员工和兄弟部队一起，英勇奋战，抢运抢修，创造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如铁道兵第一师某连在百岭川奋战了 76 个昼夜，抗击了 26 次大轰炸，全连伤亡 99 人，剩下 40 人，仍坚持按时完成了抢修任务。铁路军管局有一台机车在行车时被敌机发现追打，车身中弹 300 多处，可是司机仍将机车开到了目的地。荣立集体二等功的某部九连，守护着遭受敌机重点轰炸，被投弹 7000 多枚的一座桥梁，随炸随修，保证了通车。闻名全国的“登高英雄”杨连弟先后转战清川江、沸流江铁路桥工地，在铁道兵中首创白天利用敌机轰炸间隙抢修的范例，后不幸因定时炸弹爆炸而牺牲。特等功臣郭金升，以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拆卸了 603 枚定时炸弹（共 40 多种），取出炸药 27 吨，不但排除了危险，保护了线路，还为国家节省了财富。

敌机投弹量虽然成倍、成十倍地增长，但在我英雄战士们的奋力抗争之下，运输量反而不断提高。

1951 年 7 月，美机对我铁路线的轰炸次数相当于同年 1 月的 5 倍，可是 7 月间的铁路运输量则为 1 月间的 2.3 倍。

1952 年 1 月，美机对铁路的轰炸次数相当于上一年 1 月的 63.5 倍，可是同月，北朝鲜的铁路运输量又增加到上一年 1 月的 2.67 倍。1952 年 5 月，朝鲜北部铁路运输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上半年的运输任务。对此，同年 5 月 31 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的记者招待会上都认为是“凉人的奇迹”。

在反轰炸的斗争中，铁路运输战线广大指战员，不仅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还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总结经验，以集体的智慧创造出一整套抢运、抢修的有效方法。在铁路运输方面，为了在有限的通车时间内通过更多的列车，采取了“列车片面续行法”，即在一个或几个区段上，组织两列以上列车取一定间隔，连续向一个方向运行，不对开。这一办法的实施，显著地提高了铁路运输的效率。

当时，北朝鲜的铁路基本上是单行线，运输又大都是由北向南。在美机不断的轰炸下，铁路场站普遍遭破坏，许多车站只能临时修通一股道通车，无法会车，因此难以按常规搞火车对开的平衡运输。1951 年 4 月，铁道兵利用鸭绿江桥抢修通车的一个夜晚，试行只向南发运满载车，停止向北回运

空车，结果当夜运量比和平时期平衡运输的运量提高了一倍多。根据这一成功经验，以后每逢可通车的夜晚，所有列车就向一个方向（或南或北）单方面发车，每列车的间隔一般只有5分钟。这样，在一条单轨铁路上创造了一夜开往前线47列火车的纪录，相当于和平时期行车数的2.5倍。

在“三角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就组织汽车运输部队和装卸部队将定州、球场、价川附近的物资，倒运到渔波、顺川和德川等地再装火车前运，实施长区间的倒运。为了解决运输力量不足的问题，志愿军司令部还组织全军二线部队，到铁路运输终点接运冬装。9月底，志愿军指战员全部领到了新冬装，及时地保证了军队的需要。

在加强铁路抢修抢运的同时，为了加强公路线上的抢修力量，解决长时间公路上因错车不便而造成的交通阻塞、运转不灵的状况，志愿军司令部组织了七个工兵团和二线休整的各军及各兵团直属工兵分队参加公路抢修。志愿军工兵是与大部队同时入朝的，由工兵指挥所直接指挥。在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由15个工兵团入朝，担负各种工程保障任务。在工兵部队中，有许多像张振智、朱重元这样的英雄人物。就是他们带领着战友们，在敌人鼻子底下埋设地雷，在敌机轰炸和洪水的威逼下抢修桥梁。三年中，艰苦奋斗的志愿军工兵共架设新桥千座以上，补修的桥梁总长度达7万多米。仅到1951年12月底，志愿军工兵就在朝鲜军民的协助下，共加固加宽原有公路2158公里，新修建公路292公里，大大改善了公路的运输状况，基本上保证了公路的畅通。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年轻的空军在反“绞杀战”中正式出动作战，旗开得胜。1951年1月21日和29日，我志愿军空军第四师第十团大队长李汉，在两次实战中，击落美F-84型飞机一架，击伤两架。这是志愿军空军历史上第上次击落敌机。李汉被志愿军总部批准为二级英雄、一等功臣，反“绞杀战”开始后，志愿军空军奉命正式出动掩护交通线，到12月底共出动5个师飞机3526架次，击落敌机70架，击伤25架，迫使敌战斗轰炸机的活动空域很快撤到清川江以南，敌B-29轰炸机从10月份起转入夜间活动。

在对空作战方面，志愿军空军继续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以积极勇敢的行动迎战敌机，掩护清川江以北铁路运输线。在这一阶段，先后参战的有7个师，经常保持3个师左右的兵力进行空战。在1952年2月10日的空战中，第四师第三大队大队长张积慧驾驶的长机，在单志玉驾驶的僚机掩护下，将美国空军第四联队少校中队长乔治·戴维斯驾驶的长机及其僚机击落，戴维斯在美国号称“空中英雄”、“最了不起的喷气机王牌驾驶员”、他被击毙，在美远东空军以至美国国内都引起了震动。2月13日，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尔逊悲哀地承认，戴维斯的毙命，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张积慧共击落敌机四架，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朝鲜战争开始了世界航空史上以喷气式飞机交战的新时代。新中国的空军刚一建立，就参加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空中战争，并在战争中将自己锻炼成为一支强大的全新的技术兵种。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中国空军只有3个师，至年底前又紧急组建了5个师，然而这8个航空师各只有两个团，每师也只装备几十架飞机，其中除第四师外还都刚刚开始突击训练。

当时，志愿军急需空军参战掩护运输线。苏联方面经过初期的犹豫后，同意从1951年1月起，以两个空军师有限地掩护清川江以北的100余公里的

交通线。苏联由于担心和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一直不承担其空军在朝鲜上空参战的责任。苏联这种“很有限的参战”，远远不能满足志愿军的需要。同时考虑到我国的空防不能长期依靠他国，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末作出了空军参战的决策。

我们所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美国是战后世界空军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空军拥有飞机17000架，美国海军拥有飞机14000架。美军在朝鲜战区的作战飞机一直保持在1500架左右，最多时达2400架，美军飞行员至少都有1000个小时的飞行经历。新中国的空军与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进行空战，空军自身乃至后方基地都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在面对风险的同时，新中国的空军这时参战，又有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迅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很快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空军。

面对战争的迫切需要，新中国的空军打破了世界各国空军建设的常规，边打边建，边打边训。1950年年底至1951年4月，空军又组建了九个航空兵师，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并进行突击训练。按当时世界上训练喷气式飞机驾驶员的惯例，一般需要训练300个小时以上，在美国则需500个小时。新中国的飞行员急需参战，由教员带飞50至60小时，飞行员掌握了驾驶技术，即行参战。

1951年1月21日，空四师在鸭绿江附近上空首次同美国空军交战，大队长李汉击落F-84一架，从此开始了空军的初战阶段。1月29日，李汉在空战中又击落击伤F-84战斗机各一架。从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空军进入了以大批部队正式参战的阶段。经中央军委决定，空军以师为单位，采取由少到多，以老带新，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等稳妥办法，组织部队参战。9月4日，空四师和友军一起进行了双方有200多架飞机参加的激烈空战，战斗中飞行员刘涌新击落美国最新式的F-86战斗机一架。毛泽东主席看到战报后，马上写下了“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的批语。

11月间，空三师和空二师、空十四师转入第一线作战。空三师取得打小机群的经验后，随即配合友军打大机群，在86天中，共击落击伤美机64架。

11月6日和11月36日，空八师出动仗-2轰炸机两次轰炸了大、小和岛之敌。这是我空军第一次执行轰炸任务。在后一次出航途中，与前来拦截的美F-86战斗机展开空中格斗，击落美机三架，首创世界空战史上以活塞式轰炸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战例。对此，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在记者招待会上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锻炼出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在战争中，志愿军空军涌现出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氓这六名一级英雄，还有一大批二级英雄和功臣模范。空三师的大队长王海带领全大队团结战斗，共击落击伤敌机29架，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王海本人击落敌机4架，击伤敌机5架。空四师中队长张积慧前后击落F-86飞机4架，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空中英雄、有过击落敌机21架纪录的乔治·戴维斯少校和他的僚机。这些空中英雄们在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空战中创造出了光辉的业绩。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的年轻空军迅速成长，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共战斗出动26491架次，共击落敌机230架，击伤95架。在此期间，中国空军由只有一个航空兵师、几十架作战飞机，发展

到拥有 23 个航空师，近 3000 架飞机；从空战的实力看，仅次于当时的美苏，跃居世界的第三位，成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经过中朝军民的英勇战斗，敌人的“绞杀战”被粉碎了。侵朝美军实施的“绞杀战”，既没有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运输瘫痪，也未能迫使朝中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屈服，敌人的飞机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952 年上半年，敌人损失飞机 1743 架，其中被击落 575 架。到 1952 年 4 月，敌战斗轰炸机实力已降到最低点，有两个大队降到编制数的一半，已无力对我铁路两头同时进行“饱和轰炸”，只能轰炸清川江以北的一头了。1952 年 5 月 31 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美军的“绞杀战”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欲知敌人又施何毒计，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三章 举世声讨

美帝施放细菌弹，丧尽天良激怒怨；
举世谴责又声讨，中朝军民战犹酣。

美国侵略军在实行“绞杀战”的同时，又在朝鲜战场犯下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他们竟然不顾一切地大规模地使用了细菌武器，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争，美帝国主义这一罪行，激起了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怒声讨。

1952年2月21日，新华社驻朝鲜前线记者，首先向全世界揭发了美帝国主义这一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的罪行。消息说，从本年1月28日至2月17日为止，美国的军用飞机连续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阵地和后方的上空，大量撒放传播细菌的各种毒虫，现已发现的计有：

1月28日，美机在伊川东南之金谷里、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一带上空撒放为朝鲜居民所未见过的三类小虫：第一类状如黑蝇，第二类状如跳蚤，第三类状如壁虱（又像小蜘蛛）。

1月29日，美机在伊川上空撒下一批苍蝇及跳蚤。

2月11日，美机又在铁原一带的志愿军阵地上空投下大批纸包、纸筒，内装跳蚤、蜘蛛、白蛉子、蚂蚁、苍蝇等类小虫。

同一天，美机在市边里附近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苍蝇；同时又在朔宁一带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跳蚤；在平康地区一带上空撒下跳蚤、苍蝇、蚊虫、蟋蟀等类小虫。

2月13日，美机在金化地区志愿军阵地上空撒下苍蝇、蚊子、蜘蛛、跳蚤等类小虫。

2月15日，美机在平康一带地区撒下苍蝇、蜘蛛、跳蚤等类小虫。

2月16日，美机在北汉江以东红树及乌川里地区上空撒下苍蝇、蜘蛛、虱子等。

2月17日，美机四架在平康以北之上甲里、下甲里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跳蚤、苍蝇等类小虫。

根据志愿军医务部门初步化验结果，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的病菌。

从美国一些报刊报道里，可以看到美国军方早已在准备和制造细菌武器，据美国《生活》杂志说，驻在加利福尼亚州德第里克兵营的细菌作战部，早已开始研究细菌武器。这个细菌作战部已经发明了利用空气和水来散播的足以大批杀害人命的16种细菌武器。侵朝·美军也在进行着同样的罪恶活动。早在1951年3月，美侵朝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总部的卫生福利处处长赛姆斯准将，曾率领美军第1091号细菌登陆艇到元山港，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来试验细菌武器。

据美联社记者1951年5月18日从朝鲜巨济岛报道，这只登陆艇很快即从元山港开到巨济岛，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进行细菌试验。这个记者说：“船上的试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3000次试验。”这样试验的结果，就使“岛上半打圈栏里面关着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80%染有某种疾病”。美国其他报刊也曾报道过这只干着惨无人道勾当的登陆艇的活动。

新华社记者揭露说，美军的绝灭人性的嗜血者的暴行，不但是经过长期准备，而且是在与朝、中人民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时期进行细菌战的大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等人的勾结下进行的。

据中东社 1951 年 12 月 5 日仰光电，引述拒绝透露姓名的两名美国官员所透露的消息称，这三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了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而这三个“细菌专家”，就正是 1950 年 2 月 1 日苏联政府的照会中，提议设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加以审判的五个大战犯中的三个。

大量材料证明，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开始利用日本细菌战犯积极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美军侵朝以后，1950 年 12 月向南撤退时，曾在黄海道等地撒布过天花病菌。1951 年又多次在中朝军队被俘人员中秘密地进行细菌性能试验。

1952 年 1 月，美军在继续进行其“绞杀战”的同时，又以“制造疫区、毒害朝中军民、削弱对方有生力量”为目的，秘密地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

据“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公布的材料，从 1952 年 1 月 28 日到 3 月 31 日，美军在朝鲜北部撒布带有细菌的动物即达 804 次之多。3 月以后，美军撒布细菌的范围日益扩大，遍及朝鲜北方的 7 个道 44 个郡。撒布带有细菌的动物主要集中在接近前线的地带和后方重要城市及交通线。2 月 29 日至 3 月 5 日美军飞机还多次侵入中国东北地区领空，撒布了传播病菌的昆虫和鼠、雀，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境内。

据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检验查明，美机撒布的昆虫和鼠雀等动物带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达 10 余种。他们将这毒菌经过人工培植，附在苍蝇、蚊子、跳蚤、蚂蚁、蜘蛛、鼠、兔、鸟等动物身上，或附在树叶、棉花、食品、宣传品等杂物上，制成细菌弹，由火炮发射撒布，并多以污染水源、交通要道与居民集中点为目标。其危害对象除朝、中军队及居民以外，还包括家禽、牲畜及农作物。由于细菌战违反人道主义与国际公法，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也严格保密，称细菌弹为“不爆炸的炸弹”。

美军实施的细菌战，严重地威胁着朝中两国军民的生命安全，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在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此时又发生，其他传染病如回归热、天花、斑疹伤寒等也开始流行。2 月 20 日至 3 月 9 日，朝鲜北方居民有 13 人被病菌传染患了霍乱，其中 9 人死亡。朝鲜平安道安州郡一个 600 人的村子，2 月 25 日至 3 月 11 日，就有 50 人被病菌传染患了鼠疫，其中 36 人死亡。3 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 16 人，患脑炎和脑膜炎的 44 人，患其他急性病的 43 人，其中 36 人死亡。

为了揭露和战胜敌人的细菌战，朝中两国政府从政治上、外交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2 年 2 月 22 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首先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抗议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这种暴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组织者的国际责任。

2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正义主张，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声明说：“根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司令部的确实材料，

美国侵略军自 1952 年 1 月 28 日起，连续多次使用以虐杀朝鲜和平人民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目的的更大规模的细菌武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朴宪永外务相，于本年 2 月 22 日发表声明，抗议这种新的罪恶行为，并号召全世界人民制止美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的组织者的国际责任。我现受权正式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正义的主张。”

声明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在其所发动的干涉朝鲜战争中，遭受了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惨重打击，被迫进行停战谈判。但在谈判的进行中，又不甘心其在干涉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于是一面使用种种无耻的拖延战术，来阻挠谈判的进行；另一面又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来希图延长并扩大朝鲜战争，以实现其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远东的和平安全的侵略阴谋。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无耻阴谋和罪恶行为，中国人民是有决心也必然要将其粉碎的。美帝国主义将不仅不能达到其罪恶目的，并且必然将要在全世界和平人民正义的愤怒之下、自食其可耻的恶果。”2 月 25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美国进行细菌战，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行动起来，制止这种屠杀人民的罪行，以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庄严决议。与此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纷纷提出抗议，各人民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和科学组织分别向全世界人民和有关国际组织提出控诉。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女士，2 月 23 日发表文章，呼吁全世界人民和红十字会会员们，立即行动起来，制止美帝的暴行。

2 月底，当美军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时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同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回答这种挑衅，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声讨美国的罪行。3 月 13 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 16 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抗议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境内撒布细菌的罪行。

与此同时，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普遍反对。自从朝中两国政府向全世界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以后，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学生联合会等国际性组织都先后发表声明，坚决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 年 3 月 8 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声明中指出：“在 1 月 28 日至 2 月 17 日中间，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撒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他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

声明说：“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特别是违反 1925 年 6 月 17 日的日内瓦公约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居里号召全世界舆论斥责美国侵略者的罪行，他说：“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

现。今天，人们可以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贴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1952年3月29日，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会议。中国代表郭沫若在会上就美国对朝中两国人民进行细菌战作了详细的报告。4月1日，会议通过了《反对细菌战告全世界男女书》，号召全世界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龌龊、最骇人听闻的武器的罪犯们，作为战犯归案法办。其全文如下：

我们仔细地研讨了有关目前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文件以后，深感焦虑和震惊。细菌战不仅是应该予以制止的丑恶罪行，而且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我们向全世界的男女良心呼吁，号召他们要求制止细菌战和禁止细菌武器。我们首先向美国的男女呼吁，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面前都出现了一个正直与否和品格如何的问题。朝鲜战争之用联合国名义进行，是一种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认为：那些赞成联合国进行干涉因而对进行战争所使用的方法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的政府，应对这种情况负责。

至于我们，则负有双重义务：首先便是向世界舆论报告情况，并把真相告诉每一个人，使人人都能判断我们已经晓得的丑恶事实。我们决定公布我们现有的文件，必须使罪行大白于天下。为了使这些罪行大白于天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能够收集一切事实的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为了建立这个委员会，我们的科学界、法律界和宗教界最有威望的代表参加。我们确信世界舆论必将支持这个委员会的努力。

我们的第二个义务就是保卫所有人民，使免于细菌战的浩劫。我们认为：只有美国，也就是大国中唯一的国家，才没有批准1925年6月17日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我们要求全世界人民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签署、批准并遵守这个公约。我们同时要求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龌龊、最骇人听闻的武器的罪犯们，作为战犯归案法办。

我们确信，我们提出保护无辜者而惩办罪犯的要求，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我们代他们捍卫最崇高的事业——一切儿童生存的权利以及对人性的尊重。如果各国人民不立即行动起来制止细菌战，那么，破坏力量的残酷、狂暴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号召人类起来自卫。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

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达波赛、法捷耶夫、郭沫若、戈登夫人、贝尔纳教授、英费尔德教授、伦德奎斯特。

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斯崔特夫人、戈特、爱伦堡、赫鲁马特卡教授、龙巴迪、赛扬、卡桑诺伐、茅盾、法奇、考涅楚克、穆卡罗夫斯基。

世界和平理事会秘书长：拉斐德。

北京《人民日报》4月7日发表《为击败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而斗争到底》的社论。社论首先指出：“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奥斯陆会议一致通过了题为《反对细菌战告全世界男女书》，向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发出了庄严的正义声讨，号召全世界男女为制止美国细菌战的罪行和要求禁止细菌武器而进行坚决斗争，与此同时，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发表了《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及《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

的报告》两个文件，对美国侵略者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以及其他种种残暴罪行提出了有力的罪证，并加以严厉的斥责。这无疑使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为保卫世界和平、维护人类正义与安全而对美国侵略者发出的正义声讨，在道义上更加不可抗拒，并将必然得到全体正义人类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随之，一个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运动在全球开展起来。当时方联和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还利用联合国讲坛，对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谴责。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举行了多次反对细菌战的群众集会。印度人民和进步报刊继续提出抗议，斥责美国侵略者进行反人类的阴谋。黎巴嫩和中东许多国家报刊接到许多人民抗议书，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德国波茨坦举行声援朝鲜日，各地人民捐献药品，援助朝鲜人民。从亚洲、西欧各国一直到南美洲和美国国内，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掀起了反细菌战争，包括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集会等各种活动，他们高呼口号：“美国侵略军滚出朝鲜去！”

当侵朝美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被揭露并遭到全世界人民强烈谴责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故作沉默，直到1952年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才发表声明，进行抵赖，说什么“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细菌战”。但是，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议案，又遭到美国的无理否决。暴露美国政府仍打算继续使用细菌武器毒杀中朝人民，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为了彻底揭露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驳斥艾奇逊等人的抵赖和辩解，由中国红十字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及有关科学专家70余人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陈其瑗带领下于3月中旬和4月上旬，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中国调查团于3月23日抵达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调查团的到来首先表示感谢。他说：“调查团来，充分体现了祖国人民对朝鲜战争的深切关怀。这就是我们力量无比强大和胜利的具体表现。”在李德全谈到调查团来到朝鲜耳闻目睹美帝国主义撒布带细菌昆虫的种种证据后，彭德怀坚毅而愤慨地指出：“敌人这一罪行并不是偶然的。”他用各种事实证明，美国侵略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积极准备进行细菌战。他还说：“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来到汉城，就是为了准备在朝鲜实现这一灭绝人性的可耻阴谋。”

“但是，敌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使用细菌武器呢？”彭德怀在详细分析了朝鲜战局的变化时指出，“事实摆得如此明显，敌人原来夸耀飞机大炮是万能的，想以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进而向中国东北进攻；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人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进行了所谓‘秋季攻势’，结果又失败了。敌人的一切可耻行为，遭到中朝人民部队的沉重打击后，于是就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以此来威胁朝鲜人民和朝中部队。”

彭德怀司令员严正他说：“我要正告敌人：你们企图以你们认为‘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吓倒中朝人民和征服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你们的如意算盘，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下，一定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

1952年3月至8月，朝中两国政府还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和波兰等八个国家的著名法学家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的著名科学家组成。

这些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收集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大量证据，并根据这些证据分别公布了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有力地驳斥了美国当局的抵赖和辩解。“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4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会议，讨论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会上听取了调查团长布兰德魏纳的调查报告。布兰德魏纳首先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访问了朝鲜许多道市城镇，特别注意那些证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调查团就此提出两个报告。大量材料事实证明，美军正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从飞机上投下带有细菌和病毒的昆虫。

布兰德魏纳指出：“美军对朝鲜人民进行的细菌战，只不过是它无数罪行中的一部分而已。它还有许多行为破坏了国际法，而且最粗暴地蹂躏了人们公认的人道原则和战争惯例。例如，调查团证实了美军在朝鲜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美军在朝鲜另一罪行是大规模地屠杀和平居民和难民。仅信川一个地区，在美军占领期间，就有平民35000多人遭屠杀，其中包括妇女16000多人。”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普里特和总书记诺德曼，特就此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电文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对于美国使用这种为国际法而特别在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的万恶战争手段提出严重的抗议。”

“为国际法所禁止的这种战争手段，是为全世界人民的良心所不容许的。”电报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鉴于这种战争手段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威胁，因此，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定步骤反对此种罪行，谴责这种罪行并制止其干涉朝鲜的战争。”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还在北京、沈阳等地举办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实物、图片展览。与此同时，美军被俘人员也为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美军第三师第七团第三营K连一等兵马汶·勃朗在1952年3月5日晨1时在朝鲜战场被俘。供词说：“我证明美军使用细菌炮弹射击共军。1952年2月中旬，在115高地阵地上，美军下士爱德华·巴伦告诉我说，美第三师六十五团使用细菌炮弹射击共军，接着他给我看了一份军方内部报纸《星条报》。该报标题说：美军有500发细菌弹用以对付中国共军。该报还说，第六十五团使用细菌炮弹对付在朝鲜的共军已获得效果。”马位还说：“我曾两次看到过关于使用美制细菌炮弹的美军新闻电影。电影上映出细菌炮弹内装有带细菌的苍蝇，电影上还说明细菌弹是有效的和危险的。要大家注意保

密，不得外传。”

美俘第四十五师一七九团C连上等兵达林·歇泼斯是1951年12月自日本开赴朝鲜的。这时正是美军发动细菌战的前夕。达林供称：当时在日本对进行细菌战已经议论纷纷。来朝鲜后，1951年12月2日约2时半，在克福福特军营医务所注射了6针，而只有4种登记在我们的免疫证书上。我们问：为什么只登记4种？医官说那两种不登记是为了特殊的理由，是军事秘密。

此间，美国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公布了经过严格检查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司令布伦少将在3月3日所作的证言。布伦说：化学兵团受命负责国防部的“生物战与化学战范围内各方面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并负责放射性武器的某部分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他说，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化学兵团需要3810万美元作为研究与发展费用，比1951年会计年度增加了1230万美元，1953年比1952年再增加650万美元。因为“明年将有规模更大的新的实验所开始工作”。布伦强调说：化学兵团非常注意细菌战与化学战。“我们已研究了10年，我们认为现在应当赶上某些金属武器。”

正当美国政府继续使用各种卑鄙无耻手段，企图狡辩抵赖它在朝鲜与中国所进行的细菌战的滔天罪行时，新华通讯社又陆续公布了凯尼斯·伊纳克、约翰·奎恩、弗兰克·许威布尔、瓦克·马胡林、小安德烈、爱文斯等25名美国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和公开信。他们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供认了参与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提供了无可争辩的亲身投掷细菌弹的证据。这就使美国政府更加陷于狼狈不堪的被动境地。

凯尼斯·伊纳克空军中尉供称：他曾于1951年8月25日与其他10名驾驶员、15名领航员一道听了细菌武器的秘密讲授课程。于1952年1月7日在北朝鲜黄州投掷细菌弹两枚，于1月11日在中和投掷细菌弹4枚。约翰·奎恩空军中尉供称：于1951年12月中旬听过细菌战课程，于1952年1月4日在平壤南郊投掷细菌弹4枚，1月11日在军隅里东北投掷细菌弹两枚。他们对这些罪行已经供认不讳，而且已经详细地写成自白书交与朝中人民军队。

凯尼斯·伊纳克4月8日在自白书中写道：

1952年1月6日晚上，我与驾驶员阿麦斯上尉和机枪手屈西军士一道飞行，我们照常驾驶B—26型的飞机。我们在1952年1月7日上午3点钟起飞，4点钟我们在北朝鲜黄州投了两枚细菌弹，5点钟飞返群山，并到空军大队情报处汇报执行任务情况。我们向情报官报告，在黄州投了两枚“不爆炸的炸弹”。这不过是为了保守秘密而已，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是细菌弹。

在1952年1月10日晚上，我又同阿麦斯上尉和军士驾驶B—26型飞机于3点起飞，4点10分在北朝鲜的中和投掷了4枚细菌弹，于1952年1月11日5点15分回到群山。为了尽可能地保守秘密，我们在报告中又说在中和投掷了4枚“不爆炸的炸弹”。

现在，我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他们待我们像朋友一样。……我现在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谁是和平的爱好者，以及谁是应对这个惨无人道的战争负责的战争贩子。我已下定决心为反对华尔街资本主义、为和平而斗争，来洗刷我良心上的过失。我满怀决心，要加入爱好和平的阵营并决心做一个新人。

凯尼斯·罗埃徐·伊纳克

1952年4月8日约翰·奎恩在1952年4月13日的自白书中写道：

我做了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并被迫投掷细菌炸弹，犯下了这个反对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军的严重罪行。因为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服从命令，而这些命令是由华尔街的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所发出的。我不能拒绝作这种罪恶。但另一方面我就是那个携带细菌炸弹的人，就是我将细菌弹投掷在无辜的妇女、儿童很可能受害的地方，是我犯下这种无人性的罪恶……

我认识了我那可怕的反人民的罪恶，我对无辜的和平人民做了无人性的事情。我现在知道这件罪恶是多么的错误，我请求人民能善心地饶恕我这一罪行。这是反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罪恶，并且是一件的确应该被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谴责的罪恶。我请求一切要求和平的人民的宽恕，因为我的罪恶是敌对他们的。

约翰·奎恩

1952年4月13日

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罪行的同时，中朝两国政府又积极领导军民展开了反细菌斗争。当发现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几次发出关于对付细菌战的命令，对反细菌斗争作了布置。朝鲜迅速成立了国家紧急防疫委员会及各地防疫委员会。在病菌沾染地区，进行了消毒，扫除了毒虫。在军民中进行了防疫注射，以控制疫病的流行。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发现美军撒布的细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从组织方面、物资器材和医药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2月下旬，中央军委连续发出两次指示；要求志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疑和动摇”。遵照这一指示，志愿军于1952年3月1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斗争。并在全军上下普遍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思想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普遍地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开展了捕鼠、灭蝇和保护水源、清理驻区卫生的运动。在驻地及交通线附近的朝鲜居民中，也普遍地注射了疫苗，约达130万人次，从而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当美军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领土的时候，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进行杀虫灭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防疫运动。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人民大力进行防疫工作，开展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实行灭蝇、灭蚊、灭虱、灭蚤、清秽等工作，并应以城市及交通要道为重点。

为粉碎美军发动的细菌战，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防疫措施。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原有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加以扩大和加强，由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兼任副主任委员，以便更有力地领导全国防疫工作。到3月底，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共计2万余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了66个检疫站。国内还加紧研制和发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杀虫剂。4月10日前，对东北地区485万人进行了鼠疫预防注射，另外，3月上旬运往朝鲜各种疫苗580万份，满足了志愿军的需要，并支援了朝鲜军民。

侵略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初期对朝中两国军民造成一定的危害，在少数部队和居民中发生了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志愿军共发生与细菌战有关

的疫病患者 384 人，有 258 人治愈。由于及时采取得当的措施，组织周密的防疫工作，志愿军很快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随着反细菌战的清洁卫生运动的开展，志愿军改善了卫生面貌，提高了健康水平。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朝中两国军民彻底粉碎了美军进行的细菌战。美军实施的细菌战，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地使自己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反对。

就在中朝军民反细菌战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而开展了“地下长城”作业。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章 “地下长城”

固守阵地办法好，地下坑道挖通了；
连接起来似长城，歼敌保己是法宝。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1951 年的夏秋防御作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其基本原因是：在敌人密集的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的猛烈轰击下，志愿军依托一般野战工事，很难做到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持久的防御作战。

对此，志愿军副司令员、前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将军曾作过如下的回忆：

“在朝鲜战场上，从麦克阿瑟、李奇微到克拉克、范佛里特以至后来的泰勒，都是十分迷信于炸弹的。无论从天上还是在地面，总是把成吨成吨的钢铁往我军阵地上、往朝鲜的土地上倾泻。我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作过一个小小的试验：他在老秃山的阵地上，随意划了一尺见方的地方，就捡出大小炮弹皮 287 块。作战科作过一个统计，第十九兵团进入阵地防御期间，敌仅投掷在我阵地上的炸弹就达 7784000 多发。这些炮弹要用 51000 多辆汽车或 4400 多节火车皮才能装下。说我们的阵地土翻三尺，寸草皆无，那不是夸张的。战士们走在阵地上，松软的焦土，有时陷到脚脖，陷到小腿。那时候，我们的阵地最好认，哪座山头、哪块高地光秃秃的，哪里就准是我们的阵地。”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存自己，守住阵地，还要消灭敌人，而且要大量地消灭敌人，是很不容易的。”杨得志说，“敌人发动秋季攻势之前，我六十五军在开城以南东西九华里吉水里地区布防，保卫开城。”当时开城是敌人进攻的重点，部队防守任务很重，伤亡也很大。为了帮助解决前沿阵地出现的问题，杨得志和兵团政委李志民将军，特前来六十五军进行视察。

当时，第六十五军指挥所设在一个半山腰的掩蔽洞里，用木板搭起的桌案上点着几支蜡烛。军长肖应棠、政委王道邦、军政治主任陈宜贵都在。战场上没有寒暄。肖应棠军长情绪沮丧地向兵团首长汇报说：“这两天打得不好，部队损失很大！”

来六十五军之前，杨得志他们在兵团司令部曾经研究过，大家一致认为，六十五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开城，这一点从上到下都不能动摇，但不能把保卫理解为死守，更不能把保卫理解为是“被动挨打”。

“进攻与防御中的运动战，是我们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志民政委强调说，“朝鲜战争，从作战地点到作战对象同国内相比都不同，但正是这个不同，给我们提供了丰富以往经验的机会。对指挥员们来说，打一仗进一步，首先应该表现在战略思想和战术运用上。”

杨得志司令员也对肖应棠等人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

“我还是主张在运动中防御，在防御中运动，以运动改变被动局面。其实，这是我们的老战法：你打我，我让你打不着；我打你，就要把你打死。现在的问题是，先想办法不让敌人打着。再解决把敌人打死的问题。这方面，我希望你们多想，多谈谈。”

六十五军是华北的一支老部队，在军的干部中有好几位参加过石家庄战役，也有人参加过抗日时期的冀中地道战。杨得志请他们回忆一下攻克石家庄的情况。“这个战役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是第一次打攻坚战，攻克具

有坚固设防工事的大城市。”杨得志说，“为克服这个困难，我们采取了构筑进攻出发工事的办法，把大部队运动和屯积在敌人没有发现的战壕和坑道里，突袭敌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重提石家庄战役，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肖应棠军长说：“最近发现战士们为了防炮，有的在阵地背面挖了防炮洞，效果不错。”

“很好！”杨得志司令员说，“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指导，不断激发战士们的创造性。我们的战士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

“早在抗日时期，我们就在冀中开展过地道战。”杨得志话音一落，李志民将军就说，“没有地道的地方，我们就在防御阵地挖好掩体，既能观察敌人，又能暗中射击。现在我们把过去的经验，结合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加以利用和发展，岂不更好？”

说着两位将军就在军长的陪同下，冒着敌人不时打枪打炮的危险，到工事前沿视察。整个高地看不见一棵完整的树，半截半截的树干横躺竖卧，大片大片的树根裸露在外，杨得志将军回忆说：

“偶尔碰到一两个树桩，只有一二尺高，上边也是弹痕累累。”

前沿战壕有一人多深，在里面可以直起腰来走动。战士见兵团和军首长来了，非常高兴。尽管他们脸上布满了尘土灰烟，但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格外有神，透出“激动和坚毅”。一个个双足并拢，腰杆笔直，对首长表示欢迎。看到这般情景，杨得志和李志民心里滚烫，他们握着一双双结满硬茧的手，抚摩着他们被弹片撕得成缕成条的军衣，不时地说：“谢谢大家，谢谢同志们！”

这个连的连长是四川人，一派英雄气概，他带领兵团首长视察了他们的战壕和防炮洞。每一个洞蹲一个人，有的两个洞连在一起，形成小坑道，可以多藏几个人。连长介绍说：“敌人打炮了，我们撤下来躲进这防炮洞里，敌人炮火停了，我们再到战壕去。”

“很好！”兵团司令打心眼里称赞他们的发明，他对连长说：“还可以沉住气，等敌人靠近了再开火，这样可以多歼灭敌人！”

“再挖深些行吗？”李志民将军一面观看战士们的工事，一面回想起当年的冀中地道，说：“挖通它，把它们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地道网，再多几个望孔和射击孔，既能掩护自己，又能打击敌人！”

“要得要得！”那位连长以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兴得双手一拍，说：“我们马上就干！”

杨得志他们回到兵团不久，就接到六十五军的报告，他们已按领导上的要求，把单个掩体连在一起，形成一条条巨大的坑道，可以容纳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了。干部战士情绪很高，对坚守阵地并依托坑道扫击敌人充满信心。敌人打炮时，战士们就进去隐藏；敌人炮火向我纵深延伸，敌人步兵接近时，战士们便冲出来杀伤敌人。这就是坑道战的雏形。

这种由战士们创造出来的初级工事，在敌人炮兵、航空兵的猛烈火力袭击下，经受了考验，对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稳定性，起了明显的作用，证明了它是劣势装备的我军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的一种好方法。当杨得志将军将六十五军的坑道防御工事向志愿军总部报告后，彭德怀司令员立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1年10月，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军进行推广。一个全军性的挖洞热潮便在志愿军的防御前沿迅速地开展起来。那些日子里，敌人在上面打炮，志愿军在下面放炮（打洞）。整个防御

地域内，地上和地下，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钎，一边战斗，一边进行战场建设。

当时的敌我情况，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峙局面，对方大小 17 个国家的总兵力达 50 余万人，技术装备绝对优于我军，而且已经在南朝鲜建立起 3 个战略性防线。我们的兵力优于敌人，但技术装备处于劣势；一切供给都要从国内运来；加之朝鲜地形狭长，敌人兵力集中；因此，要在大踏步的机动战中消灭敌人是困难的。同样，敌人由于遭受了多次的惨败，也不敢大胆冒进。这样，今后作战要以阵地战即阵地攻击与阵地防御为主。我们的作战方针是持久战，我军的战术原则是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袭击、伏击、反击相结合，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根据持久作战的原则，志愿军总部强调修筑工事要注意山顶、山腰、山脚相结合，平地与山头相结合，掘开式掩体与坑道火力点相结合。为防敌迂回，阵地要组成多个品字形结成鱼鳞状，以便相互支援。还强调了小部队夜间出击问题。“夜战，是我军所擅长的传统战法，也是我军历来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有效战法。”杨得志将军形象他说，“夜间出击，打一把就走，这边一拳，那边一脚，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搅得敌人坐卧不安，这是阵地防御战中应该经常使用的法宝。”

几十万大军在紧张的战争之余，在大山的肚子里作业，与岩石、沙礅、塌方打交道。开始，战士们既缺乏先进的工具，也缺少技术，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十字镐由长磨短，由短磨秃，最后磨成铁锤一样的铁块。运碴没有车子，就给炮弹箱安几个轮子；洞里没有灯，就点起松树油，白天在洞口用玻璃片或金属向洞里反光；工具实在不能用了，就自己砌起铁匠炉锻造。战士的手，由打起一个个血泡，再结成一层层老茧。初期，靠自设小铁匠炉，搜集各种弹片和废铁，制造工具和器材。如第十二军建了 40 多个铁匠炉，8 个月制造工具 16000 多件，修理工具 75000 件。

可是坑道工程规模不断扩大，施工工具和施工器材成了严重问题。为适应前方的需要，工兵指挥所在沈阳成立了器材处，统一负责工程作业器材的采购、加工和调拨，并在平壤、三登、阴德设立了器材站，供应各施工部队物资器材。

1952 年 2 月，敌人发现志愿军正在普遍构筑坑道工事，开始有计划地以重炮、重型炸弹与毒气弹进行破坏。少数坑道由于坑道构筑不合作战要求受到损失。还有一些坑道因地点选择不当，土质松软，春季冰雪融化，出现坍塌，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志愿军司令部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坑道建设必须做到七防：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根据这些要求，各部队改进了坑道顶部过薄、出口过少、幅员过小、不够隐蔽、不便运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等缺点，使坑道进一步完善，更能适应战术与长期作战的要求。

接着，志愿军总部又于 4 月 26 日至 5 月 1 日召开了军参谋长会议，总结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经验，统一了对构筑坑道工事的认识。会议明确指出，构筑坑道工事，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为了更有效打击敌人。因此，坑道工事必须与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和生活设施，以使之更符合战术要求，成为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

同时，会议还统一了坑道工事的规格标准，要求坑道一般厚度在 30 米以

上，坑道口厚度 10 至 15 米，每条坑道要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幅员宽 1.2 米，高 1.7 米。会后，志愿军坑道工事的构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技术要求上或战术要求上都更加完善起来。

1952 年 5 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防御地带坑道工事基本完成，与之相配系的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各种火器掩体等野战工事也同时完成。

就这样，经过志愿军全军指战员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一个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逐步形成了。一座座“地下长城”在战士们手中诞生了。射击工事、交通壕、干道、支道纵横交错；宿舍、饭厅、厕所，一应俱全。有的还被战士们称为“地下大厦俱乐部礼堂”。在十九兵团司令部直属机关的坑道里还修筑了澡堂。对此，杨得志将军说：“尽管这些简陋的厅、廊、房、厦、堂绝不能同国内相同名称的建筑相比，指战员取这样一些好听的名字，也只是他们革命乐观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比起先期入朝的部队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生活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

3 年来，志愿军挖的坑道长达 1250 里，它等于从祖国东海岸连云港起，横越江苏、河南，跨过黄河，直达陕西西安的一条石质大隧道。他们挖的各种堑壕、交通壕共长达 6240 公里，几乎相当于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万里长城的长度。修的 10 万多个地堡，出土在 6000 万立方米以上，如果把把这些土堆成宽、高各 1 米的长堤，它可以围着地球的赤道线转 1 周半。

随着坑道工事的基本完成，志愿军阵地日益巩固，伤亡也不断减少。4 月间，敌以小部队向我攻击 60 余次，我阵地无一丢失。

1951 年夏秋防御作战时，敌平均发射 40 至 60 发炮弹杀伤我一人；1952 年 1 月至 8 月，敌平均发射 660 余发炮弹方能杀伤我一人。

部队有了工事，有了物资储备，攻、防我军都处于主动地位。5 月以后，随着我军阵地的日益巩固，在全线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小分队战斗活动，挤占中间地带和主动攻击敌人突出的连排支撑点。由于战斗愈来愈主动，很快将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推向了敌人阵地。第三十九军在 190·8 高地的防御战斗中，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了 8 昼夜，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第十二军在官堡里西山的防御战斗中，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了 10 昼夜，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在这两次战斗中，我退守坑道部队曾多次粉碎了敌人以放毒、喷火、爆破、堵塞等手段对坑道的破坏活动，并不断地依托坑道向占领表面阵地之敌进行反击，或配合第二梯队反击敌人。这些均显示了依托坑道进行防御作战的优越性，也为坚守坑道战斗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挤占中间地带、攻取敌前沿支撑点的同时，在全线普遍开展了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全军每一个阵地都组织了特等射手、神枪手，依托阵地捕歼敌人暴露目标。以前敌人是不挖工事的，靠他们的坦克挡着，对付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来也挖工事了，因为志愿军许多特等射手往往在他们一露头时就 把他们撂倒在阵地上。据不完全统计，1952 年 5 月至 8 月的狙击作战即歼敌 13600 多人，我军伤亡则大大减少，比运动战时期的每月平均伤亡数减少了 2/3，充分显示了坑道工事的巨大优越性。战士们高兴地唱道：

阵地是咱的活靶场，
冷枪杀敌的办法要提倡。
看看谁的技术高，
看看谁的武艺强。
一枪一个瞄准打，

个个送他见阎王。
积少成多胜利大，
功臣榜上美名扬。

毛泽东主席对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形成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给予很高的评价。

1952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就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坑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的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挺好。”

1952年上半年，在敌人实施其“绞杀战”之际，志愿军后勤部队开始了大规模地建设地下仓库和开掘式的半地下仓库，以防敌汽油弹破坏和敌机的扫射，储存物资和住人。人工洞库，一般选择在山高坡陡、石质坚硬、构造完好、洞口隐蔽、交通方便处，避开流水部位开进。一般开凿两个洞口，做到能通风，进出方便，但工程量大，工期长，只适于后方兵站。此外，还将朝鲜开采过的旧金矿、煤矿加以勘察修整，排除险石，开通出入口和通风道，排出积水，修通运输道路后即可使用，这种洞库大者可容纳几百个车皮、小者亦可容纳几十个车皮的物资。至1952年6月，志愿军后勤部门共建了能容1200多个车皮物资的石洞库和能容纳793个车皮物资的土洞库。修建了大量的地下洞库，储备了大量的物资，改善和加强了对前沿部队的供应。

就在志愿军“深挖洞、广积粮”建立坚固防御阵地的时候，“联合国军”的作战方针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从夏秋季局部攻势失败中认识到，在当时情况下，实施这种进攻战役是得不偿失的。

1951年12月，李奇微被迫改取所谓“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命令美第八集团军只进行维持其防线所必需的小规模进攻，以不断消耗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军事力量，配合停战谈判。于是，自1952年春季开始，“联合国军”除继续实施“绞杀战”和“细菌战”外，在正面战线转入加强阵地，不断以小部队对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袭扰和进攻，并加强其航空兵、炮兵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的破坏活动。

同时，“联合国军”为了支持长期作战，还采取了一些巩固后方，加强自身力量的措施。

1951年11月底，抽调南朝鲜第八师和首都师开始“清剿”在其后方的智异山、云长山、回文山地区活动的朝鲜人民游击队。从12月开始，以在日本的美步兵第四十五、第四十师，同在朝鲜的美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进行轮换。第一线与第二线的部队也频繁进行轮换休整。另外，加紧对南朝鲜军队的训练和扩编，计划在已有的十个师中每师组建四个榴弹炮兵营。

1952年春夏之交，随着朝鲜战局趋于稳定，敌我双方统帅，都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彭德怀奉命回国。在起程之前，4月6日，他对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洪学智说：“我回去以后，我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同志代理，他是1922年的老党员，资格比我还老。你们要支持他的工

作，配合好。”

“可是，我在志愿军里的资格可没有学智同志老哟，我是后来的！”陈赓笑着说，“彭总，你放心，我们会合作好的。”

随后，陈赓告诉洪学智他们：“彭总这次回国，名义上是治病，实际上是中央让他回去，要当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因为总理太忙了，还兼着军委常务副主席，忙不过来，所以非要彭总回去不可。”

当志愿军总部的同志们听说彭总要回国时，心里感慨万千。他们随彭总抗美援朝到朝鲜，已经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里，我志愿军面对强敌，无所畏惧，不伯牺牲，历尽艰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稳定了朝鲜局势，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大家听说彭总要走，心里都火辣辣的有点舍不得。

说来也巧，就在彭德怀回国 21 天后，1952 年 4 月 28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美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调李奇微到欧洲接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北大西洋公约军队最高司令的职务。当时艾森豪威尔要回国参加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的竞选。

克拉克上将和他的前任李奇微将军，是西点军校的同期生。他是查尔斯·克拉克将军之子。据说其父老克拉克将军在任陆军大学少校教官时，他的学生麦克阿瑟经常到他家去求教。基于这样的因缘，年轻的克拉克从麦克阿瑟将军那里又受到熏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克拉克作为意大利方面的第五军司令官，曾指挥过有名的萨莱诺和安齐奥的登陆作战，夺取了卡西诺的坚固阵地，为解放罗马立了大功。在安齐奥的时候，李奇微作为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曾隶属于他的指挥，所以当时他的军阶是在李奇微之上。但是，美国报纸介绍说：“使其有名的，可能还是作为美第十五方面军司令官在巴尔干方面的作战，和战后作为奥地利驻军司令官兼高级专员和苏联科涅夫元帅就奥地利中立化协定展开的外交论战。”

回国之后，1948 年 3 月，克拉克被任命为国内军司令官，负责全部陆军的教育训练和装备研制工作。他在意大利泥泞、山岳和积雪的战场上学到的一点就是“一切兵种，首先是步兵，只有把自己隐藏好才能保卫自己，保卫战友，才能执行自己的任务”这样的信念。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陆军虽然开始了大轮换的集体训练，但克拉克坚持认为：“任何战争也不可能和以前的战争完全相同。

在历史上，追寻昔日胜利的美梦而哭泣凄惨的战败的将军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为了适应新的战术，熟悉新的装备及其用法，需要让指战员熟练地掌握分队教练之后再让其出征。”

1951 年 2 月，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 2 月攻势进行方酣之际，克拉克视察了朝鲜战场。他和李奇微将军东奔西走来确定需要进行的训练。视察结果，他对全部陆军的训练计划提出了如下的改革建议：

——野外训练时间的 1/3 应当是夜间训练。

——重视近战训练和狙击训练，首先要把全兵种的全体人员，甚至包括厨师、司机、文书、通信兵，都培养成步兵。

——让他认识到步兵的任务是崇高的，步兵是最应赞美的兵种，并为此感到自豪。

且说克拉克于 1952 年 5 月到任后，在朝鲜战场上继续推行李奇微的既定方针，并拟定了除正面战场以外的军事和政治的“八项措施”。主要内容是：

在军事上，轰炸朝鲜北部水电区，轰炸平壤，轰炸主要补给线，轰炸包括部队集结地域、仓库、车辆在内的军事目标，并积极扩编南朝鲜军队，逐步减轻美军在战场上的沉重负担。在政治上，强行扣留中朝被俘人员，停止谈判。克拉克自认这是“挑衅性的行动”，妄图迫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屈服，达到其所谓的“光荣的停战”。

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取得 1951 年夏秋季防御作战胜利后，面对“联合国军”在停战谈判中节外生枝，不愿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以及仍在不断施加军事压力的情况，一面在停战谈判中继续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保持高度警惕，积极进行持久作战的准备，以对付美方拖延甚至破坏停战谈判以及可能发动的任何规模的进攻。对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彭德怀司令员在回国之前，3 月 22 日，在志愿军总部驻地桧仓会见刚刚来到朝鲜进行战地采访的著名作家巴金及其他十余名作家、艺术家时，曾作过如下的阐述：

“我们的兵法家孙子说得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相反地，敌人对我们始终摸不清楚。敌人愿意跟我们谈判，是因为我们把他们打痛了。在谈判中间他们还不甘心，又发动夏秋季攻势，结果还是吃亏了，伤亡 15 万人，才又谈起来。现在敌人是进退两难：要打，他们得不到胜利，没有出路；要和，大资本家的暴利又没有了，经济危机也要来了。我们却不然，和，本来是我们愿意的，我们就是为了和平才来作战的；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是越打越强！”

在 1952 年春夏巩固阵地斗争期间，志愿军和人民军积极开展小部队的战斗活动和狙击活动，利用各种手段大量消耗敌人，是贯彻积极防御和“零敲牛皮糖”作战方针的有效作战形式，也是灵活巧妙的对敌斗争手段。自 1951 年 12 月至 1952 年 8 月，志愿军和人民军共进行各种样式的大小战斗 1800 次，歼敌 117000 余人。这些战斗活动，改善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防御态势，使“联合国军”在战斗活动上陷于被动地位。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积累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作战的经验，为尔后进行较大规模的阵地攻防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是：

零敲牛皮糖，
敌人心发慌；
地道建设好，
打仗有依靠。

欲知今后两军对垒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五章 先发制人

口喊谈判实备战，两栖登陆紧谋算；
为防敌人再偷袭，先发制人不等闲。

自从 1951 年敌人的“秋季攻势”失败后，交战双方没有什么大的攻防行动，但停战谈判陷入僵局。

朝鲜战场出现的这种僵局引起美国及其盟国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要退出这场看不到结果的战争。当时美国正值大选高潮，美国大选的竞争焦点，不是国内问题，而是如何尽快地解决这场“令人讨厌的朝鲜战争”。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咄咄逼人”。他说，一旦他当选总统，就立即飞往朝鲜结束这场战争。他深知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连普通美国人也经常提醒他这一点。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保存不少美国士兵和军官、普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信中很坦率地指出，美国人民强烈谴责孕育着新军事冒险的侵略政策。一个美国普通军人 1951 年 8 月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说，士兵们“经常喝着啤酒议论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前途”。士兵们情绪忧郁，他们得出结论，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的命运是：“杀人或者被杀。杀人的想法使他们厌恶，被杀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恐惧。”写信的人代表自己的伙伴质问艾森豪威尔：“我们这一代人真有必要成为职业杀人者，就像大家称呼朝鲜战场上的老兵一样吗？”

因此，对外政策问题，在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中占有特殊重要位置。在争夺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就国际局势，他发表了一些比较“清醒的见解”。艾森豪威尔反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是不可能占领的。即使共产党撤退，让出了地盘，美国也无法去填补这些真空地带。”一旦发生战争，西欧是否能给美国以有效的军事援助，他是非常怀疑的。因此他说：“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

艾森豪威尔明白，扩大朝鲜冲突的方针，孕育着外交连锁反应的危险。因此，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一次对外政策的冒险，它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朝鲜战争证明，靠武力解决亚洲争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它已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亚洲人民的心目中名声扫地。不仅需要寻找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还要制定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长期方针。

1952 年 10 月 1 日，艾森豪威尔宣称，朝鲜战争的主要担子应由南朝鲜人自己承担，而不是美国人。他说：“我们不想让亚洲把西方的白种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假如那里必须进行战争，就让它是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而我们要支持的是捍卫自由事业的一方。”

竞选活动接近尾声。艾森豪威尔考虑到现实的政治局势，便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注意亿万选民感到最迫切的难题。他越来越肯定地表示，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势在必行，10 月 29 日，这位总统候选人宣称，美国不应永远陷在朝鲜的陷阱里，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美国只是在同真正敌人的辅助部队作战。11 月 3 日，他进一步强调：“和平事业是自由人民眼中的瑰宝，新政府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结束这场涉及美国千家万户、孕育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悲剧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在艾森豪威尔咄咄逼人的竞选攻势下，当政的杜鲁门集团急于扭转他们在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企图向我发动新的攻势取得战场

上的主动，缓和内部矛盾，以此当作竞选的筹码。

为了取得杜鲁门总统的喝彩，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主张“立即进攻”。为了增加军事压力，经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策划并由杜鲁门批准，美侵朝空军继6月下旬对水丰、长津湖、赴战等十座水电站进行狂轰滥炸后，又于7月中旬，对平壤、黄州、沙里院地区的工业设施和补给基地进行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轰炸。在停战谈判会议上，朝中代表揭露了美方企图以轰炸手段强迫朝中方面接受其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无理要求。美方代表一直采取拒绝协商的态度，甚至屡次片面中途休会，离开会场。

杜鲁门统治集团，为了适应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指令五角大楼积极策划和进行新的作战准备活动。7月13日，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克拉克陪同下到达南朝鲜，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一起到西部战线进行视察。

18日，美海军作战部长威廉·费克特勒乘第七舰队旗舰“依阿华号”视察元山海域，并与美远东海军司令罗伯特·布里斯柯、美第七舰队司令约瑟夫·克拉克等商谈。费克特勒对记者说，美海军只要有命令，随时可以在北朝鲜任何地点进行登陆作战。

7月30日，范佛里特声称，要对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绝对不能指望立即停战。随后，他又视察了西线位山地区。8月中旬，克拉克首次访问大丘南朝鲜陆军总部，并偕范佛里特及美第一、第九、第十军军长等人巡视金化及其以西美第七师防区。不久，范佛里特与李承晚又接连视察了美第七师和南朝鲜第二、第九师。范佛里特还在美第七师师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进行了部署。

美国军事当局甚至进行原子讹诈。美海军作战部长费克特勒在马尼拉说，美军已把可载原子弹的飞机部署到南朝鲜。8月29日，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空军协会发表演说时说，美国军队一旦遭到进攻，美空军将立即使用原子弹进行报复。

在这期间，正面战线“联合国军”的备战活动正在加紧进行。美空降第一八七团由巨济岛前调，加强美第七师防区。中部前线加紧前运作战物资，并进行各种战斗演习。海军舰只调动频繁，位于朝鲜西海面的美“九特种混合舰队”，与在朝鲜汶山地区的美陆战第一师和在日本休整的美骑兵第一师建立了通信联络。该舰队又与美陆战第一师进行了两栖登陆演习。美航空母舰“独角兽号”、“西西里号”和主力舰“依阿华号”相继开到朝鲜西海面……所有这些情况说明，敌人准备向我发动新的大规模的进攻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负责司令部日常工作的第二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把敌情报告分别送给邓华代司令员、“联司”的朝方副司令员和甘泗淇副政委及有矣方面，并将敌情通报全军。同时以志愿军司令部的名义给各部队下达了《关于严密注意当前敌情变化的指示》：

“综观目前敌情，似正在酝酿较大的变化，其企图究竟在登陆作战或局部攻势拟轮换部队尚难预料。因此，各部队当严密注意该正面敌情的发展与变化，迅速切实部署侦察，以战斗手段捕获俘虏，尤其是六十八军、十五军，立即组织侦察战斗，查明”美陆军一师、美七师部队调动情况；西海岸指挥部切实加强西海岸防务监视工作，各地所有发生之敌情征候务必立即上报为要。”

“敌人究竟要搞什么行动呢？”杨得志与邓华商定，近两日内，“联司”

首长要开会研究分析敌情。并指示情报处抓紧收集情况，及时报告；要求全军做好反击准备。这个时期，部队已经履行新的指挥关系，即不受兵团建制的局限，按兵力、按地域、按需要划定指挥范围。这样，各兵团均掌握一至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可以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春夏一系列巩固阵地的斗争，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已经完成。在横贯朝鲜半岛 230 公里的整个战线，已形成了具有 20 至 30 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网，而且位于纵深的第三防御地带重点地区的核心工事，也在开始构筑；东西海岸及正面地形平坦不便构筑坑道工事的重点地区，亦在开始构筑钢筋混凝土工事，并计划在 11 月底完成。这样，我军防御体系不仅较前更加巩固，而且更臻完善；加之反绞杀战的胜利，前线的物资供应有了很大的改善，志愿军的特种兵尤其是炮兵进一步得到加强。

1952 年 9 月同 1951 年 11 月比较，全军各种火炮已由 3047 门增加到 3807 门，已经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集中绝对优势炮火支援步兵作战。

这时，部队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反细菌战与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士气高昂，精神振奋。杨得志将军说：“人，是需要成功的鼓舞的。军队也需要胜利给予力量。小规模的地攻防战斗的胜利，使指战员更增加了必胜的信心，焕发了智慧。”在坑道，在山林各种各样的晚会上，到处可以听到雄壮有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歌》的歌声：

我们是正义和胜利的旗帜，
代表东方人民的希望。
我们推动历史的车轮，
任何力量不能够阻挡。
前进，前进，
光荣的志愿军！
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
扑灭侵略的战火，
把敌人赶下太平洋，
抗美援朝卫国保家乡。

综观两军力量对比和敌我士气，我军是有把握粉碎敌人任何新阴谋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克也决不会轻举妄动。他不会再拣起他前几任的进攻手法。因此，我军必须做多手准备。既要预防他海上登陆，又要预防他正面进攻，还要准备他陆地海上双管齐下。

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碰头会上，经过多方论证和分析，大家认为：敌人为了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和配合停战谈判，有再度发动秋季重点攻势的可能；有可能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配合下，于延安半岛实施登陆作战，以迂回我军西部战线侧背，或占领延安、白川地区造成包围威胁开城的局势。同时，为配合其登陆作战，还有可能向我军正面实施牵制性进攻，进攻重点可能置于平康地区。

中朝联合司令部根据上述判断，立即作出了《关于防敌在延安半岛登陆的部署》，于 8 月 28 日令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指挥朝鲜人民军第二十一旅，立即调整部署，准备抗击敌人登陆并保卫开城；令正面各军加强侦察，严阵以待，如敌进攻，必须予以坚决回击；令东西海岸部队作好必要的战斗准备。9 月上旬，志愿军和人民军前沿阵地部队已是箭上弦、刀出鞘，万事俱备只等

敌人到来了。

但是，敌人没有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正面战线中部敌军活动较前频繁。在我第三兵团第十五军防区的正面金化地区，敌机投掷大量烟幕弹，掩护其运输，一周时间运输往返车辆达 1300 辆次，较上一周增加 1 倍。据部队渗透侦察发现在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正面有敌 1000 余辆卡车、吉普车活动，其中 100 余辆满载全副武装的美军。这一情况使邓华、杨得志他们确认：敌人可能威慑于我军的准备，放弃了向我侧翼进攻登陆的计划，要向我正面局部发起进攻。

兵家历来主张“先下手为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必须把敌局部进攻计划消灭在萌芽之中。于是，中朝联合司令部立即形成决议并报告中朝双方最高领导。9月10日，以邓华、甘泗淇、杨得志等人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军委发了如下的电报：

“我为争取主动，有力打击敌人，使新换防部队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拟乘此换防之前，以三十九军、十二军、六十八军为重点，各选三至五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求得歼灭一部敌人，并在敌我反复争夺中大量地杀伤敌人，其他各军亦应各选一至两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时间拟在本月2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以上可否，请速示，以便各军进行准备。”

两天后，中央军委复电：“9月10日电悉。同意你们10月底三个军的换防计划和换防前的战术行动。”志愿军总部在接到中央军委复电一个小时后，即向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八军下达了命令。

9月14日23时20分，中朝联合司令部又向全军发布了战术反击的命令。命令规定：进行战术反击的时间为9月20日至10月20日之间，对每一个目标的具体反击时间由各军自行确定，以准备好为原则。命令强调：要做到攻必克，战必胜，并力争打阵地前的歼灭战。即攻占敌阵地后，抗击敌人的连续反扑，在同敌人反复争夺中歼灭敌人；如一旦攻击受挫，则迅速撤离，不应恋战。于是，正面战线各部队，在原防敌进攻的准备基础上，掀起了备战热潮。指战员们昼夜加紧阵地建设，摸敌情，选目标，拟方案，练战法，很快完成了战术反击的准备。

这次反击是一次较大的行动，是五次战役后的第一次全线反击。为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志愿军总部又向各反击部队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第一，必须准备好了再打，防止仓促发起攻击；第二，必须在反复侦察、切实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周密计划，组织好步、炮协同，并大胆使用坦克协同步兵作战；第三，要组织实施战前训练和战斗演习，并要在冲击出发地域构筑好屯兵洞，以减少伤亡和保持战斗的突然性；第四，要集中使用兵力，在战斗中根据情况适时投入第二梯队，以保证反击的胜利。总的要求是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要让新上任的克拉克“认识认识”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术反击的第一阶段于9月18日开始，在我军正面180多公里的阵地上，总共对“联合国军”的20个目标先后发起攻击。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战斗进行得极为顺利。我军一股一股的反击部队，像一把一把的利刃刺向敌人的心脏。

9月18日黄昏，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先后对上浦坊东山、高阳堡西山之敌进行攻击。这两个高地为美第二师第三十八团第三营防守，工事坚固，共有

大小地堡 50 多个。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以两个连的兵力对上浦坊东山攻击，3 分钟即突破敌人防御，激战 23 分钟，全歼守敌 250 余人。担任阻援的第八连击退援敌 5 次反扑，歼敌 200 余人。在 3 天之内又歼敌近千人。与此同时，攻击高阳堡西山的部队，也以 20 分钟的激战，全歼守敌 150 余人。之后，又打退敌人 13 次反扑，毙伤敌 500 余人，击毁敌坦克 5 辆。

9 月 28 日，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以 7 个班的兵力，在大炮 60 余门、坦克 6 辆的直接支援下向官堡里西侧无名高地的南朝鲜第六师的两个连发动进攻，同时又以 3 个排和 5 个班的兵力，分别向 691·1 东北高地和座首洞南侧高地发动进攻。这些小分队采取多路出击、重点突破、突击与爆破相结合的战法，向敌人勇猛进攻，连续爆破了未被炮火摧毁的敌人火力点，迅速扫清了障碍，攻占了阵地。继之，又连续挫败了敌人的反扑，3 天内共歼敌 1200 余人。

在攻克官堡里西侧无名高地的战斗中，英雄的志愿军战士们，无惧无畏，勇敢向前。副排长黄家富完成 15 次爆破任务，歼敌 200 余人，数次为部队前进扫除了重要障碍，并积极主动坚守制高点，打退敌人 7 次反扑，3 处负伤不下火线，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记特等功一次，授予一级爆破英雄称号。

第一 团第二连班长伍先华，带领全班连续炸毁敌人四个暗火力点，迅速占领了敌人阵地。当突击部队受敌坑道口机枪火力封锁，进展困难之际，他奋不顾身，抱着 20 公斤重的炸药包，冲进敌人坑道，与敌四十余人同归于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伍先华追记特等功，追记一级爆破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全线反击，“联合国军”大为震动。敌人见我炮火猛烈，而又全线动作，以为我要发动全面攻势。9 月 24 日，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急急忙忙飞抵前线，与范佛里特及各军长开会讨论对策，并将预备队美第四十五师前调，接替南朝鲜第八师的防务；将预备队南朝鲜第一师前调，接替美第三师防务。看来克拉克沉不住气了。其实，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阶段反击的规模很小。一个军仅拿出一两个团来，攻击一个目标也只用几个排或几个连。我反击的目标，多则四个连，少则一个班。只不过造的声势大了一点。兵不厌诈，这就造成了敌人的恐慌，打乱了克拉克原定的两栖登陆作战计划。

第一阶段战术反击战 10 月 5 日结束。各军都按照原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共毙伤俘敌 8300 余人，其中美军 2000 余人。这一次多股小规模反击战，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零敲牛皮糖”战术的威力。

对于第一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做了简要的总结。他说：“这一阶段的作战时间虽然不长，但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在组织实施上，以准备好为原则，在统一方针要求下，不等齐就陆续发起战斗。这样，就给各部队充分的自主权，也便于充分发挥各部队指挥员的聪明才智、指挥艺术和组织性。比如二十兵团为了改善北汉江两侧阵地，指挥十二军、六十八军于 9 月 28 日向敌相邻的五个阵地同时发起反击，还真有排山倒海之势，使敌首尾不能相顾。”

事后，志愿军二十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将军谈起这次反击说道：“我发起战斗的时间比最早开始反击的部队整整晚了 10 天。这 10 天我赢得了三个

优势：一、物资及部署上得到了更充分的准备；二、在精神上，指战员看到兄弟部队打响了，打胜了，满身的劲越憋越足，命令一下，个个都像饿虎扑食。三、麻痹了敌人。其他阵地打起来了，我们面前的敌人开始也紧张了一阵，后来看我没有动静，就有些松了。他松，我就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五个阵地同时开火，迫使他黄牛喝水各顾各了。这样打得稳，也打得狠。战果嘛，也就大了一点。”

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在总结第一阶段的反击战时，继续谈到第二个特点。他说：“在兵力使用上，突击部队同支援部队相比，突击部队（步兵）相对减少，支援部队（炮兵）则相应加大。这次我军实施反击的兵力，与敌相比，一般是2：1，或1：1；支援炮兵则平均攻击敌一个连的阵地，要集中使用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8至10个连。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摧毁敌坚固的阵地，也很难压制住目标附近的敌人的炮火。”

“其三，速战速决，我伤亡少。大多数部队在30分钟内即攻占敌人阵地，全歼或大部歼灭守敌，敌我伤亡之比是4：1。”杨得志继续说，“这次反击战的第四个特点是，敌有失必反，我每占一地，一般均打敌反扑，拉锯式的你来我往，经过反复争夺才能巩固占领。如六十八军一部攻占57·4高地以后，敌纠集了6个营的兵力，在88架飞机、18辆坦克和大量炮兵支援下，反扑了65次。我们在打退敌人连续反扑，毙伤敌3000人左右后，才巩固地占领阵地。在整个阶段，我共打退敌一个排至一个团兵力的反扑168次，大量地杀伤了敌人。”

经过第一阶段的反击，除克拉克前后调换的两个师的兵力之外，敌情没有多大的变化。于是志愿军总部决定继续发展胜利，进行第二阶段战术反击，第二阶段的反击不同于第一阶段。各部队不再依各自的准备情况分别发起攻击，而是按统一规定的时间一齐行动，即使有的部队没准备好，也要进行佯攻配合，以便分散敌人兵力火力，予敌更有力的打击。

10月6日黄昏，志愿军第一线7个军共组织了1个团零13个连又23个排和25个班的兵力（按建制单位计算），在760门火炮支援下，在18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向“联合国军”防守的23处阵地发起攻击。各突击部队在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的配合下，迅速5要3勇猛地突入敌人的阵地，先后占领敌人阵地21处，其中除两处阵地的敌人因为惧怕被歼而先行逃窜外，有16处阵地的守敌全部被歼，有3处阵地的守敌大部被歼。接着，在志愿军攻占的6座重要山头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其中铁原西北和金城东南地区的争夺战尤为激烈。

在铁原西北10公里的“白马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南朝鲜第九师在这里盘踞了将近一年，构筑了许多大小地堡，各堡之间均以交通沟、堑壕相连接，山上还有许多地雷和陷阱。南朝鲜军吹嘘这座山是“钢铁阵地”。

10月6日黄昏，志愿军第三十八军的突击部队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很快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并占领了394·8高地主峰以北的六个山头，守敌大部被歼。

这时，南朝鲜第九师派出一个团前来增援，企图守住主峰阵地。第三十八军突击部队又在猛烈炮火配合下强攻主峰。敌人地面上的地堡大部被摧毁后，残敌转入暗堡进行顽抗。经过激烈的战斗，第三十八军突击部队将暗堡里的敌人全部消灭，完全占领了主峰。接着，第三十八军突击部队又在炮火支援下勇猛出击，乘胜肃清了主峰以南几个山头上的残敌，占领全部阵地。

此后，敌人用 100 多门火炮、10 余架飞机向主峰狂轰滥炸，并以重兵连续反扑。于是，第三十八军又陆续投入 4 个团的兵力在 394·8 高地及其附近山岭上与敌人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每一个地堡，每一段交通壕，每一寸土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一直战斗了 9 昼夜。第三十八军在这次反击战斗中，共歼敌 9600 余人，自己也遭受了 6700 余人伤亡的严重损失。

在第二阶段的反击战中，第十五军在铁原东北 391 高地，出现了一位维护战场纪律而忍受烈火烧身的伟大战士邱少云。

391 高地山势险要，有敌人一个加强连驻守，是敌人安在志愿军前沿阵地前的一个“钉子”。拔掉这个“钉子”，不仅可以改善志愿军第十五军防御态势，而且可以对敌形成威胁。从志愿军前沿阵地到 391 高地，中间有 3000 米宽的开阔地。为了缩短冲击距离，使战斗具有突然性，该军第二十九师第八十七团组织 500 多名战士，在发起攻击的头一天（10 月 11 日）夜里，潜伏在距敌只有 60 米的草丛里。

邱少云他们埋伏的地方，在 391 高地的山坡上，离山顶上的敌人最近。要在这里隐蔽 20 多个钟头，实在是不容易的。昨天，从这里飞出一只野鸡，敌人还连枪夹炮地打了半天。邱少云和他的战友们趁着天黑摸到了这里，分成小组，散布开来。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插上了茅草，凉风一吹，人身上的草和山坡上的草一同摆动着，露不出一丁点马脚。山上的敌人，可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连敌人讲话都听得到。

第二天 11 点钟的时候，突然飞来四架飞机，在潜伏区投下几颗燃烧弹，有一颗落在邱少云身旁，四散飞进的燃烧液，溅在他的腿上。他腿上插的伪装物烧着了，火焰往上冒。邱少云身后有一条水沟，只要他滚到水沟里，就可以把身上的烈火熄灭。这时邱少云想起，首长交代要严格遵守埋伏纪律。邱少云更知道，要是他暴露了目标，埋伏在这里的战友们就会被敌人发现，就有可能被敌人消灭，这样就破坏了原定的战斗计划。他决定躺着不动。我军阵地上的指挥员，看到埋伏地点起火，连忙命令向敌人开炮，扰乱敌人的注意力。这时候，邱少云还是没有爬起来扑灭自己身上的火。烈火继续烧着他的身体。邱少云咬着牙，小声向靠近的战友李士虎说：“胜利是我们的，但是我不能完成爆破任务了，交给你去完成吧！”说完，他把被烈火烧着的身体更紧地贴到地上，一直到牺牲也没动一下。李士虎急得咬破了嘴唇，眼睛里像要冒火。但是，他和邱少云一样，和埋伏在那里的所有战友们一样，想到了整体，想到了整个战斗的胜利，眼看着他亲爱的战友壮烈牺牲，忍受着内心的仇恨，焦急地等待着战斗的信号。

反击战打响了。敌人的阵地被我军的炮弹打得粉碎。埋伏着的战士们从草丛里发起了攻击。李士虎飞也似的跑到邱少云烈士身旁，用大衣盖住了他的遗体，抱起烈士留下的冲锋枪和爆破筒，高喊着“为邱少云烈士报仇啊！”他冲过两道敌人的铁丝网，把爆破筒塞进敌人的一个地堡里，消灭了地堡里的敌人。接着，满山响起了“为邱少云烈士报仇！”的声音，满山是爆破声、枪炮声，不到 15 分钟我军就占领了 391 高地，全歼南朝鲜一个加强连。此后又打退了敌人 7 个营兵力的多次反扑，取得了歼敌 2700 余人的胜利。邱少云牺牲后，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怀着深深的敬意，在 391 高地的石壁上刻了一行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线性的战术反击至 10 月 31 日结束。这是转入阵地战

后向“联合国军”阵地发动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先后对“联合国军”连、排防御阵地及个别营防御阵地共 60 个目标进攻 77 次，打敌排以上兵力反扑 480 余次，经过反复争夺，巩固占领阵地 17 处，共毙伤俘敌 27000 余人，击落敌机 183 架，击伤 241 架，击毁敌各种火炮 57 门，坦克 67 辆，汽车 74 辆。志愿军也为此付出了伤亡 10700 余人的代价。朝鲜人民军在东线也对敌军 3 个目标进行了猛烈进攻，取得了歼敌 1700 余人的胜利。

在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连续有力的反击下，“联合国军”十分狼狈，八个师频繁调动，疲于奔命，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我军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用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战果的战法，深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赞扬。它们在贺电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然而，就在全线战术反击结束的时候，上甘岭地区的战争仍在激烈的进行。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章 激战上甘岭

敌我激战上甘岭，森严壁垒志成城；
硝烟滚滚山削半，何惧敌军万千重。

就在秋季战术反击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上甘岭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1952年10月6日，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偕“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等人，再次到南朝鲜视察，同范佛里特和李承晚进行磋商和谋划。他们发现“联合国军”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连续打击下，在战场上已丧失先攻之利，在作战精神上处于萎靡状态，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手里。为了扭转其被动局面，改善其谈判地位，“联合国军”于10月14日集中兵力、火力，向志愿军发动了自1951年秋季以后规模最大的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

上甘岭是朝鲜中部的一个小山村。它是志愿军中部朝鲜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五圣山位于金城、金化、平康这一三角地区的中央，地势险峻，海拔1000多米，是中部战线的最高峰。它西临平康平原，东扼由金化经金城通往通川至东海岸的公路，南距“联合国军”所占金化七公里，可以俯瞰其纵深，特别是能给“联合国军”由金化通平康或金城的交通线以很大的威胁。

位于五圣山主峰南侧四公里的上甘岭，其左侧是537·7高地北山，右侧是537·9高地。敌人要夺取五圣山，必须首先夺取这两个高地。而如果敌人夺取了五圣山，就从中部突破了我军防线，在我战线中央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可以进到平康平原。敌人的坦克就可以发挥优势了，还可以进一步进攻志愿军所坚守的平康、金城以北地区，从而改善“联合国军”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

敌人对这次战役十分重视。“金化攻势”是由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部署和指挥的。担任这次进攻的部队是原在万渊里、后川里地段上防守的美第九军第七师和南朝鲜第二师。进攻前，范佛里特调整了部署。鸡雄山原为南朝鲜第二师一个连的阵地，由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接管，作为其进攻集结地区。另将其预备队美第四十师由加平调至金化西南芝浦里、云川里地区，将原属美第一军的美第三师调至铁原西南地区归第九军指挥。同时以部队多次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等处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在“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之前，志愿军第一线各军根据志愿军总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反攻的指示，作了各方面的准备。在平康以南担任防御的第十五军，制定了粉碎“联合国军”3至4个师进攻的防御作战计划，并调整了部署。他们原来在军的正面阵地上构筑坑道720条，全长42000米，堑壕6450米，交通壕154000米，钢筋混凝土工事35个。仅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即构有长10米以上的坑道48条，全长769米。在对敌实施全线性战术反击的一个月内，他们又以突击方式构筑坑道和有掩盖的明暗火力发射点217个，还有上甘岭等地增筑大量防坦克壕、鹿砦、铁丝网、削壁、陷阱，埋地雷2100余枚。据守上甘岭阵地的该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特别加强了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阵地的兵力和火力。

10月12日，震耳欲聋的炮声打破了金化以北五圣山夜的沉寂。敌人集中300多门大炮，向我第十五军上甘岭阵地，连续实施了两天的火力突击。数百架飞机，也同时不断轮番轰炸。炸弹像狂风一样倾泻下来，像要把整个山头劈开似的。上甘岭烟雾腾腾，碎石横飞，阵地上—人多深的交通沟被打

得无影无踪，坚硬的岩石变成了黑色粉末。14日凌晨5时，美军第七师、伪第二师各一部共七个营的兵力，向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10月15日中午，志愿军司令部接到负责上甘岭地区防务的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如下的电报：

“在上甘岭地区，14日3时起，敌继12日连续两天的航空兵、炮兵的火力突击，又进行两个小时的猛烈炮火准备，凌晨5时，以美、伪军各一部共7个营的兵力，在一五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00余门、坦克30余辆、飞机40余架的支援下，分6路向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美、伪军各一部共4个营兵力，分别向我四十四师、二十九师正面之391高地、上佳山西北山、芝村南山、419高地实施牵制性进攻。是日，敌人对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以一个排至一个营的兵力采取多路多波的方式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冲击。共发射炮弹30余万发，飞机投弹500余枚。我一三五团两个加强连在战斗开始时，仅有山、野、榴炮15门和八二迫击炮12门支援作战。战至13时左右，我野战工事几乎全部被毁，人员伤亡较大，表面阵地大部被敌占领。我防守部队转入坑道作战。

19时，我乘敌立足未稳，组织反击，又恢复了阵地。”

“显然，敌人向我发起进攻的直接企图在于：首先占我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再夺五圣山地区。以改变金化地区防御态势，破坏我进攻企图，察明我坑道情况，为尔后进攻平康、金城以北地区创造有利条件。”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杨得志说：“敌人打来了，我们当然要迎击，而且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经和邓华等人研究决定：全线战术反击不能在22日停止了，要延续到10月底，以配合十五军粉碎敌人的攻势；同时决定十五军四十五师原定反击注字洞南山的计划立即改变，迅速到五圣山集结，集中力量反击敌军的进犯，确保我五圣山阵地。

第十五军当时归三兵团指挥。三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是陈赓将军。彭德怀回国后，陈赓在志愿军总部代理一段司令员工作，这时也因另有任务回国了。当时的三兵团负责人是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

为了让第三兵团及十五军更快地了解志愿军司令部的决定，杨得志打电话对王蕴瑞说，战斗虽然刚刚开始，但从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开始进攻的气势来分析，这将是几年来少有的一场恶仗。杨得志请他转告十五军的同志，不但准备工作要仔细，还要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五圣山阵地是我们的屏障，一定要稳稳地守住，“志司”将全力支持他们。

“请首长放心！”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瑞说，“十五军已经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硬骨头活动。一线指战员们提出：过去讲誓与阵地共存亡，现在讲绝不让阵地丢半分。阵地要存，人也要存。”

这场防御战自10月14日开始，至11月25日我军彻底粉碎敌人之进攻为止，从战术规模发展成战役规模，持续了整整43个昼夜。战斗的第一天，敌人对我仅有3.7平方公里的阵地投入了7个营的兵力。五圣山前沿一天就落弹近30万发，单是597·9高地的侧翼阵地，一天就落了45000余发。五圣山主峰下每秒钟落弹五六发，持续了半个小时。我表面阵地工事几乎全部被毁。敌人以成排成营的部队对我阵地发起冲锋。我坚守部队依据各暗火力点对密集冲锋之敌进行猛烈还击，击退敌人十几次冲击后，表面阵地被敌人

攻占，当即退守坑道。

10月14日夜，志愿军第十五军乘敌立足未稳，以四个步兵连，在炮火支援下分四路向“联合国军”进行反击。“联合国军”以大量炮火进行猛烈拦阻。志愿军反击部队在坚持坑道作战的部队有力配合下，全部恢复阵地。在这场反击战斗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战士对祖国与和平事业无比忠诚的高贵品质以及蔑视、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员、突击排长孙占元和中国共青团员、爆破手易才学，就是这样的人物。

在战斗的第一天，美国侵略军在上午用4个营的兵力向金化以北的上甘岭右侧597·9高地进行了14次的猛烈攻击，但都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英勇地打退了。到了下午，当战士们主动转入坑道作战以后，一个营的敌人才爬上了我军前沿排的野战工事，并且用钢板、木材和麻袋垒成了一连串露天的火力地堡。敌人的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六炮以及无座力炮疯狂地从这些地堡里打出来，严密地封锁住了我军的反击道路。

这个前沿阵地，是志愿军战士们用自己的血汗建筑起来的阵地，是他们一年来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着的阵地。现在敌人占领了地面阵地，战士们岂能容忍敌人呆下去呢！他们隐蔽在坑道里，愤怒地等待着反击的命令，随时准备着去夺回它。共产党员孙占元被指定为反击部队的突击排长，英勇机智的战士易才学是突击班的第一名爆破手。出击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突击排的战士们静静地站在坑道口，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敌人。

天渐渐黑了，志愿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了。孙占元带着突击排的战士们冲出了坑道，猛不可当地冲向敌人。当他们接近敌人地堡仅100公尺时，残存的4个地堡的16挺机枪发射出了密集的火力，突击排的冲锋受到了挫折。这时，孙占元一面派人和坑道里的反击部队联络，一面就命令易才学向敌人的第一个火力点前进。

被称为“飞毛腿”的易才学动作十分迅速，他冒着敌人的火力跳过一个一个的弹坑和交错着的交通沟，敏捷地摸到了敌人的第一个火力点跟前，顺利地把它炸毁了。但是，这时易才学已暴露在敌人的面前，第二个火力点里的敌人向他猛射起来。易才学几次想从弹坑中冲出去，但密集的机枪子弹使他几次都未能抬起头来。

这时，易才学忽然听到左边传来排长孙占元的声音：“从右边上，我掩护你！”接着孙占元的机枪就猛烈地射击起来，敌人第二个火力点里的火力立刻被吸引到左边去了。易才学站起来急忙从右边向上冲，可是敌人又打起了照明弹，阵地上顿时像白昼一样，易才学的行动又被敌人发觉了。第三个地堡里的机枪也突然扫射起来，易才学立即伏下身子，匍匐前进。

子弹一排接一排地从易才学头上飞过去，或者射进他身旁的松土里。易才学选择有利的地形，不停地向上爬着。当他接近了敌人的第二个地堡，正想用手雷爆破它时，他看清在这个地堡右前方六公尺的地方就是敌人的第三个地堡。他的位置是危险的。因为如果在这里先爆破第二个地堡，那么第三个地堡里的敌人必然会马上向他射击。如果先去炸掉第三个地堡，第二个地堡里的敌人也会转过枪口向他射击。而现在，第二个地堡里的敌人正在疯狂地向孙占元还击，第三个地堡里的敌人还在封锁着他刚才爬过来的道路：情况对他是有利的。他决心乘这机会同时爆破这两个地堡。

时间非常紧迫。易才学如果现在不马上炸毁这两个火力点，便会给反击

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但他要连续爆破两个地堡也非常困难：他正好在两个地堡中间，双方离他都不过三公尺；在连续爆破时，他不能立刻离开爆炸范围。但在这紧要关头，易才学并没一点犹豫，他把两根爆破筒紧紧地捆在一起，把腰里的手雷和手榴弹也取下来放在身边。他滚向第二个地堡，双手把两根爆破筒掷进地堡里；又迅速转过身来，把一颗手雷和三个手榴弹投进第三个地堡里。一阵震天的巨响，敌人的两个地堡和机枪都炸飞了。易才学成功了，他自己也被震昏了过去。

这时，隐蔽在弹坑里用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着易才学的孙占元，看到敌人的两个地堡被同时爆破了，就立刻提起机枪向上冲。

但是，这时敌人的最后一个火力点——第四个地堡又向他开火了，他的双腿被打断了。可是这个坚强的战士拖着断腿，仍旧从血泊里挣扎着爬向易才学躺着的地方。孙占元断腿爬进，坚持指挥的行动使易才学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他握着孙占元的手说：“排长，请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只要我人在，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说着，易才学掏出救急包就要给孙占元包扎。但是，孙占元拒绝了。他坚决地命令易才学：“先不要管我，为了整个胜利，你马上去爆破敌人的地堡。我来掩护你！”于是易才学又拿起爆破筒，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继续向前爬进。

机警的易才学，在敌人火力的封锁下，就用敌人的尸体作掩护，迅速趴在一块大岩石下。原来敌人第四个机枪地堡正设在这块岩石的顶上，离他有10多公尺高。道路已经没有了，易才学用手紧抓着突出的石块，小心翼翼地向上爬着。正在这时，从孙占元排长那里传来了手榴弹的爆炸声。这个智勇双全的英雄，炸死了迂回上来的七个敌人，自己也同时壮烈牺牲了。

易才学失去了机枪的掩护，处境更加艰难了。他咬紧牙关，怀着为排长复仇的强烈愿望，利用敌人机枪射击的间隙，爬进了敌人地堡前的交通沟，随即又把身体紧贴在地堡的两个枪眼之间。六个枪眼猛烈地喷射着火舌。易才学敏捷地举起双手，把爆破筒猛地投进地堡里，接着一翻身从陡岩上滚下来。只听“轰！”的一声震天巨响，敌人的第四个火力点就这样被炸毁了。

从爆炸第一个地堡到炸毁第四个火力点，仅仅只有20分钟的时间。冲锋的道路已经打开了。在坑道里，在各个掩蔽部里等待反击的战士们，随着冲锋的号声冲下山来。易才学又成了反击部队的最先锋，他第一个爬上陡岩，架起了两挺敌人丢弃的机枪，连续向反击的敌人发射了1400多发子弹，毙伤了100多个敌人，仅仅10分钟激战，一个营的敌人就被我军战士们大都歼灭了，前沿排的阵地又完整地回到了志愿军战士们的手里。

争夺与反争夺成了上甘岭战役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10月14日夜，志愿军第十五军为了集中力量迎击敌人的进攻，又将两个炮兵营调至上甘岭地区，以第一三四团两个营和第一三三团一个营分别加入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防御作战。同时调来八二迫击炮10门，支援防守537·7高地北山的战斗。

从10月15日起，连续三天“联合国军”以两个团又四个营的兵力，在大量炮火支援下，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轮番进攻。志愿军第四十五师以顽强抗击和积极反击，与“联合国军”进行争夺。这几天，“联合国军”白天夺去阵地，志愿军在夜间又反击夺回，形成反复争夺的状态，战斗十分激烈。到18日，“联合国军”凭借已占领的部分表面阵地继续

扩展。经激战后，两高地的全部表面阵地为敌军所占领，志愿军防守部队全部退守坑道。

为了歼灭进攻的敌人，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分别以三个连的兵力，在 103 门火炮支援下，于 19 日对占领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表面阵地的敌人实施反击。志愿军革命英雄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黄继光，就在这次反击 597·9 高地敌人的战斗中，用热血之躯铸造了顶天立地的丰碑。

黄继光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年仅 21 岁。他 3 岁时就死去了父亲，全靠他母亲帮人做活把他养大。他从 7 岁起给地主作了 11 年长工。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了四川，家乡获得了解放，他和母亲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房屋和土地，从此结束了牛马般的奴隶生活。他当了儿童团长，后来参加了民兵。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大门，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 1951 年 7 月，他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到了朝鲜，黄继光所在的部队正在开庆功会。战斗英雄崔建国、苗族英雄刘兴文以及许多功臣模范们的英雄事迹，给了他很大的教育。他深深地感到：战斗在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前线上的英雄是非常光荣的。在前线阵地上的坑道里，他看了苏联影片《普通一兵》。苏联军队的英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英勇地以自己的肉体堵塞敌人枪眼的英雄形象，始终活在他的心头，他决心做一个捍卫中朝人民利益的反击侵略者的英雄。

他被分配在一个步兵营营部当通信员。

10 月 19 日下午，黄继光跟随营副参谋长张广生来到第六连，参加晚上的反击战斗。从黄昏战至深夜，第六连已连续发起了五次冲击，都因为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未被摧毁，部队被阻在山梁前面不能前进，而且遭受很大伤亡。经营副参谋长与连长、指导员研究决定，组织了九名立过战功的战士编成“功臣第六班”，分三个小组对敌人中心火力点进行爆破，但是，三个小组的爆破又没有成功。这时，离天亮只有 40 分钟了，如不尽快炸毁这个中心火力点，反击任务便难于在天亮前完成。在这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求爆破任务。营副参谋长与第六连连长商定，任命黄继光为该连第六班班长，带领战士吴三羊、肖德良去执行爆破火力点的任务。

黄继光提起两个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勇敢地跨出了坑道口。临走时，他对营参谋长和坑道里的战友们说：“让祖国人民听我的胜利消息吧！”

敌人火力点里的七挺机枪撒开一个稠密的扇形火网，子弹像大雨一样地打在被炮弹炸起的山坡上的虚土里。在照明弹的光亮下，黄继光提着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跳跃前进。当冲到离敌人的火力点三四十米时，吴三羊中弹牺牲了，肖德良身负重伤，紧接着黄继光也被打倒在地上。

然而，倒下的黄继光并没有死，他的左臂和左肩挂彩了。黄继光清楚，爆破的任务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于是他忍着剧痛，登着山坡上的虚土、碎石和敌人的尸体，向着火力点爬去。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米的地方，他就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准备把手雷扔向敌人。正在这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黄继光昏迷过去。但他醒来时，忍着剧烈的疼痛，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轰！”的一声，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火光夹着黑烟冲天而起，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声震得昏迷过去。

在一刹那的寂静之后，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那里的地堡是

被炸塌了，但没有被炸死的敌人仍用机枪扫射着，刚刚发起冲锋的反击部队又被它压在山坡上。在这时候，黄继光又苏醒过来。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用掉了，另一个在左臂负伤时丢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有的只是一副对敌人充满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时天快亮了。而志愿军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舌的两挺机关枪，为反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为黄继光报仇！为光荣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志愿军的反击部队像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敌人的两个营，共1200多人全部被歼灭了。

黄继光的英雄行为，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教育的战士，具有为正义与和平而勇于自我牺牲的无比高尚的思想品质。为了表彰黄继光的伟大精神和不朽功绩，第十五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阵地夺回来了，敌人又进行了疯狂的反争夺。

10月20日5时，敌人在30架飞机和大量炮火的配合下，以两个营的兵力向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激战终日，除597·9高地西北三个阵地为志愿军控制外，其余表面阵地又被敌占领。志愿军防守部队再次退入坑道坚持战斗。

“这一阶段作战，”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说，“敌人投入了7个团17个步兵营，我第四十五师投入3个团21个步兵连。双方都使用了异常猛烈的炮火，敌使用炮兵18个营，300余门火炮；我使用山炮以上火炮19个连，46门，火箭炮6个连24门。敌人白天进攻，我入夜反击，几成规律。在7天作战中除昼间不断地实施阵前反击外，我还有计划地实施夜间反击7次，其中3次全部恢复阵地，4次局部恢复阵地。敌为我歼灭7000余人。”

据美方俘虏供认，“联合国军”所参战的18个营，每个营、连都轮番打了两三次。美第十七团一天战斗即伤亡过半，有一个连只剩下一个少尉。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有21个连队投入战斗，伤亡3000余人。各连的伤亡都超过半数，个别连队只剩下几个人，再无力组织较大的反击，必须调动二梯队投入战斗。

10月20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副司令员邓华下令：“我前沿部队全部退入坑道。”于是，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艰苦卓绝的坑道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七章 坑道战歌

上甘岭上英雄多，炮火猛轰奈我何；
坑道歼敌创纪录，艰苦卓绝谱战歌。

“联合国军”连续七天猛攻，伤亡惨重，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美国侵略军为了维持其帝国主义盟主的面子，仍不愿放弃进攻。

1952年10月21日以后，敌人一面以各种手段围攻志愿军坑道部队，一面为继续实施其进攻重新调整军队的部署。范弗里特将遭到重创的美第七师汉滩川以东的防务和进攻597.9高地的任务交给了南朝鲜第二师，美第七师则西移，防志愿军从汉滩川以西向其左翼出击；将南朝鲜第二师的部分防务交给了位于其右翼的南朝鲜第六师；另以美第三师接替了南朝鲜第九师在铁原地区的防务，南朝鲜第九师则东调金化以南史仓里地区作战役预备队。

为了取得此次防御作战的胜利，志愿军总部及时地给第十五军发出指示，指出：“敌人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我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地斗争下去，可制敌于死地。”第十五军根据这一指示，为进一步坚守和实施反击创造条件，乃命第四十五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以争取时间，为进行最后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的决定性反击作准备。

与第一阶段作战相比，第二阶段的作战更为艰苦，更为困难。

山头一个一个地守，表面阵地一块一块地夺。因为敌我双方都很清楚，谁真正占领了阵地，谁就得到了实施决定性反击作战的主动权。

作为负责作战的副司令，杨得志将军尤为关心上甘岭的防御战。他和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商量决定：给四十五师补充1200名新战士；命令第十五军二十九师参战；命令正在和六十七军交防、准备回去休整的十二军停止北返，迅速南进，归第三兵团指挥，为战役预备队。命令就近各兵站改进运输，保障对十五军弹药、食品等物资的供应。同时，决定由邓华将军与前沿指战员通一次电话，代表志愿军总部首长、机关慰问他们，并作进一步的战斗动员。

就在这个时候，祖国第二届慰问团来到了志愿军总部。他们纷纷要求到上甘岭前沿阵地去慰问，还有的要求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杨得志说，“慰问团同志们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个工作很难做，费了不少唇舌。”为了让祖国亲人了解前线将士的情况，看一看他们的子弟是怎样与侵略者战斗的，志愿军总部特派一个警卫连把慰问团的一小部分同志送到与上甘岭遥遥相望的山上，让他们在望远镜里同他们日夜思念的战士们相见。同时，把慰问团带来的慰问信、慰问品送到阵地，送进坑道，并告诉我们的战士，祖国的亲人就在他们身后，祖国的亲人在等待着他们新的胜利的喜讯。

慰问团的到来，对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曾经有一个班的战士，把祖国送去的慰问品摆在阵地上，班长说：“这是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奖赏，我们有资格享受吗？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吗？”战士们纷纷宣誓：一定要在今后的战斗中杀敌立功，不愧对祖国人民的关怀。这时有一个战士最先把糖吃完了，他拿着糖袋子对大家说：“你们说要吃一块糖打一个敌人，我已经把糖吃完了，我决心留着装糖的袋子，永远带在身边，以后打死一个敌人，我拣一小块石头装进去，一直装到126块，和原来糖的数目一样，带回祖国，做传家之宝。”

坚守坑道的指战员们，还专门给慰问团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

“我们处在距敌 50 公尺、上下相持的情况下，遭受了不少的困难。但是，我们想了办法，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保卫光荣阵地，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忍受和战胜了困难……”

“我们除了战斗以外，就是说笑和娱乐，谈我们的胜利，谈祖国的伟大。我们的心情永远都是愉快的，丝毫没有因被敌人封锁在坑道里而感到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任务的重大，明确战斗的意义，坚信我们一定胜利！”

志愿军的战士们，就在那光秃秃的山头上依据巧妙坚固的坑道工事作战。正好祖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来到了前线，他们要亲眼看看祖国的英雄子弟怎样作战。他们在山头上举起了望远镜。那时候敌人正炮击志愿军的阵地，那个红山堡笼罩在滚滚的烟雾中。渐渐地雾散了一些，山上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敌人攻上来了，突然，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山头上出现了志愿军的战士，他们把敌人打下去。等到敌人的炮弹飞来时，一下子又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志愿军的战士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战斗这样激烈、残酷，但他们始终是英勇、顽强、坚贞、乐观。战斗中人人向前，许多二线连队都要求参加战斗，他们一致说，参加上甘岭作战最光荣。伤员负伤后，要说服、强迫才退出战斗。伤员们请求不要把他们往后方送得太远了，以便痊愈后，能早日再上前线。

慰问团人员为亲临上甘岭前线，为有机会目睹这个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战斗而感到骄傲。当他们看到这些悲壮的场面时，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深深地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培育出来的英雄儿女，才具有这种伟大的英雄气概。

就在祖国慰问团前来前线慰问的同时，志愿军总部又收到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10月24日以中共中央及军委名义发来的《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的电报，这一电报，对全军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力量。电报全文如下：彭邓杨甘各同志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9月18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內，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7月以来的15个月中，比较以前的8个月，平均每月减少2/3以上（前8个月平均每月为25000人，后15个月平均每月为8000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月18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

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央及军委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一电报不仅肯定了志愿军前一段作战的胜利，而且对今后的战略、战术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志愿军总部立即把中央复电传达给正在执行全线战术反击作战任务的部队，传达给上甘岭防御作战的指战员。

第二阶段的作战较第一阶段更加艰难。克拉克将志愿军的坑道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又怕又恨。为巩固已占阵地以便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他们对坚守坑道的志愿军采取了封锁、轰炸、爆破、熏烧、堵塞坑道口或向坑道内投掷毒气弹等多种手段进行围攻。这些手段破坏性、杀伤力都很大，其中有些是很残酷的。要战胜它们也是极不容易的。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作战，既需要机智，又需要勇敢，还需要非凡的承受力、坚韧力。第一三三团坚守的597·9高地的几截坑道，坑道口被敌炮弹炸塌暴露后，敌人用八一炮、化学迫击炮疯狂轰击，还向坑道内投掷硫磺弹，再用土填塞坑道口，并且沿坑道口架设铁丝网，企图把坚守坑道的志愿军指战员困死在里边。

坚守坑道的志愿军部队，由于有的坑道被炸塌，有的坑道口被堵塞，再加上坑道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污浊，氧气不足，处境极端困难。但是，依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坑道里的勇士们都有一个坚守坑道、夺回阵地的坚强信念，发扬了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战斗情绪。

在坑道战中，以坑道为单位重新组织了党支部，统一了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使人人明确只要坚守住坑道，就能歼灭敌人，就能依托坑道反击敌人，就能恢复与巩固阵地，就能赢得战役的最后胜利。全体指战员自觉忍受困难，克服急躁情绪，齐心合力地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破坏和进攻。

在597·9高地二号坑道内，有24个分属于16个连队的指战员，其中大部分是伤员。由于没有统一指挥，秩序有点乱。有的主张冲出去打，有的主张设法与地面或其他坑道联系，也有的主张等等看，意见很不一致。一个左臂受伤、年纪稍长几岁的同志站了起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司务长，是共产党员，入朝前在淮海战场上打过几仗。这里由我暂时负责，你们都听我的指挥。”

他先后让党、团员分别举手，成立了党的小组和团的小组。他对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子。我们出国打仗抗美援朝，不能给祖国丢脸。共产党员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小组就是领导集体，我们要照顾好负了伤的阶级兄弟，我们还要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反击。”他把没受伤和受轻伤的同志组织起一个突击班，一直坚持战斗。

斗争焦点首先集中在坑道口。敌人明白，只要志愿军坚守着坑道，他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最后连已经占领的地面阵地，也不得不重新吐出来。因此，敌人不惜采取种种毒辣手段，对我军坑道进行疯狂攻击和破坏。

为了确保坑道的安全，志愿军必须阻止“联合国军”接近与破坏坑道口。除组织纵深炮火及侧后方的机枪人力严密控制坑道口，不让敌人接近和破坏外，退守坑道的分队在坑道口用麻袋修筑工事，阻击敌人。还在坑道口外挖一个深坑，再由坑道内向外挖一条通向深坑的交通沟，使敌人投来的炸药和

手榴弹都顺着交通沟滚到坑里爆炸。

当敌人投掷手榴弹、炸药包，企图炸毁坑道口时，战士们就前仆后继冲出坑道，在炮兵人力的支援下，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当敌人集中炮火轰塌坑道口，坑道缺氧战士有窒息的危险时，战士们奋不顾身，冒着炮火进行抢挖，直至将坑道口挖开。

坚守坑道的部队还在积极歼敌思想指导下，依托坑道，广泛开展冷枪冷炮狙击活动，不断组织小型出击，积极主动地打击表面阵地的敌人，粉碎敌人对坑道的围攻。上甘岭阵地涌现了许多神枪手和神炮手。其中青年狙击手张桃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31天里，用437发子弹，打死打伤211名敌人，创造了朝鲜前线志愿军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张桃芳是刚上前线三个多月的22岁的新战士。他一来到上甘岭阵地，就被那儿的许多英雄事迹感动。这时候，部队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冷枪冷炮杀敌运动，上级号召战士争当“杀敌百名狙击手”。从此，张桃芳就苦练技术本领，并虚心地向老战士们求教，终于成了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一次，张桃芳正把枪口放在固定封锁点上等着，忽听观察员喊了一声：“注意！二号发现活靶！”张桃芳一看，果然有一个敌人背着东西正向上爬，叭的一枪，这个家伙就滚下山去了。

还有一次，张桃芳正在射击台上等目标等得发急，突然两个敌人从碉堡里跑了出来。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鬼子吵架，越吵越凶，竟忘记了志愿军狙击手的厉害。张桃芳说：“咳！不要吵啦，让我来给你们调解一下吧！”说着就叭的一枪，一个敌人应声倒地，另一个赶快溜掉了，这样，张桃芳在18天的战斗中，用225发子弹，消灭敌人71名，差不多每3发子弹消灭1个，每天消灭3到4个。全班共消灭了564个敌人，有9个战士立了三等功，全班获得集体三等功的荣誉。

上级为了进一步培养张桃芳，就送他到狙击手训练队学习了两个星期，这样一来技术更提高了。在后一个时期的13天里，他用212发子弹消灭的140个敌人，平均每3发杀敌两名，每天杀敌10个到11个。到上甘岭战役反击以前，张桃芳的那个班已经消灭了760个敌人，差不多等于两个营；张桃芳一个人消灭的敌人就差不多等于两个连了。一个投诚过来的敌军士兵说：“我是新兵，刚到前沿的时候，老兵就告诉我，没事就乖乖地蹲在工事里，别到外面去乱跑，志愿军的冷枪可真厉害，说打你的头就不会打在你的脖子上！”

在上甘岭阵地上，人们还经常表扬来自四川仪陇县的一名青年神炮手，他当时年仅19岁，名字叫彭良义。在前沿阵地，彭良义用86发迫击炮弹，击毙和击伤了121个敌人。有一次，敌人正向前沿阵地忙碌地运送炮弹，彭良义立刻准确地向敌人开炮。他的第一发炮弹刚打出去，敌人的排炮就向他打来。这时，彭良义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工事里射击敌人。当敌人又向他轰击时，彭良义又转移到第三个工事里再射击。不久，工事被敌人炮火摧毁了，迫击炮和他自己被埋在泥土里。但是，他明白如果这时停止射击，敌人就会知道击中了目标，更多的炮弹就会飞过来。于是，彭良义忍受着浑身的酸痛，架起炮一连打了三发。敌炮果然以为没有打中他的工事，便向他四周的阵地上用排炮盲目乱轰。彭良义又想出了新的办法来迷惑和消耗敌人，他用一颗手榴弹放在附近一个废弃的工事前，并在手榴弹上盖上草灰，当他的炮一发射，他就叫助手拉响手榴弹。随着炮弹的出口声，那个废弃的工事前扬起了

一团烟土。敌人立刻用成百发的炮弹射向废弃的工事，而彭良义却在一边安全地射击着敌人。这一天，他打死了 18 名敌人，消耗了敌人 400 发炮弹。

10 月 14 日，敌人向上甘岭志愿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彭良义看见两个营的敌人正沿着 537.7 高地北边的前沿洼部向上爬来。他立刻带着弹药手王修成把炮搬到平地上，冒着敌人炮火的轰击，在两分钟内连续发射了 50 发炮弹，配合步兵歼灭了 200 多名敌人。

15 日，他奉命掩护 537.7 主峰阵地的坑道口，在半天内他就用游动炮火打死了 20 多个敌人。

16 日，他不幸被敌炮击中，为人类的和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志愿军的战士们，为了保护坑道口，千方百计地和凶恶的侵略者周旋。敌人为了破坏坑道，也使尽各种毒辣的手段。一天，敌人乘着呼呼的北风，把成桶的汽油浇在干柴堆上，用烟火熏坑道。坑道里的人被呛得透不过气来，皮肤被烤得要爆裂一样难受。有的战士愤怒地喊叫：“出去和他们拼了！”党支部立即提醒大家：“不能拼！现在就是一个换一百个，我们也不能和敌人拼，我们的任务是坚守阵地！”在这危急时刻，我炮兵部队用炮火及时支援，迫使敌人撤离我军坑道口。

谈起当时的坑道斗争，前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说：“这一阶段，我坚守坑道部队继续不停地组织小型反击，又叫小部队活动。机智聪明的指挥员，通常采用三种手法：一是突然强袭，歼灭敌人于坑道之外。即当敌人向我进攻时，坑道内预先组织精干小组，待敌人接近坑道附近时，突然行动，将敌歼灭。二是潜出强袭，歼敌于行动之中，在敌搜索我而未发现我时，我发现了敌，即组织力量突然袭击。三是偷袭，歼敌于坑道之内。全线各坑道进入坚守后，对敌进行小型出击 158 次，除 9 次失利外，其余全部成功，歼敌 2000 余名。这个数字在整个战役来看，虽然不大，但这种战法给敌人心理上造成极大的慌乱，使他们日夜不得安宁。”

“敌在明处，我在暗处，说不准什么时候，也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被从地下伸出的几个枪口或跃出的几个勇士给歼灭了。”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一个美国兵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一到石坝下边拉大便，裤子还没提起来，就被从石坝里伸出的两只手拉进了坑道。从那，再有大便者便三人一伍了，其中两个抱着枪望风。事情虽小，但它很生动地说明我们小部队活动的威力，也说明即使敌人占领了我表面阵地也是处在胆战心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地。”

然而，随着坚守坑道斗争时间的延长及敌人的严密封锁，伤员不断增加，弹、粮、药品等物资越来越缺乏，战斗和生活条件也愈来愈艰苦。有的坑道被打塌，空间变小，人们挤得难以行动，伤员更加痛苦。炮击的震荡，使坑道内有时点不着灯火，硝烟、硫磺、血腥、粪便和汗臭味使空气污浊不堪，温度上升到穿单衣还难以忍受，而洞外却是零下二三十度。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个馒头。特别是缺水，有时甚至只能饮尿止渴。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守部队始终顽强不屈，亲密团结，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击凶恶的敌人。

当时，运输是个大困难。为保证坑道部队所需粮弹，除组织军、师后勤力量加紧运输外，另专门抽调第二十九师三个营及各师团机关人员，专任 40 里山路的火线运输任务。这个时期，由于后勤战线同志两年来的辛勤努力，全军的战斗与生活供应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然而，上甘岭战役的第一、二

阶段某些部队出现的“靠着粮山没饭吃”、粮食供应不上的问题，是由于在新形势下运输工作调整不及时造成的。当然，敌人超出以往的疯狂封锁，也给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此，后勤部门决心尽一切力量保证第一线粮、弹供应。前线运输司令员刘居英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他对参加运输的指战员们说：“前面能不能打得更好。你们负有重大责任啊！”

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坚守坑道，饮水成了首要的难题。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说，像牙膏一类一切含有水分可以润喉润唇的东西，早就被吸吮完了，战士们干渴难忍，只能用舌尖去舔湿润的岩石或是伏在地上吸几口凉气，祖国慰问团带来的水果糖，朝鲜人民送来的苹果，二线部队在自己菜地里刨出来的萝卜，都被当作甲等作战物资前运。在那些日子里，各级司令部的电话上，喊得最多的就是：“水！水！水！”

在那些夜晚，运输部队不顾牺牲，通过敌人严密的炮火封锁，有时全身贴地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把粮、弹、萝卜等送进坑道。尽管实际送到坑道里的物资有限，但正是这种“雪中送炭”，给坚守坑道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当时，在上甘岭前线到处流传着一个苹果的故事。负责支援五连的一个人线运输员，往坑道里送弹药时带进去一个苹果。连长看着他汗湿的衣服和干裂的嘴唇，没有接，让他自己吃。他硬是塞给了连长。断水7天，嗓子早已嘶哑的连长把这个红艳艳的苹果在手掌心里掂了一下给了步话机员。步话机员舔了舔已结血痂的嘴唇，把苹果给了正在呻吟着的伤员。伤员由于断水少药，已经昏厥几次了。但当他发现只有一个苹果时，又把苹果递给了连长。连长的手颤抖了，深情地看了看大家，把苹果交给了司号员。司号员没有说话，接过来就递给了身旁的卫生员，卫生员又送给了那位伤员，伤员又交给了连长。五连当时只剩下八个人。连长用嘶哑的声音动员了一番，郑重动员每人吃一口。这个小小的苹果在八个男子汉手里转了一圈，才算吃完了。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说：“困难和斗争本身，考验着同时也教育了上甘岭前线的志愿军指挥员。”各个党支部从实战出发，提出了许多新的行动口号：“敌人是不打不倒的，越打它，它越松。”“坑道不是保险柜，要依托坑道积极打击敌人。”“消极防御等于自己消耗自己，只有积极斗争才能消灭敌人，争取最后胜利！”主动打击敌人，很快在各个坚守坑道的部队里形成群众运动。狙击和夜袭歼敌的捷报每天从各个坑道里频频传出。有一个连队，在10多天中出击16次，歼敌70余名。另一个连队在10次成功的夜袭中，创造歼敌两个半连的纪录。

在十几天的坑道斗争里，保卫坑道的指战员们创造了真正的奇迹，他们不但守住了坑道，歼灭与消耗了敌人，同时也为决定性的反击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暂时侵占了上甘岭两个高地的表面阵地的敌人，此时如同坐在一座火山上。

在坚持坑道作战中，志愿军炮兵部队以准确而猛烈的火力支援，有效地保护了坑道口的安全，给了占领表面阵地之敌以大量杀伤，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炮兵，对取得坑道作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直接配合坑道作战和进行反击准备，第十五军以第二十九师和第四十四师先后歼灭了上甘岭以西柏德里东山和平康以南万渊里地区之381高地、391高地之敌，共歼敌3000余人，为胜利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决定性的反击到来之前，志愿军政治部组织了在战斗第一阶段涌现的英雄人物事迹报告团，由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带领到各部队作巡回报告。一时，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传颂在前线各个角落，给憋足了劲的战士们的心中又添了一把火。

10月25日，第十五军召开作战会议，具体研究了实施决定性反击的作战部署，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反击597·9高地之敌，尔后反击537·7高地北山之敌；以第二十九师1个营又5个连投入反击597·9高地之敌的战斗，以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为预备队；以第二十九师的另5个连投入反击537·7高地北山之敌的战斗。为了保证粮弹等物资供应，除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增加运输外，第三兵团抽调第二十九师三个营的兵力及大量机关人员担任20多公里山路的火线运输任务，仅迫击炮弹就运了3万发上山。

10月27日，志愿军第三兵团指挥部对实施决定性反击的作战作了明确的指示，强调树立长期打下去的思想，准备与敌进行多次的反复争夺，逐渐消耗和杀伤敌人；兵力的使用要大小结合，充分发挥小兵群战术和部队随伴火炮的作用。到29日，兵员补充及部署调整已经完毕，反击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遂决定由坑道斗争转入决定性反击与巩固阵地阶段。

反击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章 胜利反击

炮声隆隆军号急，大军反攻举红旗；
英雄奋勇驱虎豹，横扫顽敌如卷席。

坚守上甘岭的英雄们开始反击了。

1952年10月30日晚上，时针指向22时，密布在五圣山方圆十几里山谷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大炮，突然咆哮起来。一道道炮弹的红光，像闪电一样劈开了漆黑的夜色，呼啸着扑向敌阵。

在炮火掩护下，我坑道部队的3个连首先对敌发起冲击，接着，坑道外第十五军四十五师的5个连，和第二十九师的两个连迅速投入战斗，对敌实施两面夹击。经5小时激战，全歼守敌4个连，并打退敌1个营兵力的多次反扑。到31日晨，除了一个班的阵地外，597·9高地所有阵地为我收复。

10月31日至11月3日，敌又先后以南朝鲜第九师1个团。美第七师3个营、美空降第一八九团及埃塞俄比亚营投入战斗，每天以1至两个多团的兵力，在航空兵和炮兵的猛烈火力支援下，进行连续反扑。

11月1日晚，预备队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九十一团投入战斗，并增调了9个炮兵连参战。是日，共歼敌1500余人。

到了反击的第二天，11月2日凌晨，敌人又对上甘岭阵地实施猛烈炮击达4小时之久，发射炮弹15万余发，并出动飞机100余架次，投弹100余枚。然后集中了5个营的兵力，多梯次地向597·9高地攻击40余次，曾一度突入阵地。志愿军防守部队第十二军第九十一团和第十五军第八十六团各一个连，顽强机智作战，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将敌击退，毙伤敌1500余人，自己仅伤亡190余人。

在反击战中，志愿军炮兵打得很出色，但也非常艰苦。当时，坑道外边寒风呼啸，温度降到零下二十六八度，但在炮兵工事里，我们的炮兵战士却汗流浃背，特别是装填手，光着膀子还大汗淋漓，帽子一拿下来，脑袋就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炮筒打红了，炮身发烫。装填手的手被炮筒烫起了泡，就用胳膊夹着炮弹往里送。为准确地配合坑道部队消灭敌人，他们还派出步兵话机战士到前沿坑道指示射击目标。

由于连续作战，炮兵战士极其疲劳。战斗间隙，有的炮手靠着发烫的炮身就睡着了，连敌人打在工事旁边炮弹的爆炸声，也不能震醒他们。可是，当指挥所传来命令时，他们又迅即扑上炮位。他们密切注意步兵的呼唤，随时随地以猛烈的炮火给予配合。由于观察的准确，射击的及时，前后配合的默契，击毁了一个个敌炮阵地和坦克群。炮兵们的准确射击，不断赢得战场上阵阵的欢呼声。

在炮兵的支援下，步兵们的战斗也非常出色。就在11月2日那天，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九十一团第八连第四班，在纵深炮火的有力支援下，机动灵活地作战，以轻伤3人的代价，打退敌人一个排到两个多连的7次攻击，歼敌400余人，创造了小兵群作战的范例。

11月5日，志愿军总部收到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和参谋长王蕴瑞发来的《关于对五圣山作战部署》的报告。根据新的情况和敌我态势，他们对巩固597·9高地和夺回537·7高地北山作战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第十二军三十一师的三个团全部投入该两高地作战；第三十四师两个团为预备队；第十五军的四十五师除炮兵、通信、后勤保障部队外，撤出战斗进

行休整。为便于指挥，由第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在德山舰组织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由炮兵第七师师长颜伏组织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配属的炮兵。

他们在战术指导上确定：“我反击成功之后，除主峰基点必守之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即有利则守，无利则收。阵地被敌占去之后，我应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即有机会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对坑道内外的利用、大小反击的结合，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讲道：“我之一切战术手段均不要形成规律，以造成敌之紧张慌乱，我之战机就会越多。”还强调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保持战术上的主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中央军委都肯定了这一部署。中央军委在复电中并指出：“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而奋斗。”志愿军司令部及时将中央军委复电转告第三兵团，同时要求他们：“鼓励十五军与十二军参战部队及配合作战之特种兵部队，坚决作战，为争取全胜，恢复和巩固全部阵地，再予敌以更大的杀伤而奋斗。”

就在志愿军总部收到第三兵团《关于对五圣山作战部署》报告那天，五圣山战斗更趋激烈。“联合国军”连续以优势兵力对597·9高地展开猛烈攻击。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九十三团一个营投入战斗，同第九十一团共同粉碎了敌人多次攻击，在反复争夺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11月5日的作战中，第九十一团第五连新战士胡修道，在班长李锋带领下，和另一位搬运弹药的战士滕士生防守一处阵地。

200多个敌人蜂拥向他们三人冲来。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胡修道奋力地投出几根爆破筒，班长也打出了几个手雷，炸倒了七八十个敌人，其余敌人连滚带爬地逃下山去。

不久，班长被调往他处。胡修道和滕士生冒着密集炮火，又打退了小股敌人的多次冲击。这时，成群的敌人快要爬上右侧不远的另一处阵地，情况十分危急，胡修道果断地带着手榴弹冲去支援，打退了敌人。在滕士生负了重伤，又有敌人约两个营向山上扑来时，胡修道独自一人坚持战斗，拼命地把手榴弹、手雷一个接一个地向敌群中投去，终于将敌人打退。胡修道在连续战斗中，打退了敌人41次冲击，歼敌280余人。胡修道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固守在上甘岭阵地上的志愿军部队，以决定性的反击夺回597·9高地后，连续7天挫败了“联合国军”5个团又两个营的轮番反扑，歼敌6000余人，巩固了阵地。美联社战地记者报道说：“在金化攻势中，联军牺牲的人数已使联军的司令官震惊了。”“联军在三角形山（指597·9高地）是被打败了。”“联合国军”在597·9高地失败后，企图集中力量固守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急调南朝鲜第九师接替伤亡惨重的南朝鲜第二师，增加火炮，加修工事。

11月11日6时，志愿军第三十一师九十二团的两个连，在山炮、野炮、榴弹炮70门、迫击炮20门和火箭炮24门的直接支援下，分两路发起冲击。激战到17时，夺回537·7高地北山阵地，全歼守敌。与此同时，为配合九十二团的反击作战，志愿军第三十一师还以九十三团一部收复了我原放弃的597·9高地的一个阵地。11月12日，敌以1个团的兵力向我537·7高地北山反扑，经激烈战斗，敌人占去两个山脚的4个阵地。此后，敌我双方即在

这两个山脚的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敌人先后投入的兵力在6个营以上，并集中了几乎是战役使用的炮火，而且每日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投掷大量重磅炸弹。战斗愈来愈艰苦激烈。第九十二团在4天激战中，反击20余次，击退敌人近百次冲击，杀伤敌人2900余人。

18日后，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六团投入战斗。由于双方均以密集炮火猛烈轰击，537.7高地北山表面工事全被摧毁，因而增加了反击后巩固阵地的困难。第一六团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首先以小分队在纵深强大炮火支援下，在前沿阵地上与敌人进行争夺，掩护主力抢修坑道和表面阵地工事，尔后依托坑道，以小兵团战术，继续大量杀伤敌人。激战至11月25日，第一六团并击退敌人50余次冲击，歼敌14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至此，上甘岭战役遂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上甘岭防御战役历时43天，敌我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投入了10万以上的兵力，进行了持久的反复争夺，战斗激烈程度是空前的。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按地区面积落弹量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少有的。战役中，“联合国军”先后投入的进攻部队有：美第七师，美空降团，南朝鲜第二师和第九师，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共11个团零两个营，在战役进行中又补充新兵9000余人。此外，还有18个炮兵营，拥有105毫米以上火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约6万余人。

在志愿军方面，先后投入作战的有：第十五军的四十五师、二十五师，十二军的三十一师及三十四师的一个团，榴弹炮兵第二、第七师，火箭炮兵二九团，六十军炮兵团，高射炮兵六一、六一团各一部，山炮、野炮、榴弹炮共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另有工兵二十二团第三营和担架营，总兵力约4万余人。

中外军事家评论，上甘岭战役，兵力、人力之密集，反复争夺之频繁，战斗之残酷激烈，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战役期间，“联合国军”共发射炮弹约190万发，飞机投掷炸弹5000余枚；最多的一天为炮弹30余万发，炸弹500余枚。当时一些西方记者报道说：“山被炸低了，坑道被炸断了。”实非夸张之词。志愿军所坚守的两个高地，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不仅山上的树木完全炸光了，整个山头上连根草茎也找不到。

这次战役，据不完全统计，我共打退敌人营以上兵力的冲击25次，营以下兵力的冲击650次。同时还进行了数十次的反击，最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此役，共毙伤俘“联合国军”25000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美国新闻界就此报道说：“美军的伤亡率达到一年来的最高点。金化攻势已经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合国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中也沮丧他说：“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敌人对我坚不可摧的坑道工事已毫无办法。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指537.7高地）和爸爸山（指五圣山）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

上甘岭战役是对志愿军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的一次严峻考验。战役的胜利，进一步显示了它在朝鲜战场上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为志

志愿军坚守防御战术增加了新的内容。志愿军所以能把克拉克的百万发炮弹变成废铁，是因为他们有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工事。

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牵着范弗里特的鼻子走，让他在前沿数点上（而不是宽正面）投入众多的兵力、兵器，而在反击或与敌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敌人，也是因为我军有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在反复争夺中，只要我能守住坑道，整个阵地就不会丢失，而且还可以使我每一个阵地成为消灭敌人的堡垒。这样，坚守坑道作战便成了我军进行坚守防御的一个新的战术课题。上甘岭战役为此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各参战部队的配合是相当密切的。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团结战斗、协同作战的胜利。上甘岭地区打响之后，全线各军配合得十分密切。步兵发起冲击，炮兵予以掩护，而炮兵射击，步兵又主动给指示目标；阵地上弹药大量消耗，运输部队昼夜兼程源源不断地供应；路和桥被敌炮火封锁，飞机轰炸，工兵部队就冒着纷飞的炸弹抢修桥梁、道路，高射炮兵日夜监视敌机，保证运输线路的畅通……所有这些努力，演奏了一部震惊世界的、有声有色的反击侵略战争的协奏曲。

谈到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舍生忘死的英雄们。当时志愿军虽然有坑道工事，炮火也有所加强，可是在火力上和技术上仍不能与美军相比。因为战场狭窄，志愿军无法有效地发挥数量上的优势，作战中我方对敌人的主要优势，还在于战术的灵活和指战员不畏牺牲的精神。

战役开始后，第十五军军党委就组织前线部队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硬骨头活动，在强调与阵地共存亡的基础上，前线部队提出，阵地要存，人也要存，对革命英雄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战役中，我表面阵地暂时失守后，敌人终日向坑道口射击、爆破、放毒、投硫磺弹，洞内空气恶浊、缺粮、缺水、缺弹，战士们就是依靠团结奋斗和硬骨头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最后配合增援部队夺回表面阵地。

在上甘岭反击战中，涌现了许多像黄继光、邱少云和孙占元这样的英雄，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吧！让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爱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吧！

我们还是先谈谈王万成和朱有光烈士的事迹吧：11月2日，八连在597.9阵地上，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当时敌人有两个连，正要爬上他们左侧的阵地。一班战士朱有光、王万成看见了，就抱着两个并联在一起的爆破筒飞奔过去。这时，敌人已先他们爬上了山头，并把信号旗插在阵地上。他俩一看，情况紧急，便不顾一切，迎着敌人冲了上去。朱有光高声地喊着：“同志们，立功的机会到了！”王万成也喊着：“同志们，捉俘虏呀！”就像他们同许多战友在一起冲锋一样。他们视死如归，抱着并联的爆破筒，冲入敌群，轰隆一声，敌人纷纷倒地，血肉横飞；余下的几个人吓破了胆，咕咕碌碌滚下山去了。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伟大的和平事业，他们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生命。他们两个人击溃了敌人两个连，在敌群中拉响了并联的爆破筒，与数十敌人同归于尽，保证了后续部队夺回阵地。

再看看烈士薛志高吧！他生前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的一个副班长。

1952年11月4日晚，他所在的连参加反击537.7高地北山的战斗，他的班参加了突击排。在攻击中，班长牺牲了，他指挥全班继续冲击。他左臂负伤，仍坚持战斗，同战友一块夺回了一个阵地，歼敌28名。在向另一阵地

运动时，他的左腿被炮弹炸断，不能行动，看见了双眼被打瞎的本班战士王合良，立即叫王背着他，他给王指路，继续向前冲击。敌人反扑过来，被他们击退。当他只剩下一个手榴弹时，他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栗振林烈士，河南林县人。生前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的一名排长。上甘岭战役中，他的排负责反击 537·7 高地北山一个阵地。他指挥全排从侧面冲上山头，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全歼守敌一个排，接着又扫清与第三排结合部的残敌，共歼敌 80 余人。他们攻上山头时，弹药已经很少。打退敌人两次反扑后，人员又有伤亡。栗振林虽已数处负伤，仍来回爬行，沉着指挥，突然，潜伏在阵地前的敌人猛扑上来，他拉响最后一颗手雷，与 20 个敌人同归于尽。

刘俊卿烈士，湖南省湘乡县人。

1948 年 10 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生前是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第三营机炮连的一名班长。敌人向 597·9 高地发起进攻，他最先向指挥所报告了敌人开始进攻的情况，并用机枪毙伤敌 70 余人。当坑道被敌人炸毁半截，他积极组织抢修，保护了 10 多个伤员，不久，敌人再次围攻坑道，他跳出坑道口，用机枪毙伤敌 20 余人。后因子弹打光，10 多个敌人一拥而上，他冲入敌群，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农廷秋烈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生前是志愿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三团第一连班长。上甘岭战役中，他所在的连反击 537·7 高地北山，他负责掩护步兵冲击，一气夺下三个阵地，并用短促密集火力，击退敌人两次反扑，毙伤敌 70 余人。这时，全连只剩 10 人，干部全部伤亡。他立即把所有人员组成一个班，自任班长，又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反扑。最后，为了掩护其他战士转入坑道，他独战敌群，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田立明烈士，湖北省人，青年团员，志愿军第十五军第一三四团的一名班长。

1952 年 11 月 1 日，他率领全班坚守 597.9 高地的一个阵地，先后击退敌人 6 次反扑，毙敌 170 余人，后来，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人，好几次被炮弹爆炸的气浪推倒，被土块石头埋住，但每一次他都挣扎起来继续作战，当 70 多个敌人蜂拥而上时，他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葛洪臣烈士，河南省临颖县人。生前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第一三四团的一名排长。他带领全排配合其他连队反击 537·7 高地北山一个阵地，一举攻下，并歼敌 20 余人。次日，他又受命坚守主峰阵地，两次身负重伤，坚持不下火线。第三次又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但仍继续指挥全排打退敌人两次反扑。最后，他为掩护部队转入坑道，单身拒敌，用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唐治平烈士，四川省宜宾县人，生前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八十六团的一个副班长。

1952 年 11 月 2 日，他们连接受坚守 597·9 高地的任务。当敌人以成排的兵力向坑道进攻时，他用手雷消灭了爬近洞口的敌人。接着又有两个排的敌人冲上来，他用冲锋枪打了几梭子子弹没有抵住，就跳出洞口掩体，扑入敌群，拉响手雷，50 多个敌人被歼灭，他也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来自山西省的通讯兵战斗英雄牛保才，1946 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第一营营部的电话班副班长。当敌人正向 537·7 高地北山前沿进攻的时候，营指挥所通往前沿的电话线断了，他立即前去查线。路上他连续负伤，但仍咬牙前进。后来，左大腿又负重伤，仍

艰难地爬着执行任务。当他英勇牺牲时，手里还捏着一个线头，嘴里咬着另一个线头，以自己的身体保证了指挥畅通。这是何等高尚的战斗精神啊！

在上甘岭反击战役中，除了已经壮烈牺牲的功臣、英雄外，各个兵种和各条战线也涌现了大批的活着的战斗英雄和模范。他们在反击战役中为夺取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受到了中朝人民的赞扬和称颂。

战斗英雄高良伦，四川剑阁县人，年仅20岁，他是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九十三团的一名战士。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领的战斗小组在一个阵地上阻击敌人，先后打退敌人7次反扑。最后只剩下他和另一名战士，两人密切协同，歼敌246人，立特等功，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来自陕西省的战斗英雄郝兴文，是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九十一团的一名班长。

1952年11月11日，他们连开始反击637·7高地北山。他带领全班第一个冲上敌人阵地，连续炸毁敌人两个人力点，为部队夺回三个阵地起了很大作用。夺回阵地后，连排干部都负了伤，他主动把全连剩下的19人组织起来抢修工事，收集弹药，一直坚守到深夜。

12日以后，在他的指挥下，又连续打退敌人16次反扑，歼敌500余人。

来自四川南部县的战斗英雄林炳远，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八十六团的战士。

1952年11月1日，他所在的连反击597·9高地。在夺回主要阵地后，约一个连的敌人在坦克掩护下反扑上来。他迂回到敌侧后，连续投掷手榴弹、手雷将敌击溃。当前进到一个洼地附近时，又发现有两个排的敌人在集结，他奋勇直入，毙敌20余人。在击退敌人的反扑中他不断地进行阵前冲击，大量杀伤了敌人。在这次战斗中，他共毙伤敌140余人。

战斗英雄王彦林，河南省新郑县人，中共党员。他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第一三三团的一名班长。他带领全班反击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扫除敌人18个火力点。在坚守阵地时，他两次主动发起冲击，顽强坚守阵地19个小时。创造了全班在战斗中先后歼敌270多人、自己毫无伤亡的新纪录。

模范卫生员陈振安，广东省新会县人，中共党员。在上甘岭战役期间，他先后抢救和护理了300多名伤员。当时，不仅没有药，连水都没有。有一次，他挖开石头缝，把一点一滴的水积起来，又用罐头里的油和上棉花燃火，把冷水烧开给伤员喝。他还把自己棉衣中的棉花用开水消毒作成敷料，并冒着危险捡回敌降落伞，用降落伞的丝帛和带子代替绷带。他就是用这些办法在10昼夜的坑道战斗中，减少了伤员的痛苦。

来自朱德元帅家乡的模范运输员许明文，自接受向上甘岭阵地运输粮弹的任务后，就向指导员写了一份决心书。他表示一定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祖国人民、为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争光，为朝鲜人民复仇！

在战斗激烈进行时，通往前线的运输道路常被敌人的炮火封锁。许明文翻过大山，冒着敌人炮火的轰击，一次次地把祖国人民送来的粮弹，安全地运送到阵地上。每一个黑夜，他都牵着牲口走八十里路，有时要走150多里，而且每天还要自动扛上两箱炮弹或者一袋50斤重的大米。

在一个雨夜里，他牵着一只驮着粮弹的牲口，自己身上还背着两箱迫击炮弹赶往前线。他翻过三座大山，通过四道炮火封锁线。在通过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四五米处爆炸，他被震昏了，石块和泥土埋住了他半个身体，嘴上汨汨地流着鲜血。当他清醒过来时，他立刻挣扎着爬起来，

又扛起炮弹箱继续前进，终于完成了任务。

在战斗开始后的头3天里，他3天3夜没有休息，许明文背着60斤重的炮弹箱连续运输了12次。在30天中他共向阵地上运送了3700斤粮弹，创造了徒步运输1200华里的新纪录。

上甘岭战役既是一次大规模的坚守阵地的防御战，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打钢铁”、“打后勤”的现代化战役，弹药消耗极大。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在43天的战役中，共供应各种物资16000吨，实消耗11000吨，其中仅弹药一项即达5000多吨，平均每天120吨。战斗紧张时，一个团作战，需要两个团负责运输作战物资。由于敌人炮火密度每公里正面达299门，加上大量的航空兵、坦克及火炮，在从前沿到战术纵深20公里的地域内构成了层层火网、火墙，实行昼夜不停严密封锁。火线运输人员把物资运上去，把伤员运下来往往要通过几十道封锁线。”

“在接近坑道时，距敌人只有二三十米，往往三面受敌人地堡群、探照灯的封锁控制。”洪学智继续指出，“我地表阵地被打成一米多深的石粉末，有的阵地被打断，坑道被打短，以致运输人员经常迷失方向，找不到道路和坑道口，误入敌人阵地。运输部队一个排四五十人把物资送上去，只能剩下二三人回来。”战争是异常残酷的，为了夺取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11500余人的沉重代价。敌我伤亡对比为2.21：1。

朝鲜人民对上甘岭战役的支援是巨大的，是令人难忘的。特别是临近五圣山一带的朝鲜人民迅速动员了8237人参加战勤工作，其中金化郡金城面和淮阳郡兰谷面（相当中国的乡）的自卫队员，全部参加了两次到三次战勤工作，组织了1807副担架，转运了1760名伤员。

在支前工作中涌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在担架队里有舍身救护伤员的国际主义战士朴在根；在野战医院里有多次为伤员输血的朴丙玉。在战斗的40多天里，一位被敌人炮火打断腿的年轻姑娘石吉荣，一直坚持在公路上设立茶水站慰问志愿军，一天内有上千人喝到她烧的开水。

在邨下里、上松馆里的妇女还组织了歌舞队，带着200多封慰问信和她们自己做的豆腐、拐棍送给志愿军伤员，她们还给伤员献花、唱歌、跳舞。兰谷面的妇女给伤员洗了3000多件血衣，其中仅咸在福老妈妈一个人就洗了700多件，手都搓出了血。战士们心疼地掉泪，都亲切地称她为“志愿军妈妈”。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和亲切慰问，更加鼓起了志愿军杀敌的勇气。

在不到四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上，涌现出来的英雄和他们的光辉事迹，已经传遍朝鲜三千里江山，传遍了中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乡村。上甘岭这座本来无人知晓的普普通通的山峰，已经扬名世界。正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所说的：“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把它作为一种象征，谁也不会忘记它。”

正是：

烈士英名留千古，
光辉事迹召后人。

欲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高尚情操和对伟大祖国的深情，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章 战士与祖国

抗美援朝两周年，战绩辉煌非一般；
将士深情念祖国，血洒疆场心也甘。

在炮火声里，雪花又落遍了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率领下，入朝参战已经两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经过英勇奋战，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向中朝边境进犯，妄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并经过多次较量将敌人由鸭绿江边驱逐到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联合发表的两周年战绩公报，中朝部队自1950年10月25日至1952年10月15日，共歼敌661034人，其中美军占291011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7323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坦克2247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各种炮4280门，这是何等重大的胜利啊！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他们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特别是入朝初期，他们几乎完全以轻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他们必须克服各种各样远非平常人所能忍受的困难。他们日夜生活在白雪皑皑的深山中，饿了，有时只能吃几口炒面；渴了，吞几捧积雪。他们是在各种艰苦环境中获得惊人的胜利，他们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和勇敢打败了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志愿军的战士来自全国各个省份和地区，他们虽然籍贯不同，民族不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一切为了祖国，一切都要听从祖国的召唤。战士们对祖国的怀念和向往，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为了祖国，为了抗美援朝，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志愿军的战士们可以牺牲一切。三十八军的一位师职指挥员，曾向战地记者们讲述了二次战役中松鼓峰战地的故事。当时，他率领一支志愿军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为了赶在敌人前面，为了争取时间，部队在没有人迹的高山峻岭中，雪夜急行军。鞋子破了，用一块毯子包着脚走。毯子破了，赤着脚走。中国人民志愿军脚上的鲜血，点点滴滴地洒在朝鲜洁白的雪地上。美军第二师、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的部队，从新兴洞出发，坐着汽车向南跑。这支志愿军部队跟着从新兴洞出发，徒步爬山向南追。追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就迅速抢占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秃秃的小山岗，阻挡敌人，一场壮烈的拼杀就开始了。

当时的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敌人不仅在武器上占优势，而且在人数上也比志愿军阻击部队多好多倍。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英雄的战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为祖国争光”、“为抗美援朝拼杀”的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麦个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染红了。在这个阻击连的前沿，堆起了300多个美国兵死尸。我们的连长、副连长、指导员都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全连剩下20多个人。

敌人的第五次反扑是最凶恶的。已经打了4个小时，敌人很懂得时间对

于他们的意义。现在，他们又集中了 30 多架飞机、18 辆坦克、几十门榴弹炮，同时向这个不大的山岗轰击。20 分钟以内，阵地上落了三四百发炮弹。敌机投下大量的汽油弹，长着苔藓的岩石都被烧焦，阵地变成了真正的火海。战士们牢记着在指导员牺牲以前大家对他做过的保证：“有我，就有阵地！”每一个人都在奋力拼杀。三排阵地上只剩下负了伤的七班长潘治中和战士张学荣，两个人一面射击，一面互相鼓励：“为了保卫祖国，决不后退一步。”汽油弹落在前排阵地的重机枪上，射手李春发的衣服着火，脸上起了水泡，眼睛睁不开了，仍然坚持射击。

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作家、战地记者魏巍曾对这个场面作了如下的记述：

烈士们的尸体，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撩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军鬼子，脑浆崩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的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最壮烈的战斗。从上午 6 时打到中午 12 时。这个连剩下 6 个没有负伤的人，敌人死亡 600 多，敌我损失之比约为 6：1。这个连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使主力部队赶来，聚歼了敌人。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的，是充满牺牲的。但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之所以不怕苦不怕死，正是为了祖国免遭蹂躏，人民免遭屠杀啊！正如一个四川籍的名叫刘根宝的战士所说：“没有一个人愿在零下 30 多度的严寒中挨冻，也没有一个人愿蹲在冰天雪地里吃雪就炒面，更没有一个人愿拿着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然而我们深深地懂得，我们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祖国人民不吃雪；我们在这里挨冻，正是为了让祖国人民不挨冻；我们在这里流血牺牲，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和平建设环境。这样，我们的工人可以安心生产，农民可以安心地在田里劳动，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读书。为了这些，我们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哩！”

祖国，伟大的母亲，您是战士们无穷力量的源泉！正是为了您，他们才以苦为荣，奋力拼搏，视死如归，即使负了伤也不肯下火线啊！第三次战役期间，遇到了这样一位“难缠”的战士：他头上团团地缠着绷带，但说什么也不肯躺在担架上，更不愿到医院去。护送他的卫生员说：“真是一个硬汉子，他一个人打死了好几个美国鬼子。在冲锋时，炮弹正落在旁边，他头上挂花了，流血很多，当场昏迷过去。可是当救护队给他包扎好，正要往下背时，他醒过来了。他坚决不肯下去，又抱着一挺机枪打；第二天，他又被子弹打掉了一根手指头，指导员让他下去，他又说，这么高的人，少一块肉算什么呀，我不能打枪还能押子弹啊！”

“因为战斗很激烈，也就允许了他。”这位卫生员接着说，“可是第三天，他的另一只手又在投手榴弹时挂花了。他怕指导员催他下去，先走到指导员面前说：‘指导员，请你千万让我留在这儿。我们的班长已经牺牲了，无论如何我不下去。我的手不能用，我的嘴还可以说话，我要求当通信员！’指导员劝说无效，最后给他下命令：‘下去，这是党的决定！’这小伙子才不情愿地下来了。”

这位年轻的战士躺在担架上，还不住地唠叨，显然是在争取人们的同情，

他说：“本来，我不下来，满能完成通信员的任务！”这位战士这样做，也自有他的道理。自从过了鸭绿江，他所看到的都是受苦受难的朝鲜老百姓。他们部队所经过的村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强盗炸毁了，不是一片片焦上，就是一片片大火；有时候就在两边烧着大火的街道上穿过，或是在被杀死的朝鲜老百姓的身边宿营。复仇的烈火在每一个志愿军战士心里燃烧着。从此，他们更加懂得了“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两者的关系及其深远的意义。

这位受伤的战士还向人们讲述了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村庄，老百姓知道我们是打美国鬼子的，亲热地照顾我们。你说多巧，我们住的那家房东，有一个朝鲜老妈妈，和我母亲的样子相像，也是40多岁。那天我困极了，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发现裤子刚破的地方，不知道是谁给我补好了。一问才知道是这位老妈妈让她儿媳妇端着灯，她趴在炕上给我补的。我真觉得她和我的妈妈一样呀！”

“可是到了白天，我执行任务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村子起了大火，房屋全被炸塌啦。到我住的房东家一看，老妈妈的儿媳妇被炸死了，老妈妈的腿也被炸断，还抱着她的小孙子。我赶快把老妈妈背到卫生所去。我们班的人都嚷着要为朝鲜人民报仇！”

“这一夜我没有睡着。”这位伤员继续说，“我翻来覆去地想，帝国主义安的什么心呀！它为了侵占朝鲜，不怕朝鲜人灭种呀！我又想到了自己，过去日本鬼子杀死了我的父亲，蒋介石抓走了我的哥哥。多亏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我也分了几亩地，娶了媳妇，养了儿女。我不再给地主放猪放牛，不再挨冻挨饿了。可是，假若让美国鬼子到了咱们中国，我的老娘还会剩下吗？我的老婆、孩子还会剩下吗？我们整个国家还会存在吗？”这位受伤的战士又怀着深情说：“咱们新中国建立起来是容易的吗？为了她，不知道多少人流血牺牲。到现在，多少人的身体里还有美国人的子弹。难道我们人民的天下能再叫它变吗？难道我们建设起来的工厂、学校再让它变成废墟吗？不！狗杂种们想碰我们祖国一根毫毛，我都要叫他们流血！”

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情怀。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不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吗！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甘愿流血牺牲；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能够征服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困难。让我们说说志愿军战士廖贻训负伤后，经过三天三夜爬回部队的事迹吧。

廖贻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连队的文化教员，年仅20岁。

1950年冬天，在清川江战斗中，他不幸负伤，和部队失去了联系。他爬了三昼夜才找到部队，手脚已冻烂，后因无法治疗而被截去两脚和九个手指。在休养中他不但不悲观，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了其他伤员，并刻苦锻炼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1950年11月25日晚上，是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刀子般的风呼呼地刮着。特务连的任务是配合兄弟部队，迂回包抄歼灭清川江以北、博川附近地区的美军一个步兵团。他们必须进行60里急行军，在天亮前赶到那里。廖贻训的心很不平静，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他觉得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部队出发了。这支先遣部队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向敌人的心脏。一夜急行军，战士们敏捷地穿过一座大桥，天亮后全连就在一条山沟里埋伏下来，急切地

等待着黑夜的降临，继续投入紧张的战斗。就在这个时候，四架敌机前来轰炸，投下两枚重型炸弹，廖贻训不幸负伤了。他的右脚的跖骨被炸得粉碎，血流了一地，棉军裤也被鲜血浸透，一只胶皮鞋只剩前半截套在断裂的脚跟上。卫生员急忙替他绑上急救包。廖贻训难过得哭了，他不是因脚痛，而是哭自己还没有参加战斗、还没有杀死一个美国鬼子，就先负伤了。

连队继续向敌人阵地逼进。副指导员背着他，走出山沟，把他暂时隐蔽在低洼的野地高粱杆堆里。以后，就匆匆地投入了战斗。

那时，正是朝鲜的初冬。廖贻训冻得全身哆嗦着，但他的心却热烈地跟随着战友们。前边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排炮声、重机枪声震天响。他从枪炮声中判断，我们的部队已经和敌人交火了。他想，为了战胜装备优良的美军，志愿军常常机动灵活地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斗结束时，部队可能很快要离开战场。

“部队转移了，那么敌人可能搜索到这里……决不做俘虏，趁着黑夜，找部队去！如果撞见敌人就用手榴弹拼！”下定了决心，廖贻训慢慢向北爬着，他要找到大桥。廖贻训咬紧牙关，慢慢地向前爬着。不知爬过多少路，爬了多少时候，他才爬到了大河岸。桥呢？已不见了来时的桥梁。他膝盖磨破了，膝关节和手腕麻木了，全身剧烈地疼痛，好像是在一块赤热的铁板上爬着。桥找不到就沿河岸往北爬。

河面有100米宽，在靠近河滩的浅水处，已结了一层薄冰。他探着身子，量了量水的深浅。他毅然地爬进水里，努力使负伤的右脚抬出水面，这是多么吃力而不容易的事情啊！水流由缓慢到湍急，终因没法支持，全身淹没在水里。他挣扎着，搏斗着，他胜利了，他爬过河又爬上一米多高的斜坡。寒风一吹，他成了冰人，伤口痛得钻心。他匍匐在地上，又昏迷过去了。

待他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他爬呀，爬呀！他想：“我一定会找到部队，一定会回到祖国亲人身边。”他已经一天一夜没进食了，饥饿，伤痛，寒冷，这一夜他不知昏迷过多少次，每次醒来又继续向前爬。

爬着、滚着，到了第三天清晨。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大半截身子已经麻木，两只脚早已僵硬。他实在爬不动了。这时，他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飞行英雄阿历克谢·密里席耶夫，不是在失去双脚后从德军那儿爬出来，爬了18天吗？钢铁般的意志是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光辉的事迹鼓舞了他。“我还只三天啊！”于是，他又忍着疼痛继续向前爬。直至爬到一条公路，又昏迷过去了。

待他醒来时，他已经被寻找他的战友抬回野战医院了。因为四肢冻伤严重，并且右脚跖骨、踝骨关节被炸碎，部分组织已经坏死，医生决定截去右脚，尽量保持左脚和两手。医生、护士们日夜替他按摩治疗左脚和两手，使坏死部分增加抵抗力和恢复血液循环的功能。但事与愿违，最后还是不得不截去左脚和九个手指头。没有脚，没有九个手指，不能参加战斗，今后见怎能为新中国服务呢？就在廖贻训思想最痛苦的时候，医生、护士、战友们给他送来温暖，多方开导他，在同志们的亲切关怀下，他又鼓起了生活的风帆。他又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英雄密里席耶夫。他不是装上了假脚，还照样驾驶飞机吗？他不是一天参加了7次战斗，打下了3架德国飞机，成为著名的无脚飞将军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夺去了多少朝鲜人、中国人的生命啊！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要有牺牲的决心。很多同志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自己呢？两只脚，九个手指头，这又算什么呢！再说党和政府

会照顾我，装上假脚，我即便不能到前线杀敌，仍可以在后方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啊！”想到这里他豁然开朗，从此努力锻炼身体，学习本领，准备在新的岗位上为祖国服务。这就是一个身残志坚的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情怀。

在守备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里，志愿军战士们，昼夜监视着敌人，“为了祖国，为了美好的明天”，随时准备和敌人拼杀。但是，在腊月初九那天，北风卷着雪片在山谷中呼啸，那布满弹坑的山头上，厚厚地铺上了一层白雪。后来风停了，炮声也停了。战士吴振昌心想，敌人可能让我们“休息休息”！于是他跳出工事，跑到班长王玉那里说：“班长，有烟吗？”王玉递给他烟末。吴振昌一面用手卷着烟，一面笑着说：“班长，我们20多天没捞到一滴水喝，炒面充饥，雪水解渴，你说毛主席知道不？”

“当然知道啰，咱们的柴川若同志不是回国作报告去了吗！听说毛主席亲自和他谈了话，啥也打听到咧！”没等班长说完，吴振昌说：“对！我们一定立国际功给咱祖国争光荣！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就是牺牲了，我们也不能后退一步！”

班长王玉心中翻腾起来。他想：“光死打硬拼总不行啊，得琢磨个办法既守住阵地，又能大量歼灭敌人。”根据以往几次的战斗经验，敌人最怕近战和夜战。于是，他让战士们把手榴弹放在工事前沿，等敌人靠近，听口令一齐打。时间不长，几十个鬼子背着卡宾枪摸上来了。

50米，40米，30米，20米。只听班长大喊一声：“打！”手榴弹就像冰雹一样地飞出去了，鬼子们留下了20多具尸体，其余的就叽哩咕噜地滚下山去了。

王玉负伤了，但仍带领全班阻击敌人。王玉和吴振昌两人守一个工事，他们的手榴弹快打光了。瞅着脚下的悬崖，王玉忽然眼前一亮，心想要把大石头摆在工事前，等敌人爬到半山腰时把石头推下去，不是也能打击敌人吗？想到这里他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搬石头砸鬼子！”于是，战士们齐动手，很快在工事前排成了一道长长的石头墙。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先由八架野马式敌机进行狂轰滥炸，接着有两个连左右的敌人往山上冲。等敌人爬到半山腰时，战士们首先把石头推下去，机枪随后跟着响起来，接着又投出手榴弹，打得鬼子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过了一会，又集结了一个营的兵力，漫山遍野地扑上来。这时志愿军的后援部队也来了，炮弹在敌群里开花，机枪暴风雨似的打过去。这时王玉高声喊道：“狠狠地打，这是手榴弹吃肉的时候了！鬼子能把咱阵地轰成黑色，咱们就能把他们进攻的道路变成红色！”他抛出四颗手榴弹，鬼子被炸死了一片。剩下的鬼子冲到阵地前。战士们胸中燃起了复仇的怒火，班长王玉第一个拿起铁锹跳出工事，并高声喊道：“同志们，为了祖国冲啊！”他第一锹劈倒一个鬼子指挥官，连着又用铁锹砸烂了另一个鬼子的脑袋。这时他的脖子却给一双毛茸茸的大手从背后卡住了。忽听背后“唉哟”地叫了一声，那双大手松开了，原来是吴振昌端着刺刀从背后把鬼子捅死了。那边三个鬼子正在与战士李万富扭打，王玉他们正要赶过去，可是迟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腾起一团黑烟，李万富搂住三个鬼子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在这次战斗中，班长王玉带领全班勇敢机智地战斗，打退了敌人八次冲锋，受到上级的表扬。战后他在总结会上说：“我们的战士都是爱国的，都懂得出国作战的意义，一提到祖国，就无所畏惧，智慧无穷。因此我得出一

条经验：用勇敢打击敌人，用机智打击敌人，胜利总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男。

1951年5月16日，第五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志愿军某团将向敌军心脏穿插的任务交给二排。营教导员严肃地对排长崔建国说：“崔建国同志，你是个优秀的人民战士，是共产党员，祖国人民和党交给你的任务，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它。你能吃苦，不怕牺牲流血，党是了解你的。”崔建国从营教导员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任务非同寻常，于是就说：“教导员你有什么指示就直说吧，我一定不打折扣地去执行。”

“好！你知道祖国的父老把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是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并不是来送死。你是指挥员，如果有一点考虑不周到，就会让我们的战士白白流血。你始终不要忘记上一次战斗，你们排有几个不应有的伤亡。”教导员再一次告诫说：“指挥员要多用脑子，在顺利情况下不麻痹；在危急情况下不急躁。一个人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带领战士机智地战胜敌人，减少伤亡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你必须做到这一点。崔建国同志，请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记牢：对祖国负责，对战士负责，对党负责。”

从营教导员的谈话里，崔建国深深懂得了“对祖国负责”这句话的份量。回到排里，他召集大家开会。崔建国把军用水壶打开，对大家说：“同志们！把你们的洋瓷碗放到面前，我们喝一点从祖国带来的薄荷水。”战士们看了看排长，又互相望了望，把洋瓷碗放在面前的草地上。薄荷水是他从祖国带过来的。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每当崔建国口渴难忍，揭开水壶的木塞时，又舍不得喝下去：这是祖国的水啊！这水有着祖国泥土的气息！每一次他总是看看壶里的水，嗅一嗅水的味道，再把木塞拧上。可是这一次，他们排接受了最艰巨的任务，他决定把这壶水分给全排战士。祖国的水会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会增强他们的战斗力量。

崔建国默默地把薄荷水分给大家。他举起碗来说：“我们好好想一想祖国，想一想咱们的领袖毛主席。”他看着大家喝下之后，就宣布任务了。

“同志们！我们接受了一项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崔建国说，“为了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我们要插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我们是全团的尖兵，上级要我们通过40里纵深的敌人封锁区，在敌人的心脏楔下钉子。这个任务比过去任何一次任务都要困难、艰巨。我们既要通过封锁区，还不让敌人发觉；消灭敌人，在敌人的心脏里站住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沉着、冷静、机智，坚决服从指挥，一定要完成任务！”

“当然，我们有可能要孤军作战，弹药得不到接济，与10倍、20倍、100倍的敌人战斗。”崔建国讲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大家又强调说：“我们是中华儿男，祖国只允许我们胜利，不允许我们失败。刚才我们大家喝了祖国的水，它会激发我们增加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胜利，一定要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为祖国牺牲了，六班长王来成同志来代替我。各班班长都要指定代理人！”

崔建国讲话之后，就分班进行讨论，大家都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并做好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走在最前边的是第六班，他们是尖刀排的尖刀班。战士们托着挂在脖子上的自动枪，手摸着枪机，准备随时射击。手榴弹全部揭开盖子，皮线外露着。水壶、手榴弹外面包着布片，不让它碰响。

在行军路上，他们一会儿伪装成南朝鲜军，一会儿伪装成美军，以极其

巧妙的动作，穿过敌人一道一道的封锁线，抓到一个又一个敌人的“舌头”。沿途了解了不少情况，绘制了一张张的军用图，为后续大部队进攻创造了条件。当他们进入敌人心脏后，就像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了。全排三个班分组活动，袭击敌人的哨所和指挥部，搅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敌人追上来，他们就以自动火器成排地扫过去，敌人一片片地倒下去；或者他们吹起军号和小喇叭，敌人不知道面前的这支部队有多大兵力，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他们夜袭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的营团指挥所，歼灭一批又一批小股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大兵团作战。

5月21日战斗结束了。崔建国的尖刀排歼灭几百名美军和南朝鲜军。只崔建国一人就打死打伤敌人30名，俘敌8名，缴获1门化学炮，两个火箭筒，1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10几支卡宾枪。战后评功会上，崔建国被军部记了一个特功，他所带领的尖刀排，也荣获“中华男儿尖刀排”的称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们，在朝鲜战场不仅英勇奋战，努力杀敌，而且十分关心家乡的变化，关心新中国的建设。在许多指挥员的房子里，甚至在战士们们的掩蔽部里，可以看到贴着从报刊上剪下来的治淮工程的照片，成渝铁路通车的照片，新建工厂的照片，一个战士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遥远的祖国呵！你知道你的奔腾前进，是怎样地激励着那些为了你拿起枪来的儿女们啊！”

祖国一日千里的建设，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牵动着每个志愿军战士的心，一个名叫杨恩华的战士，收到妹妹来信和寄来的照片，激动不已。他拿着妹妹的照片，逢人就说，“这是我妹妹的照片，你看她现在多神气啊！可她以前是给地主当丫头呵，浑身上下给打得青一道紫一道的，脸黄黄的不像人样。她三天两头跑回家来，找我诉苦，我有什么办法呢？爹娘撇下我们俩，我连妹妹都养活不了！现在祖国变了，家乡也变了。妹妹来信说，靠近我们家乡，工厂建设起来啦，她已经是个幸福的工人。村里实行了土地改革，穷苦农民们都分了土地。村里成立了互助组，说不定再过几年还会使上拖拉机哩！”

祖国的建设深深地吸引着战士们的心。当成渝铁路通车的喜讯，传到了朝鲜战场，特别使得四川籍的战士们轰动了。正在行军中的战士扭起了秧歌舞，阵地上的战士，拍着他们怀里的枪支唱起了家乡的“金钱板”。战士杨国明的家乡紧挨着成渝路，他深情地告诉战友：他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小时候他就看见河两边插着修成渝铁路的木牌子，可是20多年过去了，木牌子也烂掉了，他的父亲也被迫修路累死了，可也从没有看到什么“成渝路”。现在，刚刚解放三年，成渝路就通车了。战士们从心眼里高兴啊！

当祖国新造的无座力炮运到朝鲜前线的时候，战士们像迎接新娘一样举行隆重的欢迎会。在第一次反坦克战中，它就击毁了敌人18辆坦克。其中二个炮手，1个人就击毁了5辆。据说，这个战士刚刚开炮的时候，好几发坦克炮弹落在附近，他负伤了。这时他扶着无座力炮的脚架站起来，低声唤着也已负伤的伙伴说：“这炮是祖国工人老大哥给我们造的啊，难道还没有击毁一辆坦克，就走下火线吗，不能！这样对不起工人弟兄们！”那五辆坦克，就是他这样带着伤，血顺着袖子流着的情况下接连击毁的。战后，指导员要给他请功，这位战士说：“要请功，首先要给造这炮的工人老大哥们请功啊！”

战士们对祖国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他们喜欢谈谈家乡的美丽富饶。一个四川籍的战士希望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班的战友

们都到他的家乡看看。他说：“我们四川啥子都有，号称天府之国，真是个好地方。”一个云南籍的战士说：“我们云南和朝鲜不一样，一年四季都是春天。”东北一个战士说：“冷算什么！我们那里煤炭用不完，地下到处是乌金，山上到处是松林，保险冻不着你。”太行山的战士，怀念家乡的红枣和柿子，山东的战士夸耀家乡的山蚕……想想自己伟大的祖国，再看看朝鲜被美军蹂躏的土地，每一个人都从心里更认清了自己光荣神圣的任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自称是“三八线上的哨兵”，他们要给祖国站岗，给朝鲜站岗，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两周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10月25日这一天，志愿军驻地，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会上，战士们畅谈中朝人民的胜利，畅谈自己的进步，回顾两年来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合着音乐的节拍，敲打着自做的各种乐器，高兴地唱着志愿军总部文工团最近教唱的反映志愿军生活的《三千里江山云和月》：情切切，意切切，难忘三千里江山云和月；风潇潇，雨潇潇，难忘那一把炒面一把雪。临津江畔同举杯，松岳山上共祝捷：金城高奏凯歌曲，世世代代唱不绝。峰叠叠，岭叠叠。难忘半岛硝烟日与夜；炮隆隆，旗猎猎，难忘那一腔豪情一腔血。热血染红金达莱。傲骨凝成钢与铁；中朝友谊树丰碑，名垂千古永不灭。欲知用鲜血凝成的中朝两国军民的战斗友谊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章 鲜血凝成的友谊

唇齿相依情谊重，患难与共舟济同；
战斗鲜血凝友谊，子孙万代水歌颂。

1952年10月，是个丰收的季节，中朝军队在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和“细菌战”之后，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就在这捷报频传的日子里，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平壤首都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两周年。

10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的邀请，率志愿军代表团抵达平壤，参加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两周年大会，同时应邀前往的，还有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代表。这一届慰问团总团长是刘景范，副总团长是陈沂、李明灏、胡厥文、周钦岳。中国客人一到平壤就受到朝鲜政府的隆重接待和热烈欢迎。

平壤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朝鲜是个多山的国家，而平壤却处在一个广阔的平原上，这块平原是由大同江冲积而成。平壤就由此而得名。平壤是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名胜古迹荟萃的地方。这里风光秀丽，牡丹峰是平壤市大同江畔的著名风景区，因山势起伏形如盛开的牡丹而得名。由于景色秀丽，古时又称锦绣山，并被誉为“天下第一江山”。峰顶有一古老亭子，名乙密台。登台眺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尤其是白色飘带般的大同江，白浪涛涛，令人心旷神怡。如今这座城市，虽然在美帝多次狂轰滥炸下，已是满目疮痍，处处废墟，但她英姿勃勃不减当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抵达平壤的当天，金日成首相就前来看望。杨得志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金日成首相。金日成当时只有40岁，身体魁伟，神采飞扬。金日成握着杨得志的手，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杨将军，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早年就熟悉了！”杨得志有些愕然。金日成放声地笑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团，解放战场上的杨罗耿兵团，我已是久闻大名了！”

是的，金日成首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非常熟悉的，中朝人民有着长期的战斗友谊。过去，中国的土地上，朝鲜革命同志抛洒过热血和汗水；今天，朝鲜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抛洒着热血和汗水，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

在10月25日举行的盛大庆祝宴会上，金日成首相作了重要讲话，他对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下，朝鲜人民失去了祖国，我们曾在中国的东北和关内，同中国人民站在共同的抗日战线上进行斗争，得到中国人民各种援助和爱护。今天，当我们朝鲜人民处在祖国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派遣了自己的优秀儿女，来帮助我们。”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像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热爱朝鲜，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以鲜血保卫了朝鲜的城市和乡村。”金日成说，“为减少朝鲜人民的不幸和痛苦，为他们幸福的未来，不顾任何苦难和牺牲，竭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热情，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保障朝鲜人民争取光辉胜利并捍卫东方持久和平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接着，杨得志在热烈的掌声中也讲了话。他代表志愿军全体将士向金日成元帅、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向伟大的朝鲜人民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杨得

志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对朝鲜政府和人民所表示的感谢，绝非外交辞令。他的讲话是发自肺腑的，代表着志愿军全体将士，也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他记得停战之后，陈毅元帅访问朝鲜。在志愿军的一个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到底是我们援助朝鲜人民多，还是朝鲜人民援助我们多，应该说是朝鲜人民援助我们多。如果没有朝鲜人民和我们并肩作战，没有朝鲜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和平环境，不可能有今天，应该接受感谢的不是我们，而是朝鲜人民，我们应该感谢朝鲜人民！”

杨得志说，他在朝鲜三四年间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深切体会到朝鲜人民不愧是英雄的民族。他们坚强、勇敢、勤劳、善良，他们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无比热爱自己的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以后，朝鲜人民的战斗精神、顽强的意志和对我军的热情支援，使我军全体指战员深受感动，大大激励了志愿军全体将士的斗志。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年轻的朝鲜人民军，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无比忠诚，有着高度的爱国主义、集体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是一支有素养、有战斗力的部队。朝鲜人民和军队在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劳动党、政府的领导下，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巨大的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把朝鲜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把朝鲜人民的疾苦和幸福当作自己的疾苦和幸福。这两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巨流汇合在一起的人民军队，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为了打击敌人的侵略气焰，有效地歼灭其有生力量，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首相经常会面，共商抗敌大计。两党、两国政府协商，成立了指挥前线两国军队作战的联合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经常强调，两支兄弟部队战斗打响前要进行充分协商，规定协同作战方案和在各种情况下互相支援的办法；要求战斗一打响，双方坚决执行既定方案，发现一方有困难，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援，把损失控制到最小的程度。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沉重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彻底破产，变成了圣诞节向“三八线”以南的总崩溃、总退却。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第三次战役，经过连续7昼夜的艰苦奋斗，以每小时前进1公里的速度前进了80至110公里，毙伤俘敌19000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

在这次战役中，中朝军队涌现出许多相互协同作战的范例。1951年元旦这天，我军突破了敌人的三八线防线。这时志愿军某部王团长命令王副营长率连队由高秀岭直插华岳里。根据情报，那里有南朝鲜一个联队的团部和榴弹炮营。团长再三交代：“要穿插得猛，跑得快！慢了，敌人会坐上汽车跑掉的。”部队勇猛直追，一气跑到红磑里，远远望见华岳里一带大火冲天，敌人又在烧房子，看来马上要逃跑了。大家一鼓作气，跑步前进，浑身都湿透了。然而跑到了华岳里，一个敌人也没有，满地都是破电线，村南头炮兵阵地上堆着成垛的炮弹，看样子敌人刚刚逃窜。于是，副营长命令说：“敌人跑得不远，加劲追还来得及，快速前进！”

果然，不出所料，部队前进不远，就遇到百余敌人的猛烈阻击。王副营长立即命令重机枪和六炮向山包上的敌人回击。此时敌人火力忽然减弱，只见敌人在混乱中逃窜，战士们猛虎般地冲过去，一会儿就俘虏了200多名

敌人。原来小山包的东南侧有朝鲜人民军的一个中队，以猛烈的火力向这边的敌人压过来，使这股敌人陷入了包围。这是两国军队在战场上不约而同地密切配合，相互支援，并肩战斗而取得的胜利。战斗结束后，中朝人民军队汇合在一起，肩并肩地沿着通往横城的大道急速前进。

在另一次大兵团作战中，中朝部队协商制定的作战方案，是围歼县里地区之敌。战斗充分体现了两支兄弟部队协同一致、互相支援的国际主义团结。在这次作战中，志愿军一个营插到某地截断敌军南逃退路时，朝鲜人民军一个连也插到了该地区，他们互相协同，配合主力部队形成了对敌军的紧密包围。从5月16日发起进攻，激战三昼夜，两支兄弟部队创造了在一个地区共同打垮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两个师的光辉战例。

中朝两军的战斗团结、深厚的友谊是说不完的。在东海岸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守卫着一座高地。它的位置特别突出，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自从接受任务以来，这两支英雄部队就一直并肩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进攻。这座高地前面侵略者已丢下千余具尸体。

这两支部队的指挥所只相隔100多米。人民军指挥所的掩蔽部是一个半坑道式的工事，负责这里指挥的是人民军的朴副营长。他是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才从中国东北回到朝鲜的。他曾在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谈到中朝两国的战斗友谊，他首先谈起了1950年秋天的艰难日子，又谈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情。“我记得在一个风雪的晚上，我们跟志愿军同志会师了，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想说好多话，但嗓子哽咽了，好半天才说出了一句话：‘同志们，你们可来啦！’我很希望在这些同志中间能找到一个老战友。没有我熟悉的老战友，但是不论看到谁的面孔，都使我感到亲切。熟悉，就像我都认识似的。以后，我们就和志愿军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并肩前进了。”

朴副营长又向前来访问的记者谈了一件感人的事情。他说：“敌人的残酷破坏给朝鲜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荒。今年春天，这里的老百姓非常缺粮。这件事被志愿军郭连长及战士们知道了。于是，不到一天的功夫，他们就捐了100多件衣服和许多棉鞋，并且还拿出600斤粮食，送给村民。志愿军同志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使我们的战士都感动得流泪了。”

“咱们都是亲兄弟！朝鲜人民对我们像亲人一样地照顾，人民军同志们也像亲兄弟一样地热爱我们，这也教育了我们的每一个战士。”坐在旁边的志愿军的郭连长打断了朴副营长的话，然后向前来访问的记者说，“特别是在战斗中，人民军同志们对我们的支援，是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的，今年1月间，敌人从521·1高地下来了一个多营的兵力，向我们连一班前沿攻击。朴副营长问我：‘需要炮火支援吗？’我说：‘正需要哇！’他说：‘听着吧，说话就到，’不一会儿，人民军的轻重炮火就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轰击，我们的大炮也发射了。结果杀伤了200多名敌人。”

“同志们知道，我们的胜利与人民军的支援是分不开的，纷纷要求给人民军同志们请功。”郭连长接着说，“每一次战斗，都是在两支部队积极合作下取得胜利的。可是哪一方都要把这胜利的荣誉给对方。”

正当朴副营长和郭连长向记者畅谈中朝军队友谊的时候，忽然从外面传来飞机声，接着就是一阵轰炸声和扫射声，震得掩蔽部刷刷地落下上来。通信员进来报告说，三架敌机正轰炸志愿军三连的阵地。朴副营长愤怒地说：“告诉同志们，三连阵地也就是我们的阵地，集中人力，狠狠地打！”于是，

从人民军阵地的掩体里和交通壕里，立刻发射出猛烈的人力，两架敌机随着猛烈的枪声中弹起火了。

傍晚，是前沿比较平静的时候，枪炮声停了，只有探照灯光从敌人的阵地上射过来。在这战争的空隙里，中朝部队开了一个联欢晚会。双方虽然语言不通，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感情的交流。战士们都热爱自己的领袖，他们用中朝两国语言合唱了《东方红》和《金日成将军之歌》。他们歌唱自己的亲爱祖国，歌唱那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英雄们。团结、友爱的欢快气氛充满了整个会场。

朝鲜人民军战士在高声歌唱：

你们越过东北的山岳，你们跨过了鸭绿江，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来了，为了消灭那美国侵略者——我们共同的敌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们也应和着：

中国，志愿军，朝鲜人民军，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武装，
我们都是保卫和平的兵。
我们一个意志，我们一条心，
携手并肩，并肩携手，
勇猛向前进！……

唱不完的战斗团结，唱不完的深厚友谊。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实例比比皆是。1951年10月8日，中国志愿军第六十八军的一个团，正要接收朝鲜人民军五军团文登公路两侧的阵地时，敌人发起了进攻。当时阵地上没有坚固的工事，人民军虽英勇抗击，但由于敌人兵力占优势，火力很猛，人民军伤亡较大，原确定的固守要点，大部被敌攻占，五军团的一个团已被敌人迂回切断。中国志愿军部队马上主动提前投入战斗，不借一切代价，同敌人进行了肉搏战，致使一个班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硬是把敌人打垮，掩护朝鲜人民军安全转移。后来，这两支部队虽然离得很远，仍经常互通音信，互相关怀，真是用鲜血凝成了兄弟般的战斗友谊。

朝鲜人民热爱自己的军队，也热爱赴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把志愿军视为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亲人，为志愿军，他们舍得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伟大的朝鲜母亲安玉姬，为了援救一个陷入敌手的志愿军侦察员而壮烈牺牲。她的英雄事迹，当时在朝鲜北部，在志愿军全军广泛地流传着。

安玉姬是平壤人，战前在纺织厂做工。战争爆发后，她丈夫响应祖国的召唤参加了人民军。敌人侵占平壤前几天，她带着7岁的儿子金永洙向北撤。那时，她怀着孕，连日的奔波，使她筋疲力尽，头晕眼花，但她仍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北走。

1950年10月26日，当她走在一条山沟里突然山头上的志愿军战士向她招呼，下山将她母子俩接了上去，亲切地问长问短。她望着这些陌生而热情的战士，激动地说：“你们来啦！我们就得救了！”枯涩的眼睛里闪耀着希望的光芒。战士们在团部附近的一个小山沟里找到了一间隐蔽的房子把她们安置下来。第二天她便生产了。母亲在产后身体尚健康，婴儿没多久却去世了。驻在附近的同志们也都在战斗间隙轮流去看护这位母亲，在初冬的日子里又给她母子俩送去了棉衣。热情的照顾，使得这位母亲不止一次地流下热

泪。

后来，当她听说经常来照料她母子生活的侦察员李治黄执行任务没有回来后，她再也坐不住了。她请求志愿军同志，让她去探听李治黄的消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便设法把他救出来，但大家都婉言拒绝了。

她决心去找志愿军团长，一次，两次，团长没有应允。第三次，她下了最大的决心又来到了团长跟前请求：“我为了自己胸祖国，去了解敌人情况，去救为了支援我们祖国而被敌人俘去的志愿军同志。你既爱我们朝鲜，也请你允许我为了自己的祖国去做一点工作吧！”

团长没有立刻答复。他在考虑：刚从敌人占领的地区逃出来的母子俩，难道又让他们回到魔爪控制的地方吗？还是阻止她，可是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权力，为什么要阻止一个爱国女子的爱国行动呢？他终于点了头，应允了：“那么我们需要我们什么帮助呢？”她刚强而迅速地回答：“给我一颗手榴弹。”这样，她便带着孩子和手榴弹离开了志愿军防区，向敌人占领区走去。

安玉姬从敌人占领的村庄里探听到，志愿军侦察员李治黄没有死，被关在一间房子里。黄昏时，她开始行动了。她把手榴弹藏好，叫孩子拿着镰刀，对孩子说：“到了那里，趁我和敌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到哨兵守卫的屋子旁，从门缝中把镰刀递给志愿军叔叔。他出来后，你和叔叔从后边山坡上转出去，不要等我，只要向我这边丢一块石子，告诉我一下就行了。”

这时倚在她身旁的7岁儿子忽然向母亲发问了：“妈妈我们走后，你一个人怎样出来呀？”她安慰孩子说：“这一次，你妈妈也许再也看不到你了。你听到手榴弹响，你不要再盼望妈妈回来，你不要哭，也不要伤心，你要记住妈妈是怎样死的，是谁破坏了我们幸福的家庭，是谁迫使我们离开了平壤，你要牢牢记住这仇恨，长大了要为妈妈报仇。现在好了，志愿军来了，我死后，志愿军叔叔是不会抛弃你的；金日成首相是会把你扶养成人的。”说完她吻了吻孩子的脸，母子二人就分别去执行任务了。

在志愿军战士李治黄被囚禁的地方，7岁的金永洙躲过哨兵的监视，偷偷地从门缝里伸进了镰刀，割断了捆绑李治黄的绳子。李治黄又接过镰刀劈开了门，与金永洙从后门逃走了。这时候金永洙听见他母亲与敌人死拼的声音，他赶紧向母亲那儿扔了块石头，告诉她，他们已经安然脱险了，就在这块小石头落地后不久，便传来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朝鲜女英雄安玉姬，同与她纠缠的五个敌人同归于尽了。

被援救的李治黄向团长报告了事情经过，大家都对这位英雄的母亲怀着无限的敬意。云山战斗胜利结束之后，战士们便把她和志愿军烈士埋在同一块土地上，以此来表示对这位英雄母亲的崇敬，来表示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志愿军某部一位营长负了重伤，倒在一个山沟里，被一位朝鲜女救护队员抬到敌后的一个山洞里藏了58天。就靠这位女救护员天天给他敷药和送饭，养好了伤口。伤好后，又是靠一位游击队员带路，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终于回到志愿军部队。而这位郭营长的未婚妻，当时在志愿军某野战医院任护士长，经常在敌机的轰炸下抢救伤员。一次她为了抢救朝鲜伤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金城反击战中，一队由朝鲜同志组成的护送志愿军伤员的担架队在路上急行，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一位朝鲜女同志，见隐蔽已来不及，就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担架上的志愿军伤员，一动也不动，只见她的浅绿色裙

子上渗出鲜红的血。她，宁可牺牲自己，来换取志愿军同志的生命。这位女英雄名叫金桂花，年仅 19 岁，是人民军女战士。

朝鲜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朝鲜战场上，可以说整个朝鲜都在和侵略者作战。从六七十岁的老人，到刚刚懂事的孩子，从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到无家可归的后方群众，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即赶走侵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一切为了前线。

在朝鲜，特别在北部农村，男人们大部分到前方打仗去了，繁重的田间劳动，大多由妇女担当起来。在咸镜南道、江源道和安南道的农民，为了预防敌机袭扰，在地头上一共挖了 28 万多个避弹坑。敌机来轰炸了，她们就躲进避弹坑，飞机走了，照常劳作。咸镜北道镜成郡永康里的农民，还排除了敌机投在大田里的 390 颗定时炸弹，按时完成了播种任务。江源道通川郡的农民还组织了武装插秧队，先后与企图登陆的小股美国海盗激战 3 次，打死打伤和俘敌 137 名，保证了春播任务的完成。

朝鲜的工人们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男工们上前线了，他们的妻子、姐妹，甚至母亲就顶上去。金春熙的丈夫上前线去了，她就到矿山接过丈夫的风钻。掌握风钻是一项既要技术又需力气的活儿，对一个年轻的妇女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她没有退却，经过勤学苦练，她熟练地掌握了这一技术，并创造了一天采集的矿石量比男风钻手还多 25% 的新纪录。

朝鲜的爱国者还在敌人后方建立了游击队，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袭击敌人的指挥所，伏击敌人的军用列车和汽车运输队。朝鲜女英雄赵玉姬领导的游击队就是这样的游击队。战争爆发前，赵玉姬担任碧城郡妇女同盟委员长，敌人侵占碧城郡后，赵玉姬根据党的指示，组织游击队，活动在银波山一带。他们神出鬼没，屡建战功，使敌人闻风丧胆。在一次战斗中，她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她和苏联的丹娘、中国的赵一曼一样，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最后在高呼“祖国万岁”声中壮烈牺牲。

战争的破坏，给朝鲜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宁可自己吃野菜、喝稀粥，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到前线。在飞虎山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三三五团，激战三昼夜，在极端饥渴的时候，黑铝矿一位老矿工田高燮亲自组织了 10 多名工人，蒸了 300 多斤大米饭，不避艰险把饭送到山上。仁兴里、三峰里的朝鲜人民自动组织了 30 多人的送饭队，冒着敌人激烈的炮火把热饭送到飞虎山阵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到战士们没有菜吃，跑下山去把自己仅有的一碗芝麻酱送到阵地，志愿军战士被感动得落了泪，金老太太却拍着战士的肩膀说：“孩子，用不着感谢，我活了 60 多岁了，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好军队，也没有见过像美国和李承晚那样野蛮的军队。他们伤天害理，杀人放火，他们不是人，是牲畜，是瘟疫，我只希望你们全部消灭这群坏东西！”

在清川江北岸，志愿军某部三班奉命守住一个山头，3 天 3 夜打退了敌人 14 次冲锋。由于敌机成群结队换着班地轰炸后方运输线，给养得不到及时供应，战士们已经 3 天 3 夜没有吃一顿饱饭。

他们蹲在工事里，迎接敌人第 15 次冲锋。这时有 4 架敌机贴着山尖飞来，进行狂轰滥炸，机枪、炸弹响成一片，浓烟滚滚。班长张金生看见一群朝鲜老乡在密集的枪弹下拼命跑来。跑在最前面是一位鬓发苍苍的老大娘，她头上顶着一个 30 斤重的白布袋，里面装的是萝卜、地瓜。这是几天前美机炸毁了她的房子，她在火堆里抢出来的唯一一口的食品。她宁愿自己不吃，也要

把它送给前方的战士。迎面一架飞机俯冲下来，老大娘急忙把头上的干粮袋取下来，紧紧抱在怀里伏在地上。她心想：自己生命可以牺牲，送来的粮食不能让飞机毁掉。轰！轰！炸弹在她身旁开花，老大娘负伤了。战士们把她抬到工事里，给她包扎伤口。她睁开眼睛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战士，用那颤抖的手摸着自己的干粮袋，非常抱歉似的说：“亲人们，对不起你们，没好的，吃几块萝卜、地瓜吧。”战士们感动得落下泪来。班长张金生知道，朝鲜人民非常热爱志愿军，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粮食送给志愿军，可我们的战士怎能忍心吃这些东西呢？张金生从衣服兜里掏出200元朝鲜币，想顺手塞在大娘手里。老大娘狠狠地打开了他的手，并生气他说：“干什么？我这些东西是钱能买到的吗？我是上前线来做生意的吗？难道你们帮助我们打仗，是我们拿钱雇来的吗？同志，咱们两国人民的友情，不是用钱能买到的呀！”老大娘说着，眼泪也流下来。班长张金生激动地站起来说：“同志们，都看见了吧，我们虽然离开了祖国，可是到处都有我们的亲人，他们不顾生死地来给我们送粮送物，我们该怎么办？”战士们异口同声像宣誓一样庄严回答：“坚决消灭美国侵略军，为朝鲜人民报仇！”

无数生动的事实，集中表现了中朝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崇高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品质，全体指战员深切理解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正义性，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中，涌现出无数的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而勇于牺牲的志愿军英雄。如跳入冰窟中救出朝鲜儿童而自己光荣牺牲的罗盛教；为了战争的全局胜利而抱着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为了恢复上甘岭一号阵地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口的黄继光；为遵守潜伏纪律及保证战斗胜利宁肯让烈火烧死自己的邱少云；从烈火中抢救出朝鲜八名妇女、自己被烧死的吕玉久、张明禄等等，他们都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好儿女。

中国人民志愿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教导，不仅与敌人英勇拼搏，而且在战火中积极抢救朝鲜老百姓，被誉为“仁义之师”、“世界上最文明的军队”。1953年1月31日晚上，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8架美国飞机向平壤附近的一个和平村庄——蒋金里投下了200多颗燃烧弹和杀伤弹。村庄立刻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越烧越猛。这时住在蒋金里附近村庄里的志愿军某部卫生员梁振和，一个21岁的小伙子，背着急救药箱，冒着敌机的轰炸，跑来抢救。一到村边就听到一间茅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屋子全部烧着了，窗户里吐出长长的火舌，屋梁烧得发出将要断裂的响声，眼看房子就要塌下来。孩子凄惨的哭声，使这位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忘掉了自身的危险。他顺着哭声，冒着浓烟烈火，终于摸到了这个朝鲜孩子。孩子身边的棉被已经烧去了大半截，火苗正向孩子扑来。梁振和一把将孩子抱起，刚奔到屋外，屋子就哗啦一声坍塌下来。梁振和把孩子交给别人，又冲进另一家大火燃烧着的房子，救出了母亲、小女孩和男婴。母亲胸部被打穿了，因为伤势过重，时间不久就停止了呼吸。小女孩右腿已被炸断，趴在母亲尸体上大声哭喊。梁振和将女孩和男婴送到志愿军的医疗队，并在里委会的帮助下找到孩子们的父亲——张官斗。这个善良的庄稼人，在被美国飞机炸得家破人亡以后的极度悲痛中，看见被志愿军战士救活的孩子，十分感动，他拉着梁振和的手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中国志愿军同志的大恩大德！”

这一天志愿军战士梁振和还给这个婴孩写了一封信，交给他的父亲保存起来，等孩子长大了再看。信里这样写着：

最亲爱的朝鲜小弟弟：

在 1953 年 1 月 31 日晚上，美国空中强盗轰炸朝鲜平壤蒋金里的和平居民。当时，你的姐姐被炸断了一条腿，你的母亲被炸死了，你还睡在母亲的怀里呢。我看见了，觉得你的母亲就和我的母亲一样，你就像我的亲弟弟。我把你抱起来，并且把你送给了你的父亲。将来你长大了，你要记得：美国鬼子是怎样杀死你的母亲，怎样杀害朝鲜人民的！你要为他们报仇，为你的祖国好好服务：

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员梁振和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

金日成元帅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朝鲜人民从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光荣的人民中国新儿女，看到了把朝鲜人民的艰难困苦当成自己的艰难困苦，并为克服这种艰难困苦而努力奋斗的崇高而纯洁的新型人物的真面貌。”“这种高贵的道德品质，不能不为中朝两国人民和所有尊重人类尊严的人们引为骄傲！”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战争。通过朝鲜战争，中朝人民深切认识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认识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国际主义大团结的意义。诚如朝鲜原副首相洪命熹在他的《志愿军赞》诗中所写的：

百万貔貅渡鸭江，东征声势震西邦。

贼虽荷杖呼“侵略”，正义堂堂世绝双。

然而，就在抗美援朝期间，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年轻的中国空军迅速成长起来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章 年轻的雄鹰

年轻雄鹰建奇功，驰跨蓝天敌机惊；
奋勇冲杀无所惧，勤学苦练攀高峰。

继张积慧击落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之后，青年战士韩德彩又一举击落美国“双料王牌”哈罗德·爱德华·费希尔。

1953年4月7日一战，实属偶然。这天下午，中国志空第十五师第四十三团的12架米格—15比斯飞机参加空战后返航。张牛科、韩德彩双机在空中掩护战友们着陆。掩护任务结束后，韩德彩飞机的油量警告灯发亮，这表示剩油不多了。他准备立即着陆，飞机下滑到高度1000米时，忽然听到地面指挥员命令：“快拉起来，有敌机！”

韩德彩闻命立即拉起飞机，发现左前方两架敌机正在跟踪一架返航的志愿军飞机。接着其中一架敌机忽然放弃跟踪，调转机头，直奔张牛科的飞机。韩德彩急忙呼叫长机拉起，敌机已经开炮，张牛科飞机中弹，尾部冒出白烟。韩德彩不顾油料将尽，加大油门，冲向敌机，到300米处开炮，一下子把那架F—86击落。敌机在坠地前，飞行员跳伞。守卫在机场附近的民兵早已布下罗网，敌人落地，立即被俘。

这个俘虏就是美国空军第五十一联队上尉小队队长哈罗德·爱德华·费希尔。他从15岁学飞行，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朝鲜战争中战斗出动175次，因有击落10架飞机的战绩而称为“双料王牌”飞行员。

这位“双料王牌”在接受讯问时，一再请求想见识一下击落他的对手。部队首长满足了他的请求，当他见到韩德彩这位志愿军空军中最年轻的飞行员时，不相信这就是击落他这个“空中英雄”的对手，还认为是“开玩笑”。部队首长告诉他，韩德彩只有20岁，参军后才学的文化，飞行时间不到100个小时。费希尔惊得目瞪口呆，低下头去说不出话来。韩德彩在击落费希尔之前已经有击落美机四架的战绩。如果志愿军空军也有击落五架称为王牌飞行员的话，这次他也够上称为“王牌”了。

当时朝鲜战场的情况和两年前大不一样了。志愿军刚到朝鲜时，整夜在燃烧着的土地上行军，在大火中穿行。那时，白天和太阳被美国空中强盗独霸了。什么佩刀式、雷电式、野马式、海盗式、女妖式……美国的各种空中飞机在朝鲜上空横行霸道。它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想怎么炸就怎么炸。他们可以把每一个欢乐的村庄炸成废墟，可以把美丽的山林烧成灰烬，可以把公路、桥梁炸断，可以向地面每一个和平居民扫射。

由于美国空中操纵着制空权，所以太阳一出，白天一到，千军万马都得隐蔽，被迫“休息”，而行军、打仗就只能在黑夜。志愿军战士们开玩笑说：“白天进深山，钻古洞，修身养性；夜晚出击，东奔西走；活如神仙。”

面对美国空中的暴行，彭德怀司令员深有感慨地说：“美国空军太猖狂了。如果我们空军能够像陆军一样牵制住敌人的活动，那就可以更快地战胜敌人。”彭德怀对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寄予殷切的希望。后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很快地组建了人民志愿军空军，并于1950年12月开始入朝作战。

这支年轻的空军，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他们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由开始只有一支小型的航空兵部队，发展到后来有十个歼击师和两个轰炸师的一支强大的部队。他们不畏强敌，不怕艰险，英勇奋战，给具有强大

优势的美国空军以有力的打击，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保卫重要目标和直接与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中国志愿军空军参战初期，围难重重。他们所面对的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号称世界第一流的美国空军；敌空军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技术上也占优势。拿歼击机飞行员来说，敌人是飞行了一两千个小时的老飞行员，训练有素，技术熟练，有实战经验。所以，当年轻的中国志愿军空军出现在朝鲜上空的时候，敌人狂妄地说：“共军的空军，是没有毕业的土包子，根本不懂得空战，不堪一击！”

当“联合国军”的陆军，在地面上被中朝军队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他们就叫嚣着：“要在空中扩大战争，要把空中的战争推到鸭绿江上空，推到满洲上空！”他们几乎每天都出动数百架各种飞机，对北朝鲜的和平村镇、交通干线、军事目标，进行分区、分段的重点轰炸。他们最新式的F—86型“佩刀式”战斗机，成百架次地大编队向我方飞来，他们气势汹汹，骄横无比地要寻找志愿军作战。他们甚至狂妄到这种程度：封锁志愿军的机场；俯冲志愿军的跑道；偷袭志愿军着陆的飞机，妄图把这支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志愿军飞行员虽然平均飞行小时不过100多个小时，一些基本的战斗科目都没有飞行过，更缺乏实战经验。但是，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他们对祖国无限忠诚，对兄弟的朝鲜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他们决不准美国空军在自己头上撒野和逞凶，他们提出“来者不拒，碰到就打，一定要消灭它”的英雄誓言。

战幕揭开了。

1951年1月21日清晨，中国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侵略军进行了第一次空战。当时，美国F—84型战斗轰炸机20架，沿平壤、新义州至宜川上空，对北朝鲜铁路线进行破坏性轰炸。志空第二十队奉命出击，大队长李汉率6架飞机升空作战，目标是正在轰炸清川江大桥的20架美国的F—84喷气式战斗轰炸机。他们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迅速找到目标。李汉见敌机正在肆虐，大桥周围浓烟滚滚，不禁怒火中烧，大喝一声：“跟我来！”就带头向敌机冲去。敌机面对这意外的袭击甚感惊恐，队形迅速四散，但旋即恢复战斗，将李汉等驾驶的六架飞机团团围住。在敌众我寡、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李汉咬住其中两架敌机，一阵炮击，击中一架，其余敌机望风丧胆，仓皇逃窜。

中国志愿军年轻的飞行员，不畏强暴，以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敢于战斗，首战告捷，从而增强了对空战的信心。八天以后，即1月29日下午，雷达发现一批美机在定州、安州一带活动。李汉率两个中队迎敌，在定州西面发现敌F—84飞机16架分上下两层，高度分别为6000米和5000米。这时李汉大队的机群在地面引导下，居高临下，占据高度优势，决心待敌机到达右下方的时候，打它个措手不及。

当美机刚刚接近海岸线，李汉突然发出了攻击命令：“投弃副油箱，二中队掩护，一中队攻击！”他率领一中队右转120度，一推机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上层的八架敌机猛压过去。遭到李汉他们袭击的美国空中飞机，顿时慌了手脚，急忙甩掉副油箱，被迫迎战。位于上层的四架美机迅速掉转机头，妄图利用敌机之间的高度差，从我机腹下冲过去，然后上据有利高度，迫使我机群转到不利的位置。

“决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李汉看到这种情况，毫不畏惧地向敌机冲过去，堵住了敌机前进的道路。敌人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招，一下子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境地。对头攻击是意志的考验。在相距 1000 多米，也就是再过两秒钟就要双机相撞时，敌人胆怯了；为首的敌机向右侧规避，这就给李汉一个尾后攻击的机会，把敌机套进了瞄准具光环。这时，其余敌机转到李汉后方，企图偷袭；但一中队的另外三架飞机上前迎战，迅速将敌机驱走。李汉在战友的掩护下，跟踪瞄准到 400 米的距离，三炮齐发，一下射出 40 多发炮弹。敌机顿时冒着浓烟，掉进大海。我志愿军空军首创击落敌机的记录。

这时副大队长李宪刚率领的二中队也把其余的八架敌机打跑。李汉率部将敌机逐至海上，又将一架 F—84 击伤。这一天取得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自己无一伤亡的战果，而且空中指挥和编队协同有明显进步。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军，也传到祖国各地，人心振奋，特别是大大地增强了志愿军空战歼敌的信心，戳穿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指挥部里，彭德怀司令员听了空军的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说：“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发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一定可以打出新的战绩来的。”接着，他要求志愿军空军部队，陆续开赴前线和美国空军进行英勇不懈的较量，在实战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1951 年 6 月，朝鲜战场经过五次战役，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方被迫与中朝方面开始停战谈判。为了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美国企图通过空中优势对我施加压力。侵朝美军的作战飞机增加到 1400 多架，拟定了“绞杀战”计划。志愿军空军从 9 月份起，以师为单位轮番进入一线机场参战，并承担了反敌空中封锁的任务。

从 9 月份开始，在朝鲜上空发生了大规模空战，敌我双方都采用数十架飞机的大编队和 100 多架飞机的大机群作战。其中以 9 月 25、26、27 日三天的空战最为激烈。9 月 25 日，志愿军空四师和友军一起出动飞机 100 余架，同前来袭击清川江桥的 100 余架美机激战。第十二团大队长李永泰遭 10 多架 F—86 飞机围攻，军械系统被破坏，只能用猛烈的机动动作在敌阵中左冲右突，多次向威胁最大的敌机猛冲，终于突围。这次他的飞机中弹 30 余发，受伤 56 处，但仍安全返航。在以后的战斗中，他先后击落了 4 架 F—86 飞机。

年轻的飞行员刘涌泉为掩护长机，单机与敌 6 架 F—86 飞机激战，击落其中 1 架，首开打下美国最新式的“佩刀式”飞机的记录，自己壮烈牺牲。9 月 26 日和 27 日都有大规模空战。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称：“这三天的战斗是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喷气式飞机的战役。”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在 9 月 26 日起的五天内击落美机 26 架，击伤 8 架。10 月 2 日，毛泽东主席在作战报告上批示赞扬道：“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进入 10 月中旬，志愿军空四师回二线休整，空三师开赴前线接替。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三师在 5 次小规模空战中击落美机 8 架。大队长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各 2 架，副大队长赵宝桐击落美机 2 架。

11 月 16 日起，开始与美空军大机群作战。两天之后，又一场振奋人心的空战打响了。

那是 11 月 18 日的下午，美国侵朝空军 184 架飞机，活动于大同江及永柔地区上空，其中数批窜入安州、清川江一带轰炸扫射。志愿军空军奉命出

击，王海大队六架战鹰向指定的地区飞去。到清川江上空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左前方低空有黑压压一大片敌机，有的已向清川江大桥投下炸弹。王海发出了口令：“跟我攻击！”王海一推机头，率领6架战鹰从万米高空猛冲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冲来。美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把炸弹胡乱地扔到沙滩上，急忙抢占位置。这时，王海又果断的命令：“爬高占位！”顷刻之间，志愿军飞机迅速占据了有利位置，居高临下。王海在500米左右的距离开炮，打得两架F—84翻滚跌落下来。他的僚机焦景文也大显身手，在600米以内，打得两架F—84型敌机黑烟滚滚，双双坠落下去。

王海和焦景文，保持双机协同作战，紧密配合；战功赫赫。但是有一次，空战结束了，在朝鲜前线的野战机场上，出击的雄鹰一架架地归来了。平常，紧跟着王海着陆的总是他的僚机焦景文，可是这次却没有看到焦景文的飞机。大家不安地等待着，王海的神情显得特别焦急。他怎么能不焦急？他自己一共打落打伤9架敌机，他指挥的部队一共打落打伤20多架，哪一次的战绩能和焦景文的名字分得开呢？每当有人向王海称赞他这支空军大队的战绩时，他老爱用这一句话来回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有一架出色的僚机。”

正在大家万分焦虑的当儿，随着一阵马达的轰鸣，一架飞机缓缓地吃力地降落到跑道上。焦虑一下变成了惊喜，大家拥上去迎接焦景文。这时，大家发现这架飞机上有20几个打穿的窟窿，才明白这位英勇的僚机飞行员迟归来的原因。

这是1952年12月3日的事情。这一天，王海率领的一队飞机，在朝鲜某地上空和F—86敌机群遭遇了。敌机的数量几乎是他们的四倍。焦景文想：“一定要好好掩护长机，使他能够从容地指挥部队。”敌人几次想偷袭王海，都被焦景文打跑了。这时四架敌机突然从他们后面跟了上来，焦景文立即报告王海叫他脱离，同时准备急转过来驱逐敌人，但是后面的敌机已经开火了。这时候，焦景文只要猛一上升就可以避开敌人的射击，可是这样长机就要遭受敌人的袭击。焦景文马上用一个机灵的动作，闪开了敌人的射击，同时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长机就迅速地脱离了敌机的射程。

敌人还不死心，其中有两架飞速地冲到焦景文前面，企图向王海攻击。焦景文的飞机已经负伤，而且后面的两架敌机还在继续向他开火。他并没有忘记僚机主要的职责是掩护长机的安全。焦景文心似火燃，他把操纵已经不灵活的飞机猛地一带，照准前面那两架敌机狠狠地开了一阵炮，吓得敌机一溜烟地钻了下去。就在焦景文向敌机射击的同时，后面的敌机又好几次击中了他的飞机。但他关心的只是长机的安全，他向王海报告：“我的飞机负伤了，现在正和两架敌机纠缠，你要注意后面！”

两架敌机仍然紧紧地盯着焦景文，他不断做着灵巧的动作，使敌人不易瞄准。当他的飞机再一次负伤时，他依然很沉着，他想：“已经完成了掩护长机的任务，我还要把飞机安全地驾回去。”敌人继续向他射击，曳光弹在他的飞机四周闪耀，但他终于摆脱了敌机，安全地飞了回来。在这次空战中，焦景文忠实地执行了僚机的职责，掩护长机连续向敌人进行了5次攻击，把敌人从12000公尺的高空打到1500公尺的低空；使王海能够从容地指挥部队，只15分钟就打垮了敌人，并且击落敌机3架，击伤3架。

这是焦景文参加的多次激烈空战中的一次，这位英勇的僚机飞行员，不仅已经打落打伤了四架敌机，更重要的是他出色地完成了掩护长机的任务。

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特授给他“二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的光荣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发给他“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王海大队是一支敢打敢拼的英雄部队，在这个大队里涌现了许多英雄，其中孙生禄就是受人崇敬、怀念的一位。入朝作战仅仅一年零两个月，他率领的飞行中队就取得了击落击伤侵朝美军飞机 12 架的辉煌战果，其中仅他一人就击落敌机 6 架，击伤 1 架，成为志愿军空军有名的“空中突击手”。他的赫赫战功，充分表现了革命军人临危不惧的气概，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舍己救人的高尚品格。

1952 年 11 月 15 日，孙生禄驾机率领僚机马连玉飞临大同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他们警惕地盘旋搜索。时值深秋，碧空如洗，江水如带，正当他们即将结束巡逻准备返航时，突然发现斜前方出现两架 F—86 型敌机。孙生禄心一震。这种机型，美军炫耀它性能良好，最近专门增派一支飞行大队到朝鲜战场。这支大队骄横狂妄，似乎不可一世。孙生禄对这帮强盗早已恨之入骨。这一回在空中相遇，正是好机会，定要狠狠教训教训他们。

孙生禄发现敌机还没有丢掉副油箱，便推断敌人还未发现自己，当即决定乘机对敌发起突然袭击。他调转机首，率领僚机敏捷地绕到敌机背后，紧紧盯住敌机后尾。正当他准备实施攻击时，耳机里传来马连玉的紧急报告：“注意，后面又跟上两架敌机！”其实，孙生禄对此已有所料，当他发现前面两架敌机时，就估摸到这是一个机群，但他不愿放弃这一战机，他扫视一下后面，两架敌机开始扔下副油箱。他判断敌机飞行高度低于自己，而且距僚机马连玉还有一段距离，一下子追不上来，便决定继续对眼前之敌机实施攻击，然后回头再消除后面威胁。孙生禄推动油门，加大速度，敌机的身影迅投进了瞄准仪的光圈。他迅速按动炮钮，在一串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敌机立即卷起一团浓烟栽了下去。另一架敌机见势不妙，投下副油箱，趁势下滑，仓皇逃走。

12 月 2 日，又一次激烈的空战打响了。这一天，大队长王海指挥着 12 架战鹰向 40 多架 F—86 敌机猛扑过去。正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突然从云缝里又窜出来四架飞机，疯狂地向王海逼近。正在前面和一群敌机周旋的王海无暇后顾，紧跟在后面的孙生禄奋不顾身地对着这四架敌机冲了上去。

美国飞行员色厉内在，他们一见孙生禄这个架势，吓得一个个赶快拉起机头，慌忙避开。孙生禄咬住一架敌机开炮，可是，另外两架敌机也狡猾地紧跟着追上来了。孙生禄刚要准备左转弯摆脱这两架敌机时，忽然看见左前方另有四架飞机抄着近路，气势汹汹地向我机群尾后冲来。形势紧迫，是自己甩开敌人脱离险境呢，还是冲上去援助战友？孙生禄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急蹬右舵，切个半径，拦住了敌机的去路，使我机群当即脱离了险境。

敌人是不会甘拜下风，又有 10 架敌机疯狂地向孙生禄扑来。在此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孙生禄毫不畏惧，冒着弹雨，上下翻滚，同这 10 架敌机英勇搏斗。敌人的炮火愈来愈密集猛烈，他的飞机负了重伤，操纵已非常困难。僚机马连玉大声疾呼：“54 号，快跳伞！”孙生禄虽然听到战友的呼唤，但他仍顽强地坚持着。他多坚持一分钟，战友就多一分安全，胜利就多一分把握。只见他继续驾驶着一抖一抖的飞机，颠颠簸簸地跟敌人纠缠着。终于，他驾驶的飞机起火了！好一个英勇无畏的孙生禄，他将机头一拉，驾着熊熊燃烧的战鹰直向敌机撞去，与敌人同归于尽。

就这样在孙生禄和马连玉的掩护下，志愿军雄鹰凯旋，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 6 架的光辉战绩。可是，抗美援朝的伟大战士、年轻的“空中突击手”孙生禄同志，却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蜿蜒秀丽的清川江上，为战友们的安全，为整个战斗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朝人民联合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嘉奖令，称赞孙生禄立下不朽的功勋；彭德怀司令员签署命令，授予他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王海大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战斗集体。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共空战 80 余次，击落击伤美机 29 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英勇的王海大队”名扬海内外。

195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向 8103 部队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中朝人民空军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不那么大吹大擂它的“空中优势”了，而中国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却是愈战愈强，愈战愈勇。

1952 年 2 月 10 日上午，美机数批先后侵入平壤、沙里院和价川地区，其中有两批 F—84、F—80 战斗轰炸机共 16 架，在 18 架 F—86 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军隅里附近的铁路交通线。志愿军空军第四师起飞 34 架米格—15 迎击，一场激烈的空战随即展开了。

志空第十二团第三大队长张积慧和僚机单志玉发现远方海面有敌机，当即报告空中指挥员，并投弃副油箱爬高，准备迎敌。在爬高中丢失目标，又脱离编队。这时在右后方云层间隙中有 8 架敌机直窜下来，为首两架已到他们双机的尾后，张积慧猛烈右转上升，使美机扑空冲了过去，张积慧趁机占据美长机的尾后，敌机见势不妙，急忙摆脱，先作急俯冲，又垂直上升，然后又转入俯冲，张积慧紧追不舍，步步近逼，终于在 600 米距离上三炮齐发，将美机击中，坠地烧毁。一分钟后，他又攻击第二架美机。这架飞机也使出浑身解数，力求摆脱，但仍被张积慧击中。空战结束后，志愿军空军从美机残骸中找到乔治·戴维斯的证章。接着美国报纸也证实了被击落的正是美国空军推崇为“空中英雄”的戴维斯少校。

乔治·戴维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 266 次战斗飞行，飞行总时间超过 3000 个小时，号称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王牌”飞行员。如今被中国飞行员击落，引起美国朝野一片喧嚣。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发表特别声明，承认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美国军方和新闻界，当时急于了解，击落戴维斯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击落戴维斯的中国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和其他年轻的中国飞行员有类似的经历。他生于山东半岛最东面海边上一个贫农家庭。

1944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又参加了宁国共产党。1950 年，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激起了他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心中燃起了为中朝人民复仇的怒火。

谈到他的思想感受，张积慧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祖国人民热烈地支援我们。他们捐献了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就是几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也节省了糖果钱，捐献了‘儿童号’飞机给我们使用。这一切更加鼓舞了我的战斗意志。为了答谢祖国人民对我们这种无比的关怀和支援，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如何对敌斗争中了。我们全体同志，为了争取空战胜利，在零下 30 度的严寒天气里仍坚持训练。有的驾驶员和机务人员的手，一摸到飞机就被沾住了，有的冻烂了。可是他们还是坚持工作，想办法

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地保证每一次飞行任务。”

张积慧是多么希望打下美国飞机啊！可是，在没有实战经验以前，他还不能认识到它的复杂性。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参加第一次空战的情况。那天，敌人的阵势是 16 架 F—86 佩刀式驱逐机，掩护着六架 B—29 轰炸机。张积慧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接近敌机，向敌机进行了暴风雨般的射击。无数条火舌喷吐出去，但却没有击中一架敌机。这次战斗使他非常遗憾，这遗憾甚至使他数日不能安眠。这使他真正体会到部队首长讲的话：“勇敢加技术就是战术。”同时对苏联英雄波格雷士金所说的“只有勇敢，才会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他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这之后，没有多少日子，张积慧又接到迎击敌机的命令。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空战，敌人集中了数百架最好的佩刀式驱逐机。他和僚机刘春生奋勇迎敌。他两眼死盯着敌人，紧紧地尾追着敌人，精确地计算着“前置量”，瞄好了，就猛烈向敌人开火。敌机中弹了，打着了油箱，一股白烟冒了出来，但仍挣扎着逃窜。张积慧继续射击，敌机燃起熊熊大火，最后坠入大海。

正当他要返回基地时，突然从后面飞来了六架佩刀式敌机，成纵队向他袭来。他的飞机中弹了，而且后面有两架敌机紧追不舍。他明白，这时胜利与失败就在于动作的正确和机智，就在于坚强的意志和战胜敌人的信心。于是他沉着地操纵着飞机，瞅准一个机会，向敌射击。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发射了三四发，炮弹就光了，张积慧顿时紧张起来，没有炮弹，就等于失掉了武器。狡猾的敌人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发觉了张积慧的致命弱点，于是毫不放松地追着他，企图把他击落。

张积慧操纵着飞机垂直地上升和下降，做着不规则的动作，敌人始终没有击中他。他想：这时可不能松气，要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志愿军的英勇气概和顽强。就在这生死关头，张积慧决定和敌机相撞，这样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此时，他迅速将飞机转向敌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彼此以极快的速度接近了！狡猾的敌人并没有逃避，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谁先躲避，谁就必然被击落。结果，两架飞机越来越接近，甚至敌机座舱里的人影都看到了。这是决定胜负的一刹那，这是战术上的斗争，是意志上的较量。敌人终归是胆怯的，显然，他支持不住了，惊恐地倒转下去，避开了张积慧的撞机。但由于敌人过度紧张和惊恐，未注意高度，使飞机撞在山上起火爆炸了。这一次战斗，使他深刻体会到：在紧急情况下，只有特别的勇敢和机智，才能战胜敌人，取得胜利。

这就是当时美国人要急需了解的我们的空战英雄张积慧。在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里，有许多张积慧式的英雄，他们凭着对祖国、对和平事业的忠诚，英勇奋战，勤学苦练，不断提高作战技术和本领，为打破美国的空中优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两年零 8 个月的空战中，共击落敌机 330 架，击伤 95 架，在抗美援朝战史上，谱写了震惊世界的光辉诗篇！正是：

中国飞机一出现，骄横敌机傻了眼；

美国王牌被击落，空中优势破了产。

欲知在后勤战线上，中国志愿军各兵种及中国支前民工的战斗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章 一切为了前线

运输紧啊修路忙，一切为了打胜仗；
保证前方粮和弹，何惧敌机疯和狂！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所需军事物资和几十万大军的给养全部仰赖国内供给。因此，在敌人狂轰滥炸下，保证铁路、公路的畅通，把这些物资及时运到前线，就成了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铁道兵、工程兵、运输兵和来自国内的数以十万计的支前民工，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保证交通运输的斗争中，桥，在整个朝鲜战场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说起来它不过才百十公尺长，但是如果有半公尺断了就不能通车，就会影响前线战局。正是因为这样，美国空军才想出种种恶毒的方法破坏它。每一座桥的前后左右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炸弹坑，钢梁上有数不清的弹疤。什么大炸弹、小炸弹、子母雷、定时炸弹，美国侵略军把所有足以摧毁桥梁的玩艺儿都拿出来了。

那是在 1951 年 3 月上旬的一个夜晚，风卷着雪花像刀一样刺在人们脸上，积雪冻得人们两脚麻木。就在这天晚上，美军的飞机投下了一颗 1000 磅重的定时炸弹，正好落在的一座桥墩的旁边。这是一个凶恶的家伙！它一旦爆炸，这座桥就会被炸毁，而且不是一两天可以修好的。

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铁道兵的战士们急了。他们纷纷提出要求，要舍身去搬走定时炸弹。就在这个时候，22 岁的青年战士、共产党员王国璋跳进一公尺深、上面还浮着薄冰的深水里去探寻炸弹：王国璋一入水，浑身就冻成紫的了，但他的一颗心却是火热的。这颗火热的心燃烧着他，鼓舞着他，使他奋不顾身地去努力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王国璋既沉着又勇敢，在水里摸了许久，摸到了！他把绳子套在炸弹的环上，向岸上战友们喊：“拉呀！”岸上的人们把炸弹拉到岸边。这时，定时炸弹爆炸了，大桥安然无恙，列车顺利通过。当祖国的铁路职工慰问团访问王国璋时，问他：“你拉定时炸弹时，是否想到它一爆炸你就会牺牲呢？”王国璋回答说：“当时我只想到：只要定时炸弹一爆炸，桥就会被炸毁，我们就不能通车，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损失！”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在 3 月 20 日下午，美机又来轰炸大桥附近的一个车站。美机在站里投下了好几十个定时炸弹。敌机去后，天已经黑了，定时炸弹在车站附近不断地爆炸。土块、石子、枕木、弹片，在爆炸的浓烟里飞舞。但是，英雄的铁路员工们却毫不畏惧地冲进烟火滚滚的车站。因为，大家都知道，运输不能有一夜的停顿，甚至不能中止一小时。就在那天夜里，有一趟伤员列车要接进来，有两趟列车要开出去。铁路员工们冒着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的危险，开始了紧张的抢修工作。共产党员刘景洲发现站里九道线上有两颗重约二三十公斤的定时炸弹。刘景洲心里像火烧一样，他立刻向车站中共党的支部书记表示，要把这两颗定时炸弹抱走。他要求担负这个任务的坚决态度，使支部书记无法阻止他。这时已经有六七个工人从石碴里把定时炸弹用手抠出来了，刘景洲立刻把定时炸弹扛在肩上，迈开大步向站外跑去。十几分钟以后，站里的人们听见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大家正担心，刘景洲平安地跑回来了。就这样，他又把第二颗定时炸弹扛走，扔到站外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半个月，刘景洲却在抢救一列车军火时壮烈牺牲了。那天，天还没有亮，一辆机车推送一列弹药车过桥进山洞隐蔽，因为线路不好，列车中部有五辆脱线。黎明是敌机骚扰最厉害的时候，于是机车只得牵引后面的一部分车辆返回。其余十多辆车，就停在江桥上了。但是，不能把弹药车就这样摆在桥上，等着敌机轰炸。于是，站上的铁路员工都出动了。他们把车钩解开，一辆一辆推进山洞去。当大家正推着第八辆车，到山洞坡度最大的地方时，几架敌机突然飞来，疯狂的扫射开始了。

此时此刻，军事代表命令工人们立刻散开，找地方隐蔽，打算独自一个人去抵住车辆。但是共产党员刘景洲没有走开。他和军事代表两个人不顾敌机的扫射，用全力去抵住车辆。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力量大小了，阻止不住车辆的下滑。滑下去，如撞到停在桥另一端的六辆弹药车，就会爆炸起火，桥梁必定难保。

情况危机。伏在山坡上隐蔽的工人都急得叫起来，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跑回来，刘景洲已经用自己的身躯把下滑的车轮挡住了。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全了军代表，保全了战友，保全了七辆弹药车，保全了铁路大桥。

在场的人谁也忘不了那一幕壮烈的情景：车辆在往下滑，刘景洲急忙用一根撬棍插在车轮下边，想使车轮停下来，但无济于事。这时，只看见刘景洲把军事代表推出路轨，大声喊着：“你重要……”话音没落，刘景洲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压到撬棍上。满载军火的下滑车辆停住了。就这样，刘景洲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弹药车！这就是我们的铁路工人！

刘景洲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在朝鲜战斗着的中国志愿援朝的铁路工人们当中，像刘景洲这样高尚、英勇的人很多，这正是抗美援朝事业必然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驻守长津江某渡口的一个二兵班，他们奉命保护、抢修桥梁，保证运输畅通。这条河流，冬季结冰，春天开始溶化。4月初，紧张的冰化期到来了。轰隆轰隆的冰块破裂声，冰排撞击声，山崩地裂般震动着大江两岸。为了保护桥墩不致被冰块冲毁，就必须昼夜不断地把桥墩附近的冰排炸成碎块。像小山一样的冰块，随着江流汹涌而来。炸碎这些冰块，是一场严峻的斗争。

在这紧急关头，工兵班班长、共产党员王世荣毫不犹豫地提出：“不让前线的接济发生任何困难，我们必须保护桥梁。”他向自己班里的战友们说：“同志们，光荣的任务来了，我们上吧！”每个人都写了决心书。王世荣的决心书上写着：“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女，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也是光荣的。如果我牺牲了，盼望你们继续努力，一定完成任务。”4月5日下午，江水突然上涨了四五尺，冰块冲击得更凶猛了。王世荣他们准备停当后就驾着木筏、小船，带着炸药等工具，开始下水破冰了。全班九个人分成三组，坐着小木船向冰流前进。小船从冰块的空隙中穿来穿去。三个战士首先跳上了冰排，凿了洞，放好炸药。他们点燃炸药引线后，就迅速跳上小船，又从冰块空隙中穿出来。这时，大冰排在轰隆一声巨响里炸碎了，江岸两旁的战士为他们第一次的成功热烈欢呼。

在这之后，王世荣又带着六个战士坐着小船破冰。这时江水涨得更厉害，冰排的来势也更凶猛了。他们巧妙地驾着小船在巨大的冰块空隙中穿来穿去。三个战士跳上了正向江桥冲来的冰排。王世荣和三个战士撑着小船，去和另一块冰排搏斗。忽然一声巨响，冰排把一只小船撞成两段，船上的战士落入江中。

4月的江水冷得刺骨。当 they 从江水里爬上冰排的时候，已是遍体鳞伤，通身冻僵了。留在岸上的两个同志，急忙推下木筏去援救，木筏刚靠近一块大冰块，又被打翻了。这两个战士也迅速爬上冰排。九个人分立在三块冰排上，冰排随着江流浮动。就在这时，王世荣和另外两个战士站立着的冰排发出一阵破裂声，冰排裂开了，三个人一齐掉到江中。另一个冰排上的薛成仁也掉到江水里去了。在大家的焦急声中，王世荣忽然露出头来，经过奋力拼搏，把临近的两位同志救了上来，又跳下水去，救起了另一个同伴。足足有半个小时，八个人全被救了上来。他们分站在几块小的冰块上。然而，就在快要脱离险境的时候，上游的江水又上涨了。一块有一丈高的冰块把王世荣打倒了，从此他再没有从冰冷的江中爬出来。

王世荣牺牲了。在他伟大精神的感召下，工程班的全体同志继续和冰块斗争。经过两天两夜的努力，不仅保护了原有的那座大桥，并且还临时架起了一座新桥。大车、汽车从这两座桥上滚滚向前。共产党员王世荣的光辉形象，也像大桥一样，深深地刻在全体战士们的心中。

谈到抗美援朝的胜利，彭德怀司令员曾经这样说过：“朝鲜战场打胜仗，一半功劳归前方浴血奋战的同志，另一半功劳归负责维护交通、保证供给的同志，他们也是在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天天在拼搏呀！”

在敌人实行“重点轰炸”期间，铁道工程兵的同志们曾经这样豪迈他说：“不管美国飞机怎样炸，我们保证前方战士每天有吃的，有打的！对于我们铁道战士们说来，胜利的意义就是让火车每天在铁路上跑。如果火车每天都在跑着，那就是说空中强盗失败了！”

在“重点轰炸”期间，美国飞机一直想破坏铁路运输以阻止志愿军的进攻。一开始，他们以为破坏车站就可以使运输瘫痪，于是他们把所有车站站舍炸成一片瓦砾。但是，火车照样开着。接着美国飞机就开始轰炸桥梁，等到他们把重要桥梁都反复炸过了，运输仍然没有中断。有一个时期，敌机又专门轰炸隧道。但是，火车仍然往前开着。敌人不得不供认：“一年多的重点轰炸，北朝鲜的火车仍在继续行驶。”美国被俘的一个空军中尉很不理解地说：“我们这样的炸，你们的火车还能通，真是奇迹！”

我们铁道工程兵的战士，都是好样的。正如他们的一个指导员所讲的：“它炸了，我们就修；修好了，就通！不炸，我们就维修！别看铁路的样子难看，我们保证线路质量，叫它照伴一小时跑几十里！”

在敌机一个狂轰滥炸过后的夜晚，战士们为了迅速修复当天被炸毁了的线路，有的把自己的衬衣脱下来，沾上油做成火把照明。工地上一片火光。不久，山上的防空监视哨打了两枪，这是空袭警报。立刻，火光全熄了。美机在这里扔下几个定时炸弹就飞走了。各战斗小组随即行动起来，清除定时炸弹。因有人扛定时炸弹牺牲了，领导上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让战士们回驻地取铁绳来拉。这时三排长周风情不同意地说：“取绳子来回要用40多分钟，在40分钟内炸了，我们今晚就别想通车了！”他又对领导说：“前方的战士和敌人打仗，不能因为有一人倒下了，后边的就不往前冲了。我们把定时炸弹搬出去了，这就是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就这样，铁道工程兵的战士们凭着对祖国的崇高责任感，继续去搬、去扛定时炸弹。美国飞机的“重点轰炸”被粉碎了，每天夜晚，无数列车安全地经过这个“重点轰炸”的地区，开到前方去。

讲起铁道工程兵的英雄事迹，志愿军全军将士深深怀念全军闻名的“登

高英雄”杨连第。他在解放战争中修桥筑路，战功卓著。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多次克服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铁路抢修任务。

1950年底，杨连第和他的战友们，刚一踏上朝鲜的土地，第三次战役就打响了。可是，通往前线的沸流江大桥被炸毁了。上级决定要在七天内修复，派杨连第带领一个组完成钢梁起重任务。白天敌机轮番轰炸，他们只能在晚上劳作。现场没有灯，只能借着微弱的星光，冒着寒风作业。

两个昼夜过去了，任务完成还不到1/10。大家非常着急，杨连第心里感到沉重。收工了，他一个人趴在桥头的掩蔽部里思忖着。他想，虽然敌机轰炸频繁，但两次空袭之间都有一段空隙。只要抓紧这些空隙时间抢修，就比摸黑干一夜的效率还高。他打定主意，请示连长后，决心在白天进行抢修。这样做当然危险。但是，在杨连第精心组织下，躲过敌机的空袭，工程进展很快，沸流江大桥终于提前三天修复通车了。

可是大桥修复通车没有几天，美机再次把它炸毁。上级决定修建一条低矮的爬行便桥，以保证运输畅通。这时已被提升为副班长的杨连第接受了挖土1700立方米的任务。僵硬的冻土和顽石给施工带来很大的困难，铁锹磨秃了，镐把震断了，换上再干。可是工程进展仍然很慢。一人一夜也挖不了一方土。杨连第想出了“掏空心”、“砸硬盖”、“深坑中间搭跳板”的办法，现场一试，工程进度很快，由原来每人0.8立方米提高到2.5立方米，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

1951年7月，杨连第所在部队转战到朝鲜著名的清川江大桥，这座大桥位于满浦、平壤铁路线上，大量的军需物资不分昼夜从这里运往前线。这时，清川江大桥被40年来未遇到过的特大洪水冲毁了，桥墩倒塌，铁轨沉落江中，运输中断了。杨连第所在连奉命接受了抢修任务，团指挥所限令8天完成。杨连第这时已被提升为副排长，他提出用“交叉钢梁立在江底”搭浮桥的办法。大家认为可行，于是一场架钢梁铁轨浮桥的战斗开始了。

在施工中，杨连第抢在最前头绑钢轨，绑完一节，就顺着平伸出去的钢梁爬到尽头，悬空骑着再竖第二节交叉钢轨架。人随着单根钢梁颤动，下面是滚滚激流，杨连第不停地绑着，钢轨一根接一根伸向江心。突然一震，就在他接钢轨时，两手扑空，掉到江里去了。被战友们救出之后，换了衣服，又投入紧张的施工。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工程竣工了，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源源不断地通过这座浮桥开往前线。

1952年5月上旬，美机对清川江大桥又加紧轰炸。并投下大量的定时炸弹。杨连第这时被提升为技术副连长，带领他的连队顽强地战斗在清川江上。敌人连续轰炸，战士们连续抢修，始终保持列车顺利通过。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5月15日清晨，杨连第正在指挥战士校正钢梁，一颗罪恶的定时炸弹爆炸了，弹片击中杨连第的头部，鲜血洒在桥梁工地上。杨连第牺牲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并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第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在抗美援朝的运输线上，除了数万名铁路员工外，还有一支英勇机智的汽车运输队伍，这些司机们长年奔驰在朝鲜公路上。“头顶飞机，脚踏定时炸弹”，在风雪交加的冬夜，在泥泞路滑的雨天，他们穿过排炮的火网，避开火光熊熊的汽油弹，在机枪扫射、弹片四散、照明弹照得像白昼一样的情

况下行车。靠勇敢和机智，靠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责任感，他们将军需物资送到前方，保证了战士们有粮食，有弹药。

美军无时无刻不在设法破坏志愿军的运输线，他们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恶毒办法。有一个时候曾投下大批特务，那些该死的东西就躲在公路附近的山头上，等汽车经过的时候，向天空打信号枪。每到晚上，敌机就在天空飞来飞去，到处找目标。有时丢下了汽油弹烧山，有时丢下一排照明弹照得四处通亮，甚至下流地丢下钢笔和手表玩具炸弹，谁去碰它就爆炸。有一次敌人忽然扬言已经有“最新的发明”可以破坏志愿军的运输线了，原来是往公路上撒下一种四角钉子，汽车驶过就扎坏车胎。但是，经过志愿军防空哨和朝鲜人民的努力，一扫帚就将这些“新发明”从公路上扫光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汽车驾驶员们，以英勇和机智战胜了敌人种种恶毒的诡计。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一长列汽车往前方运弹药，敌人在必经路上丢下大批定时炸弹。一次，一位带头的司机队长下车站在定时炸弹的旁边，镇静地挥手喊道：“同志们，冲！”第一辆车开过去了，所有车辆都开过去了。那位队长后来对人说：“谁知道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前方等着弹药，我们哪有时间慢慢地等，干了再说！”

“干了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机们就是这样勇敢。他们经常整夜开车。到了宿营地，首先将汽车隐蔽好，然后才去睡觉。“白天修车、护车，夜晚开车。”他们几乎是日日夜夜都在工作着，很少休息。汽车兵团的一位指挥员十分自豪地说：“朝鲜战场上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运输，每一条公路上，每天都是滚滚的尘烟，我们的运输线，成为打不烂、炸不坏的钢铁运输线。”

英雄的汽车司机们，不仅和敌机斗智，而且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车辆，还真枪实弹和敌机较量，并在这方面创造了奇迹。1951年3月21日上午8点钟，赵宝印的汽车赶了一夜路程后；隐蔽在一个村庄里。两架敌机向那村庄扫射轰炸，跟着又来了第二批。赵宝印很焦急，怕自己的汽车被击中。他拉起了刚睡下的助手曹兴义，说非要打飞机不可。两个人就拿起步枪干了起来，敌机被打中，在汽车兵团中成功地创造了用步枪击落敌机的光荣事例。

司机同志们的英雄事迹是说不完的，在反“绞杀战”中，模范驾驶员尹继发创造了出车265天，行程4万公里，未经大中修理、创安全无事故的最新行车纪录。但成绩的取得是多么不易呀！这是在冰天雪地、河流纵横的朝鲜，是在战火纷飞、敌大机群轮番轰炸的战场上啊！此时此刻，尹继发怎能忘记入朝以来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呀！

入朝后的第一个冬天，起伏的山峦披上厚厚的积雪。一天，尹继发的汽车满载送往前线的粮食，行至龟城附近休息。因为在白天，停在山沟里用于树枝伪装的汽车被敌机发现了。“嘟嘟嘟”一梭子子弹打来，尹继发的汽车座垫被打着了，火苗窜出窗口，直扑车身。尹继发在山腰上看见这危险的情况，不顾敌机正在头顶上扫射，抄起一件大衣就冲下山去。他默默地想：“有我在，车就在！”他一头钻进驾驶室，左扑右打，奋力扑救。终于把大火扑灭。

1952年初春的一天，尹继发和助手小杨驾驶汽车从物开里出发时，已有满天星辰。出发前，指挥所的同志再三嘱咐：“前方急需鞋子，今晚一定要送到！”汽车在黑暗中奔驰。快到市边里了，尹继发心里盘算着：“一定要想办法通过这个重点封锁区。”他刚想和小杨商量一下，一溜照明弹已挂在

半天空。霎那间，大地被照得如同白昼，汽车完全暴露在雪白的光圈中。没容尹继发作出反应，一串串子弹像雨点似的横扫下来。尹继发回头一看，车上的汽油桶和鞋箱子打着了，火苗越烧越旺。他知道一旦油桶爆炸，整个汽车和物资就全完了！

尹继发心急如焚，急忙爬上车厢，冒着危险，拼尽全力，终于将汽油桶推下车。油桶刚落到地上，“嘭”的一声就炸开了，浓浓的火焰把汽车照得通亮，这样一来，目标更明显了，敌机嗡嗡地又从头顶上压下来。尹继发一把抓住小杨的肩膀，情急地说：“我开车往前冲，你顺山沟往前跑！我要是牺牲了，你就上来，继续往前开！”说完，不容小杨分辩，驾起车来往前冲。敌机呼啸着一次次地俯冲扫射，轮胎被打破了，但尹继发使劲地握着方向盘，继续向前冲，敌机被甩在山的那边。等小杨赶上来，一起换好轮胎，又继续赶路了。

到1952年12月7日，尹继发的汽车安全行驶达39873公里。黄昏，他把车子从深沟里慢慢开出来，又要执行前线运输任务了。连长、排长对他这次执行任务表示特别的关切，连长拍拍尹继发的肩膀说：“尹继发同志，今天完成这趟任务回来，你这辆车就跑完四万公里了，在路上要注意敌机呀！”尹继发用劲搓了搓手掌，没有说话，他知道领导和同志们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四万公里这个数字，代表着自己和全连的荣誉，不，是全志愿军汽车运输兵向美国空中强盗的胜利示威。

尹继发登上车，心里热乎乎地喊了一句：“请首长和同志们放心，保证突破四万公里！”在轰鸣的马达声中，汽车一溜风地开跑了。刚开出不远，突然车前一亮，敌机扔下一颗照明弹，接着又扔下第二颗、第三颗，整段公路被照得通明雪亮，车子被罩在光圈里。怎么办？尹继发毅然将油门加大，决定冲过去，汽车忽地飞奔起来。这时，尹继发从挡风玻璃中看见前方飞来一架敌机，俯冲下来。他猛地一收油门，车立即刹住，飞机扑空了，他躲过了炸弹，躲过了机枪的扫射。趁敌机转过山头的空隙，尹继发又把汽车开动了。等到敌机调过头来第二次扫射时，汽车已经驶出很远了。就这样尹继发胜利完成安全行车四万公里的任务。

在朝鲜前线，除了由火车、汽车负责志愿军的运输外，还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祖国优秀儿女以无比的热情支援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满载战争物资的马车、卡车在蜿蜒崎岖的公路上奔驰；漫长的人流——志愿担架队和运输队，拖着雪橇，扛着担架，赶着胶皮轮大车，奔赴前线。

当中国第一批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东北地区的老百姓就组织了志愿民工队。他们雄纠纠地驾着自己的马车，挥动着手里的鞭子，紧跟在志愿军后面，军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支前到哪里。他们高兴地唱着自编的《支前小调》：

夏季里，麦子黄，
民工队员上前方。
装卸车，运伤员，
抗美援朝保家乡。
秋季里，秋风凉，
装卸物资大家忙。
快把物资送前方，

战士吃了打胜仗。

前来支前的民工队，绝大部分都是东北的翻身农民。他们亲身经历了日寇十多年的残酷的统治和压迫，对美帝国主义正在走上日寇的道路要奴役全中国人民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他们自动报名参加了民工队。

支前民工们的勇敢战斗精神，是跟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分不开的。这具体地表现在他们对祖国物资的爱惜。当敌机轰炸扫射使物资起火燃烧的时候，他们不顾敌机还在上空盘旋，就冲进烟火里去抢救。当掩蔽物资的时候，他们又高度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创造出许多新奇巧妙的办法。

谈到为什么前来支援前线，来自安东（今为丹东）地区一位姓王的民工说：“这还不明白吗？朝鲜离美国那么远，地方又不大，美国干吗费这么大劲来抢占？还不是想要咱们东北，他是拿朝鲜来做跳板嘛。再说，你看，美国鬼子把朝鲜糟蹋成什么样子，烧、杀、淫、掳，什么都干，要不赶快把他们打垮，若是美国侵略者到了咱们东北，还不是一样！再说，人家朝鲜人民抗美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咱中国；咱们来援助他们，也就跟援助自己一样。”

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直关心着朝鲜的和谈，但美方一直缺乏诚意，节外生枝，总想在谈判桌上捞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欲知板门店的谈判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章 舌战板门店

节外生枝蛮搅缠，和平谈判无进展；
恐吓讹诈施诡计，美方阴谋被戳穿。

朝鲜停战谈判自 1951 年 7 月开始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总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8 月 23 日后，美国方面的破坏活动更加变本加厉，有增无减，且看：

——8 月 25 日，美、李武装部队 21 人悄悄侵入开城中立区的白田里，企图谋杀我方的军事警察人员，当即被我方发现，给以迎头痛击。

——8 月 30 日，南朝鲜部队的侦察队员 10 余人，由一个叫金凤得的带路，将魔爪再次伸到开城中立区，在炭洞里袭击和绑走我方军事警察郑重男、杨显泽、张仁风三人，杨、张惨遭枪杀，郑重男身负重伤。金凤得在 9 月 1 日又一次侵入开城中立区时被我俘获。

——与地面的破坏活动相配合，美方的飞机更是明目张胆，多次威胁中立区的安全，仅从 9 月 1 日至 8 日的 8 天中，美机就侵入中立区 139 架次之多。

对美、李破坏中立区安全和武装挑衅活动，中朝方面多次提出抗议。对此，李奇微不但矢口否认，而且倒打一耙。他在 9 月 6 日的复信中说：“你们一点事实根据也没有地再度怀疑了联合国军队的信义。你们在这些据称的事件中所作的指控是毫无根据而且是蓄意虚构的。”还说，“如果这些事件的确曾经发生，可以假定它们是由你们的部队所发动和做出来的，以便为你们对联合国军所作的虚假和恶意的指控提供伪造的证据。”

经过研究分析，中朝开城代表团认为，敌人之所以不断制造破坏谈判事件，其目的在于达到更换谈判会场地址的目的。决定先打掉李奇微的嚣张气焰，等他认错后再议更换谈判会址问题。

因此，金日成、彭德怀在给李奇微的信中采用了强烈的措词：你方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行动，“事实昭彰，证据确凿，欲加否认，连你方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你方乃用转移目标的办法，提议更换会议地址，以逃避处理你方破坏协议的一连串的挑衅性事件的责任，并为你方需要破坏谈判时制造借口。应该指出，你方的这种企图是不会成功的”。

9 月 10 日，美国空军又有一架飞机，公然扫射了开城中立区。在我方的抗议后，这回李奇微没有犹豫，马上表态认错。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叫乔埃给中朝代表团写信，承认错误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对于这一由于驾驶员航行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对于协议了的中立区的违反，表示遗憾。适当的纪律行动正开始中。”

中朝代表分析，李奇微态度的转变和当时的形势有关。美国侵略军除了在其“夏季攻势”中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外，当时从莫斯科还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斯大林发表谈话，证实苏联境内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并称还要进行各种直径的原子弹的试验。美国独霸原子弹的时代结束了。在此情况下，杜鲁门着急了，电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寇克去拜访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希望苏联帮助朝鲜谈判圆满结束。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如苏联肯出面，它正好借机下台阶；如苏联不愿出面，则可把它拖延谈判的责任转嫁给“共产主义集团”。苏联政府明确回答说，朝鲜停战谈判拖延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军司令部所制造的各种障碍，要使谈判取得好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训令李奇

微不要使谈判复杂化，停止制造人为障碍。

为了进一步表示我方的和谈诚意，1951年10月7日，中朝代表建议：停战会议地区的中立范围扩大到开城和坟山，而将会场地址移至板门店，并由双方负责保护这一会场地址。李奇微第二天复函金日成、彭德怀，表示同意在板门店复会。

10月10日以后，双方的联络官在板门店新搭起的帐篷内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讨论，就板门店会场地区以及板门店至开城、板门店至汶山公路两侧安全问题达成了一项综合性协议。规定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在会场区均不得进行任何敌对行动。会场区的安全与秩序的维持，由双方指定的军官共同负责。

10月25日，停止了63天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美方由于“军事压力”的失败，虽然放弃了要求我方退出12000平方公里的荒谬方案，但又提出了从现有接触线出发，片面要求我方退出15000平方公里，唾手而得开城地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方案。对敌人的无理要求，我方没有理睬，提出了以现有战线为基础的对整个战场加以全面调整的军事分界线方案。我方的方案，既尊重了现有战线，又照顾了战场全面，其所提议的调整，对双方都是完全平等的。

敌方念念不忘开城，找出种种借口为占有开城地区辩护。对此，中国志愿军代表解方将军驳斥说：“你们提出索取开城理由之一是‘防卫汉城’，这种话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你们借口‘防御’，侵占台湾，侵占日本的许多小岛。这种论据是说不通的。”

接着，美方又以“调整”为借口，提出以零星岛屿与金城、高城两个突出地区，同开城地区交换。对此，朝鲜代表李相朝将军讥讽他们说：“这种逻辑等于说：把瑞士搬到花园里，花园就美丽了。或者说，把我们的金刚山搬到华盛顿就可以作一个美丽的公园了。”

这一招失灵了，美国代表又找出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会场上出现了激烈而有趣的辩论。美方代表说：“开城之所以被你们占领，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动进攻，这表示了对停战的诚意。”解方将军反驳说：“难道说你方没有进攻鸭绿江，也是表示对停战的诚意？！”

美国代表又说：“要不是因为开城是中立城市，我们原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拿下来的。”南日将军反驳说：“请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所谓秋季攻势中，曾经企图绕过开城，到达该城东北，因而使第一骑兵师的大部分士兵丧了命，”

此时朝鲜中部已是初冬，阵阵朔风向开城平原袭来。趁着夜晚，李克农在代表团的会议室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传达中央制定的全面方案。他说：“谈判是美国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恢复的，而谈判的恢复，转过来又增加了国际国内要求把战争停下来的压力，这就是形势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认为现在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增加了，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金首相共同的估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

“在停战线的问题上，我们主张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停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估计可能很快达成协议。”李克农继续说，“这个方案经中央批准，打出去之后，对方有些慌乱。虽然他们放弃了深入我阵地后方划分停战线的要求，却仓促提了个以讹诈手段要开城的11月8日的对案，我当时就认为他们难以坚持下去，因为对方说不出任何理由来。果然，11月17日不得不原

则上接受我的建议。”

这时，乔冠华插话说：“对于索取开城的要价，我有一种感觉，它很可能是李承晚的主张。开城是朝鲜的古都，打了一仗丢了古都，政治上很难交代，美国人似乎也不得不应付一下。”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李克农点点头说，“所以要坚决驳斥。结果把它驳了回去。对其无理要求要驳，但要主动促进。停战线的问题是停战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最主要的问题便得到了解决。当然我不是说别的议程没有麻烦了。同美国人打交道，你不要设想没有麻烦。比如第三项议程，停战监督问题，美方一贯的立场是无限制的监察，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又要僵住，我们准备在双方的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的解决方案。”

“关于战俘问题，”李克农呷了一口热茶又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的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讲到这里乔冠华插话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八十一师二十三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成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了。

停战谈判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后，接着讨论停战监督问题。不同的出发点，反映在谈判桌上，形成了新一轮尖锐斗争。11月27日，一进入这项议程，朝中方面的代表就提出以下五项原则建议：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三天内，自非军事区撤出。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五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双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于任何延期撤走的理由，则对方为维持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不得进入非军事地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

——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

美方则坚持停战后要到对方后方去进行空中和地面的“自由视察”。对于这种干涉内政的措施，遭到朝中方面的拒绝。会场上，经过近一周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对方主要顾虑朝中方面会利用停战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为了解除对方的顾虑，不给他们借口，而又不致形成双方对对方内政的干涉，所以在12月3日朝中代表又提出了一个补充建议，即把停战后“双方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作为一项重要保证，并把监督措施分为两部分，即对非军事区的监督由停战委员会直接负责，对非

军事区以外的后方监督交由中立国监察机构负责。

这一建议提出之后，对方不知所措，毫无准备，只建议会议转入小组讨论。显然，他们要争取时间请示华盛顿。拖了九天之后，12月12日，对方才拿出一个对案，勉强同意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但是一方面要坚持大量的轮换部队与补充武器弹药，另一方面却为达成停战协议设置了一个大障碍，即提出要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可能允许限制自己国境内的设施的。

朝中代表说，我方不能同意你方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绝不能让步的是我方内政的不受干涉，至于我方进行或者不进行这一种或那一种设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方说，这种干涉现在我们就以我们的军事力量进行着。“现在我们正在干涉着你们的内政，你修飞机场，修好了，我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当时出席会议的我方代表解方将军气愤极了，当面斥责对方，他说：“你们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荒谬到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妄想干涉也没有干涉得了。你们使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而美国代表却无耻地说：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完整的主权，完整的主权既不存在，又何必斤斤计较于主权的完整和内政的不可干涉呢？还是请你们忘记主权、内政这些支离破碎的名词吧！

中朝代表严正驳斥说：“这正是你们美国统治集团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的露骨表现，你们企图侵略别的国家，因此你们就否认世界各国还有什么主权。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这种称霸世界的妄想已经在这个世界的不少地方碰了壁。因为，在这些地方不仅有主权完整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还拿起了武器为保卫自己的主权，为反对外来的侵略、干涉而英勇斗争了。”

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美国企图再次施加压力，可是战场上它已经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结了前一年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的经验，大力加强和巩固了现有阵地，开始了以各种战法杀伤和消耗敌人。就在夏季防御作战后期，全军全线掀起了大规模的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我军利用这些工事，以劣势装备打退了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多次进攻，杀伤了大量敌人，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最后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合国军的空、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切断共军的供应，然而共军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1952年发动的“绞杀战”和“细菌战”也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彻底粉碎了。

1952年2月6日，停战谈判举行代表团大会。朝中方面代表建议：双方在停战协定失效后3个月内，各指派5名代表举行政治会议，讨论以下问题：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讨论中，对方首先是企图避免明确提出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其实质就是想使这项议程变得毫无意义。

经过10余天的讨论，2月16日在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我方代表为了打破僵局，又提出如下修正案：“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

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这一修正案经过多次协商，终于在2月17日达成了协议。

在这之后，板门店谈判进入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释放战俘，是交战双方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无论哪个士兵的父母，如果得知他们的孩子被俘了，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能早日回来与家人团聚。收容在双方战俘营的俘虏们的反应更为强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下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第十二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说：“我们希望回家，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在朝鲜当战俘以后的第二个圣诞节。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待我们好极了，让我们吃得很好，并且非常和善地照顾我们，但是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家乡。”“我们希望回家的理由简单得很，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妻子、儿女和我们的父母。”至于在美方收容之下的朝中战俘，要求回家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用文字、语言表达他们的迫切愿望，而是用生命和鲜血记载了他们的恳求。

1951年12月11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会开始了。会议一开始，我方即提出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书面提出五点建议：第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第二，确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第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第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第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

然而，美方代表则坚持先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战俘营，否则拒绝讨论第四项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据负责战俘工作的杜平将军分析，美方有自己的丑恶打算。他们想扣我们的人，但还不知道我们到底收容了他们多少战俘，所以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双方战俘应在所谓“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如果说美方的发言还只是向中朝方面发出了一个信号的话，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李维中校在同一天对记者的谈话，则把美方在战俘问题上怀的鬼胎，和盘托出来了。他公开招认：“联合国军不打算给共军以很大的人力，不愿把战俘释放回去。”于是，双方僵持起来。

美方代表李比在发言中攻击中朝的建议是“没有准备好船，就想过河”。李相朝代表立即反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你们不愿过河而已。”

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争论的只是个先后程序问题，事实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如按我方的建议，先确定全部遣俘的原则，那么战俘问题的讨论就将变得简单、明了。而按美方的建议，先交换资料，还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会玩些什么新名堂，把谈判拖到什么时候。会议僵持了一周，没有进展。为了不给敌方借口，逼其走下一步，在12月18日上午的小组会上，我方出乎美方意料，宣布：下午双方即交换全部战俘材料。李比听后，愣了好一会。他大概以为我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其僵持下去。我方的让步，再次显示了谈判的诚意。

当日下午，对方交来132474人的战俘名单。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54人，中国人民志愿军20720人。经核对，对方移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列出的

姓名数，较对方所称战俘总数缺少 1456 名；对方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有 44205 人未列入 12 月 18 日提交的战俘名单。我代表质问对方：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列入移交名单？搞得美方代表李比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与美方提交的几乎是一堆废纸的资料相反，我方交给对方的战俘名单，却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中朝向敌方提供的战俘人数：南朝鲜军 7142 人；美军 3193 人；其他国家军队 1216 人，共计 11551 人。这个战俘名单包括了朝中方面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中有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将军，迪安是在 1950 年 7 月中旬的大田战斗中被朝鲜人民军俘获的。

敌方对我方提供战俘名单的准确、翔实十分惊奇，并害怕以此给美方代表带来“沉重的负担”，“造成新的压力”，于是故意找岔子。他们以美方在战场上的“失踪”的人数为依据提出质问，说中朝提供的名单仅占失踪美军的 27%；南朝鲜军失踪 88000 人，而说我方仅提供 7000 多人，那 8 万多人哪里去了？十分有趣的是，美国国防部在此以前，只承认有 169 名美军被俘，表明美军是勇敢的，不会投降的。现在却又把它宣布为“失踪”的人员，统统算成战俘。他们说，美方“失踪”的有 12000 多人，而朝中方面提出的美军战俘只有 3000 多。

12 月 21 日李奇微又节外生枝，致信金日成和彭德怀，再次在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问题上作文章。信文如下：

“从朝鲜冲突的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几次请求你们以及你们政府当局许可他们的代表进入北朝鲜，单单去视察战俘营，以便给你们现在羁留的联合国军战俘和大韩民国战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此外，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已一再向你方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样的许可，并且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时起，就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它所拥有的战俘有这种特权。迄今为止，这一切请求和建议都被拒绝。

“现在我代表有关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并以被你们俘虏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名义，我再亲自请求你们重新考虑这种行动。我丝毫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这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在以前的战争中各国都肯定允许该委员会进行的工作。

“我一心只想到这些人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我诚恳要求你们，请求立即许可持有适当证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入境——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随时给你们以援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12 月 24 日复信李奇微。信文如下：

“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悬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现在停战谈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业已接近解决，只是因为你们方一再节外生枝地坚持无理的要求来拖延谈判，以致停战协议尚未达成，双方战俘无从获释，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悬望的痛苦也因此继续下去。

“我方对于战俘，无论在饮食、被服、居所或娱乐方面都本着宽待战俘的精神和政策，给予他们以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伤、病战俘都能够从为他们安排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有效的治疗。我方所提出的关于战俘

的精确名单，充分反映了我方对战俘的人道的注意和关切。因此，我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访问是不必要的。

“但是，为了双方遣俘工作进行便利起见，我们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之后，立即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会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分组出发，到双方战俘营去进行就地访问，并准备在双方战俘交接的集中地点，协助遣俘工作。你如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的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了，而一场尖锐的名单斗争开始了。我方提交的战俘资料中，按照战俘的国籍使用他们所各自通用的文字，详细地列出他们的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营的所在地点；但美方所提交的名单中，却除了英文拼写的姓名以外，根本没有列出任何必需的识别材料。中朝代表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材料，而且对名单和总数不符的问题也必须作出认真的交待。

面对我方的一再催促，美方显得十分尴尬。美方倒打一耙，又玩弄以战场失踪数字来索要战俘的把戏，并以此为据，指控我方对战俘施加暴行。然而这一图谋很快就破产了。

12月26日，美国《国民前卫周刊》曾揭露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失踪”数字的虚妄。该刊说：“要知道其余大多数失踪的美国士兵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线索不应该从‘暴行’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朝鲜战争的悲惨过程中去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19日也对美国发表的“失踪”数字表示怀疑，并列举以下事实加以说明：“当美军第二师的一个营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800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事实上在中共军对这被围的一营人作五次连续的进攻时，若干官员相信，或许这一营的一半人员已经死亡。”该报又说：“联军司令部有点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根据制度，联军曾被迫把损失人员列在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掉了。”

美方的这一阴谋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美国报纸面前被戳穿了。但是他们又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52年1月2日，对方终于拿出一个他们的解决战俘问题的所谓方案。他们公然违背日内瓦协议，提出的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地交换。如果一方交换完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愿”到哪去就到哪去，并美其名曰“自愿遣返”。

美方这一建议，自然遭到中朝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一场新的舌战又开始了。李相朝代表对美方的方案气愤地指出：“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气遣送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们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1952年4月，克拉克将军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但是李奇微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为了强迫中朝接受美方的方案，美军又施加军事恫吓，于是提出了“克拉克的八点行动计划”，其内容是：轰炸水丰发电站；轰炸平壤；轰炸平壤至开城的供应线；轰炸北朝鲜所有大大小小的目

标；“释放反共”战俘；中断谈判；增强李承晚军；施放调用蒋军计划的烟幕。

在“克拉克八点计划”的驱使下，1952年6月23日，美空军以590余架次轰炸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以及长津、赴战、虚川等发电设备。

1952年7月11日，美机746架次，又一次轰炸了平壤、黄州地区。残酷轰炸的受害者何止是朝鲜的平民百姓，他们还无数次地轰炸了没有明显标志的战俘营，造成大批战俘伤亡。

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就是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引起强烈反对。在这年的5、6、7月间，在英国，在美国要求停战的呼声高涨。在英国，全国妇女大会直接向丘吉尔请愿，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调回英国的军队。5月25日，有25位战俘的妻子在英国国会前集会请愿，要求还给她们的丈夫。

在中国志愿军战俘营收容的英籍战俘们，几乎一致签名给到南朝鲜视察部队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一封请愿书，要求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杀害中、朝战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没有对我们作任何报复”。无怪英国政府强烈要求要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的谈判。

在美国，美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全体公民致杜鲁门、艾奇逊的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们采取立即行动，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们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的原则受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这种“原则”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违反了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和全部国际惯例。就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加拿大，也担心“自愿遣返”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已提请美国注意：“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政策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在此期间，美国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分析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5月8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作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人们都气愤地咒骂哈里逊和克拉克破坏停战谈判的罪行。5月9日清晨，巨济岛上传来新闻：第七十六号战俘营中的朝中被俘人员，为抗议美方“甄别”和非人道待遇，扣留了美方战俘营营长杜德，从而揭开了美方“自愿遣返”的血腥内幕。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章 愤怒的抗争

身在囚笼志更坚，忠于祖国心不变；
横眉冷对千夫指，愤怒抗争谱新篇。

美方在“自愿遣返”的幌子下，以“甄别”为名，在他们设置的战俘营里制造了一桩桩、一件件的血案。朝中被俘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畏强暴，为了回到自己的祖国，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

美军在朝鲜南方的釜山、巨济岛分别设立了一些战俘营，每个战俘营都派有校官以至准将担任战俘营长。美军宪兵司令部和李承晚军在每个战俘营内外均驻有大批部队和宪兵进行“警卫”。在战俘营里，除有美国远东军事情报局、美国远东民众心理调查局、美第八集团军情报处等派驻大批人员外，还有李承晚特务机关派来的“教官”和由国民党特务机关自台湾派来的“教官”。美军的指挥与行政军官加上这些美、李、蒋特务，以及从俘虏中“挑出的”所谓“解放了的特务”，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血腥统治网。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绝大部分被关押在釜山和巨济岛上。每个战俘营区都围着五层铁丝网，四角设有高高的岗楼，夜晚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警犬随时可以出动。战俘们一进入收容所，站在两旁的美军士兵一哄而上，像群恶魔，扑到战俘的身上，贪婪地搜索着每一样东西，钢笔、手表、打火机……战俘们进入战俘营帐篷后，逐个进行登记、照相、按指纹，给每个人发一记载关押日期、战俘编号的小铁牌。通常情况下，每50个人关在一个帐篷里，统统躺在潮湿的地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东张西望，不经批准不准去厕所。

战俘们一进入集中营，犹如来到人间地狱，受尽种种迫害，过着非人的生活，尤其是女战俘所受的折磨更为严重。在一个帐篷里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四个女战士，美国强盗为了便于对她们进行强奸，扬言要对她们进行个别“审讯”。四个女战士一起坐在地上，抱成一团，谁也不进去接受“审讯”。这时两个美国兵动武了，他们把一个年龄最小的硬拉起来。这个女战士连哭带喊：“放开！放开我！”

“站住！”年岁最大的一个女战士站起来吼道：“你们别动她，有话跟我说！”她平静地用手往后梳了一下短发，仇恨的目光射向敌人，在落日的余辉下，她显得特别高大。美国兵押着她进了帐篷。一会儿帐篷里传出女人的呼喊声。在外面的三个女战俘不顾美国兵的阻挡，冲进帐篷。只见几个脱得一丝不挂的美国兵，正把这位女战士强按在行军床上。她们与美国兵扭打着，撕扯着，但她们终究是女人，抵不住这群野兽。她们的衣服被撕破了。一个美国兵带着兽欲的满足刚站起来，那位年龄最大的女战士突然拣起敌人放在地上的卡宾枪，扣动了扳机，一个美国兵倒下了，其余的美国兵连滚带爬地窜了出去。

帐篷被包围了。美国兵架起机关枪向里面扫射。四个赤裸着身体的志愿军战俘，紧紧抱在一起，唱着《志愿军战歌》，高呼着“祖国万岁”的口号，英勇地牺牲了。这就是新中国的女性，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女战士！

“回到祖国”是朝中战俘的强烈愿望。就在美方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提出所谓“自由遣返”时，各战俘营的铁丝网上空，正笼罩着恐怖的大屠杀的空气。他们所谓的“甄别”就是在美军刺刀尖下，由美、李、蒋特务强迫每个战俘“拒绝遣返”。强迫的手段极端残酷，拿着一张已经写好的“拒绝遣

返”的“请愿书”，强迫每个战俘按手印。

谁不按，轻则打一顿，让你再去“考虑”；重则打晕过去，拿着你的手按上指印；再重就当场打死，杀一儆百，如群起反对便立即镇压。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讲气节的，所以，强迫在战俘胸脯上刺上“反共抗俄”的大字，看你还敢回去？如果有人反抗刺字，特务们手里有大棒，宪兵手里有武器，战俘周围布满了随时可以进行镇压的美军。这样，便发生了一场场惨绝人寰的流血事件。

在被称为“阎王殿”的七十二联队，有62人因为坚决要求回归祖国，被割了肉。刽子手们把割下的肉挑在刀尖上示威，最后盛在三个脸盆里端出来，公开宣布要用这些人肉包饺子吃。被俘战士林学甫拒绝回答他们的追问，他的胸脯被挑开了，当一颗忠于祖国的战士的心脏，即将被匪徒挖出时，他目光炯炯，面无惧色，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为人们留下了最壮丽的遗言。

在釜山各收容所的伤病战俘，也以同样的英勇行动回答了敌人的“甄别”和“审查”。在那里，美帝国主义开了世界上虐待战俘的又一先例，以连续断粮断水，逼迫被俘人员参加他们的“甄别”。断粮由3天延续到11天。有些战俘饿死了。

1951年10月2日，美蒋特务们强迫战俘参加所谓“示威游行”，呼喊反动口号。志愿军被俘人员张子龙拒绝“示威游行”和举旗呼喊反动口号，要求返回祖国，被特务们左右开弓打了顿耳光。打完还不解气，特务们把张子龙吊在帐篷上，用皮鞭抽打。六个小时过去了，皮鞭声仍未间断。张子龙怒骂的声音渐渐低沉下来。但敌人仍不死心，又把他倒吊起来，用木棒敲打他垂下的头，用火烧他的肚子，用大铁钉钉他的脑门，用刀子扎进他的太阳穴。

“还没有死，还没有死！割掉他的生殖器！”特务们发疯了。鲜血顺着张子龙的双腿流下来，染红了脚下的土地。他又一次奇迹般地抬起了头，嘴里还骂着什么，可惜已经听不清了。发疯的敌人把他从吊绳上拽下来，用铁锹把心铲了出来、又掏了他的肝，然后开始分肢。国民党特务陈福生把张子龙的心扔到锅里煮，并对战俘们噪道：“每人都吃一片。谁不吃就是同情张子龙，就是想回大陆，就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这就是美国代表所坚持的“自愿遣返”的血腥内幕。

随着美方在板门店和谈中提出“根据战俘自愿遣返”的无理建议，停战谈判又陷入僵局之后，战俘营内双方的斗争也急剧尖锐起来。美、蒋特务们极力发展其“反共抗俄同盟”等反动组织，并利用其控制的联队警备队的执法权利，在集中营内不断制造事端，殴打战俘，制造白色恐怖。共产党员张泽石把在美军《星条报》上看到的有关和谈的消息，告诉了俘虏营的一些战友们。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开展以反背叛、争取回归祖国为宗旨的斗争，在群众中大力进行秘密宣传和发展地下斗争组织，并把分散的、自发组织的地下党、团及爱国组织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

1951年10月9日下午张泽石他们获悉，警备队长、台湾国民党特务周大麻子召集紧急会议，他从包袱里拿出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准备明天庆祝双十节时在大门口挂出来，以便让美军记者拍照，制造中国战俘不愿回大陆的假象，使在板门店谈判的志愿军代表下不了台。周大麻子说，估计共党分子会捣乱，要严密监视，对为首的要来个突然搜捕，先抓起来。对此，他

们事先还跟宪兵司令部打了招呼，必要时，美军会协助行动。

当爱国战俘们知道敌人这一卑鄙阴谋后，十分气愤。大家都感到这次斗争关系到战俘们的前途、命运，更关系到祖国和党的荣誉。张泽石站起来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更不能任凭那些民族败类肆意歪曲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形象，即使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也要同敌人斗争到底。”

就在这天晚上，在共产党员的组织和带动下，爱国战俘们冲入警备队，烧毁了青天白日旗。敌人的军警特全部出动，第八十六集中营的20多个同志被捕了，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王少奇被叛徒特务毒打致死，他是第一个冲进团警备队痛打蒋帮特务周大麻子的，他是为捍卫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自10月9日流血斗争之后，叛徒、特务们继续以清查暴动分子为名，大批搜查我地下组织成员。在此情况下，张泽石提出：为加强对战俘斗争的领导，应正式成立地下党支部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核心。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议。但当调查哪些同志是共产党员时，却发现他们81个难友中竟只有时占魁、曹明和他是党员。原来，其余的人都是解放后新参军的青年。这样，他们当即决定由担任过连指导员的时占魁任支部书记，曹明任组织委员，张泽石任宣传委员，并兼任81人的战俘代表。同时成立了地下青年团支部，由周铁行任团支书，钟俊华、杨守让为团支部委员，他们参加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核心领导。

当天晚上，他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支部成立大会”。支部书记时占魁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肃立唱《国际歌》。难友们站起来，小声地默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热泪从一张张黄瘦的脸上淌了下来。大家坐下后，张泽石代表支部讲话，他先向北方深深地鞠一躬，面对着他们自制的一面党旗说：

“敬爱的祖国，敬爱的党，我谨代表远离您怀抱的三名共产党员和全体被敌人囚禁在孤岛上的战士，向您表示我们对您的忠诚！祖国啊，我们自从被迫远离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我们在苦难中每时每刻都深深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痛苦……”

“今天，我们3个共产党员，81名爱国者，重新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张泽石强忍住眼泪继续说，“我们深深相信祖国始终在关心着我们这些忠诚的儿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始终在支持着我们这些骨肉亲人……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他举起了右手，紧握了拳头，领读了誓词：

“茫茫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卖国贼！”

在第二天晚上，党支部和团支部又联合召开了王少奇烈士的追悼会，没有遗像，没有灵堂，只有一个用手纸、铁丝扎的花圈，只有几幅人民军战友送来的用烟灰蘸水写在手纸上的挽联：

“暂将热泪祭战友，怒讨血债向敌人！”

“不屈忠贞爱国志，尽洒热血民族魂！”

上午张泽石为王少奇烈士写了悼词，骆星一为它谱了曲，十几位会识谱的难友排练了这首挽歌。那天从清晨起就下大雨，开追悼会时更是风雨交加。暴雨打在铁皮屋面上，像祭奠的爆竹。追悼会在低沉的挽歌声中开始，又在激昂的挽歌声中结束：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
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仇恨永记在心里，
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
和敌人战斗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在追悼会上，地下中共党支部代表在讲话中说，王少奇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对祖国的忠诚，他是祖国的好儿女，是党的好战士！号召大家学习青年团员王少奇烈士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完成烈士的遗愿，把反对敌人迫害，反对背叛祖国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日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美蒋特务在美军的支持纵容下活动更加猖狂。在党支部会上，大家研究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第七十二、第八十六集中营的叛徒特务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公约，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撤走这个营内的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们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

在翻译这份抗议书时，张泽石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词典。为此，支部决定从发给他们一人一条的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朝鲜军换购一本英日词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人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本用旧了的英日字典。张泽石借助这部字典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军的公开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的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

为了扩大影响和配合战俘向美军管理当局的书面揭发、抗议，党支部还组织战俘在铁丝网里举行游行示威。

200 多人打着用中、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强烈抗议美方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坚决要求取消战俘营内的法西斯罪恶统治！”“反对美方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反对美方强迫战俘背叛祖国！”这些标语都是用纱布绑在帐篷杆子上，用手纸拼成横幅写成的。战俘们高唱《国歌》、《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走，跟着毛泽东走》等歌曲。这一斗争行动，很快传遍了巨济岛和釜山各战俘营，进一步鼓舞了战俘们要求回归祖国的斗争。

1952 年的春天来到了巨济岛，但春天并未给战俘营带来希望。形势更加严峻，板门店的和谈还在僵持着，美方加紧在战俘营推行强迫战俘背叛自己祖国的政策。叛徒特务们根据其主子的指示，加强了战俘营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对战俘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折磨。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动标语，在手臂上刺了“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直到在后背刺上“青天白日”，许多人被强迫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按手印，甚至被强

迫写“绝命书”。斗争愈来愈尖锐，敌人的镇压和迫害也愈来愈疯狂。

2月18日拂晓6时，一支美国军队将巨济岛第六十二号战俘营中的5000名战俘包围起来，由美、李、蒋特务对战俘逐个进行所谓“甄别”。当不甘心忍受污辱和虐待的中朝战俘们拒绝“询问”和“甄别”时，战俘营当局立即对第六十二号战俘营的战俘们发出警告，话音刚落，站在四周的美国兵用步枪、手榴弹血洗战俘营，并且还开来了坦克，大批手无寸铁的战俘倒在了血泊里。那些英勇斗争的朝中战俘人员的鲜血，向全世界昭示了真正的自由意志是不能被任何邪恶势力侮辱的。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此次“巨济岛惨案”中，战俘死伤373人。

3月13日，也就是2月18日惨案的血迹未干，美方士兵在巨济岛又挥起了屠刀，战俘死伤38人。为此，朝中谈判代表严厉抗议美军暴行。

随着美方强迫扣留战俘活动加紧，镇压行动也越来越变本加厉。从4月8日起，更加野蛮残暴的大规模的强迫“甄别”开始了。美军在巨济岛空地上搭起一个高大的“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的威逼下走进这个阎罗殿，听候宣判。在“审查室”的出口处有两条窄窄的通路，均有台湾特务把守。一条铺满鲜花，说是到台湾的“光明之路”、“自由之路”；另外一条路布满刺刀、匕首，愿意回祖国的人必须从这儿向外冲，跑慢了，不被刺死也要被刺伤。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战士石振青，就是被台湾特务用乱刀砍死的。1952年初，合众社记者发自巨济岛第一战俘营的电讯透露：巨济岛的“集中营中心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在这里的战俘日常生活中交织成一幅恐怖的图画”。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被美军残暴枪杀的战俘就有17000人之多。美军不仅随意枪杀战俘，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美军第一九一号登陆艇上灭绝人性地用战俘作细菌试验。据美联社透露：试验结果，“被关押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80%染有某种疾病”。

美军还要蒋介石从台湾派来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冒充战俘混入战俘营，强迫志愿军被俘人员在身上刺字，强制他们写血书和组织“反共救国团”之类的组织。据在朝鲜被志愿军俘获的美蒋特务王顺清、刘炳章、王福田供称，他们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经常严刑逼讯，强迫“签名按手印”“我被俘人员为反屠杀求生存，英勇斗争，因而普遍遭到毒打，甚至水刑、电刑，直至剖腹、活埋。

1952年4月8日、16日，以台湾特务李大安为首的50名暗杀团，各执有US字样尖刀一把，对被俘人员坚持要求遣返者，曾当场将数人挖心、割肉，他们的罪行激起了志愿军和人民军战俘的强烈反对。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开始了。1952年5月7日，巨济岛战俘营一片寂静。

13点30分，作为战俘营的最高长官战俘营的总管杜德准将，在严密警戒下，乘车来到巨济岛战俘营第七十六联队。这位准将发现站在第七十六联队营门内的一群人民军战俘与往常有些不同，一个个挺胸挽臂，目视前方，但他没有去想这些人为什么与往常有些异样。

早在当年4月，战俘们就曾多次强烈要求美方停止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要求战俘营当局给予人道待遇。可是这位自认为掌握了战俘生杀大权的杜德准将，从不理睬。这次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傲慢，大摇

大摆来到七十六联队俘虏营大门口，和站在门口的战俘代表们迎面而立。

人民军战俘代表对杜德说：我们在战俘营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你们强迫“甄别”，虐杀战俘，经常断粮断水，违反国际公约，对此再次向你提出严重抗议。

“你们要知道，战俘就是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杜德仍像过去一样，并不答应对战俘生活作任何改善。战俘们愤怒了，时针指向15点20分，第七十六联队战俘营的大门突然打开了，10多个手无寸铁的人民军被俘人员从帐篷里冲了出来，一个人民军被俘人员抓住杜德的手，另一个人抱住腰，两个人拖住腿，把这个肥头大耳、哇哇乱叫的美国准将，连拖带拉地弄进了铁丝网，随即把大门关起来。这时，杜德全身发抖，脸色惨白，两腿瘫软，连话都不会说了。

杜德被扣以后几分钟，第七十六号战俘营的门口，就挂出了一幅七米长、两米宽用英文写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杜德被抬进了第七十六号战俘营，由被俘人员中的外科医生，给他包扎好他被抓进来的时候被削铅笔的小刀割破了的手指。被俘人员代表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说：“希望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我的部下就要发怒了！”被俘人员代表告诉他：释放他的时间决定于他本人是否能在谈判中很快答应战俘们的合理要求。

就在这时，战俘营周围开来了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步兵，眼看一场屠杀就要开始了。战俘们之所以扣留杜德，只是为了要求改善战俘的待遇，要求杜德听一听各战俘营战俘代表们的呼声，停止强迫“甄别”。现在，为了避免一场新的流血，他们要杜德签署手令，解除武装包围。杜德接受了这个要求，下达了如下手令：

“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柯尔生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七十六联队。”

为了便于谈判的进行，第七十六号战俘营的被俘人员，特地把原来住100人的帐篷腾出来，作为杜德的临时住所，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并要杜德通知他的部下给他送来一部电话机，一张行军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允许外边按时给他送饭，同时派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国兵来服侍他。

杜德被安置好以后，被俘人员代表正式告诉他，要巨济岛各战俘营都派代表来这里参加谈判，以便通盘解决各战俘营的问题。杜德马上通过电话命令战俘营管理当局用吉普车将代表接来。当晚，中朝被俘人员代表43人在这里开了一次会，同意成立战俘代表团，并当场选举了正副团长。会议是在杜德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5月8日，在七十六号战俘营帐篷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纷纷发言，列举大量事实哭诉美方迫害、屠杀中朝被俘人员的罪行。一位被他们强行截断右臂的人流着眼泪说：“惨绝人性的战俘营当局披着慈善的外衣，硬是把我的右臂锯掉了！这就是你们的仁慈吗？”杜德坐在会场上，大会主席还不时地问他是不是事实，他只是点头示意。对于战俘代表们提出的增加口粮、饮水和被服，以及为伤病战俘治疗等要求，他都点头同意。

就在这个时候，范弗里特已派第一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生准将接替社德统管战俘营了。在此种情况下，朝中战俘代表团就要同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战俘营外的查尔斯·科尔生两个人谈判。科尔生和杜德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每天把他们商量的结果，由杜德向全体朝中战俘代表作口头答复；如果大家有意见，再向杜德和科尔生提出，由他们研究后重新答复。5月9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范弗里特还亲自到巨济岛来向科尔生面授机宜，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通了电话。

朝中战俘代表团在自己办公的帐篷里，摆满了各战俘营代表秘密搜集的美军虐杀战俘的文字和图片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编写的美军屠杀战俘大事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机关报《星条报》、南朝鲜的《民主新闻》、《釜山日报》，以及美国报刊上登载的片断材料。

5月9日，朝中战俘代表起草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并向杜德提出四项条件。

第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第二，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第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第四，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当新任战俘营总管科尔生准将接到这四项条件时，已是5月10日。他立即报告李奇微。李奇微正在向克拉克交代工作，他立即决定：电告范弗里特，制止科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与此同时，质问范弗里特为什么没有执行他5月8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紧接着5月10日当天，美方调集美军第一八七空降团，派出数千人的作战部队，使用飞机、坦克、喷火器等各种武器，在巨济岛各个战俘营对战俘们进行血腥镇压，不少战俘又残遭杀害。

但是，终因杜德还在战俘营里，5月10日中午，科尔生才不得不回信同意了战俘们提出的要求。科尔生与杜德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一、关于你方信中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犯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二、关于第二项，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三、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

四、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这一对朝中战俘代表四项要求答复的联合声明，由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用打字机打成正式文件，并由科尔生和杜德亲自签署后于5月10日晚送交朝中战俘代表团。被科尔生和杜德的供状和诺言弄得狼狈不堪的克拉克，曾尴尬地掩饰说，科尔生的诺言是“在极大的威胁之下作出的”。但事实是：

受到胁迫的是朝中被俘人员，并不是这位拥有众多武装力量的战俘营长官。

在杜德被扣的第二天早晨，美军就开来 22 辆坦克，围着第七十六号战俘营的铁丝网来回巡逻，大约一个团的步兵在营场四周挖工事，在两边山头上还架起了大炮。5 月 9 日上午 9 时，科尔生一上台，就通过广播器威胁朝中战俘：“限你们 10 分钟以内释放杜德，否则，我将用武力来营救他。”朝鲜被俘人员告诉杜德说：“如果科尔生用武力来破坏我们之间所进行的和平谈判，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便通知科尔生不要使用武力。

5 月 10 日上午，美军坦克又包围了七十六号战俘营，并且摆出向里冲的架势。杜德知道以后，十分惊慌地打电话叫科尔生“赶快把武装兵和坦克撤退”。在这一天，科尔生发出过五次最后通牒，每次都出动坦克把七十六号战俘营包围起来。朝中被俘人员十分镇静，只要向杜德说一句“又来了”，他马上就张慌失措，抓起电话找科尔生讲话。假若碰到接电话的是上校，他就厉声嚷道：“我不要上校，我要找将军讲话。”然后，就对科尔生说：“千万不要用武力进来，我在这里很安全。”

5 月 10 日下午 9 点 45 分是朝中战俘代表团释放杜德时间。杜德释放前，一个战俘代表问他：“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杜德把事先写好的一个纸条交给这位代表，大意是：“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七十六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 78 个小时又 30 分钟的杜德，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由杜德和科尔生签署的联合声明，通过新闻媒介发出之后，震动了世界。因为这一声明出自巨济岛战俘营前后两任总管之手，对于处境艰难的战俘们来说，的确是一次斗争的胜利。从此，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英国报纸《雷诺新闻》5 月 18 日对此发表评论说：“巨济岛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式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

但是，杜德一出铁丝网，美军当局就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它的一切诺言。在李奇微离开东京几分钟后，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将军就发表声明说：“科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科尔生将军对此所作的任何承诺，亦应根据这种情形来加以解释。”

接着而来的是克拉克命令波特纳接替科尔生为美军战俘营总管的职务。对朝中战俘进行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开始了。正是：

迫害战俘丧天良，“自愿遣返”为哪桩；

美蒋李特下毒手，欲盖罪行反弥彰。

欲知美方如何对朝中战俘进行残酷报复，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五章 残酷的报复

美军枪炮齐出动，疯狂镇压战俘营；
宁死不屈奋抵抗，气壮山河是英雄。

杜德事件发生之后，李奇微慌了手脚，指令范弗里特，要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镇压战俘。他恶狠狠地说：“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的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要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

范弗里特紧急命令出动美第一八七空降团和派出 12000 名作战部队以及美第三师的一个营。巨济岛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形势十分严峻。5 月 9 日晚上，朝中谈判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 10 日的会议上，向敌人提出抗议，声援我方被俘人员的义举。

第二天上午，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大会上义正辞严地宣读了我方抗议书：

“我奉我方司令官之命通知你方：在我方被俘人员被你方收容期间，你方就有计划地采取一系列的野蛮办法来实现你方蓄意已久的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你方这种在自愿遣返名义下进行的罪恶行为，彻底破坏了日内瓦战俘公约，违反了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我方被俘人员对于你方这种非法不义行为的反抗完全是正当的。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的接二连三的血腥镇压，都不能动摇我方被俘人员要求遣返的坚决意志。你方司令官竟于最近公然声称要对手无寸铁的我方被俘人员施行再一次的屠杀，这是不能容忍的。你方应该清楚知道，保护双方司令官收容下的战俘的安全，并尊重他们的人格，乃是双方司令官所不可逃避的义务。你方必须对我方被俘人员的安全负完全的绝对的责任。”

美方虽然对朝中代表的抗议有了准备，但仍然狼狈不堪。为了掩饰丑态，美方只有求助于造谣、诬蔑，说巨济岛上朝中被俘人员的英勇斗争，是朝中代表团遥控指挥的。李奇微耸人听闻地说：“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杜德被释放出来之后，美国将军们就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图谋对战俘进行更残酷的迫害。首先宣布对第一、二、三战俘营的 3500 名伤病战俘进行甄别隔离。为此，战俘营司令约翰·博斯蒂克在 5 月 11 日发表通令说，只向新的战俘营供给水和食物，原战俘营一律断电、断水、断粮。第三战俘营的战俘，无视布置在三个战俘营周围的三个步兵营，提出了先经过谈判才能接受审查和转移。博斯蒂克拒绝会见第三战俘营的代表，其他两个战俘营对这一命令也采取了蔑视态度。

经过一个似乎平静的夜晚之后，战俘们开始行动了。他们写了标语牌，挥动着旗子，高唱着爱国歌曲示威。美军第十五团士兵手持刀枪包围了战俘营，坦克也出动了；但是，示威者拒不服从博斯蒂克的命令。

5 月 19 日，范弗里特决定使用武力。第二天早晨，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接着美军进入第三战俘营，准备镇压战俘的反抗。战俘们手持石块、链枷、削尖的帐篷杆、钢管和大刀对抗。美军用催泪弹把战俘驱赶到一个角落，然后强迫他们转移。在这场斗争中，11 名战俘死亡，29 名负伤。

在这之后，斗争愈趋激烈。为了使战俘顺利转移，范弗里特任命原第二师副师长海顿·波特纳为巨济岛新的司令。波特纳决定士兵和工程技术人员

共同投入修建新战俘营，还命令施工部队实行两班倒，每班 12 个小时。为了便于对战俘的控制，波特纳还把 6000 多名居民迁离该岛。

进入 6 月，经过充分的准备后，波特纳命令战俘迁到新址，接受隔离甄别，但战俘们并不把他的命令放在眼里。第八十五、九十六、六十战俘营挂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共产党的党旗。6 月 4 日，美军第三十八团的步兵，在两辆坦克的援助下冲入第八十五战俘营。坦克撞倒旗杆，美军捣毁了标语牌，烧了共产党的旗帜，并解救了 10 名被战俘捆绑的美蒋特务。战俘们奋起反抗，美军对他们施用催泪弹和火焰喷射器，造成了多人伤亡。

在此严重情况下，战俘们估计恼羞成怒的美军当局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还会报复，甚至实行大屠杀，于是决定立即做好反大屠杀的战斗准备。第七十六战俘营的全体难友，紧急挖掘坑洞和战壕，组织战斗队和敢死队，制备了“燃烧弹”、“梭标枪”；全营进行了战斗动员，并举行了战斗演习。中国志愿军的战俘们，也积极参加了朝鲜战友们的战斗动员和准备。他们被请到各帐篷去讲演，讲述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的故事；还和朝鲜战友一起挥汗挖壕沟。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他们深深感受到中朝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骨肉情谊，并为朝鲜战友们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大的血洗开始了。6 月 10 日清晨，波特纳强令第七十六号战俘营的战俘，按 150 人一组集中起来准备迁移。战俘们手持大刀、长矛、帐篷杆守在壕沟内准备反击。美军第一八七空降团战斗队随即赶到，他们用手榴弹、催泪弹、刺刀把大部分战俘从壕沟里驱赶出来，接着 6 辆坦克开进战俘营，机枪对准在壕沟里坚持战斗的 300 名战俘开火。战俘的反抗被摧毁了。在这场两个半小时的战斗中，31 名战俘死亡，139 人受伤。美军一人被长矛刺死，14 人受伤。

美军在清理第七十六号战俘营时，发现该地共有 3000 支长矛，4500 把匕首，1000 发汽油弹，还有不少棍棒、斧头和铁锤，这些武器是战俘用废料制成的。美军害怕了，他们决定对战俘进行更大规模的清洗和血腥镇压。他们先以数千兵力紧紧包围了战俘营，然后用坦克从四面八方压倒铁丝网突入营内，跟在后面的特种兵部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毁帐篷，步兵则用催泪弹、机枪、冲锋枪扫射。不畏强暴的第七十六号战俘营的敢死队员们，他们在愤怒的呐喊声中勇敢地投入战斗。全营几千名战友为他们鼓劲，高唱《国际歌》。三辆美军坦克被“燃烧弹”烧毁，一些正持枪扫射的美军被从后面战壕中突然飞来的投枪刺中，嚎叫着倒下，而更多的英勇的敢死队员们高呼着“祖国万岁”的口号跳出战壕，向坦克、装甲车扔出最后一颗熊熊燃烧的汽油弹，壮烈牺牲。在这场血腥大屠杀和反屠杀斗争中，人民军战俘共伤亡 300 余人。战士们用鲜血再次宣告了他们永远忠于自己的祖国！

这场血腥大屠杀过后，1952 年 6 月 10 日傍晚，18 名朝中战俘的正式代表被判成所谓战犯，押往巨济岛最高监狱。走下囚车后，志愿军战俘张泽石直起身来，看见前面一座有人字形屋顶的石砌坚固楼房，门栏上方刻有英文最高监狱几个字。他正看着，背上挨了一枪托，美国卫兵吼道：“混蛋！给我滚到墙根那边去，面对墙蹲下，把双手放在脑后！”一种人格被侮辱的耻辱感深深地刺痛了张泽石的心，那张写着“我方保证决不对你们报复”的《释放杜德协议书》和波特纳在上面签字时的阴沉面孔再一次浮现在他眼前。“这个背信弃义的禽兽！”他在心里骂着，并告诫自己要准备为“活捉杜德”付

出更大的代价。

进门后，看守打开第一扇木门，让他把鞋脱在门外，趁他躬身往里走，看守一脚把他踹了进去，他从地板上翻过身来，愤怒地喊着：“我抗议你们这种虐待战俘的暴行！”那个看守皮笑肉不笑地瞪着眼对他说：“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战俘！只有战犯和刑事犯！”说完吹了声口哨锁上门走了。

“好嘛！我们从战俘升级为战犯了，真他妈的感谢美国鬼子！”

他坐在牢房地板上揉着被撞疼的膝盖骂着。环顾这间单人牢房、顶多有0.8米宽、2米长、2米高，四面都是松木板，这大概也是为了防止囚犯自杀吧！“真可笑！要自杀用不着等到今天，还要留着这条命跟你们拼到底呢！”这么想着，他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张泽石从昏睡中被开门锁的响声惊醒，在牢门前立着一个中等个子的美军少尉，他查对了张泽石的姓名后说：“你跟我出来！”张泽石随他来到外间那两张办公桌前。这个美军少尉指着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夹说：“你是中国战俘代表，你先签字吧！签了字就可放你回去！”他打开文件夹，把签字笔往张泽石跟前推了推。张泽石俯下身看那文件，标题就使他大吃一惊——《悔过书》！他急速读下去，大意是“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对杜德将军非法地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人身折磨，强制杜德在《认罪书》上签了名，承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保证今后绝对服从战俘管理当局的命令”等等。

“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张泽石对这位美国人说，“事实是杜德将军签名是完全自愿的，我们对他的人道待遇科尔生将军、波特纳将军都是确认了的！”他把笔一放，“这个字我不能签！”

“看来你是很喜欢这监狱生活，也不愿回到你同伴中去了？”这位少尉说，“那你就回牢房吧！”

张泽石刚走进牢房，这个少尉就把他推到墙角，恶狠狠地说：

“现在就让你尝尝蹲监狱的滋味吧！”接着对他拳打脚踢起来。

张泽石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朝鲜战争爆发后自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来到朝鲜后英勇奋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他躺在潮湿的地上，腹部、下额、后脑、两颊剧烈疼痛，他愤恨，他怒火中烧，他要复仇！但是，他一闭上眼就觉得那凶残的眼光仍在盯着他，那份《悔过书》、那支签字笔又晃动在他眼前。

“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这个念头使他警觉起来，“这些家伙大概是看中我是个文弱书生，在代表中又最年轻，先拿我开刀，好打开突破口吧？”

“不，决不能上敌人的当！”他努力鼓励自己，“要斗争！要勇敢地斗争！”第二天，张泽石决定采取主动。在放风后，他向看守长要求给他纸笔：“我要给波特纳将军写封信！”他在这封信里，叙述了中朝战俘谈判代表们所受的虐待，叙述了他自己被强迫要在什么《悔过书》上签字与那位美军少尉对一位数千名中国战俘的代表所施加的无耻的人身侮辱与摧残，并写道：“对此，我提出强烈抗议！所有的事实你是完全清楚的，代表团并未给杜德将军任何人身侮辱和折磨，以迫使他在《认罪书》上签字。我们是无罪的，把我们判定为战犯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坚决要求立即无罪释放代表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所代表的各自的战俘营中去！”

日子一天天熬过去，眼看7月1日党的生日快到了，6月30日早晨，利用放风的时间，张泽石和黎子颖等一些难友商定明天绝食一天，由张泽石今

天向波特纳提出书面抗议：“抗议美方不遵守双方协议，扣押代表入狱，要求立即将我们中国代表释放回 602 号战俘营去！”

绝食开始了。7 月 1 日下午，布鲁克斯上尉和一个手里端着盘子的穿白大褂的美军医生来到张泽石的牢房，并且吼道：“我不允许你在监狱里还搞什么绝食斗争！我奉波特纳将军之命来劝说你们！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将给你们注射针药，让你们的胃里翻腾起来！”

“布鲁克斯先生，”张泽石正言道，“如果你真敢对中国战俘代表下毒手，如果我不死，我一定要向全世界控告你！”

布鲁克斯狠狠地看着他，一挥手和那个美军医生一起退了出去，把牢门“砰”的一声关死了！临走，从窗口对他吼了一句：“我要让你永远在这里呆下去！”

经过斗争，敌人对他们的限制也逐渐有所松动，战俘代表们可以利用放风时间交谈，互相教唱革命歌曲。每到早上和黄昏，他们就轻声唱起高尔基的《囚徒之歌》：

太阳出山又落山哪，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总逃不出牢监。

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我的铁链！

1952 年 9 月 10 日下午，这 18 名被判为“战犯”的朝中战俘代表，在监狱里被囚禁了整整 3 个月，不，用他们的话说是 2208 个小时之后，他们被宣布“服刑期满”。然后一辆大卡车将他们送回巨济岛战俘集中营。

就在美军对朝中战俘进行残酷报复、镇压时，在板门店，朝中代表团一直和美方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1952 年 5 月 19 日，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叙述了对方一系列屠杀战俘事件，特别是最近对巨济岛战俘营残暴镇压后指出：现在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事实是，尽管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采取如此野蛮办法，强奸他们的意志，但我方被俘人员仍不屈服于你方暴力之下。

南日将军严词质问道：“难道我方被俘人员不能容忍你方的虐杀而甘冒遭受集体屠杀的危险，向你方提出正义要求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进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恶活动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不顾日内瓦公约，违反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对我方被俘人员施行各种暴行，甚至采取屠杀的手段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有强迫甄别不是事实吗？”在一连串的质问之下，美方代表只好低下头去，无言以对。

在 5 月 28 日的双方代表团的大会上，据中国谈判代表柴成文所写的回忆录，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和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将军，进行了如下的交锋和对话：

南日：为什么你方战俘营内发生的无数次屠杀事件连一次也不能交代？

哈里逊：（拒不回答问题）我建议休会。

南日：看来你无法答复。我再问你，你以为你们对我方被俘人员公然进行屠杀，而又没有作负责的交代，你方现在就可以公然集合大批军队，甚至聚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屠杀吗？

哈里逊：（哑口无言，达五分钟之久）我现在和今后都不愿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帐篷外面有关的事实已经讲过了。我建议休会。

南日：一切有关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和安全的问题，都与这次会议有直

接关系。我们是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帐篷外面举行会议。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哈里逊，（没有吭声）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甄别？

哈里逊：（低头不语）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答复关于战俘的生命和安全的抗议和质问？

哈里逊：（又过了五分钟，他仍一声不吭）

南日：为了使你有时间考虑这些质问，我同意休会到明天通常开会的时间。

哈里逊：我同意。（站起来就走）

美方代表虽然理亏辞穷，但是他们的军队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朝中战俘的残酷镇压和迫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中朝战俘始终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

中国战俘，他们从来没有忘记新中国的誕生日。

1952年国庆节将近的时候，每500人住在一起的铁丝网里，人们用各种方法做起国旗来；有一面旗子就是用每个同志身上的血染红的。

10月1

日的早晨，就在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前，红旗升起了，人们仰望着她，向往着祖国！美军居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向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开枪，致使141人流了血，其中56人牺牲了。不过那庄严美丽的红旗，始终没有被敌人抢去。

经过抗议和不屈的斗争，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允许战俘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那些杀人的主使者也被迫在英雄的墓前低下头来。战俘营的战士们，从此唱出了自己的歌：《十月一日的红旗》：

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

英雄们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

敌人愈残暴，我们更坚强，

拳头挡住刺刀，石头抵住机枪，

臂膀靠着臂膀，胸膛筑成铁墙，

保住了我们的红旗，打击了敌人的疯狂。

仇恨结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偿，

可恶的美帝，逃不出世界人民的手掌。

新中国男儿英雄事迹天下扬！

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

英勇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血的巨济岛！”只有这句话才能一针见血地揭露出美帝国主义屠杀、虐待、侮辱战俘特别是妇女儿童的血腥暴行。在开城临时医院里，首批被交换回来的伤病战俘，控诉了美帝和美蒋特务迫害战俘的暴行。在一个帐篷后面，一群新闻记者访问了一个失去四肢的青年。他仅仅受了轻微的冻伤，但是在一个月以后给他第一次“医治”时，就把他的双手双腿都截去了。“我还只22岁，他们却把我弄成这样一个残废！”他最后咬着嘴唇痛心地说。另外一个人脱下他的军服，指给记者们看他左臂上的大伤疤。“台湾特务把我打得人事不省，然后给刺上‘反共抗俄’四个字。”他说，“我恢复知觉之后，就用一把剃刀把这些字挖去。有的同志用烧着的香烟头来把这些字烧

掉。”

在女病房里，那里一共有 21 人，是在交换伤病战俘的最后一天才回来的。这些朝鲜姑娘里有一个被美国人虐待得精神失常了，她躺在床上茫然直视。在她们所知道的 80 个在强迫“甄别”期内受了伤或成了残废的女孩子中，她们这 21 个是唯一被遣返的一批。

她们的经历是惨痛的，橡皮鞭子的抽打，残酷的电刑，以及专门为侮辱和损害女性而采取的种种非刑，都与“甄别”和“重新分类”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阻止她们回到自己的祖国。许多人就这样被折磨疯了。

重返祖国的急切心情，使她们连一分钟也不能忍耐了。她们愤怒地用铁盒罐头砸开车窗玻璃，从破洞口中伸出了一面又一面国旗和一幅又一幅标语。这些国旗是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那些标语又是她们在车上撕开衬衣，咬破手指用鲜血写成的。上面写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兄弟的中国人民万岁！”车门一打开，她们都“哇”的一声哭着倒在亲人的怀里。如果不是医护人员紧紧扶着，她们简直要向在场的美国遣接军官横扑过去。这景象很自然地使人们想到：美国战俘营的长期虐待和侮辱在她们心中引起了多么深的仇恨。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炊事员杨玉城的归来在开城也引起轰动。他是在 1952 年 7 月间，从美方强迫扣留着的 14000 名战俘中逃出来的。

1952 年 3 月，在巨济岛八十六号战俘营中，他被打昏后，特务在他身上刺了“反共抗俄”四个字。4 月 7 日，这个战俘营开始血腥“甄别”时，他又被打昏。拖了回去，算做“拒绝遣返”者！但是，不管敌人怎样毒打和折磨，他只有一个思想、一句话：“坚决回祖国！”

以后几天，他留心着逃跑的机会和路线。可是，一星期后，被强迫扣留的 14000 人被押送到济州岛。志愿军被俘人员被分作两部分，现在隔着大海了。派来的特务越来越多，控制也越来越严了。敌人要把这些人变成能走路的死人、能说话的工具。敌人不许他们交头接耳，出帐篷要请假，进帐篷要报告。一不小心，耳光打上来了，棒子打上来了，宪兵队部里经常传出受刑人的惨叫。

5 月初的一天晚上，有人爬铁丝网被抓住了。人们被枪声惊醒。杨玉城借着手电筒的光，看见一个战俘双手被反绑着，几个南朝鲜兵用刺刀顶着他的背押出铁丝网。他被枪杀了。死，对于他们已不是什么可怕的威胁；逃，对于他们倒有一种很大的引力。第二天做苦工的对候，美国兵和特务一转身，许多人都小声说：“有人开始逃了！”杨玉城和十几个人商量过：“死不了就逃，要死也死在铁丝网外面！”

然而，杨玉城没有逃脱，第二天就被押回来了。他被美国人审问了三天，台湾特务对他威胁说：“你的小命值几个钱？你回不了国，共产党就把你剁死在三八线啦！”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始终喊着：“我要回祖国！”最后，美国人忽然变了，堆着笑脸说：“船来了就送你到釜山共产党的战俘营。”那时，杨玉城还不知道这正是美国人的阴谋。后来他才知道，他去的地方正是美国人特别布置的刑房。一星期后，他被送到釜山第十一收容所。那时已经夜深了，他进了帐篷就向里面的人说：“同志，我好不容易逃到你们这里来了……”话音没落，两个耳光就打上来了。

毒打开始了，这完全是非人的折磨！特务和美国兵把杨玉城捆起来，再把他装进一个帆布袋子里，打他，摔他，用脚踏他。第三天晚上，敌人以为

他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人了，就把他从袋子里放出来，杨玉城背上血和衣服都粘在了一起，动一下浑身就像针扎一样。两天两夜已经没有任何吃到一口饭喝到一口水了，嗓子里渴得冒烟。敌人都睡得像死猪一样。那天晚上有月光，远远地就看见铁丝网了。他爬到铁丝网跟前，留心一看，才知道是两层。十层也要爬过去！在他靠近铁丝网时，敌人就已经发觉了。他半立起身，手搭上铁丝网，正要用力，枪响起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臂，另一颗子弹又射穿了他的右腹。

当天晚上，他被送到战俘医院。到了7月，杨玉城的伤渐渐地封了口。一天，一个美国军官带着一个台湾女翻译对他说：“你刻了字，为什么还要到共产党那儿去？”杨玉城喊着说：“我就是共产党的人嘛！刻字是你们强迫的嘛！”

女翻译说：“回去了，共产党要杀你，蒋总统欢迎你们去台湾！”杨玉城已经压不住火气了，他向女翻译呸了一口，大骂道：“去他妈的蒋介石吧！他没有把中国人杀完！我还到台湾去送命？！”

现在杨玉城终于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了。他在美国战俘营里度过了两年又三个月的非人日子。每个人完全可以想像到他回到祖国怀抱时的激动心情。他向战友们哭着说：他左臂被刺字的地方，有两块伤疤，下面是用牙齿咬掉的，上面是用消毒粉蚀掉的。他说：“我还是活着回来了！我身上每一块肉都在敌人的鞭打下流过血。我这一生就记着两件事：共产党的恩，敌人的仇！”

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战士。在战场上，他们英勇奋战；在战俘营，他们坚贞不屈！我们正是因为有了这支英雄的队伍，才能百战百胜，无攻不克；我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强的脊梁，我们伟大的祖国才逐渐变得繁荣富强，永远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美帝国主义虽然对中朝战俘，百般摧残虐待，但他们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了，杜鲁门政府已处于“黔驴技穷”之境。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章 黔驴技穷

内外交困还发疯，黔驴技穷力不从；
民怨沸腾人心失，杜氏犹坐火山中。

1952 年对杜鲁门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年份。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在谈判桌上也连连受挫，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用中国的话说是“黔驴技穷”了。而这一年，正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进行竞选，对杜鲁门来说是尤为不利的。

但是，作为现任总统，杜鲁门不愿失面子，与其竞选失败，还不如来个高姿态，不参加竞选为好。于是在这个重要时刻，他抛出了一篇“奇文”，所谓 1950 年 4 月 16 日的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说，早在两年之前，他的政绩最为“辉煌”的时候，杜鲁门就决定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了，多么谦虚，多么高明啊！

现将这个“备忘录”抄录如下：

我不是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的候选人。

我第一次竞选公职是在 1922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军队里服务了 2 年，在参议院 10 年，担任参议院副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两个月又 20 天。我担任公职有 30 多年，就任美国总统差不多整整两届。

华盛顿、杰斐逊、门罗、麦迪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伍德罗·威尔逊以及卡耳文·柯立芝是就任两届总统的先例。只有葛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试图打破这个先例。弗兰克林·罗斯福成功了。

我认为，当 8 年的总统就够了，而且有时候，对任何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来说，都是吃不消的。

权势有一种引诱力。它可以渗入人的血液，正如大家知道的赌博和贪财有引诱力一样。

我国是一个共和国，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我愿意这个国家继续是一个共和国。辛辛纳图斯和华盛顿指出了这条道路。当罗马忘记了辛辛纳图斯，它就开始衰退。当我们忘记了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这些人的榜样（所有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原是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的），我们将开始走上独裁和毁灭的道路。我知道，我能够再度当选，并能继续打破为弗兰克林·罗斯福所打破的旧的先例。

但我决不这样做。今后这种先例的继续，不应当靠宪法修改案，而应当靠以在职的人的荣誉为基础的惯例。

虽然我可以辩解说，我只做了一届总统，但为了重新建立这种惯例，我不是一个候选人，我将不接受另一届的候选人提名。

杜鲁门对外声称，他已决心不参加 1952 年的总统竞选，作为民主党的领袖，他所关心的问题则是向人民推荐一位合适的人做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美国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

文森曾在好几届国会中任职，在国会里他被认为是税务和另外一些问题的专家。他曾在联邦高等法院任职。在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任命他负责稳

辛辛纳图斯：罗马政治家。据历史传说，公元前 458 年，辛辛纳图斯被罗马城居民推举为独裁官，让他去援救被埃魁人围困于阿尔基多斯山上由一位执政官率领的军队，他接到此项任命时，还在自己的小农庄上耕作。据说他一天内就打败了敌军，在罗马举行了凯旋式，危机一过，即主动辞官返回农庄为民。

定经济的工作。后来他作为总统的助理进入白宫，负责管理战时经济以及转入和平生产的重大工作。在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之前，又在杜鲁门政府里担任过财政部长。杜鲁门认为：“文森具有一种天赋的个人忠厚和政治忠诚，这在华盛顿上层人士中是罕见的。在华盛顿，有些人争夺政治权益时常常背信弃义，而文森就不这样。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和感情不外露的爱国者，他还能够始终不渝地对个人和对党表示忠诚。”

然而，杜鲁门的建议被文森拒绝了，文森对这位现任总统说，在他同妻子商谈并慎重考虑以后，他仍然真正地感到，并且在他的心目中认为，他不应当利用法院作为爬上总统职务的阶梯。杜鲁门虽然从中多次劝说，但文森最后仍以“身体健康欠佳为由，坚决地予以拒绝”。

接着杜鲁门又挑选伊利诺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鲁门喜欢史蒂文森的“政治素养和从政经历”。史蒂文森出身于一个有政治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曾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同格罗弗·克利夫兰一起参加过1892年的竞选运动和选举。他的祖父还曾在1880年同温菲尔德·汉考克一起作过总统候选人。他曾经在国会里任职。史蒂文森的父亲，参加过伊利诺州政府的工作。而史蒂文森本人也给杜鲁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伊利诺州的一位出色的州长”。

在竞选总统运动中，史蒂文森的演说才能果然名不虚传。他的确擅长讲演，因为他的讲演词能够触及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为了赢得选票，史蒂文森在俄勒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回答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说，他若主持白宫，“将清除华盛顿的污垢”。这句话在广大选民中引起了欢呼，但在民主党内却引起大哗。杜鲁门对此十分不满。他说：“我怀疑史蒂文森是接受了共和党的欺骗宣传，把我们华盛顿窗户上苍蝇留下的粪污夸大为一个大的污点或‘污垢’。近几年来，共和党反对派曾企图制造一个案件来反对政府，但是它只发现政府对根除任何地方的贪污或恶习永远保持警惕。只要有人行贿，就必然有人受贿。这在私人企业是真实情况，在公用或政府企业也是这样。这在工业、银行和联邦政府亦同样是真实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在政府里要少得多。由于史蒂文森在俄勒冈的疏忽大意，使得共和党反对派在艾森豪威尔竞选运动中敢于进一步提出两个骗人的论点——贪污和朝鲜事件。”

由于杜鲁门政府对内增加税收，加紧扩军备战，对外疯狂进行侵朝战争，引起广大美国公民的强烈不满。因此从竞选运动一开始，民主党就处于下风。而与他们对阵的却是声名显赫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西方盟国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当时又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活动，巩固了他在美国右翼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政治上可靠的高标准。美国政客们确信，这样的职务能为艾森豪威尔轻而易举地开辟通向白宫之路。

当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忙于北约事务时，在美国国内狂热的政治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2年的竞选运动看来将要达到少有的激烈程度。在华盛顿政治交易所里，对杜鲁门总统的评价不高。在1952年竞选运动开始前，杜鲁门实际上是个政治破产者。经济已转入和平轨道，杜鲁门却不裁减军备，因而恢复平时生产进行得相当吃力。

1948—1949年经济危机的伤疤也还没有痊愈。在朝鲜，美国被迫承担侵略战争的主要负担。战争虽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但也没有因此受到普通美国人的欢迎。美国的盟友在这场军事冒险中只是出了最小的力。共和党向民主党展开大规模的攻击，声称美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困难，是由于杜鲁门领导无能和民主党的总的政治方针所造成的。

美国许多政治领袖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时刻已经到来。要执行新的政治方针，必须有新的领袖。艾森豪威尔虽然领导北约的时间不长，但是，就在这有限时期内，他已经证明，他将是妄想统治世界的美国垄断集团意志的一个出色执行者。对华盛顿实现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艰难，艾森豪威尔心中是有数的。可能从他未来的政治前途来考虑，艾森豪威尔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表现出了他利用自己全部威望和才能，去实现美国统治集团提出的侵略性对外政策的决心。

提名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日益展开。堪萨斯城的出版人罗伊·罗维尔特斯肯定他说，他还在30年前就知道，艾克是“堪萨斯的优秀共和党人”。参议员约翰·斯巴克曼在亚拉巴马宣称，他将争取让德怀特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但是艾森豪威尔，他从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表现了一种“善于控制自己的重要品质”，从不轻易表态。

杜鲁门总统曾两次派遣原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去见艾森豪威尔。这位外交官肩负着一个难以完成的使命：说服德怀特以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尽管杜鲁门向将军保证，在未来的选举中将全力支持他，艾森豪威尔仍然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以民主党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建议，因为我好像是共和党人的成份比民主党人的成份多。”僵局打开了。艾森豪威尔第一次相当肯定地暗示，他打算竞选总统。

到了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了。1952年4月11日，将军得到了白宫的同意，从1952年7月1日起，解除他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职务，从军队退役。在北约主要成员国首都进行告别拜会之后，艾森豪威尔于1952年6月1日返回美国，以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显然是从实际出发考虑的。一般说来，美国大多数选民都把自己看作民主党人，但对这位有名望的将军同样也会给予广泛支持的。以共和党候选人竞选。能保证他能得到有势力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帮助，垄断资本集团对共和党的倾向大大超过对民主党的。这就是他竞选策略的总轮廓。

在1952年6月7日至1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政治赌博中，艾森豪威尔是手握王牌的：“头号”战争英雄的威望和工商界的支持。大企业家的头面人物通常不亲自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在幕后左右形势，并以此自得其乐。在艾森豪威尔问题上却是个例外。“汽车大王”福特二世和“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查尔斯·威尔逊等垄断集团的头目，都出席了共和党代表大会，积极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

6月4日，艾森豪威尔在阿比伦首次向全国发表电视政治演说。那天天下着雨，他穿着平民的雨衣，看起来有点奇特；他无表情，又口齿不清地念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他的话来回重复，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比他出现在电视机前更好，因为他使共和党的保守派放心。他说，他是通货膨胀的敌人，是高税收、政府集权、欺骗和腐败等等的死敌。尤其是，他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丢失中国”表示痛惜。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一致认为，与事先准备好的演说相比，艾森豪威尔对即席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精彩的。詹姆斯·赖斯顿认为，艾森豪威尔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师。赖斯顿写道：“他说话直截了当，平易近人，不使性子，不挖苦讽刺。同样重要的是，在回答某些问题时，他好像比他实际上更为坦率。他说话简洁，不像知识分子那样绕弯子。”

在具体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说，他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秘密方法；指出轰炸鸭绿江对岸的危险性。他说，他愿意为“体面的停战协定”而努力。当时美国的侵朝战争已进行了两年零四个月，战场上损兵折将，士气低落，加上高额的军费支出，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盟国的埋怨、泄气，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特别是美军七个陆军主力师长期陷在亚洲一角形成的战略重点的矛盾，使美国很多有战略眼光的人士忧心忡忡。人们普遍要求尽早结束这场胜利无望的灾难。

艾森豪威尔参加总统竞选，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本来，在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之初，艾森豪威尔就感到忧虑，但他说：“我国既已诉诸武力，就必须保证成功。”时至今日，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结束朝鲜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他过罢62岁生日之后两个星期，抛出一篇动人的竞选演说。

1952年10月25日他向人们公开许诺，他当选了总统，“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这项打动人心的“誓言”，征服了选民。在击败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竞选为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的角逐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人们清楚地看到，对外政策问题在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中占有特殊重要位置。在争夺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就国际局势，他也发表了一些清醒的见解。他反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是不可能占领的。即使共产党撤退，让出了地盘，美国也无法去填补这些真空地带。”一旦发生战争，西欧是否能给美国以有效的军事援助，他是非常怀疑的。因此他说：“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

艾森豪威尔明白，扩大朝鲜冲突的方针，孕育着外交连续反应的危险。因此，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一次对外政策的冒险，它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朝鲜战争证明，靠武力解决亚洲争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而且它已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亚洲人民心目中名声扫地，不仅需要寻找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还要制定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长期方针。1952年10月1日，艾森豪威尔宣称，朝鲜战争的主要担子应当由南朝鲜人自己承担，而不是美国人。“我们不想让亚洲把西方的白种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假如那里必须进行战争，就让它成为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而我们要支持的是捍卫自由事业的一方。”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演说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注意亿万选民感到最迫切的难题。他越来越肯定地表示，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势在必行。10月29日，艾森豪威尔声称，美国不应永远陷在朝鲜的陷阱里，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美国只是在同真正敌人的辅助部队作战。11月3日，他进一步强调：“和平事业是自由人民眼中的瑰宝，新政府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结束这场涉及美国千家万户、孕育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悲剧冲突。”

在美国大选期间，杜鲁门政府对朝鲜问题的政策，遭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抨击和谴责，迫切希望朝鲜问题早日和平解决。1952年10月18日，波兰

政府代表团在七届联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加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提案。这项提案一开头就建议参加朝鲜战争的各方：

——立即停止陆上、海上与空中的军事行动；

——按照国际准则将全部战俘遣送还乡；

——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部队在内，在两三个月之内撤出朝鲜，本着由朝鲜人民自己在一个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原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委员会应由直接有关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组成之。并建议将此列入议程的第一项，由政治委员会首先加以讨论。

由于这一建议完全违背杜鲁门、艾奇逊的愿望，结果被美方粗暴地否决了。

10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也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

“建议朝鲜交战的双方，在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双方停止一切陆上、海上及空中的军事行动。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则交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2/3的多数赞成决定。

“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美国、联合王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责成上述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精神解决朝鲜问题，此项措施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在内。”

这项提案是经过中、朝、苏三国政府磋商过的，经11月10日和11月23日两次修正。中朝外长于11月28日分别声明表示赞同。按理说，在当时，双方在战俘遣返原则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立即停火，战俘问题交给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委员会去解决，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是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但是，杜鲁门虚弱得很，十分害怕真理，就连这样的提案也被他拒绝了。

继苏联提案之后，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梅农又提出一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提议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该会由四个中立国组成，并由该四国推一公断人，遇到不能决定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朝鲜停火后90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30天后，如仍有未回家和未做出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11月21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国会演说，呼吁各国在印度提案基础上实现朝鲜的停战。

此时此刻，处于内外交困的杜鲁门，抓住印度这一提案，令其国务卿艾奇逊于11月24日提出，如果印度提案能够作些重要修正，美国将“衷心支持”。于是在美国的操纵之下，这个提案作了重要修正，并获得联大通过。这个由印度提出由美国重新炮制的方案，一方面“肯定战俘之释放与遣返应按照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公法中确立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执行”；另一方面却又“肯定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以阻止或使他们返回家乡”。

杜鲁门可算如愿以偿了。但是，这个一厢情愿的决议却遭到中朝政府和

人民的坚决反对。1952年12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决议是艾奇逊提出的“21国提案”的翻版。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谎言，完全是不可置信的。周恩来明确表示“而且就将全部遣返战俘回家这个任务交给中立国所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去做，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由于美国方面派遣了大批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在朝、中战俘当中，利用战俘已被强迫刺上背叛祖国字样或盖上拒绝遣返血书指印后所产生的耻辱、顾虑等心理失常的状态，经常对他们进行胁迫行为。如果不把这些特务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起来，那么，一切访问和解释都不可能顺利进行，而那些被刺过字和打过指印的朝、中战俘们，仍有被特务胁迫拒绝回家以至带走的可能。因此，要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特务分子，这在遣返委员会管理战俘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只有将战俘直接交给对方保护，然后才能办到。”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声明，击中了美国方案的要害，杜鲁门集团有些慌乱。美国国防部长罗维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记者们的追问之下，也情不自禁地泄露了“天机”。他说：“联合国拒绝强迫遣返战俘的立场，从军事上来说，也是适当的，因为很多战俘是由联合国军宣传人员之劝导而背叛的。因此，如果强迫他们遣返，便会失掉信用；也将损害联合国心理战争方面的努力。”

对于联合国所通过的完全按着杜鲁门政府的意志所炮制的这一决议，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中、朝政府的断然拒绝。中朝外长12月14日和12月17日分别复电联大主席，坚决反对并要求取消这一决议，再次呼吁立即停火，把全部遣返战俘问题交由苏联建议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解决。

对于中朝政府的严正立场，杜鲁门、艾奇逊之流，暴跳如雷，于是故伎重演，恐吓要扩大侵朝战争，要进行军事报复。欲知局势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章 众志成城

美帝穷途再较量，两栖登陆寄厚望；
中朝战友防登陆，众志成城若金汤。

话说美国侵略者在战场和谈判桌上连连受挫后，百般无奈，又进行战争恫吓。妄想挥舞原子弹讹诈，又慑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剩下的只有利用海空优势，从志愿军和人民军侧后登陆这一张王牌了。此时，朝鲜战局仍处于对峙状态，停战谈判也因美方的破坏而陷于僵局。战争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扩大，正处于转折关头。交战双方为了争取或保持战争主动权，均在进行新的筹划。

战争的旷日持久，对美国愈来愈不利。到1952年10月，在两年多的侵朝战争中，美国已损失兵员31万多人，直接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达150亿美元，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800亿美元。沉重的战争负担和巨大的伤亡，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

特别是美国的七个陆军主力师长期陷于朝鲜战争的泥沼中，影响了它的全球战略格局，使美国当局忧心忡忡。英、法等国长期被美帝国主义绑在侵朝战车上，劳民伤财，严重地损害了其自身利益，也在极力设法摆脱美国的羁绊，渴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战争使美国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谋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新途径。

但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如何结束朝鲜战争，意见纷纭。有的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寻求妥协，早日实现停战；有的主张加快扩编南朝鲜军队，使美国逐渐从朝鲜战争中脱身；甚至有人叫嚷，继续增调部队，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以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甚至不惜使用原子弹来赢得战争。

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朝鲜战局的前景十分关注。为了实现自己的竞选诺言，1952年12月2日至5日，皆同准备在新内阁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太平洋战区司令阿瑟·雷德福等到朝鲜前线，与侵朝美军高级将领克拉克、范佛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等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并视察了美陆战第一师、美第二师、英联邦师、南朝鲜首都师和第一师等。

艾森豪威尔在回国途中，12月8日在威克岛附近的重巡洋舰“海伦娜号”上停留时，又同他新任命的国务卿杜勒斯、财政部长汉弗莱、内政部长麦凯等举行会议。据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透露，在上述会议和磋商中，“战地指挥官们同意，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指美国）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着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我们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随着美国新当选总统上台之日临近，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扩大战争的议论更是甚嚣尘上。美国共和党的麦克阿瑟、罗伯特·塔夫脱、约瑟夫·麦卡锡等人，叫嚷要“在共和党取得政权后，全力打赢这场战争”。新任国务卿杜勒斯甚至主张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美国军界则提出了各种扩大战争的实施方案。他们认为，面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甚为坚固的正面阵地，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利用海、空军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配合正面进攻。

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当时“联合

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曾组成专门小组，制定了实施计划——《8—52 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通过陆、海、空三军大规模的全面攻势，推进至元山—平壤一线。其中包括地面部队合围性攻击、大规模两栖登陆和从空中、海上对中国境内的目标实施袭击。

美军为了实施这一计划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准备，如频繁进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刺探东西海岸情报等。与此同时，还新建了南朝鲜第十二、第十五两个步兵师、6 个独立团，28 个炮兵营，并将新建的两个师于 1952 年底投入第一线作战。

对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前后敌人的战争叫嚣和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我侧后实施两栖登陆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极为重视。1952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签署的《关于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方针》这一文件中指出：“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于激烈化，艾森豪威尔正为其上台后的朝鲜军事行动作准备。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做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

“我如能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战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文件要求，“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尽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这之前，1952 年 11 月 23 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电告志愿军负责人立即着手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我翼侧登陆，配合正面进攻。12 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时，又进一步强调：“志愿军应从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川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

为了粉碎敌之登陆计划，1952 年 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又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下达了进一步的全面指示。这个《中央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是由毛泽东起草，经中央负责人讨论后签发的。全文如下：

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军委各部门首长：

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

（一）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二）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

（三）为此目的，我军必须：

（甲）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

（乙）在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他可能遭受敌人

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

（丙）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满浦球场间），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

（丁）我正面各军过去作战成绩很大，在 1953 年应争取更大的成绩，消灭更多的敌人。

（戊）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

（己）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 1953 年 4 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

（庚）以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同志为西海指副司令员，西岸海指的其他干部应予加强。

（四）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中共中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为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于 1952 年 12 月 17 日至 21 日，先后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和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认真研究了如何加强反登陆作战准备问题，决定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以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 1953 年的首要任务，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加强两翼海防，特别是西海岸的防御。坚决不准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要坚决消灭它，绝对不准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正面部队则一面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面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不断地杀伤消耗敌人，以抓住敌人，破坏其登陆计划。

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作了大的调整与充实。根据中央指示，并同朝方商定，以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是梁兴初、方虎山（朝方）、吴信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由杜平兼任，参谋长由志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政柱兼任。指挥部内还设立了空军前方指挥所、海军作战办公室、炮兵主任办公室、装甲兵第二指挥所。志愿军总部的工作由杨得志副司令员主持。东海岸指挥部由第三兵团兼任，以王近山、金雄（朝方）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治委员。

反登陆作战的兵力部署，确定以一部分兵力组成具有一定纵深的海岸防御，坚决阻敌登陆，并力求歼敌于海上或滩头；而以主力位于纵深机动位置，一面准备歼灭敌之空降部队，一面待一线部队将进攻之敌消耗到一定程度之后与敌决战，进行战役反击，最后歼灭敌人。12 月 23 日，志愿军总部下达

了《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从此，全军展开了以思想动员、部署调整、工事构筑、物资储备以及战备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为了加强我军反登陆作战力量，中央军委又调第一、第十六、第二十一、第五十四军和改装的第三十三师先后入朝，坦克第一师也再次入朝。此时，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部队已有 19 个军，共 135 万人，兵力空前雄厚。其中担任西海岸防御的有 6 个军，担任东海岸防御的有两个军，担任正面防御的有 4 个军。担任东西海岸防御的几个军，如东海岸的第十五、第十二军，西海岸的第五十、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都是在朝鲜经过战斗锻炼，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部队。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加紧准备反登陆期间，1953 年 1 月 20 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上台。2 月 2 日，他发表“国情咨文”，极力鼓吹美国的全球侵略扩张政策。在朝鲜问题上，他宣称“自由世界不能无限期地处于瘫痪的紧张状态中”，而要采取所谓“新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他按照自己的逻辑宣布：“我现在下令第七舰队不能再用来保卫共产党中国了。”其实质就是要唆使台湾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登陆进攻，以配合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冒险。

针对艾森豪威尔的战争叫嚣，1953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要加强抗美援朝斗争。他说：“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毛泽东强调指出，“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庆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有力地鼓舞了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斗志。在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中，大规模地构筑工事是最为艰难的。按照预定计划，必须在 1953 年 3 月底以前，在东西海岸构成 10 公里纵深的坚固防御地带。而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冰厚雪深，气温一般在零下 20 摄氏度至零下 30 摄氏度，冻土层达 1 公尺左右。志愿军平均每天有 50 万人参加施工。广大指战员都以忘我的劳动，昼夜突击施工，想尽各种办法完成任务。施工用的炸药缺乏，就拆卸敌人投掷的未爆炸的炸弹挖取；没有工具，就利用炮弹皮等废铁自行制造。仅据西海岸第一线三个军的统计，挖取炸药 10600 公斤，自制工具 9000 余件。

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志愿军指战员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到 1953 年 4 月底，圆满地完成了建筑工事的任务。在东西海岸设置了纵深 10 公里的两道防御地带，动用人力 6000 多万个，挖掘坑道 8090 条，总长 720 公里，相当于从朝鲜永兴到釜山凿了一条石质隧道；挖堑壕、交通壕 3100 余公里；构筑了 605 个永备水泥工事及大量的火器掩体。这样，在东西海岸和正面 1100 多公里弧形防线上，形成了以坑道和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与此同时，志愿军铁道兵和工程部队对北朝鲜的交通网路进行了改造和

完善。新建铁路龟城至德川段、价川至殷山段子 4 月中旬先后通车，使朝鲜北部三大铁路干线联为一体，并在原有铁路线上新建便桥 35 座，迂回线路 4 处。到 3 月底，新建和加宽公路 566 公里，架设公路桥 47 座。志愿军和人民军交通运输困难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物资储备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到 1953 年 2 月底，物资囤运任务已超额完成，囤积弹药达 1238000 多吨，粮食 2.5 亿公斤，可供全军食用 8 个半月。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期间，侵朝美军为了再次试探我正面防御的稳定性，曾于 1 月 25 日在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亲自授意下，策划了一次所谓空军、坦克、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试验的进攻。以美第七师 1 个加强营，在 8 个炮兵营、1 个坦克营和 1 个战斗轰炸机联队支援下，猛攻志愿军第二十三军第二一师一个排防守的芝山洞南侧高地（敌称之为“丁字山”）。一天之内敌共向我阵地发射各种炮弹近 17 万发，投掷炸弹 22 万多磅。

美军在进攻时，还邀集了大批高级军官和记者观战。志愿军守各部队依托坑道工事，英勇沉着地抗击敌军，以伤亡仅 11 人的代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牢牢守住了阵地，歼敌 150 余人。这次战斗，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引起了极大骚动，纷纷谴责与质问美国军方：这次进攻是正当的军事行动，还是给高级宾客表演的角斗士比赛？就这样，在一片责骂声中，克拉克的协同作战试验不得不狼狈收场。

在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期间，中国志愿军的作战方针是：如敌人来攻，则坚守阵地，给敌人大量杀伤；如敌人不攻，则选敌弱点，以“小吃狠打、逐点攻歼”的战法，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以便拖住敌人，粉碎它的登陆企图。整个反登陆战备期间，志愿军正面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 760 余次，共歼敌 5 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尽管克拉克制定了《8—52 作战计划》；尽管艾森豪威尔疯狂叫嚷：如果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不能按美方要求达成协议，“美国将不再受世界上任何君子协定的限制，不再为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而负责”。但是，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东西海岸大规模构筑工事，全线兵力部署的调整，有生力量和大批作战物资源源运入朝鲜战场，为美国当局所密切注视。敌人见情况不妙，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的情报预测中估计：“目前在北朝鲜的部队，大约有 19 个中国军和 5 个北朝鲜军团。其中大约有 30 万人被部署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岸地区，可立即投入海岸地区的作战。”同时指出，“一旦联合国军按计划对朝鲜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将展开最大限度的地面防御来抗拒联合国军的进攻并实施坚决的反击。”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也认为：“志愿军沿海滩的防御体系和前线的防御体系一样，纵深的距离甚长，并且它的效力大部分依靠地下设施。但是，除开地下工事外，还有一道道的明壕从滩头向后分布，因此，任何从海上攻击的部队，一旦他们在岸上获得立足点，即被迫去攻击一道又一道的前沿。雷区到处都是。大部分稻田地区被水淹没，使它们变成战车的大陷阱，使我们的装备在泥淖中进退两难。”

中朝军队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对美军企图进行登陆冒险的有力打击。于是，在正面攻不动，两翼又面临森严壁垒的情况下，美国当局被迫又回到停战谈判桌上来。2 月 10 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离任回国，

遗职由美陆军副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接替。

1953年2月22日，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我方，提议在停战前先行交换伤病战俘，试图以此为转机恢复停战谈判。3月28日，中、朝同意了美方这一建议，并提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随后，中、朝两国政府又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遇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方案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英法等国的赞同，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同意以我方建议为基础，恢复战俘问题的谈判。从此，中断了六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一些军事评论家认为，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战争相持局面下的一个重大战略行动。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准备；其重要意义也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反登陆作战准备的胜利完成，使志愿军和人民军东西两翼海防和正面防御更加稳定和完美，不仅兵力雄厚，实力增强，阵地更为巩固，而且后方供应和交通运输亦远胜于入朝作战以来任何一个时期。这样，就迫使美方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企图，同中、朝恢复停战谈判，从而为尔后朝鲜停战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不敢来，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艾森豪威尔现在是骑虎难下，欲打力不从心，欲和于心不甘，所以我们现在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采取行动为止。”

欲知朝鲜战局下一步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章 打破僵局

扩大战争激众怨，反战思想在发展；
新任总统多心计，唯一良策是停战。

有人说艾森豪威尔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走的是一个“之”字形的道路，即停止战争—扩大战争—停止战争的道路，只是在美军付出更大的代价，战争不能再打下去的时候，才又在板门店恢复停战谈判。

美帝仗着实力雄厚、财大气粗，一向狂妄自大。他们对朝鲜战争这个“无底洞”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美国统治集团原本指望，一旦战争开始，它的盟友们就会根据华盛顿的一道命令，派来所需要的“炮灰”。美国政策制定者原来的如意算盘是，美国盟友派到前线若干个师的兵力，而美国将主要发挥军火库和指挥棒的作用。结果事与愿违，不管白宫如何施加压力，盟国都不急于向朝鲜派遣本国士兵。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人不得不承担战争的军事、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主要担子。这种沉重的超负荷，有可能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宣告破产，同时更会引起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 1950 年 12 月 30 日写给国防部长弗兰克·佩斯的信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信中说：“美国并不那么强大，能够把全世界都背在自己身上。”

帝国主义同盟者对朝鲜战争所出力量的平衡表证明，进行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的主要负担，确实压在美国身上。哈里·巴利斯 1953 年 4 月 1 日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现在，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无出路的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已完全被北朝鲜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阻止住了。”他是作为美国工作小组领导人去台湾解决保障“共同安全”问题，刚刚返回美国后说这番话的。根据巴利斯的计算，美国向朝鲜派遣了 35 万军人，南朝鲜拥有 40 万军人，而这场军事冒险的其他 17 个参加国总共派了 35000 人。巴利斯写道：“美国人民不仅要质问我国政府，而且还要质问联合国及其所有成员国，什么时候能在朝鲜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停止这场前途无望的战争。”

1951 年 7 月 10 日，陷入军事、政治困境的美国，在世界和美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开始了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然而，直到 1952 年美国竞选运动开始前，谈判实际上毫无进展。这种局面向艾森豪威尔提供了有利机会，使他得以利用反战情绪取得选举的胜利，同时还能设法达到同朝鲜的“体面和解”。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喋喋不休地说：“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地和体面地停止朝鲜战争……为达到这一目的，如需要我亲自去朝鲜一趟，我一定前往。”他在另一次演说中说：“我们能够防止类似朝鲜战争这样新的战争。我们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反对进行对外侵略战争，几乎成了美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根据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的回忆录判断，这位年轻的美军少校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反战思想的。反战思想在美国青年中特别普遍，因为战争要他们不是在大学讲坛或外交论坛上施展才华，而是去战场脚踏死地。约翰也曾到朝鲜参战，他的父亲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在约翰动身去朝鲜之前，他同儿子进行了长时间的严肃谈话。谈话涉及很广：谈到如何安排约翰妻子的生活，由谁照看他的小孩。然而主要还是艾森豪威尔对儿子的临别赠言：“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当敌人的俘虏。”

的确，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

强调指出：“除了国内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外，这次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美国在朝鲜的伤亡和被俘人数约 398000 人，而美国所有其他盟国（南朝鲜除外）共损失 29000 人。

在竞选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曾主张进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这个办法的目的是，如果美国不能从欧洲盟友那里搞到士兵，就用亚洲盟友的。然而，转向亚洲的政策同样也是无前途的。连装备精良的强大美军用三年多的时间都未能打败一向被华盛顿一些人士瞧不起的“亚洲人”，那么，南朝鲜傀儡政权的军队则更是力所不能及的了。出路只有一个，即尽快签订和平协定。艾森豪威尔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诺言，使他获得了大量选票，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

美国大选揭晓后，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艾森豪威尔在杜勒斯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的陪同下，前往朝鲜考察。他们得到的印象是：“美国在亚洲只采取了杂乱的不协调的守势，而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长期、全面的战略计划。”

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分布太广，尤其在亚洲，把大多的军队驻扎在足以受共产党牵制的地点。雷德福不主张这样分散的部署方式，而赞成把美国的力量集中在北美洲或北美附近，成为一支战略性的后备力量。经过这样的部署，“前线的防务将主要由非共产党国家正在建立的当地军队来负担；万一发生战争，美国的机动力量可以静待机会向敌人的要害出击”。

具有同一见解的杜勒斯，极力推销他两年多来一直在鼓吹的主张，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用来威慑共产党，使其不敢从事战争”。他的理由是，美国不太可能沿着共产党这么大的整个地区，在四周都驻上充分和固定的防御力量，虽然他们也许会从这些地区出击。他说：“美国应该用维持一支足以迅速地向侵略大本营还击的巨大报复力量的办法，来集中力量吓退进攻，而不要把防御力量到处分散。”所讨论的这一点，就是美国“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先声。

雷德福和新任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两人都觉得将来亚洲在冷战中是一个重点。艾森豪威尔一方面承认亚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说，西方不能解决它在亚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除非等到欧洲强盛之后才有可能。他的论点是，一旦西欧拥有了维持和保卫它自己的力量，并能使全世界感到它的威力时，亚洲问题就达到了“可以解决的地步”。

朝鲜之行对最后选中雷德福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新当选的总统在军队效力时就认识雷德福，可是威尔逊却从未遇见过雷德福。艾森豪威尔曾要求国防部长推荐一位接替陆军上将奥马尔·布雷德利职务的人，因为后者已经当了两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的任期将在下一年 8 月届满。艾森豪威尔觉得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应该由一位赞成在亚洲实施远大的战略的军官来担任。从这一点来说，雷德福将军当然是合适的人选。因为雷德福对远东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这次朝鲜之行中，也颇得新总统和国防部长的赏识。

新总统的朝鲜之行：进一步加深了他必须及早结束朝鲜战争的印象。在前沿观察哨所，这位当选的总统在克拉克将军的陪同下，通过望远镜观察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并详细听取了前线指挥官们的报告。他说：“看来，他们已找到了一个保护自己万无失，同时却能以炮火不断袭扰我方阵地的办法。他们不怕烦劳，开凿了直通山顶、大得足以容纳大炮装备的坑道。他们

通过坑道推出大炮进行射击，打完就撤。显然，他们已经作了一项很费气力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有充分的人力可以使用。”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鉴于敌人阵地的力量已得到加强，任何正面的攻击将碰到巨大的困难。”

在朝鲜视察中，范佛里特将军在朔风伴奏之下，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露天午餐会。届时，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正在第十五步兵营服务。范佛里特出于对总统的尊敬，特意安排了总统和儿子的会见。儿子艰险的经历，也促使艾森豪威尔下决心早日结束这场“苦难的战争”。为此，在汉城，他还同李承晚进行会谈，并召集过多次秘密会议，讨论“朝鲜军事、经济的前景”。

李承晚是顽固不化的，疯狂主张要“全力以赴地全面进攻，把战争扩大到跨越鸭绿江，攻击中国境内的供应基地”。克拉克、范佛里特等前线指挥官们，同李承晚的主张略有不同，但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仍不成功，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

艾森豪威尔抱着难以决断的心情结束了朝鲜之行，飞返关岛。在那里布雷德利和雷德福回珍珠港了，他和他的班底改乘巡洋舰“海伦娜号”到威克岛靠岸。在那里同已选定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凯和卢修斯·克莱将军会合，讨论新政府面临的种种问题。对“海伦娜号”上的几天讨论，总统认为“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中，没有一个比朝鲜战争更需要引起迫切注意的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反复琢磨着各种可能的选择：拖下去是“不能容忍的”，美国“正遭受着严重的伤亡，即使有所收获，也是微不足道的”；若不顾一切地全力发动进攻，夺取军事上的全面胜利，“这是最不诱人的方案，成功的机会甚微，而且会使美国和它的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争取“体面”条件下的停战，可是在战俘问题上共产党人已经拒绝了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板门店的谈判已经中断，双方只是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如今，新当选总统同前任总统遇到的是同样的难题。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美国必须准备打破僵局局面。”艾森豪威尔脱离不开时代、经验和当时美国的基本战略构想的局限。在那冷战、反共的时代，凭着他的经历，萦绕他脑子的无外乎以封锁包围逼阻对方，以亚洲人打亚洲人、腾出手来照顾战略重点，以军事威胁谋取“体面”的停战等设想。在汉城、在威克岛以及以后在夏威夷，他一直未得出最后结论。

在“海伦娜号”巡洋舰上时，艾森豪威尔获悉，12月5日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全国制造商协会于纽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宣称，他有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如果他被请求，他将把这一计划向艾森豪威尔陈述。艾森豪威尔立即发电表示接受麦克阿瑟的想法，以“举行非正式的会晤以便我和我的同僚们从你的见解和经验中，获得巨大教益”。

于是，按着双方的约定，麦克阿瑟把一份长达几千言的备忘录交给艾森豪威尔。其中的关键要点是艾森豪威尔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之间的“双边会议”。美国将要求德国和朝鲜的统一，以及由两大国保证它们，还有奥地利和日本的中立。

“要是苏联不接受，”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写道，“我们就准备肃清北朝

鲜的敌方军队，这一意图可以通过如下办法来实现：用原子弹轰炸北朝鲜境内的敌人军事集结点和军事设施，在战地散播适量的制造原子弹的副产品放射性物质，封闭从鸭绿江通向南方的敌人的主补给线和交通线，同时在北朝鲜两面海岸进行两栖登陆。”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工业设施也将受到轰炸。

艾森豪威尔曾当过麦克阿瑟的副官，对他这位老上司的建议不加可否地细心听着。最后他说：

“将军，这是一种新的东西，我将必须看看我们自己和我们盟国之间对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的理解如何；因为假如我们准备轰炸鸭绿江一边的基地，假如我们准备扩大战争，我们就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冒犯整个……自由世界或不会失去信任。”

对麦克阿瑟的“秘密计划”的消息，最不喜欢的就是杜鲁门了。他叫他的新闻秘书洛哲·德贝发表声明说，如果麦克阿瑟真的有一个结束战争而不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战争计划，他应该立即呈报给有关当局——总统。第二天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仍然心里冒火，对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大肆攻击。他说，他怀疑麦克阿瑟有行得通的结束战争的计划。杜鲁门认为，无论是艾森豪威尔的朝鲜之行，还是他同麦克阿瑟的会晤，都是“廉价的蛊惑人心的宣传”。

1952年12月14日艾森豪威尔从朝鲜回来之后，对汉城之行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说：“我们大家早已知道，没有什么简易办法迅速而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但是这种亲临现场的了解，至少会使我们对我们的艰巨任务有所准备。”与此同时，他一方面宣布要加速训练和扩大李承晚的军队；另一方面秘密交代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制一个“攻势”计划。据后来透露，这项计划包括把“国民党的一些师拉进战场”的问题，对中国东北地区和内地进行轰炸问题，封锁中国问题，甚至包括“在战术上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这种冒险计划杜鲁门设想过，麦克阿瑟也设想过。它除了借以吓人之外，是注定要碰钉子的。

其实，作为一名军人，一位高级将领，艾森豪威尔完全懂得，对中国发动进攻的后果严重而又难以预测。在一次会上，他曾经这样讲过：“在朝鲜对共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金钱的代价。自从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以来的一年半中间，一度动荡不定的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了，共方已经抓紧了这个时机在他们那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如今，再发动攻势就更困难了。”

“这一进攻如果终于发动了的话，”他预测道，“就很可能不得不在得不到我们主要盟国的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他们对于任何这种冒险都是反对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在朝鲜打仗，没有机会打赢这场战争，因为打过鸭绿江就会冒犯国际舆论。”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站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东正厅平台上，在美国首席法官弗雷德·M·文森的主持下宣誓就职。他在就职演说中又说了要和平的话：“我们寻求的和平，不止是让火炮停止轰鸣，减轻战争的痛苦；也不止是避免死亡。和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不只是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歇脚站，它更是勇敢者的希望。”到此为止，艾森豪威尔至少在表面上还是主张和平结束朝鲜战争的。

但是，10天以后，他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主张不借冒扩大

战争的风险，来赢得这场战争。他在 1953 年 2 月 2 日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解除“台湾中立化”，妄图动用蒋介石的武装威胁中国大陆，说什么“我们确实没有责任去保护一个在朝鲜同我们作战的国家”。2 月 3 日，他文同出兵朝鲜的各国的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的问题。外电透露，他扩大战争的内容还有轰炸中国本土，直至包括在战术上使用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继续扩大战争的冒险政策，不仅遭到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遭到批评和抵制。许多人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寻求妥协，以求实现停战，激烈指责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扩大战争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实力；更多的人指责他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也表示，不同意使用蒋介石的武装而导致朝鲜战争扩大。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说：“封锁中国是一种错误。”

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形势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也并不妙。1 月 29 日结束的“丁字山”战斗，敌我伤亡比例是 9：1。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时的同学范佛里特哀叹说：“共军阵地十分坚固。”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们也惶惶不安地说：“不管采取什么方法，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更长。”2 月 10 日，在朝鲜呆了 22 个月之久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垂头丧气地退役回国，接替他职位的是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泰勒中将。这位泰勒将军，比他的前任失败得更惨，仅 3、4 月份，志愿军和人民军就主动出击 100 多次，歼敌 3 万人以上。更使艾森豪威尔头痛的是，中朝军队在朝鲜东西海岸作了充分的抗登陆准备。在这个期间，志愿军在“小吃狠打”的作战方针指导下，进行大小战斗 700 余次，共歼敌 5 万余人。这样，艾森豪威尔再利用美国海军优势，重演仁川登陆的如意算盘难以实现了。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右派的战争叫嚣，再次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怒。美国反战运动方兴未艾，要求停止战争的无数信件、请愿书、呼吁书飞向白宫。一封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致艾森豪威尔的呼吁书说：“全世界 90% 以上的居民，对朝鲜战争怀有愤懑之情。你一点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你只能指望大型报纸、电台、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的帮助”这份致总统的呼吁书还指出，关于朝鲜战争可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和全世界蔓延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战争永远不能遏制共产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共产主义在半个世界的胜利而结束。新的世界大战将是何种结局？谁知道呢？有可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胜。”呼吁书的作者代表明尼苏达州的选民坚决要求停止在朝鲜的军事冒险。

艾森豪威尔进退维谷。他除了结束朝鲜战争之外，难以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而除了再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以外，别无出路。对此，中国代表团乔冠华等人对形势进行了分析，2 月 19 日向中央提出如下报告：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上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骗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但面孔既已板起，要就此转弯，尚非其时，特别是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政策行通与否还要看看。

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激怒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来想借此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

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职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很可能是拒绝。具体方式可能是：

一、置之不理；二、以我既未接受其方案又未提出新方案而拒绝；三、反建议以印度方案为基础复会。四、坚持不得强迫遣返战俘的原则解决战俘问题。以二三条可能较大。如我以金、彭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主席同意代表团乔冠华等人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动向的分析，决定看一看再采取行动。但是艾森豪威尔坐不住了，他想法子使自己下台阶了。既然战不行，就只有求和了。他先指令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很明显，这是美国方面发来的恢复谈判的试探信号。

但是，朝中方面没有立即答复，先把它晾了一个月。因为联合国大会决定2月24日复会，在联大复会前两天，美国方面发来这样一个信件，是否诚心实意，尚有待事实证明。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如果我方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估计美国拒绝的可能性大。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一个月过去了，美国没有再玩什么新花样。从3月28日起，中朝、苏为导致停战采取了一个一致的新的重大步骤。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认为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应当使之引导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使朝鲜停战得以早日实现。因此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

金、彭致克拉克的信发出两天之后，3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

中国外长的声明说，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声明指出，这一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而采取的新的步骤，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

3月31日，金日成首相发表声明，热烈支持周恩来外长提出的新建议。

4月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和金日成的主张，并建议联合国中应有中、朝两国政府的合法代表。在七届联大政治委员会上，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也发表长篇讲话，并郑重声明：“苏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崇高举动。”“热烈支持关于恢复朝鲜谈判，以达成交换病伤战俘和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协

议，并从而解决朝鲜停战和缔结停战协定问题的建议。”

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国际舆论纷纷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建议消除了停战的最后障碍，表现了中朝方面谋求和平的诚意，中朝建议，克拉克奉命响应，表示愿意恢复谈判和交换病伤战俘。从此，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谈判重新恢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阵容作了新的调整，这次出席会议的代表由丁国钰接替边章五，柴成文接替解方。

在恢复谈判的首次会议上，朝中方面提出了一项解决战俘问题的六点方案，主张将坚持遣返的战俘在停战以后两个月内全部遣返完毕。然后在一个月內，将其余的战俘从原拘留方军事控制下释放出来，送交中立国加以看管，并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向战俘进行六个月的解释。如解释以后，要求遣返的一切战俘应即予遣返。如在六个月后尚有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交由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僵局打破了。但是，就在停战谈判深入进行时，却遇到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强烈反对。他企图利用北朝鲜和中国战俘问题，破坏和平谈判，并使战事再起。李承晚十分狂妄，宣称如果需要，南朝鲜军队将单独战斗到“最后胜利”。美国极右势力也跟着叫嚷：“不消灭共产势力决不罢休！”

4月9日，李承晚迫不及待地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抗议信”，坚决反对恢复谈判：“如果达成一项容许中国人留在朝鲜的和平协议，大韩民国将认为它有理由要求除了那些愿意参加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以北的国家外，所有盟国都得离开这个国家。”他说，“如果美国武装部队要留下，那么他们就得跟随着前沿阵地的战士支持他们，并用飞机、远程大炮和在朝鲜半岛周边的舰炮掩护他们。”他还威胁说：“如果美国想要把它的部队撤离朝鲜，它可以这样做。”

无独有偶。4月15日，白宫也接到盘踞孤岛的蒋介石的一封信，他要求艾森豪威尔对板门店谈判要有个时间限制，就是说，给共产党代表规定谈判时限，不答应就要大打。李承晚是想以打得天下，统一朝鲜半岛；蒋介石是想以打重返中国大陆，捞回失掉的一切。多不自量啊！

4月23日和6月6日，艾森豪威尔分别给李承晚写了两封长信，对其“忧虑”给予安抚之外，并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在信中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继续以战争来进行统一朝鲜的斗争呢，还是以政治和其他方法来追求此项目标……我深信，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和大韩民国有必要接受停战。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希望以武力达成朝鲜的统一而使这一苦难丛生的战争拖长下去。”艾森豪威尔还答应：“美国政府在取得必要的国会拨款的条件下，准备继续给予大韩民国以经济援助，这将使它得以在和平状况下恢复它的饱受摧残的国土。”

然而，李承晚拒绝停战的条款，说：“按照目前的条款，停战对我们意味着死亡。我们一贯要求应该把中共军队赶出我们的国土，即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得不单独作战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南朝鲜国民议会表决“一致反对停战条款”，同时汉城和其他南朝鲜城市到处爆发了所谓“反对停战的示威”。

更有甚者，6月18日凌晨，李承晚命令打开战俘营大门，将27000名朝籍被俘人员“就地释放”，然后在警察的监护下实行强迫扣留。这一严重事件，使舆论哗然。印度总统尼赫鲁的发言人6月19日说：“这是一件很遗憾而极其令人反感的事情。”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宣读了英国致李承晚政

府的抗议照会：“女工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背叛行为。”艾森豪威尔也慌了手脚，他通过国务院发给李承晚一份急电：“你目前的命令和根据这个命令所采取的行动……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困境。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只会牺牲联合国军精锐部队用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

李承晚破坏停战的消息传出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已由北京抵达平壤。待他了解情况后，向毛泽东主席建议：推迟停战签字，再给李承晚以严重打击。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章 以打促谈

破坏和谈李承晚，就地释俘生事端；
以打促谈实必要，金城歼敌五万三。

虽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了，僵局打破了，但和谈道路仍困难重重，犹如大海中的一只帆船，随时会遇到暗礁和恶浪。对此，中、朝两国政府及其军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并确定了“以打促谈”的方针。

当时美国虽然被迫接受恢复谈判，但在统治集团内部仍是意见分歧，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罗伯特·塔夫脱、前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及美第八集团军前任司令范佛里特等人仍然公开反对妥协，极力鼓吹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甚至仍不甘心认输的美国五角大楼，5月19日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向总统建议：“直接向中国和满洲”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联席会议参谋长们认为，时机的选择是头等重要的。所有必要的行动，包括“战略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都必须实施得能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和最大限度的冲击性”。第二天，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

为了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压中国在谈判中就范，新任国务卿杜勒斯，挑选印度作为他警告要使用原子武器的一个讲坛。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的“满洲庇护所”。杜勒斯还提到美国成功地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强烈地表明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北朝鲜使用这种武器。杜勒斯在同约翰·休斯的一次谈话中还说：“美国不会从朝鲜停战中得到利益，我们会后悔的。我认为我们不会从朝鲜问题的解决中得到很多东西，除非我们先把中国人狠狠整一下，在整个亚洲面前表现我们明显的优势。”

在战俘谈判进行到关键时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请求华盛顿准许他提出一项“最后的建议”，即由一个中立国在朝鲜对战俘进行甄别，期限为90天；否则他的军队将在30天之内单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并“开始对共产党方面增加军事压力”。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克拉克所提出的是相当敏感的建议。美国远东空军的飞机已经轰炸了北朝鲜的水坝，让汹涌的洪水冲毁公路和铁路。现在克拉克想更进一步“以洪水冲毁农作物为特别目的而轰炸水坝，这样来切断共产党军队和平民的粮食供应”。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未表示反对，克拉克现在“有一张新牌对付共产党了”。

1953年春天的几个月里，有人说，李承晚“痛苦、混沌而郁郁不乐”。差不多三年来，他在自己的国土上一直是一个傀儡总统，但是在这次停战谈判中却表现了异常的“独立”性。他极力反对停战，叫嚷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并扬言“在必要时单独作战”！

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则继续玩弄两手政策，一面同中朝进行停战谈判，一面积极扩编南朝鲜军队，作继续进行战争的准备。这一形势说明，停战谈判恢复之后，虽然战争停下来的可能性比过去增大，但美帝国主义一贯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在战俘遣返、停战监督等问题上，仍在节外生枝；另外，美帝国主义从其全球战略考虑，也可能需要争取一些时间。因此，战争拖下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然而，这时战场形势对我愈来愈有利。经过反登陆备战，我军可攻可守，

在战略上日趋主动。敌人在战略上则日趋被动，特别是在正面战场，已处于无可奈何的地步。当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敌军总兵力已达 120 万人，地面部队有 24 个步兵师。其中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大量增加，已达 16 个步兵师，正在扩建的还有一个师，连同其海、空军共有 64 万余人，装备、火力已接近美军水平。志愿军和人民军总兵力为 180 万人，其中志愿军 135 万人，人民军 40 万人；地面部队志愿军有 19 个军，人民军有 6 个军团，兵力、火力有了很大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也很充足。全军上下，积极求战，士气高昂。

毛泽东主席根据交战双方的情况，为志愿军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据此，志愿军总部决定：继续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工事，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登陆进攻；同时，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配合停战谈判。准备除继续进行个别的战术反击外，如 5 月上旬，敌不向我进攻，我则于 5 月中、下旬举行类似 1952 年秋季那样的战术性反击作战。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决定。

志愿军总部制定这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适当注意我现有阵地。”打击对象以美军及其他侵朝军为重点。根据敌人分布情况，西线以打击美军为主，东线以打击南朝鲜军队为主。

战役指导的基本精神是“稳扎狠打”。所谓“狠”，即在我正面战线巩固、侧后也有保障的情况下，要放手作战，同敌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直到把敌人打得不敢再来反扑时为止。所谓“稳”，即要掌握持久作战，并能随时粉碎敌人进攻的原则，防止急于求成。一定要有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再实施进攻。同时要采取“集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攻击目标以不超过一个营为好。

攻击目标的选择以地形对我攻歼有利为原则，即便于我兵力、火力隐蔽集结和展开，便于我迅速发起突击，在战术上要力求全歼、速歼，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有利侧守，不利则给敌以一定杀伤之后放弃，保持主动，全线反击实施时间，预定 6 月初开始，至 7 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于 5 月底完成。

且说停战谈判恢复以后，敌人坚持反对我方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并在朝鲜境内看管的方案”，而无理地提出所谓“就地释放”朝方战俘的“反建议”，仍企图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敌人这一无理主张遭到了世界公正舆论的强烈谴责，英、加、澳等国也对美国表示不满，但是，要达成协议尚需时日，尚须经过尖锐斗争。

据此，志愿军总部估计 6 月份以前尚难实现停战，而这时各军对攻歼重点目标的准备工作又尚未全部完成，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斗争，掩护我军战役企图，遂于 5 月 11 日决定，凡对敌连以下目标的进攻准备已经完成的，即可开始作战。根据这一决定，第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军、第六十七军，于 5 月 13 日对敌发起进攻。至 5 月 25 日，攻歼了 11 个点的敌人，连同打敌反扑，共歼敌 4100 余人，我军伤亡 1608 人，敌我伤亡比例为 2.6 : 1。

这一反击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5 月 25 日，美方基本上同意了我方 5 月 7 日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继续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的安排”的方案，谈判不日将达成全部协议。然而，就在

此期间，李承晚集团却大肆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声言要“进军鸭绿江”、“单独打下去”，并指使其谈判代表退出谈判；在汉城、釜山等地还导演了反对停战的所谓“群众游行”。

根据这一形势，为了进一步促进停战谈判，为了使这一战役行动打得更策略些和使新入朝的部队迅速开赴一线得到作战锻炼，志愿军总部于6月1日决定，将原定的以打击美军及其他侵略军为重点的计划，改为以打击李承晚的军队为主，对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也不作大的攻击。

各兵团、各军根据志愿军总部这一指示，对作战计划作了适当调整。经过一周的准备，第六十军于6月10日以3个团的兵力进攻据守北汉江以东的南朝鲜第五师第二十七团的阵地。该军为了争取战斗的突然性和减少伤亡，于6月9日夜预先将6个连和两个排的兵力，秘密地进入敌阵地前和翼侧隐蔽潜伏。

10日晚，在火炮259门支援下，采取多路多梯队的方式从北、东两个方向突然发起冲击。经过50分钟战斗，全歼守敌，首创阵地战以来一次歼敌1个团的范例。

从6月11日起，南朝鲜第五师和第三师连续进行反扑。至14日，该军先后击退敌大小反扑190余次，共毙伤敌7000余人。

14日晚，第六十军乘敌无力继续反扑之机，连续向敌发起进攻，该军在反击作战中毙伤俘敌14800余名。

紧随第六十军之后，第六十七军也于6月12日夜以3个团的兵力，在300门火炮、8辆坦克的支援下，向南朝鲜第八师第二十一团据守的阵地发起进攻。该团工事坚固，每个支撑点均有坑道2至3条，敌称之为“模范阵地”，“京畿堡垒”。为攻歼该敌，第六十七军进行了充分准备。战斗发起后，进行了28分钟的炮火轰击，然后迅速发起冲锋，激战1小时30分，全部占领敌表面阵地，并立即转入肃清坑道残敌的战斗，至6月13日10时战斗胜利结束。接着又连续打退敌反扑50多次。该军在反击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3500余人。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向北汉江两侧之敌发起进攻前后，右翼志愿军第九兵团所属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军和左翼朝鲜人民军第三、第七军团也先后向敌22个营以下阵地发起进攻，共毙伤俘敌11000余名。

此次进攻，志愿军和人民军先后对敌51个团以下阵地进行了65次进攻作战，创造了对敌坚固阵地进攻中一次歼敌1个团的战例，给了南朝鲜第五师、第八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在北汉江两侧占领了敌3个团正面12公里、纵深3至6公里的防御阵地，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名。我军伤亡19354名。

敌我伤亡对比为2.1:1。

经过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连续沉重打击，敌人的态度变得较为现实些了。6月15日，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也将完成，签署停战协议在即。为了促进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于6月15日19时发布命令：“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于是，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第二次反击作战遂告结束。

正当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准备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竟公然破坏协议，从6月17日深夜起，以“就地释放”为名，胁迫人民军被俘人员27000

多人离开战俘营，押到李承晚军队的训练中心。并且还继续狂妄地叫嚣要“单独干”和“北进”，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李承晚这一公然破坏遣俘协议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各国舆论纷纷予以谴责，斥责李承晚是“出卖和平的叛徒”，“不负责任的乖戾小人”，甚至要求美国换马，撤掉这个傀儡。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都谴责李承晚集团的这一行径，并抗议他“破坏联合国司令部的权限”。美国政府则竭力推卸责任，表明此事与其无关。

鉴于这一形势，毛泽东主席于6月19日非常及时地指出，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要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6月19日，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致函质问“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指出这是“有意纵容李承晚集团去实现久已蓄意破坏战俘协议、阻挠停战实现的预谋。我们认为你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必须负责立即追回被释放的全部战俘，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同时质问克拉克：“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政府的军队？”“朝鲜停战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要求美方就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作出负责的答复。

6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途经平壤，给毛泽东主席发了如下一封电报：

“毛主席：20日晨抵安东，南北朝鲜均降雨，故白日乘车至大使馆，与克农、邓华均通电话。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6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15000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21日见金首相，22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否盼示。”

毛泽东主席接到彭德怀司令员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

“6月20日22时电悉，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志愿军总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为配合停战谈判，决定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为此，指示各兵团、各军，对原预选目标，如已准备就绪者，应即坚决歼灭之；如新选目标，应即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对美军及外国帮凶军仍不作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进犯之敌均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6月24日，第二十兵团向志愿军司令部电告，拟以他们现在指挥的第六十七军、六十八军、六十军、五十四军及志司临时加强给他们的第二十一军5个军的强大兵力，在金城以南、北汉江至上所里间25公里的地段上实施进攻，并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歼灭南朝鲜首都师及第六、第八、第三师为战役目的。7月上旬完成战役准备，7月10日前后发起进攻。

金城以南地区，是“联合国军”防线的突出部。其东北部山高坡陡，易守难攻。北部、西北部山势较低。金城西南地形开阔，不易隐蔽。其东有北汉江，水深达五尺，不能徒涉。西有南大川，位于双方阵地之间。金城川从金城以西折向东南与北汉江汇合，平时水深不足一公尺，雨季水涨时，大部不能徒涉，成为纵深战斗的较大障碍。

敌人担任这一突出部防御的是南朝鲜的首都师和第三、第六、第八师。敌人的基本阵地普遍构筑了坑道、半坑道工事、大量的明暗火力点、地堡群、堑壕、交通壕，阵地前还设置了3至15道铁丝网，埋设有各种类型的地雷，

纵深 150—300 公尺，是比较完整的、支撑点式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

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在新任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主持下召开兵团党委和师以上干部会，决定以所属 6 个军组成 3 个作战集团：第六十七军及五十四军一三五师、第六十八军二二师为中央集团；第六十八军及五十四军一三师组成西集团；第六十军、二十一军及六十八军六五团组成东集团。中央集团在官岱里、轿岩山地段实施突击。西集团由外也洞、灰古介地段实施突击。东集团北汉江西岸之六十军由松室里、龙虎洞地段实施突击，北汉江以东之二十一军巩固现有阵地并以积极行动牵制当面之敌不使西调。三个集团突破后，首先集中力量攻击金城西南梨实洞、北亭岭、梨船至金城川以北之敌，拉直金城以南战线，并坚守阵地，抗击敌 3 至 4 个师规模的反扑，尔后再视情况继续向纵深发展。

志愿军领导批准了第二十兵团的战役部署。为了保证二十兵团右翼的安全，志司决定二十兵团发起进攻后，第九兵团第二十四军也从其后翼发起突击，协同作战；志愿军其他各军及人民军各军团则自选目标，配合作战。

7 月 13 日晚，浓云密布，天色昏黑，我军 1000 多门大炮，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向敌发起轰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志愿军部队全线突破敌人阵地。

西集团突破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攻当面之敌，以渗透迂回支队向敌后纵深猛插。第六七团侦察排的一个 13 人的侦察班，在副排长脯才的带领下，化装成护送美国顾问的南朝鲜兵，接连混过敌人三道警戒线，出其不意地直抵敌首都师白虎团团部。正赶上敌指挥所开会，他们便突然开火，当场毙伤敌团长以下 54 人，活捉 19 人，捣毁了敌团部，使其无法再组织抵抗和增援。该团很快溃乱。

这个侦察排有力地支援了师主力的战斗，对全歼“白虎团”起了重大作用。接着，师主力又趁暗夜堵截溃逃之敌，歼灭了一个位于白虎团团部附近的炮兵营大部和乘车来援的南朝鲜首都师装甲团二营大部，并击毙了该团团长陆根洙。西集团的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把李承晚的王牌团全歼。14 日，电闪雷鸣，大雨如泼。趁敌航空兵不能活动，我军迅速扩大战果。战至下午，攻占了梨实洞、间棒帆一线，在激战中生俘南朝鲜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美伪大为震惊。

中央集团突破后，左翼第一九九师在对轿岩山的攻击中；遭敌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右翼第二二师于当夜突破后迅速向敌纵深发展，占领了龙渊里、东山里，割裂了南朝鲜第六师防御，使轿岩山和烽火山两敌侧后受到严重威胁。

东集团因准备仓促，进攻正面狭窄（仅两公里半），又横越山脊，加之主要突击部队走错了路，步兵和炮兵脱节，进攻速度缓慢，当日傍晚才占领细岬里。第二十四军突破后迅速歼灭了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之敌，黄昏前占领了 432·8 高地及杨谷以北地区，保证了二十兵团右翼的安全。这样至 7 月 14 日晚，金城川之敌已全部被我肃清。

鉴于战役发展比较顺利，志愿军司令部 7 月 14 日 15 时电令二十兵团：“以主力控制现占领线，迅速构筑工事，修通道路，抢运物资弹药，推进炮兵阵地，准备粉碎敌之反扑。同时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混乱之际，分别向南发展。”

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对敌人的全线突破，特别是西集团及二十四军的迅速

进展，对敌金化要地造成了严重威胁。敌慌忙调来刚换防的美三师阻止志愿军向纵深发展，并向西集团和二十四军进行反扑。这时西集团一面反击敌人的反扑，一面以攻为守，有限度地继续向纵深扩大战果。与此同时，东集团以第二梯队一八 师南渡金城川，迅速向南发展。中央集团也以一三五师一个团零一个营的兵力继续向前发展。7月15日晚，二十兵团三个集团又向前推进，完成了全部进攻任务。

且说，南朝鲜军遭志愿军痛击之后，李承晚埋怨美军见死不救，美军埋怨李承晚无能。美伪之间矛盾加深。7月16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匆忙赶到金城前线，整顿败军，部署反扑。17日晚18时，志愿军总部发出指示：“近来板门店谈判敌人态度转硬，克拉克、泰勒昨日飞赴前线，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声言发动最大的反攻，企图夺回金城以南失掉的阵地。估计敌人反扑规模之大和激烈程度，会超过去年秋天的上甘岭战役。我进攻部队，要紧急行动起来，抢修新占阵地工事，组织炮火，加强交通运输，在敌反扑中，予敌更大的杀伤和歼灭性打击。”同时，命令其他正面各军，以积极的动作牵制当面之敌。

从7月18日起，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尤其是19、20日两天，敌人在飞机480余架次、坦克30余辆和猛烈炮火的支援下，连续进行猛攻，战斗异常激烈。志愿军英勇抗击，不畏牺牲，给敌以重大杀伤，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战至7月27日，志愿军一共歼敌53000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金城战役。

在金城战役进行期间，志愿军在其他正面战线上的各军和朝鲜人民军亦积极地组织了对敌连以下的目标进攻27次，毙伤俘敌16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金城方向上的作战。其中志愿军第一军进攻198·6高地战斗和第二十三军进攻石砚洞北山战斗，均同敌进行了反复争夺，杀伤敌3000余人。在石砚洞北山战斗中，第二十三军第二 团战士许家明，在双腿负伤和炸药失效情况下，为打开冲击道路，毅然以身体扑向敌地堡射孔，壮烈牺牲，战后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总计这次进攻作战，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8000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1架，各种炮423门，各种枪7400余支，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33253人的代价。敌我伤亡比例为2.3：1。

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战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中说：“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在志愿军猛烈的夏季反攻战役中，敌人遭到了沉重打击，特别是在金城反击战中，敌人损失惨重。对于这种情况，《美国第八集团军简史》中是这样描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呼啸声中他们前赴后继攻击这个地区的大韩国防线。在共军的猛攻下，前哨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了。”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夏季反击战役，是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战役。敌我双方先后投入作战的兵力，中国志愿军为10个军，朝鲜人民军为两个军团，敌军为18个师。战役持续时间为两个半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39次。整个夏季进攻战役共毙伤俘敌123000余人，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密切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有力地

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同时，还收复土地 240 平方公里，造成了停战后的有利态势。

经过夏季反击作战，敌人的处境更加不利，他们不得不向中、朝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议的保证。6 月 29 日，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复信表示，今后“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7 月 13 日到 7 月 19 日，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作出保证：“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的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条款。”“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朝中方面鉴于美方已向我作出了保证，尽管这时我军还可乘胜取得更大的胜利，但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仍然同意了美方尽快签字的要求。

1953 年 7 月 24 日，双方谈判代表确定了最后的军事分界线。经过夏季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共向前推进了 332.6 平方公里，过了 3 天，7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随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协定于 27 日朝鲜时间下午 10 时生效。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金日成司令官和彭德怀司令员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了停战命令，命令自 1953 年 7 月 27 日 22 时起，即从停战协定签字后的 12 个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停战协定生效 72 小时内，全线一律自双方已宣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 2 公里，并一律不准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要求全军保持高度警惕，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却在对其所属人员发表的文告中说：协定签字并不意味着立即或早日从朝鲜撤退。冲突还没有结束，要保持他们的实力。李承晚则发表声明：“我反对签订停战协定。”

美国作家约瑟夫·格登，对朝鲜停战这一重大事件作了如下的记述：“美国结束了一场它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没有庆祝活动。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在时代广场灯光新闻牌上闪烁着；人们驻足读着这一通告，耸耸肩膀继续走路；不像欧洲胜利日和对日作战胜利日，没有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艾森豪威尔显然是实现了他结束战争的竞选诺言，但是这一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

克拉克将军在他以后写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我成了历史上签定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朝鲜停战的实现，标志着志愿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胜利是中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这一胜利确实来之不易，欲知赢得胜利的源泉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章 胜利的源泉

和平实现举世欢，中朝人民更开颜：

胜利源泉是祖国，抗美援朝总动员。

全世界人民渴望已久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至此也就胜利结束了。胜利是朝、中军民奋斗的结果，胜利的确来之不易啊！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从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作战起，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战止，经历了两年零九个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所指挥的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三八线附近地区，从而彻底地粉碎了美国侵略者妄图占领全朝鲜并进一步侵略扩张的战略计划，有效地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做出了贡献。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 109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7000 余人，摧毁、缴获“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大量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据战后美军资料透露，仅美军在战争中就消耗各种作战物资 7300 余万吨，开支战费 830 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耗费。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夺取战争胜利也付出了相当代价。

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能和朝鲜人民军在一起，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其根本原因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的正义性。正如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真正来自人民的、有着高度政治觉悟和高贵品质的军队。它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它是在爱国主义精神下教养起来的，是在尊敬和保护其他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下教养起来的。它也是在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组成和壮大起来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彭德怀说，“都普遍而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代表着祖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他们所执行的是保卫祖国安全、保卫朝鲜人民独立和自由、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伟大光荣的任务。因此，他们的士气非常旺盛，战斗意志非常昂扬。每个战士在战场上都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坚强和主动机敏，表现了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我们之所以能在朝鲜前线赢得了如此伟大的胜利，我国人民的全力支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彭德怀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的坚强团结和努力工作，使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得以迅速开展并获得成绩。全国人民的一切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联合成为一支巨大的洪流，冲破了一切困难，把抗美援朝斗争引向伟大胜利。”

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入朝参战和 11 月 4 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发表，在中国大地上，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迅速兴起。和朝鲜一江之隔的中国东北地区人民，在美国侵略者直逼朝中边境的情况下，首先奋起要求到朝鲜前线去，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他们在各种集会上发言指出：“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是共患难同甘苦的兄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我们两国人民一同受

欺侮，并肩抗日。现在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要把全朝鲜变成一座活地獄，并且要把侵略战火烧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这种残暴的行动。”为此，他们筹集了大批马匹、车辆、担架、医疗用品等，准备随时前往朝鲜承担战地勤务工作。

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全中国人民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懂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中朝人民必胜的道理，坚定了争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念。工商界、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陆续参加到抗美援朝运动的行列。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在中国城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近三亿人。

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的基础上，中国人民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纷纷向领导递交决心书、请战书，坚决要求走上抗美援朝最前线。一批接一批志愿赴朝参战部队，斗志昂扬地奔赴朝鲜战场。

在全国各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毗邻朝鲜的东北地区人民，率先响应祖国的召唤，特别踊跃地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受到美国飞机轰炸的安市，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的几天内，就有500多名青年工人报名参军。双城县在3天中就有520名青壮年报名参加志愿军。锦州市在10几天内报名要求参军的达1000余人，有的人还咬破自己手指，在志愿参军的请求书上签名，以表示自己抗美援朝的坚强决心。

正在进行或刚刚完成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掀起了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热潮。当时人口只有2000万的浙江省，先后有100多万农民报名参军。未得到批准入伍的人说：“参军比考秀才还难！”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毅然投身到志愿军的行列。西北地区在1951年即有24000多名各族爱国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的一个行政村，有60多个年轻人牵着自己的马参加了志愿军。各族人民深深懂得，抗美援朝战争关系着兄弟国家的生存和祖国的安全，关系着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朝鲜前线。

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大批农民，纷纷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勤务工作，为中朝人民军队服务。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铁路系统报名志愿赴朝的员工达到铁路职工总数的80%以上。仅北京市志愿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就有1246人。在上海铁路局范围内，有1366名员工先后赴朝服务。许多铁路局和城市除了派出赴朝的员工外，还组织几千人到几万人的预备队，准备随时应召赴朝服务。

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同志愿军铁道兵指战员和朝鲜人民一起，粉碎了敌人的空中优势，把一列列满载作战物资的火车开往前线。到1953年4月为止，志愿赴朝的铁路员工中，有167个单位荣立集体功，涌现出5621名人民功臣和工作模范，有2742人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勋章和奖章。

志愿赴朝服务的汽车司机，仅据东北各省市1951年6月统计，即有5571人，占当时东北地区司机总数的51%以上。他们在敌机狂轰滥炸的袭扰下，白天精心隐蔽车辆，夜晚驰骋在弯曲多险的山道上，将大批军需物资源源不

断地运上前线，又把光荣负伤的志愿军战士运回后方治疗。他们不顾自己安危，历尽千辛万苦，机智勇敢，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在“响应祖国号召，到最光荣的岗位上去”的口号感召下，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奔赴朝鲜战场。1950年11月18日，由著名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率领的上海军医大学师生志愿手术队，最先前往朝鲜。接着北京、天津、沈阳、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地的医务工作者，相继组织了志愿手术队、医疗队、公共卫生队和防疫队，开往朝鲜前线。

为了统一组织和领导志愿赴朝的医务人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统一筹划，分期分批地组成医疗队赴朝服务。在抗美援朝期间，各地赴朝服务的医务人员约达6000人。其中有男有女，有医生，有护士。这些白衣战士也像志愿军战士一样，活跃在朝鲜战场，在救护伤员、粉碎敌人细菌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涌现了许多英雄模范。

1951年11月底的一天，室外的温度已降到零下30度，滴水成冰。某医院接受了一个失去知觉的伤员，两脚还缠着防滑的草绳，草绳与脚都结了厚冰，像两根冰柱。如不赶紧救护，这两脚就完了。青年女护士解秀梅，当时只有19岁，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她从小就听人说过，冻了的手脚是不能用热水烫或火烤，那样手脚会烂掉的，最好的办法是用体温把冻了的手脚暖过来。解秀梅决心亲自试一试。

可是，这是男战士的脚呀，她还只是一个姑娘，怎么好意思把男人的脚放在自己的怀里来暖呢？这时，她想到自己是共青团员，为了祖国，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为了挽救志愿军战士的两只脚，还有什么可害羞的呢？她马上解开自己的棉衣扣子，把这位伤员的两只冰脚放在自己的怀里，裹好棉衣，盖上被子。她感到自己是和祖国、和伤员同呼吸共命运的。

暖呀！暖呀！脚上的冰融化了，脚有了热气，伤员的眼睛也睁开了。当伤员看到自己的两只脚暖在一个年轻姑娘的怀里时，他一切全明白下，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还有一次，上级指示她所在的野战医院，上午9点前将伤员全部转移出去，说是敌机要来轰炸。当伤员全部转移后，却又从前线转来一个腿部受伤的排长李永华。因为担架队转运伤员还没有回来，李排长只好暂时在医院里等着。

天这么冷，滴水成冰。解秀梅怕李排长受不了，于是上山去拾柴禾，准备烧火给李排长取暖。她还没有爬上山顶，九架野马式敌机飞来了，在上空转了几圈就俯冲下来，投了几颗凝固汽油弹。病房附近的房子被炸起火，火舌向病房逼近。这时，解秀梅想起了医院指导员说过的话：“在敌机紧急轰炸的情况下，不要让伤员负第二次伤！”于是，她立刻跑回病房，背着李排长就往外跑。

她背着排长往山沟转移。敌机又俯冲下来，丢下几颗炸弹，正从她头顶上落下。解秀梅放下李排长，勇敢地伏在李排长身上。这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死只能死我一个，让在前线负了伤的英雄活下来！”炸弹在离她五六公尺远的地方爆炸，泥土、石块像雨点般落在解秀梅的身上。解秀梅负伤了，李排长被保护下来。在生与死的考验中，白衣战士解秀梅光荣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在评功会上，她被评为一等功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各地还有很多农民，主要是民兵，志愿前往朝鲜前线，从事各种战地勤务工作。有的担负弹药、物资的运输工作，有的负责运送伤员。特别是东北地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即有几十万青壮年农民随军入朝，其中参加担架队的有15万余人。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的达60多万人。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指出：“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这年的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就捐献武器的具体办法发出通知，进一步强调了捐献武器运动必须有充分深入的宣传和细密的组织工作，必须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相结合，必须贯彻自愿的原则。为了各界人民认捐方便，通知还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1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1辆坦克25万元，1门大炮9万元。

那时候，一个正义的号召，可以说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刚一发出，全国总工会、全国妇女联合会、青年团中央、全国学生联合会、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科学技术学会、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迅即作出决定或发出通知，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全国各地区、各阶层都行动起来，形成了一个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

抗美援朝深入人心。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很多地方、单位和个人，把捐献武器列入爱国公约之内，作为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实际行动。各地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甘肃省玉门油矿的职工，在八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毛泽东故乡湘潭县人民捐献“毛泽东号”战斗机，北京妇女捐献“北京妇女号”，全国体育总会捐献“体育号”，全国各界分别捐献“北京铁路工人号”、“中国店员号”、“鲁迅号”、“教工号”、“人民电影号”、“狼牙山号”、“白洋淀号”等等。一些省、市、自治区有的捐献一个炮兵团、炮兵师，有的捐献装甲旅，山东省捐献了120多架飞机的“山东空军师”。截至1952年5月，全国人民的捐款可以购置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6230多万元。

在捐献中，中国各界人民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为了支援志愿军战士，她卖掉了自家的汽车作为资金，准备了5台拿手好戏，从1951年8月起的半年内，她领导剧社全体人员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个省巡回义演170多场，观众达30万人。她把义演的收入捐献了一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这融进她与剧社全体员工多少心血汗水啊！

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口号下，全国工矿、城乡形成了捐献热。河北省阜城煤矿工人罗润生，将两年多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200元工

资全部捐献出来。福建省福州市妇女工国樵，她母亲临终前把仅有的一对金耳环留给了她，十多年来不管生活多么困难，都舍不得卖掉。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她把这对金耳环奉献了出来。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老人吾古尼沙汗，虽已 103 的高龄，但她坚持纺线卖钱捐献武器，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

重庆市 63 岁的劳动妇女彭素贞，在临终前特地嘱咐邻人将她一生洗衣、缝纫所得的积蓄和金戒指 3 枚、银元 5 块、房屋 1 栋全部捐献出来。湖南省湘潭县 76 岁的勤杂工谭楚云，当时每月只有 8 元的收入，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捐献武器号召之日起，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了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生产捐献，谭楚云记”的字样。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中国刚刚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1951 年 5 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企图扩大其早已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破坏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削弱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济能力。为了打破美国经济封锁，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前线供给，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决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热火朝天地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生产劳动竞赛，使工农业生产大幅度的增长。

1952 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 827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

增产节约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国内不仅给志愿军送去充足的粮食，还运去了大批猪肉、鸡蛋、牛肉干、蛋粉、香肠、饼干以及医疗用品。军事工业企业的职工，千方百计地加紧生产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品，保证志愿军的作战需要。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的各种作战物资共达 560 余万吨。这种巨大的物力支援，是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

在开展增产节约的同时，全国城乡还广泛开展拥军优属和亲切慰问“最可爱的人”的活动。城乡军人家属的生产、生活都得到妥善的照顾，他们的子女入学得到优先录取。广大烈军属的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不仅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工农业生产和做好本职工作，还写信鼓励朝鲜前线的亲人英勇作战，为国立功。青海省的一位军属，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咱们已经翻了身，村里人都很爱护、尊敬咱们，你要好好在前方打仗，啥时候胜利了，咱们再团圆。”

在进行优抚工作的同时，中国人民时刻关怀着艰苦奋战在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志愿军人朝后的第一、二次战役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回祖国以后，全国人民就掀起了往朝鲜前线寄送慰问袋、慰问信的热潮。北京大学的学生，在 3 天内就寄送 300 多封慰问信和 6000 多个慰问袋，有的在慰问袋内还装着一纸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同志：献给您毛巾、肥皂，用它来擦干您的汗水，洗净您身上敌人的污血，好好地休息一会，准备第二次的进攻，让又一个敌人躺在您的利刀下。”

首届慰问团送的慰问袋里都装着一本红色的小册子，这是著名诗人柯仲平献给志愿军的一本诗集。诗人在每一本诗集的扉页上都写了这么一首诗：

一个慰问袋装着一颗心，
一颗心又装进一封慰问信。
几万万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

给你们送来了几万万颗勤劳勇敢的心。

上海著名作家章靳以在慰问信上写道：“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一定用我的笔写下你们的光荣史诗。我还要鼓励我的学生响应祖国的号召，投考军事干部学校，作你们的后盾。”南京市人民在平壤收复后的四五天内，即写了2万多封慰问信，寄送5000多个慰问袋。截至1951年1月，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各地就寄出慰问金人民币114万余元，慰问信45万余封，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品61万余件。

杨得志将军回忆，在第五次战役期间，在一次行军路上，他收到国内寄来的几封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每封信都是情真意切，字字千钧啊！杨将军打开的第一封信，是一位84岁的老人写的。信中写道：“你们打击侵略者，为国为民立了大功。我率儿、孙、曾孙四代人向劳苦功高、为民谋福的全体将士致谢致敬。我老了，不能拿枪了。但送走了孙子，还愿把50多岁的儿子送上前线，并愿率居家人等搞好生产，支援前线将士。”

第二封信是一位68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写的。她在信中说：“我痛恨万恶的侵略者，我心疼志愿军孩子们。我老了，但身体还好，膀子还很有力，我要求到前线给志愿军洗衣服、烧火做饭……”杨得志将军把信念给同志们听后，大家感动得流下了泪水。有的同志向将军要求：“司令员，等我们住下之后，赶快给老妈妈写封信，请她放心，请她千万不要来，我们一定狠狠打击侵略者！”

还有一封信来自汉口。诉说汉口被服厂的一位女工，为了连夜赶制40套棉军装，把自己患重病的独生子寄托到姐姐家里。可是第二天回到家时，姐姐正悲悲切切地哭——儿子死了！她也难过得哭了。有人要把这件事向上级报告，写信告诉志愿军。她开始不让，后来再三说服，她含着泪说：“要写就告诉志愿军不要为我难过。为了40个军人不受冻，儿子死得值得……”同志们听了，顿时都沉静了下来，好久没有人说话。只见杨将军深沉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伟大的英雄的中国人民！他们那纯真、朴实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曾先后组织了三次规模庞大的慰问团前往朝鲜进行慰问。第一届代表团团长是廖承志，第二届团长是刘景范，第三届团长是贺龙元帅。第一、二届慰问团前往朝鲜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第三次是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前往朝鲜的。这些慰问团是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以及文艺工作者组成。慰问团所到之处，均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

首届慰问团在朝鲜期间，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紧张地进行第四、第五次战役的时候。慰问团的全体人员，克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中国人民所赋予的慰问任务。在慰问过程中，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的经常袭扰下，为指战员作了千百次精彩的表演。不少演员还深入到前沿阵地上为战士们进行演唱，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每个战士的心坎上。慰问团回国之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到全国2050个县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激励全国人民再接再厉，全力支援朝鲜前线，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早日胜利。

第二届慰问团在朝鲜进行了为期40多天的活动。从中朝边境到三八线上

的开城地区，从朝鲜的西海岸到东海岸，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到许多连队的前沿阵地，到处留下了慰问团的足迹。这届慰问团在朝鲜慰问期间，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战役的时候，也是志愿军赴朝参战两周年的前后。志愿军指战员决心以战斗的胜利迎接祖国亲人的到来。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慰问，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他们在驻地和坑道口扎上松门，贴上“迎接亲人”、“以战斗的胜利迎接祖国人民的使者”等醒目标语，迎接慰问团的到来。他们说：“看到了祖国人民的代表，就好像看到了祖国五亿人民。”有一首贴在坑道口的快板诗这样写道：

春风吹过鸭绿江，
祖国亲人到前方，
带着温暖和希望，
来与子弟话短长。
见了久别亲人面，
个个心里暖洋洋，
好像见了毛主席，
又像见了爹和娘，
千言万语说不尽，
不知先说哪一桩。

这首快板诗真切地表达了志愿军指战员欢迎慰问团的心情。

他们把祖国来的亲人称自己为“最可爱的人”，视为最高的奖赏和无尚的光荣。他们表示：“最可爱的人一定要做最可爱的事，”“在祖国人民的关怀下，坚决打到底，打到胜利，打到美国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止。”

在慰问团慰问期间，各部队用许多辉煌的工作和战斗成果，作为向祖国亲人的献礼。装卸部队的一个连队，把装卸一车物资的时间从四分钟缩短到两分半钟。铁道兵的一支部队一夜就抢修好了被敌机炸毁的路轨。高射炮兵的一个连队，仅仅用16发炮弹就击落了一架在阵地上空盘旋的敌机。该连连长指着掉下来的敌机向慰问团的亲人说：“这就算是我们送给祖国人民和慰问团的礼物吧！”

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代表到达志愿军第三四六团进行慰问时，该团正受命准备强攻高旺山。负责主攻的两个连队，当即向慰问团代表提出保证：“坚决以战斗的胜利，来答谢祖国人民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热爱。”两个连迅速击败了敌军的抵抗，毙伤俘敌200余人，把慰问团赠送的红旗插到了高旺山上。

中国慰问团回国后的巡回汇报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祖国和支援前线的热情。他们在报告中所介绍的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模范事迹，都是最生动最实际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材，深深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志愿军的英雄形象，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加紧生产、勤奋学习的光辉榜样，对于当时全国开展的捐献武器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及其他各项工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事实充分表明，他们不但以一切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而且给了志愿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祖国慰问代表团的到来，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祖国建设的捷报，带来了全国人民的关怀、热爱和期望，还带来了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他们给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他最后强调说，“祖国，是我们的坚强后盾，祖国，永远是人民军队力量和胜利的源泉！”

第六十一章 尾 声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第二天，1953年7月28日21时，平壤举行了有10万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用124门火炮鸣放24响，欢呼庆祝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美国侵略者打了3年零33天的朝鲜战争，朝中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了两年零9个月的反侵略战争，至此以双方停火而结束。

在平壤市庆祝胜利的大会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荣誉称号，并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勋章。全场立即响起了暴风般的掌声。

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领袖、人民团体、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纷纷发来贺电。这些贺电表达了一个声音：“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是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和争取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朝中两国人民团结一致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胜利。”

授勋大会开过之后，彭德怀慢步返回房间，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不仅因为外面的歌声笑语彻夜不绝，也因为自己的激情难于成眠。这个晚上，他想了很多。两年来，他身上的担子是何等的重啊！经过惊涛骇浪，这个任务总算胜利完成了。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欣慰。他从心底里感激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感激广大军民的英勇奋战，特别是战斗在最前线舍生忘死的将士们。

第二天一清早，彭德怀简单地用过一些早点，就受到一群记者、作家和专家们的包围。大家前来，一是向他祝贺胜利，二是向他提些问题。当有人称颂他是常胜将军和创造奇迹的统帅时，彭德怀显得不安地说：“不！世界上百战百胜的将军是没有的。我彭德怀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就是在朝鲜，有些仗打得好，有些仗也打得‘不好。’”

“要说奇迹，一个人哪能创造奇迹？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奇迹的创造者。”彭德怀望了望大家，接着说，“朝鲜战场上的坑道工事，大概你们都住过了，现在人们称它是地下长城，挖出来的土石方，可以绕地球一周还多。难道这些是我彭德怀挖的？恐怕任何个人也挖不出来！我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份。”

“不应当夸大我彭德怀的作用。”彭将军继续说，“我们的统帅是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元帅。最初我们讨论出兵还是不出兵的时候，我在北京饭店一夜没有睡，把毛主席的话念了几十遍，才通了。”

经过这三年的斗争，对他的胆识，我体会得更深了。说实话，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把毛泽东主席看成老大哥，后来经过长征到达延安才感到他确实是我的好老师。”

彭德怀听到人们对他的称颂，从来都是不安的。他怕大家再说下去，就连忙向秘书使了个眼色，秘书会意地站起来说：“报告司令员，到前沿阵地出发的时间到了。”

彭将军告别记者们，驱车来到白岩山阵地，看望那里的指战员们。团长和政委请彭司令员到茅舍的正屋就坐，一边汇报工作，一边为司令员准备了简单的“小宴会”。只不过打开了几筒国内运来的罐头，炒了几个鸡蛋，加

了一碟辣椒。司令员边吃边谈。他问到在第二次战役中勇敢顽强的战斗英雄郭祥，是否在这个部队？团长告诉他，郭祥已担任营长，在最后一仗中，腿被打断了还坐在担架上指挥，任务完成得很好。战斗结束后才送到后方医院去了。

“选干部就要选这样的人！对革命忠诚、老实、勇敢、大公无私。关键时刻，这种人一个可以顶10个、100个、1000个！”彭德怀说，“对好的干部，有成绩的，就要表扬；有毛病的，不正派的，就要批评。你们说是不是？”在座的同志，对彭总这种刚直不阿，胸襟开阔，光明磊落的品格，十分钦佩。

饭后，彭德怀顾不得休息，坚持立即到白岩山去看望战士们。这时三连正在一座小山岗上掩埋烈士。他们按照团里的指示，准备把全团在最后一仗牺牲的同志，都埋在这个山包上，修个烈士陵园。彭德怀司令员步行着走了很远，来到山下，三连连长和指导员快步下山来迎接。附近的几十名战士也围拢过来，彭总看到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心里实在高兴。热情地同他们道了辛苦，一个一个地亲切握手。

彭德怀继续朝山岗走去，来到烈士陵园。他带着沉重的心情，一个墓一个墓地察看。当他发现有座墓前没有木牌时就停止了脚步，对修建陵园的部队干部说：“这里有的怎么没有插木牌呀？有的姓名、年龄、职务和籍贯也写得不清楚。不要怕麻烦，一定要设法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临时插个木牌可以，以后要换成水泥的。不是这些牺牲的同志，我们怎么来的胜利？！”

然后，彭将军来到停放烈士遗体的地方。他收住脚步，脱下军帽，默默地肃立着，站了很久很久。他在轻声地说：“谢谢你们，亲爱的同志们，不是你们英勇拼杀，哪会有今天的胜利！”热泪从两颊涔涔而下。彭德怀十分怀念在这场战争中长眠于异国土地上的中华儿女。没有他们的英勇献身，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就不会有今天的欢乐和胜利。他们是祖国的骄傲！他们虽然已经不能再回到自己的祖国了，但他们那一座座坟墓，包括无法知道姓名者，就是矗立在朝鲜土地上的无字丰碑。祖国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彭德怀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告别了锦绣的三千里江山，返回祖国。在北京火车站，他受到了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两千多人的隆重欢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首先代表全国人民向彭德怀司令员表示热烈、诚挚的欢迎和感谢。他说：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感谢你们。你们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是和平的胜利，民主的胜利，正义的胜利，最后，他振臂高呼：“光荣属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实践者！”“光荣属于战胜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中朝两国人民永远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和平胜利万岁！”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彭德怀司令员致答词。他说：“我怀着无限的兴奋和感激，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分别了两年多的伟大的祖国人民致敬！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敬！向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祖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到此为止，朝鲜战争虽然停止了，但美帝国主义并没有认真接受教训，他们又把侵略的魔爪向印度支那，伸向中东，伸向拉美。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从斗争中求独立，从斗争中求生存，从斗争中求发展，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为了独立和自由，
流血牺牲岂能惜！

朝鲜战争大事记

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

1950年6月26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

1950年6月27日 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以“紧急援助”南朝鲜为名，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

1950年6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1950年7月1日 美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5日与朝鲜人民军在乌山首次交战。

1950年7月7日 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同意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使用联合国的旗帜，并组织“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指定“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

1950年7月8日 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所谓联合国军其实主要为美国军队。另外，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派出了少量军队。

1950年7月8日 金日成首相发表演说，揭露和谴责美国侵略者盗用联合国名义进行侵略的野蛮罪行，号召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国侵略而坚决斗争。

1950年7月13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安全。

1950年8月中旬 朝鲜人民军推进至洛东江一线，解放了朝鲜南部广大地区。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1950年8月20日 周恩来外交部长致电联合国，支持苏联8月4日提出的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

1950年8月24日 周恩来外长向联合国提出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罪行的控诉案。

1950年8月25日 侵朝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将军被朝鲜人民军俘获。

1950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中国特种兵建设。

1950年8月27日 周恩来外交部长就美国空军侵犯中国领空事，向美国提出抗议，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1950年8月29日 联合国决定将中国控诉美军侵华案列入议程，并于9月29日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会议。1950年9月15日侵朝美军7万余人，在260多艘舰艇、近500架飞机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及其以南水原方向进攻。朝鲜人民军转入战略退却。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国庆节大会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1950年10月7日 美国侵略军不顾中国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并继续北犯，企图迅速占领全朝鲜。

1950年10月8日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与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国军委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准备立即入朝参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1950年10月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沈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参战决定，确定入朝作战方针。

1950年10月15日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谈，决定占领全朝鲜。

1950年10月19日 美国侵略军占领平壤，并继续向朝中边境鸭绿江进逼。同时，还不断以其空军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公然将战火烧向中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1950年10月21日 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在大洞会见，就稳定朝鲜战局问题进行了商讨和部署。

1950年10月25日 中共中央作出组成志愿军领导机构的决定，并任命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华兼副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进行第一次战役，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此役歼敌15000余人，挫败了敌人在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950年10月26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

1950年11月4日 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誓以全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坚决斗争。

1950年11月7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下入朝参战。此前，志愿军炮兵、工兵和铁道兵已分别入朝参战。

1950年11月13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共党委召开会议，制定作战指导方针和做出下一步作战部署。

1950年11月17日 毛泽东主席电示华东局、中南局，加强东南沿海战备。

1950年11月25日—12月24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将敌人驱逐至三八线以南。此役，共歼敌36000余人，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解放了三八线以南之瓮津半岛及延安半岛，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

1950年11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发表演说，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行。

1950年11月30日和12月16日 伍修权又在联合国发言，驳斥了美国代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答辩。中国代表在联合国讲坛上义正辞严的发言，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地位。

1950年12月3日 中朝两党两国政府商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

1950年12月4日—8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艾德礼举行会谈。承认遭到失败，但表示仍要坚持侵朝战争。

1950年12月22日 周恩来外交部长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一事发表声明。揭露了美方假和谈的阴谋，重申了

中国历来的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

1950年12月23日 美侵朝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在败退途中死亡。12月26日，马修·李奇微接替其职务。

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军三八线阵地，占领汉城。此役，共歼敌19000余人，解放了三十七度线以北广大地区。

1951年1月8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坚持侵朝战争，积极扩军备战。他要求美国国会将现役兵力增至350万人，每年生产5万架军用飞机和35000辆坦克，并向国会提出延长并修改兵役法等。

1951年1月17日 中国政府周恩来外长复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就朝鲜及其他远东诸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建议举行中、英、美、法、印度和埃及七国会议，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等远东有关问题。

1951年1月22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强调交通运输的重要性，提出了“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的口号，要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1951年1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彭德怀司令员作了《三个战役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志愿军的指示：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与朝鲜军民“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

1951年1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抗击敌人反扑。此役至4月21日结束。共歼敌78000余人，为举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2月2日 中共中央针对美帝正在对日进行片面媾和和策动蒋介石集团作进攻大陆的准备等情况，发出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在全民中广泛进行蔑视、鄙视、仇视美帝与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的教育。

1951年2月2日 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痛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而且侵越安全理事会权限的情况下，竟通过诬蔑中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1951年2月2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派代表归国，分赴全国各地汇报中朝人民军队抗击美国侵略军的英勇事迹。

1951年2月3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组织医疗队的通知。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先后组成40个志愿医疗队前往朝鲜战地服务。

1951年2月7日 中共中央军委为坚持长期作战，提出轮番作战的方针。

1951年2月1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下开始赴朝参战。之后，以陈赓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领导机构组成，并随即率部入朝。

1951年3月中旬 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成立，统一指挥中朝空军部队

作战。

1951年3月下旬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率领下，从3月底至5月中旬分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与朝鲜人民。

1951年4月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在金化郡上甘岭召开干部会议，部署第五次战役。

1951年4月11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推行其侵朝政策，协调其内部矛盾，撤销了麦克阿瑟远东军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遗职由李奇微接替，并任命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李奇微第八集团军司令职务。

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敌人的登陆计划、夺取战场主动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发起第五次战役。此役共歼敌8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此后，敌我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

1951年5月19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

1951年5月26日 毛泽东主席提出对美英军作战，目前应实行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原则。

1951年6月1日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忱，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入的发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这一决定，得到全国热烈响应，取得了很大成果。

1951年6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入朝参战。此前，中央军委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

1951年6月23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和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1951年6月30日 美国由于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严重失败，被迫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7月1日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

1951年7月10日 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7月26日双方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后因美方提出无理要求，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土地，致使谈判陷入僵局。

1951年8月18日 美方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对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并借以改善其在东部战线的防御态势，于8月18日开始，先后以美军两个师、伪军五个师的兵力向我发动了夏季攻势。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夏季防御作战。

1951年8月18日 美帝为了瘫痪我后方，在其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空军力量向我发动了以破坏铁路线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的“绞杀战”。中国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航空兵以及在后方的其他部队同朝鲜军民一起，同敌空军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线部队作战物资的供应。在反“绞杀战”期间，中国航空兵和后方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380余架，击伤1100余架。

1951年8月22日 美方飞机轰炸开城朝中谈判代表团住所，我方宣布谈判会议停开。此前，8月19日，美方武装人员在中立区又枪杀我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

1951年8月28日 中共中央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建议，决定10月25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1951年9月17日 中央军委发出加强海防、防敌登陆的指示。东西海防指挥部相继成立。宋时轮和韩先楚分别兼任东、西海防司令员。

1951年9月18日 敌人发动的历时1个月的夏季攻势被我粉碎，此役共歼敌78000余人。

1951年9月29日 敌人夏季攻势被粉碎后，不甘心失败，又以9个师的兵力（其中美英6个师，伪军3个师）发动秋季攻势，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中朝屈服。经24天激战，至10月22日，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共歼敌79000余名。

1951年10月23日 毛泽东主席在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致辞，号召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大会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

1951年10月2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25日进入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至1951年10月10日，一年来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387000余人，其中美军176000余人，击毁和缴获敌战车945辆，各种炮3558门，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2310架。

1951年10月23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

1951年10月25日 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

1951年10月30日 美发动夏秋局部攻势失败、被迫与中朝恢复停战谈判以后，仍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志愿军为对敌施加压力，促进停战谈判，并收回一些阵地，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举行局部反击。从10月30日开始到11月底止，先后对敌营以下兵力举行小规模反击34次，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

1952年1月18日 由李雪三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由洪淳哲率领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一行270人抵达北京，并随即分赴全国各地访问。

1952年1月28日 美帝不顾国际公法，于1952年1月开始，秘密地对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了细菌战，企图以此制造疫区，残害中朝人民，削弱我军有生力量。中朝军民全面开展了反细菌的斗争。

1952年2月24日 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3月3日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等国际组织，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3月12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4月7日 彭德怀司令员回国，其职务由陈赓代理。

1952年4月2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召开兵团和军参谋长会议，总结坑道工事构筑经验。至5月底，志愿军第一防御地带的坑道工事及与之相配系的各种野战工事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1952年4月28日 杜鲁门总统任命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1952年5月5日 新华社从这天起,至1953年11月22日止,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战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

1952年5月7日 巨济岛朝中被俘人员为反抗美国侵略者残害和强迫扣留战俘,扣留了美战俘营负责人弗兰西斯·杜德准将。

1952年6月11日 陈赓奉调回国,由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52年6月23日 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为了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施加军事压力,配合其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下令对朝鲜北部城市和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朝鲜北部78个城市均遭到了敌人的轰炸破坏。

1953年6月24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人民功臣授勋。

1952年7月11日 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十九兵团司令员。

1952年9月18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发起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历时44天,先后对敌60个目标进攻77次,共歼敌27000余人。

1952年10月8日 美方片面宣布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1952年10月14日 侵朝美军为配合停战谈判,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志愿军在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即有名的上甘岭战役。至11月25日,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守住了阵地,并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25000多人。

1952年10月24日 中朝人民军队司令部联合发表两周年战报。自1950年10月25日至1952年10月15日,共歼敌661034名,其中美军占291011名,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7323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坦克2247辆,击毁和缴获敌各种炮4280门。

1952年10月25日 志愿军隆重举行庆祝出国作战两周年大会。

1952年12月2日 美国新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从12月2日至5日到朝鲜进行视察,并与侵朝美军将领和李承晚举行了会谈。

1952年12月20日 为了防止敌人进行登陆冒险,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更大胜利》的指示。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从而迫使敌人放弃了进行登陆冒险的企图。

1953年1月 中央军委任命李志民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1953年2月7日 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他严正宣告:“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1953年4月10日 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就交换病伤战俘达成协议。

1953年4月18日 为执行干部轮换计划,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志愿军参谋长,许世友为第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为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勇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轮换原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第十

九兵团司令员韩先楚、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回国。

1953年5月13日 鉴于美方仍在拖延停战谈判,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斗争,志愿军决定立即开始夏季反击作战。此役共毙伤俘敌41000余名。

1953年6月8日 停战谈判就战俘安排问题达成协议。从此双方进入重新校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

1953年6月17日 李承晚集团在美方纵容下,破坏遣俘协定,强行扣留我方战俘27000余名。与此同时,还公开叫嚣反对实现停战。

1953年6月19日 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克拉克,要求美方立即追回李承晚集团以“释放”为名擅自扣留的朝中被俘人员。

1953年7月13日 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破坏停战的行为,志愿军集中5个军的兵力、1000余门火炮,向金城方向李伪军4个师防守的25公里宽的弧形战线发起进攻,即金城战役。7月27日战役结束,我军向前推进了9.5公里,扩大阵地面积达170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78000余人,连同第一、二次进攻,整个夏季战役共毙伤俘敌123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谈判双方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于当天成立了军事停战委员会。

1953年7月27日 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命令还要求朝中部队坚决遵守停战协定,并保持高度戒备,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行为。

1953年7月27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公报称:自1950年6月25日至本日止,共毙伤俘敌军1093839名,其中美军397543名,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12224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6064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

1953年7月31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3年10月4日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编为8个分团)一行4000余人,在总团长贺龙率领下赴朝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12月中旬,慰问团人员先后离朝回国。

1953年10月27日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人和英雄、模范、功臣代表以各种勋章和军功章。据统计,全军立三等功以上的功臣有30多万人;其中特等功臣217名,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有6100多个。

1954年9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辞职,邓华任志愿军司令员。之后,1954年10月至1958年10月期间,志愿军司令员先后由杨得志、杨勇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先后由李志民、王平担任。

1958年2月14日 周恩来总理赴朝访问,商谈志愿军撤军问题。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10月24日 平壤市各界隆重集会欢送志愿军官兵。当晚金日成首相举行盛大欢送宴会。金日成致辞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所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它将永远记载在进步人类的史册上”。

